

119.132

853

:18

列 寧 選 集

第 八 十 卷

1943

解 放 社 出 版

列 寧 選 集

第 十 八 卷

出版者 解 放 社

發行者 新 華 書 局

校閱者 張 仲 實

一 九 四 六 年 七 月 出 版

校閱者底話

本卷所收集的是列寧關於共產國際的一些重要著作或摘要，共分為三大編：一、齊美爾瓦德國際之破產與第三國際之成立；二、共產國際底基本原則及其第二次代表大會；三、共產國際第三第四兩次代表大會。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列寧在這些著作裏面，把蘇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底鬥爭，和殖民地及附庸國度裏爭取消滅封建主義殘餘和推翻帝國主義羈絆底鬥爭，以及帝國主義國度裏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底鬥爭，聯系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世界革命過程」（俄文版編輯部序言）。他在這些著作裏面，不僅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和實現其任務的鬥爭中的戰略和策略，而且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無產階級政黨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戰略和策略（尤其是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國際之戰略和策略等等），都作了明確而具體的指示。列寧底這些著作，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兩條戰綫——反對右的機會主義與「左」的宗派主義的鬥爭，也提供了最好的範例。

列寧底有名的小冊子「左派」幼稚病全文收在這裏。

這本小冊子本來早已有中文譯本出版，但爲慎重起見，這次又根據俄文原文和英文譯本，重新校閱了一遍；並根據列寧全集，添加了人名註釋。其餘各文，都是根據德文譯本翻譯，對照俄文原文校閱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

119.132
253
118



3 0406 3019 0

目 錄

第一編 齊美爾瓦德國際之破產與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之成立

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的

任務（無產階級政黨綱領草案）…………… 2—15

社會主義國際內部的實況…………… 2

齊美爾瓦德國際之破產。——必須要建立第三國際…………… 10

論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 16—27

我黨在國際中的任務

（關於第三次齊美爾瓦德會議）…………… 28—31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詞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32—33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 34—35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位置…………… 36—46

第二編 共產國際底基本原則及 其第二次代表大會

第三國際底任務（麥克唐納論第三國際）…………… 48—64

45030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64—237

- 一、在那個意義上才可以講
 俄國革命底國際主義？64
- 二、布爾塞維克成功底基本條件之一67
- 三、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底幾個主要階段71
- 四、布爾塞維主義是在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
 敵人作鬥爭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77
- 五、德國共產黨底「左派」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87
- 六、革命者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97
- 七、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109
- 八、不作任何妥協麼？122
- 九、英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136
- 十、若干結論152

增 補

- 一、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171
- 二、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174
- 三、意大利的杜拉第及其同盟177
- 四、從正確的前提中做出錯誤的結論179

註 釋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238—240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底主要任務提綱.....241—261

- 一、無產階級專政及蘇維埃政權底本質242
- 二、應如何立刻並隨處準備無產階級專政246

- 三、加入共產國際或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
各黨底路線以及部分的成分之糾正.....256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底基本任務（一九二〇年七月
二十九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262—285
- 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286—293
- 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演說（一九二〇年七月
三十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294—301
- 共產黨底作用（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在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302—306
- 土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而作）.....307—321
-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而作）.....322—330
- 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國際之戰略和策略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
大會上的報告）.....331—338
- 論國會主義（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在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339—343
- 論德國和法國工人的一封信
（論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辯論）.....344—346
- 關於自由的理論.....347—368

第三編 共產國際第三和
第四次代表大會

意大利問題（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370—378

擁護共產國際底策略（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378—390

給德國共產黨人的一封信……391—405

我們所付的代價太大了……406—411

政論家札記（論登高山；論沮喪之害；論
商業之利益；論與孟塞維克之關係等等）……412—422

 一、一個例子……412

 二、不用比喻……414

 三、論捉狐狸；論茶壺；論塞拉德……417

論反戰問題（給布哈林、季諾維也夫、莫洛托夫
的一封信）……423—423

關於我們赴海牙代表團任務問題的札記……424—428

俄國革命底五年與世界革命底展望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四次
大會上的報告）……429—447

第一編

齊美爾瓦德國際之破產

與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之成立



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的任務

——無產階級政黨綱領草案——

社會主義國際內的實況

(一六) 俄國工人階級底國際義務，正是在現在特別有利地提到前列了。

現在不宣誓相信國際主義的，只有懶漢，就是沙文主義者國防派，就是普列哈諾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就是克倫斯基，也自命為國際主義者了。因之，無產階級政黨底迫切義務，就是十分明確地、確切地、肯定地用實際上的國際主義去和口頭上的國際主義對立起來。

向全世界工人發表空洞宣言，空說自己盡忠於國際主義，企圖直接或間接規定各交戰國無產階級革命發動底「次序」，努力在各交戰國社會黨人間訂立關於革命鬥爭的「協定」，忙碌於召集社會黨大會以便從事和平運動，以及其他等等，——這些思想、這些企圖和這些計劃，無論其

● 本文在這裏僅選了兩章，全文見本選集第十卷 ●

——校閱者

作者如何誠實，但從其客觀意義上看來，都只是一些空話，最多也只是一種幼稚的善良的希望，只適於掩飾沙文主義者對於羣衆的欺騙。在國會欺詐主義的手法上最狡猾最老練的法國社會沙文主義者，早已打破了高呼空前響亮和動聽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辭句的記錄；但同時却實行空前可恥的對於社會主義和國際的叛變，加入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投票贊成信用貸款或贊成借款（如像齊赫芝、斯科比列夫、蔡雷特里、斯節克洛夫等近來在俄國所幹的那樣），反對本國的革命鬥爭等等。

好人常常忘記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底殘暴和兇惡的境况。這種境况，不容忍空談，它嘲笑那幼稚的甜蜜的願望。

實際上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即熱忱工作，以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並援助（以宣傳、同情、物質上）各國（無一國例外）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綫，而且只能幫助這種鬥爭。

除此以外，其餘都是欺人之談和曼尼洛夫式的夢想。

兩年多的戰爭以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在各國造成了三種派別；誰要是不切實承認這三種派別，切實分析它們，切實爲真正的國際主義派作澈底的鬥爭，誰就是自陷於軟弱無力、無辦法和錯誤之中。

三種派別如下：

（1）社會沙文主義派，即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則是沙文主義者；這些人，承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首先是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

這些人是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已經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各國正式社會民主黨底正式領袖們，大多數都是如此。俄國的普列哈諾夫這般先生們，德國的謝德曼輩，法國的倫諾德、黑德、山巴等，意大利的比梭拉底等，英國的海德曼、費邊派和「工黨派」，瑞典的勃朗亭等，荷蘭的特魯爾斯特和他的黨，丹麥的斯多寧和他的黨，美國的伯格爾及其他「保護祖國派」。

(2) 第二派人，即所謂「中派」，這些人搖擺於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之間。

「中派」宣誓，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國際主義者，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對政府的多方「逼迫」，贊成多方「要求」本國政府去「表明人民底和平意志」，贊成各種各樣的和平運動，贊成不割地的和平等等，——同時也贊成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的和平。「中派」贊成「統一」；中派是分裂之敵人。

「中派」是善良的小資產階級的誇誇其談，口頭上的國際主義，實際上的胆小的機會主義和向社會沙文主義者阿諛獻媚的走國。

問題底焦點，即在「中派」不相信有進行革命來反對本國政府之必要，不宣傳革命，不進行獻身的革命鬥爭，而臆造最卑鄙的——好像極帶有「馬克思主義」口吻似的——放棄革命的遁辭。

社會沙文主義者，是我們的階級敵人，是工人運動中

的資產者。他們代表着工人底一定階層、集團，這些工人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所收買（高等工資、尊貴地位等），幫助自己資產階級掠奪和壓制弱小民族，幫助資產階級為瓜分資本主義賊物而鬥爭。

【中派】是為腐敗的合法性所腐化了的、為國會主義等環境所弄壞了的老頑固派，是慣坐高貴位置和慣作【平安】工作的官僚們。在歷史上和經濟上講來，他們並不代表一種特殊階層；他們只是從工人運動過了時的階段，從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的階段（這個階段，給無產階級以許多寶貴的經驗，特別是對無產階級所必需的一種藝術：緩慢地、堅毅地、有系統地、廣泛地和最廣泛地進行組織工作）轉到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從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發生以來，在客觀上已成為必要的了；這次戰爭，展開了社會革命底紀元）之過渡東西。

【中派】底主要領袖和代表是考茨基，他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最有名的權威，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以來馬克思主義完全破產底榜樣，是絕頂無氣節的人物底榜樣，是最可憐的動搖和叛變底榜樣。【中派】在德國有考茨基、哈薩、列德堡和國會內的所謂【勞動友誼社】；在法國有龍格、普列斯曼和一般所謂【少數派】；在英國有斯諾登、麥克唐納爾及獨立工黨和一部分英國社會黨底許多首領；在美國有喜爾克維特等；在意大利有杜拉第、特列佛斯、毛底連尼等；在瑞士有格里姆等；在奧大利有阿德勒之流；在俄國有組織委員會派、阿雪洛德、

馬爾托夫、齊赫芝及蔡雷特里等等。

很明顯地，個別的人物，有時不知不覺地從社會沙文主義底立場轉到【中派】底立場，或是從中派底立場轉到社會沙文主義底立場。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不管個人從一個階級自由轉到別個階級，但各個階級總是各不相同的；同樣，在政治生活上，不管個人從這一派自由轉到那一派，不管他們企圖和努力把各派融合在一起，但各個派別總是各不相同的。

（3）第三派是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齊美爾瓦德左派】最能切近表現他們的主張（在附錄內，我們轉載有他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所發的宣言，以便讀者能夠根據真正的文件而了解這派底產生）。

主要的特徵，就在他們和社會沙文主義及【中派】之完全破裂。他們和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進行不怕犧牲的革命鬥爭。他們的原則：【主要的敵人，是在本國】。無情地反對社會和平主義者（社會和平主義者乃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夢想不要推翻資產階級的壓迫和統治而獲得永久的和平）的甜蜜詞句和各種遁詞，這些遁詞就在否認與這次戰爭相聯系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性或適宜性、或及時性。

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國是【斯巴達克團】或【國際社】，卡爾·李卜克內西即為其一員。李卜克內西是這

派的和新的真正無產階級「國際」底最有名的代表。

李卜克內西曾經號召德國底工人和兵士倒戈反對自己的政府。李卜克內西，在國會講台上曾經公開地這樣號召。以後，他就跑到卜特司達場上（柏林最大廣場之一）向遊行羣衆散發非法印刷的宣言，號召「打倒政府」。他於是被捕，被罰作苦工。他現在坐在德國的苦工監獄裏，而德國數百（倘不是數千的話）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也都因反對戰爭而坐在牢獄內。

李卜克內西在演說與信扎上，不但與本國的普列哈諾夫們、波特列索夫們（即謝德曼、列根、達維特之流），並且還與本國的「中派」，與本國的齊森芝們、蔡雷特里們（即考茨基、哈薩、列德堡之流）作了無情的鬥爭。

一百一十個國會議員中，只有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奧多·魯列曾破壞了紀律，毀壞了和「中派」及沙文主義者的「統一」而反抗了全體議員。只有李卜克內西一人代表了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事業、無產階級革命。其餘一切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借用威森堡（她也是「斯巴達克團」底會員和領袖之一）底正確的話來說，已成為腐屍了。

德國另一個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的團體，是布立門的工人政治報。

在法國，最接近於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的，有洛里歐和他的朋友（布博龍和麥爾赫已陷於社會和平主義），以及在日內瓦發行明天雜誌的法國人基爾波；在英國，有工聯主義者報和不列顛社會黨及獨立工黨底一部分黨員（如

呂賽曾公開號召與已經叛賣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實行分裂），蘇格蘭的國民教師社會主義者馬克林（因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曾為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工作苦工）；英國數百社會主義者，都因同樣的罪名而坐在牢中。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是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在美國，有「社會工黨」和在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內部那些自一九一七年一月起出版國際主義者報的分子；在荷蘭，有發行論壇報的「論壇派」（班業康克、郭泰、文柯伯、羅爾霍列斯特），在齊美爾瓦德會議上他們曾是中派，現在歸到我們方面來了；在瑞典，有少年黨或左派黨，以林特哈根、納爾曼、卡爾遜、斯特立姆、赫龍德等為領袖，赫龍德曾在齊美爾瓦德會議上親身參加「齊美爾瓦德左派」的建立，現因進行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被判入獄；在丹麥，有特立爾及其朋友，他們退出了斯多寧總長所領導的完全變成資產階級政黨的「丹麥社會民主黨」；在保加利亞，有「吉史涅克」；在意大利，最接近於國際主義的有社會主義黨底書記拉撒里和中央機關報前進底編輯塞拉第；在波蘭，有拉狄克、甘業茨基及其他統一於「邊疆管理委員會」之下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此外還有盧森堡、提史科及其他統一於「總管理委員會」之下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在瑞士，有草擬「全體表決」理由書（一九一七年一月）來和本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中派」爭鬥的左派，他們在日內瓦的蘇黎支州社會黨大會上（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原則上革命的反對戰爭的決議；在奧地利，有弗里德里

赫·阿德勒底左派青年朋友，其中局部地曾是在維也納【馬克思俱樂部】內活動的；這俱樂部，現在已爲奧大利最反動的政府所封閉，奧大利政府因阿德勒英勇地——雖然是冒昧地——槍擊總長，正在追究他。

事情並不在色彩底濃厚上，這種色彩底濃厚，就在左派中間也是有的。事情是在派別上。在可怕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時代，要作個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不是容易的事，這就是問題底全部實質。這樣的人是很少的，但是社會主義底整個將來，却只在他們身上，只有他們才是羣衆底領袖，而不是羣衆底敗壞者。

在帝國主義戰爭底環境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一般社會主義者中間，改良派與革命派底分別，客觀上勢必要遭受變化的。誰只限於向資產階級政府【要求】締結和約或【表明人民底和平意志】等等，那誰實際上就陷於改良上去了。因爲戰爭問題，客觀上只有用革命方式才能提出的。

要從戰爭轉到民主的非暴力的和平，轉到各國人民底解放，使之解脫那【靠戰爭】而發財的資本家老爺們底無數萬萬利息之盤剝，——要做到這點，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其他出路了。

對於資產階級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要求各色各樣的改良；但爲要不陷於夢想主義和改良主義起見，就不能要求爲帝國主義資本底千百條繩索所網繫着的這些人們和階級斬斷這些繩索；而不斬斷這些繩索，則關於用戰爭反對戰

爭的這一切話，都是空洞的騙人的辭句。

「考茨基派」，「中派」，是口頭上的革命者，實際上的改良主義者；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者，實際上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底幫兇。

齊美爾瓦德國際之破產。——必須 要建立第三國際

(一七) 「齊美爾瓦德國際」，一開始就站在動搖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場上；因此齊美爾瓦德左派就不得不立刻劃清界限，獨樹一幟，而發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齊美爾瓦德國際」底主要缺點，其破產（因它已經遭受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破產）底原因，就是在最重要的實際上決定一切的問題上動搖，不堅決；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和社會沙文主義以及和海牙（荷蘭）社會沙文主義的老國際（以萬德威爾，九思曼等爲首）完全分裂的問題。

在俄國還有人不知道，「齊美爾瓦德國際」的多數，正是考茨基派。可是這是一個不能不顧到，並且在西歐已爲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實。就是沙文主義者，德國極端的沙文主義者，極端沙文主義的海姆尼茨報之主筆和極端沙文主義的巴烏斯的雙鐘報之職員蓋立曼（自然是「社會民主黨人」，並且是拚命主張社會民主黨「統一」的人），也不

得不在報上承認：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齊美爾瓦德的多數，是一個東西。

在一九一六年末和一九一七年初，就已經完全確定了這個事實。不管昆泰爾的宣言，怎樣斥責社會和平主義；但整個【齊美爾瓦德國際】的右派，整個【齊美爾瓦德國際】的多數，都滾到社會和平主義方面去了：考茨基及其同伴，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和二月的許多演說中，已有這種表現；法國的布德龍和麥爾赫，和社會沙文主義者一致投票贊成社會黨大會（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及【勞動總會】大會（即是法國工會全國的組織，也召集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底和平主義的決議*；意大利的杜拉第及其同黨也是如此，那裏全黨都站在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上，而杜拉第本人，則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七的演說中，甚至【脫口說出】（自然不是偶然的）了民族主義的、掩飾帝國主義戰爭的話來。

齊美爾瓦德會議和昆泰爾會議底主席格里姆，在一九一七年一月，竟與其本黨內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格萊赫立、柏斐留格、苗勒爾等），聯合起來反對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

* 關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法國社會黨】和【勞動總會】底和平主義的決議，可參閱列寧選集第九卷內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主義一文。

在各國齊美爾瓦德派底兩次會議上（一九一七年一月和二月），「齊美爾瓦德國際」多數底這種兩重性的兩面性的行動，曾被幾個國家底左派國際主義者，如「少年國際同盟」底書記和極好的國際主義報紙少年國際底主筆苗春堡；我黨中央代表季諾維也夫；「波蘭社會民主黨」（「邊疆理事會」）代表拉狄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斯巴達克團」團員哈特史坦等，正式加以痛罵。

俄國的無產階級，得了許多的東西；全世界上還沒有一處的無產階級，曾經做到了像在俄國那樣地展開了革命的毅力。誰得的多，要求於他的也多。

再不能容忍齊美爾瓦德的泥坑了。再不能爲了「齊美爾瓦德國際」的「考茨基派」，而和普列哈諾夫與謝德曼輩的沙文主義的「國際」，仍舊保持半聯系了。應該立刻和這個「國際」斷絕關係。留在「齊美爾瓦德國際」，只是爲着傳達消息。

正是我們，正是在現在，應該急不容緩地建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更正確些說，我們不怕高聲承認，這個國際，已經建立起來，並且正在活動着。

這是我在上面所確切列舉的那些「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之「國際」。他們，只有他們，才是革命國際主義的羣衆之代表，而不是敗壞羣衆之人。

如果以爲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數量太少；那末就讓每個俄國工人可以自問一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革命之前夜，俄國覺悟的革命者，究竟多不多呢？

事情不在數量上，而在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思想和政策之正確表現上。問題底實質，不在「宣佈」國際主義，而是在甚至在最困難的時候，善於做個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

我們不要以成立協定和召集國際大會之希望來欺騙自己。只要帝國主義戰爭延長一天，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軍事專政的鐵壓機，國際間的來往關係就受壓縮一天。甚至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附屬政府的「共和派」，米留科夫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也不放瑞士的社會主義者伯拉登（瑞士社會黨書記，國際主義者，齊美爾瓦德會議和昆泰爾會議底參加人）進入俄境；雖然他娶了個俄國老婆，要來看老婆的親戚，雖然他在里加參加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因而坐過俄國的監獄，為要獲得自由，曾納過保證金給沙皇政府，而現在想取回這筆保證金；雖然如此，但米留科夫不放他進入俄境。倘然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共和派米留科夫能在俄國幹這種事，那末資產階級關於不割地的和平之種種允許、預約、辭句和宣言等等，有什麼價值，自可不言而喻。

英國政府逮捕托洛茨基的事情如何呢？不放馬爾托夫出瑞士，希望把馬爾托夫誘到英國去，使之和托洛茨基受同樣的命運，這些事實又是如何呢？

我們不要自作幻想。不要自欺。

「等待」國際大會或會議，那是說成了國際主義之叛徒，因為我們已經證明，甚至既不許忠於國際主義的社會

黨人從斯托哥爾姆到我們這裏來，甚至又不准把他們的信寄給我們，雖然當局完全可以作最嚴密的軍事檢查，來審察這些信件。

我們的黨不應「等待」，而應立刻建立「第三國際」，——那時德國和英國監獄中的千百社會主義者將容易地呼吸一下，——成千成萬的德國工人（現在正在舉行那些爲德皇威廉這個混蛋和強盜所害怕的罷工和示威）將在非法的傳單上，讀到我們的決議，讀到我們對於李卜克內西（只對於他）的兄弟般的信任，讀到我們現在也在反對「革命的保衛主義」的決議；他們看到這點之後，便會在自己革命的國際主義中鞏固起來。

誰得的多，要求於他的也多。全世界上，現在沒有一國有如俄國這樣的自由。我們現在利用這種自由，並不是去宣傳資助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革命的保衛主義」，而是要勇敢地忠實地本無產階級的、李卜克內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國際；這個國際，無論與社會沙文主義者叛徒們，無論與「中派」動搖分子們，都是勢不兩立的。

（一八）我講了上面這些話以後，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談不到統一的問題，已不必多費口舌了。

寧可只剩兩人，如李卜克內西一樣（這就是說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留在一起），而不可片刻保存與「組織委員會」派，與齊赫芝及察雷特里等聯合的思想；這些人在工人報上與波特列索夫締結聯盟，他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裏面投票贊成發行借款，他們已滾到「保衛主

義」方面去了。

讓死者去埋葬自己的屍體吧！

誰想要幫助動搖的人，那他就應當先從自己中止動搖開始。

論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

現在許多人又對於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發生興趣了。關於它底意義的問題已經在報紙上熱烈地討論過了。這個問題是和對整個現代社會主義基礎本身的估價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尤其是在它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上。因此，我們必須更詳細地把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討論一下。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即布爾塞維克，從一開始就聲明反對參加這次代表會議的。他們在這一點上是從原則的根據出發的。誰都知道，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在一切國家，不論是在交戰國或中立國，在對於戰爭的態度問題上，已經分成了兩個大的根本上不同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站在他們底政府方面，站在他們底資產階級方面。我們把他們叫做社會沙文主義者，就是說，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的沙文主義者。凡是用『保衛祖國』這個名詞來保衛『自己的』統治階級底掠奪利益的人，我們把他叫做沙文主義者。在目前的戰爭中，交戰雙方的資產階級都追求着掠奪的目的：德國資產階級爲着掠奪比利時、塞爾維亞等等而戰，英國和法國資產階級爲着奪取德國的殖民地等等而戰，俄國資產階級爲着掠奪奧大利（羅夫）、

土耳其（亞美尼亞，君士坦丁堡）而戰。

因此，凡是在這次戰爭中站在本國資產階級立場上的那些社會主義者，都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了，他們已經背叛工人階級了，實際上已經轉到資產階級底營壘中去了。他們已經變成了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歐美社會主義底歷史，尤其是第二國際時代，即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這一時期的歷史，告訴我們，一部分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大多數領袖和議會主義者之這樣地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並不是偶然的。在一切國度裏，恰恰是社會主義底機會主義的一翼構成了社會沙文主義底基本幹部。假如我們把社會沙文主義科學地加以觀察，即不拿個別的人物來講，而當作其發展中的一個完整的國際思潮來講，從其社會聯系之總體來講，那末，社會沙文主義就是邏輯上貫徹到底的機會主義。

在無產階級的羣衆當中，到處都可以多少明顯而尖銳地看到一種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叛賣社會主義的意識，對於最著名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如俄國普列哈諾夫、德國謝德曼、法國黑德、倫諾德及其一派，英國漢德曼等等，等等的憎恨與輕視。

在戰爭時期，不管資產階級如何絕望地迫害他們，不管資產階級如何努力想塞住他們的口，可是，在一切國度裏面，革命的國際主義派仍然形成了。這一派始終是忠於社會主義的。他們沒有向沙文主義屈服，他們不容許用保衛祖國的騙人的詞句來掩飾沙文主義，相反，而是揭發這

類詞句底全部欺騙性，揭發目前兩大集團底資產階級爲掠奪目的而進行的戰爭之全部罪惡。屬於這一派的，有英國的馬克林，他因爲反對強盜的英國資產階級而被判處一年半的苦役；有德國的卡爾·李卜克內西，他因在德國號召革命和從德國方面揭穿戰爭之掠奪性這種「罪狀」而被德國帝國主義強盜判處做苦役了。屬於這派的，還有俄國的布爾塞維克，他們以同樣的「罪狀」，以緝捕馬克林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罪狀」，而被俄國共和民主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所緝捕。

只有這一方向是唯一忠於社會主義的方向。這一個方向沒有叛變那關於自己信仰的莊嚴宣言，沒有叛變那全世界、毫無例外地一切國度的社會主義者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巴塞爾宣言上一致簽字的莊嚴的諾言。這個宣言所講的，恰恰不是關於一般戰爭——有各種各樣的戰爭——而恰恰是關於在一九一二年人所共知的準備好而在一九一四年爆發的戰爭，恰恰是關於德國和英國在連其一切同盟國之間爭取世界霸權的戰爭。而在這種戰爭的面前，巴塞爾宣言並沒有一字提到社會主義者有「保衛祖國」（他們參加戰爭的理由）的義務或權利，相反地，它卻以十二分肯定的語氣說，這樣的戰爭必須引導到「無產階級的革命」上面去。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之叛變社會主義，從下面的事實上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來：即他們現在像賊躲開偷過東西的地方一樣，竟然胆怯地躲開巴塞爾宣言中說到目前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聯系的地方。

顯然的，在那些始終忠於巴塞爾宣言，並以宣傳和準備無產階級革命去「回答」戰爭的社會主義者跟那些以擁護「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去回答戰爭的社會沙文主義者之間存在着一條怎樣的不可越過的鴻溝啊。人們懂得，那想「調和」或「統一」這兩個派別的努力，是怎樣地無聊、幼稚和虛偽啊。

在世界社會主義中的第三個流派，所謂【中派】或【考茨基派】（由【中派】底最著名的代表考茨基名字來的）方面，正可以看到他們貧乏的陣痛。在整整三年的戰爭期間，該派在一切國度內暴露了它的毫無思想和不可救藥。例如在德國，事變底進程會迫使考茨基派不得不和德國的普列哈諾夫們分裂，而組織一個特殊的，所謂【獨立社會民主黨】；但是這個黨還是害怕做出必要的結論，而宣傳在國際範圍內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的【統一】；繼續拿希望在德國恢復這種統一的辦法去欺騙工人羣衆；阻礙那反對「本國」政府的革命鬥爭的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的策略，這種鬥爭，在戰爭時期，可以而且應該改變自己的形式，但它是不能延緩，延宕的。

這就是國際社會主義內底實況。對於這種狀況沒有明確的估價，對於國際社會主義底這些派別沒有原則上的觀點，那就不能討論如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這樣的實際性的問題了。但是，只有布爾塞維克黨才能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舊曆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的代表會議上所通過、並經八月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所批准的詳細

決議裏邊關於國際社會主義底一切派別加以原則上的估價。忘記這種原則上的估價，不注意它而高議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那就是說，站在完全無原則性的立場上了。

這種無原則性盛行於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中間，可以八月二十三日（舊曆十日）新生活上面的一篇文章作為這種無原則性的榜樣。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正因為它集合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極左翼底報紙上關於斯托哥爾姆的最流行的錯誤、偏見和毫無思想之大成。

「人們可以——新生活的社論說——根據這個或那個理由對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持否定態度；也可以在原則上非難「保衛派多數」底調停嘗試。但是，為什麼要否認那一目了然的事情呢？在英國工人底有名的會引起了該國政治危機而在英國「民族統一」中造成了第一個深刻裂痕的決議以後，會議終於得到了它迄今還沒有過的意義。」

這種議論乃是無原則性底範本。事實上，怎樣爲了因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而在英國「民族統一」上造成深刻裂痕的這種毫無成果的事實，便得出結論說，彷彿我們一定要彌補這個裂痕，而不要加深它呢？原則上的問題是這樣的，而且只有是這樣的：與「保衛派」（社會沙文主義者）決裂呢，還是和他們妥協？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乃是許多調解的嘗試之一，它失敗了。它之所以失敗，是由於英法帝國主義者現在還不願意議和，而德國帝國主義者則

同意這樣做。英國工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了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他們的欺騙。

現在就問，必須怎樣來利用這一點呢？我們是革命的國際主義者，我們說：必須利用這來加深無產階級羣衆和本國社會沙文主義者之分裂，使這個分裂澈底完成，掃清羣衆反對本國政府，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發展中的一切障礙。這樣的活動時，恰恰是我們，也只有是我們，才能加深着這種裂痕，直至分裂。

但是，前往斯托哥爾姆，或者正確些說，向羣衆說教有到那兒去的必要的人們，在現在，在生活已經『斷送』了這種把戲的時候，他們在實際上會得到什麼呢？只能彌補裂痕而已；因為有意召集和支持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的，顯然是一些擁護本國政府的人們，是部長主義者車爾諾夫和蔡雷特利，斯多寧，勃朗亭，特魯爾斯特，至於謝德曼們，那更不必說了。

這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這就是新生活底機會主義者們，在不把社會沙文主義當做一種派別加以一般的估計，而只是完全無原則地推論時，所忘記或所塗抹的事情。斯托哥爾姆代表會議乃是加入各帝國主義政府的部長們之空談。那怕新生活怎樣努力想迴避這一事實，但是你是迴避不了它的。號召工人們到斯托哥爾姆去，號召他們等待斯托哥爾姆會議，號召他們對斯托哥爾姆抱持某種希望，這就等於向羣衆說：『你們可以，你們必須從小資產階級底政黨和坐在帝國主義政府裏面並擁護帝國主義政府

的部長們之諒解中等待一些好的東西。】

新生活恰恰是在不自覺地做着這種極度無原則的、極有害的宣傳。

新生活爲了英法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他們的政府之間的衝突，而忘記了，車爾洛夫們，斯科比列夫們，蔡雷特特里們，阿克生替也夫們，勃朗亭們，斯多寧們，謝德曼們，都是自始到終擁護自己政府的社會沙文主義者。難道這不是無原則性嗎？

新生活不是向工人們說：你們看吧，英法帝國主義者甚至不容許自己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去和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談判，這就是說從英法方面講，戰爭也是一種掠奪性的戰爭，這就是說，除了和一切政府，和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澈底決裂之外，再沒有別的出路，——而它竟以幻想安撫工人。

【人們準備在斯托哥爾姆——該報這樣地寫道——獲得一些關於和平的一致意見，並共同製定一個一般的鬥爭計劃：對信用借款，拒絕投票，與「民族統一」決裂，從政府撤召回閣員，等等。】

這些澈頭澈尾地欺人的詞句，其全部證據，就在於【鬥爭】兩字加傍點印出。不用說，這是一個多麼好的證據啊！

在三年戰爭之後，還用些空洞的諾言來飼養工人們：【準備在斯托哥爾姆】與民族的統一決裂。

誰準備這樣做呢？是謝德曼們，車爾洛夫們，斯科比

列夫們，阿克生替也夫們，蔡雷特里們，斯多寧們，勃朗亭們等等，就是說，正是有的幾年以來，有的幾個月以來幹着民族統一政策的一般人（或政黨）。不管新生活怎樣真誠地相信這樣的奇蹟，不管它怎樣誠實地相信這種事情是可能的，但我們仍然必須說：新生活是在工人中間散佈着最巨大的欺騙。

新生活正在欺騙工人，它暗示工人要去信任社會沙文主義者。照它敘述，社會沙文主義者雖然向來坐在內閣裏面，實行民族統一政策，可是他們在最近將來將在新托哥爾姆互相商討，互相諒解，互相衝突，並停止如此行爲。他們將要開始爲和平而奮鬥，將拒絕投票贊成信用貸款等等，等等……

這一切都是澈頭澈尾的和絕大的欺騙。這一切都是對工人的反動的慰藉和麻醉，都是暗示他們要相信社會沙文主義者。但是那些不是在口頭上，不是爲了自欺，不是爲了欺騙工人們，而實行「爲和平而奮鬥」的社會主義者，却沒有等待任何的國際會議，老早就開始了這種鬥爭了；他們老早就用分裂民族統一的辦法開始這種鬥爭了，如英國的馬克林，德國的李卜克內西，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都是。

「我們完全了解——新生活寫道——布爾塞維克對於倫諾德和謝德曼那些人的合理的和健全的懷疑主義；但是工人與兵士底政論家們卻教條主義式地只願見樹木而不願見森林；他們沒有估計到在倫諾德和

謝德曼所依靠的羣衆中情緒的轉變。】

問題並不在於懷疑主義，諸位老爺們，——你們的這種佔着優勢的情緒乃是那遮掩並表現無原則性的知識分子的懷疑主義。我們對於倫諾德們和謝德曼們並不是懷疑主義者，我們是他們底敵人。這是「兩個大區別」。我們已經和他們決裂了，並且號召羣衆們和他們決裂。正是我們，也只有我們「注意到」羣衆中情緒的轉變，但是還「注意到」一種比情緒及其轉變遠較爲重要，遠較爲深刻的東西，這就是羣衆底基本利益以及這種利益和倫諾德們與謝德曼們所代表的社會沙文主義政策之不可調和性。新生活底諸位老爺們，與俄帝國主義政府底官員們在一起，在斯托哥爾姆所遇到的正是謝德曼們和倫諾德們（因爲斯多寧及特魯爾斯特——阿克生替也夫和斯科比列夫且不必說了——和倫諾德並沒有任何嚴重的區別）。但是我們丟開白社會沙文主義者排演，由社會沙文主義者自己來看的斯托哥爾姆的滑稽劇，爲的是要羣衆張開眼睛，爲的要表現他們底利益，爲的要號召他們去革命，爲的要利用他們底情緒轉變，不是去無原則的配合這種情緒，而是展開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完全決裂的原則的鬥爭。

* 工人與兵士爲布爾塞維克中央機關報，代替在禁的真理報及士兵真理報，發行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五日（舊曆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共出了十五期。

——編輯部

「……布爾塞維克——新生活寫道——喜歡責備那些到斯托哥爾姆去的國際主義者，說他們和謝德曼們及漢德遜們妥協，而「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對代表會議的關係上是和普列哈諾夫們、黑德們及海德曼們——當然根據根本不同的原因——一道。」

說我們在對會議的關係上是和普列哈諾夫們在一起的，這是不正確的！這顯然是無稽之談。我們在不願意出席跟一部分社會沙文主義者開的不徹底的代表會議上，是和普列哈諾夫們一致的。但是我們對於代表會議的態度，無論在原則上或實際上，都和普列哈諾夫們底態度完全不一樣的。然而，自命為國際主義者的你們，却真正地和謝德曼們、斯多寧們、勃朗亭們一起去出席代表會議的，你們是真正和他們妥協了。這都是事實。你們把團結社會沙文主義者底渺小的、卑鄙的、高度地帶有陰謀性的、依存於兩大集團之一的帝國主義者的事業，叫做「團結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事業」。這是事實。

你們這般偽國際主義者，不說一大堆謊話，不散播一些幻想，不裝飾社會沙文主義者，不暗示羣衆以這種希望：好像斯多寧們，勃朗亭們，斯科比列夫們，和阿克生替也夫們，能夠認真地打破民族統一政策似的，就不能向羣衆去進行出席斯托哥爾姆會議的說教（很有可能，超過說教以外，就寸步不能行了，因為代表會議尚未舉行，但是說教底觀點上的意義却是存在的）了。

可是，我們布爾塞維克，在自己的反對斯托哥爾姆的

宣傳上，却對羣衆說出全部真理，繼續揭露社會沙文主義者以及對他們妥協的政策，並引導羣衆同他們完全決裂。假如事情搞成這樣的，即德帝國主義認為目前參加斯托哥爾姆會議於自己有利，於是送他的代理人謝德曼們到那裏去，而英帝國主義却認為這一時機於自己不利，現在決不願意談和平，那末，我們就揭露英帝國主義，利用英帝國主義和英國無產階級羣衆之間的衝突去加深這些羣衆底階級意識，去強化國際主義底宣傳，去向這些羣衆解釋有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完全決裂的必要。

新生活底偽國際主義者，其行為正如知識分子的印象主義者，就是說，正如那些毫無人品地隨波逐流而忘掉國際主義底基本原則的人們一樣。新生活派是這樣地來推斷事情的：英帝國主義既反對斯托哥爾姆會議，那就是說我們必須贊成它。這就是說，該會議獲得了它迄今所沒有的意義。

這樣地推斷事情，那是說實際上就陷於無原則的地步了，因為德帝國主義現在爲了它自私的和搶奪的帝國主義利益而贊成斯托哥爾姆會議。害怕直接承認這種無可爭辯的和顯明的事實，而不得已把這一事實隱藏起來，這種「國際主義者」，其「國際主義」有什麼價值呢？諸位老爺們，假如你們和謝德曼們、斯多寧們及其一派一同去出席斯托哥爾姆會議，你們究竟有什麼保證，使你們不會在實際上變成德帝國主義祕密外交家手裏的玩具和工具呢？你們是不能有這種保證的。因爲這種保證根本就不存在

的。假如斯托哥爾姆會議仍舊舉行（這是很少可能的），那末，這個會議將成爲德帝國主義者刺探這種或那種交換割地之可能性的基礎之嘗試。謝德曼們和斯科比列夫們及其一派底漂亮演說之現實的，真正的意義，就是這樣。假如這次會議開不成的話，那末，你們暗示羣衆使羣衆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對他們底最近的、可能的、蓋然的『改正』存下虛偽希望的那種說教，將具有現實的意義了。

在這兩種場合之下，你們本來自願做一個國際主義者，但實際上却成了某一集團或兩個集團底社會沙文主義者之幫兇了。

但是，我們却計算到政治底一切急變和細節，始終是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宣傳工人底兄弟般的聯合，宣傳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的決裂，宣傳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工作。

一九一七年九月。

我黨在國際中的任務

——關於第三次齊美爾瓦德會議——

十月十一日（舊曆九月二十八日）工人之路第二十二期上，載有第三次齊美爾瓦德會議底宣言。假使我們沒有弄錯的話，那末，發表過這個宣言的，就只有國際主義者孟塞維克底火星報了（第一期，十月九日，舊曆九月二十六日），後者並附有關於第三次齊美爾瓦德會議底成分及其開會日期（新曆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的簡單說明；在其他的報紙上，既沒有登載宣言，也沒有發表關於這次會議的詳細消息。

我們現在握有關於這次會議的若干材料，這些材料就是瑞典左派社會民主黨底報紙政治家上面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在芬蘭社會民主黨機關報上已有譯文），以及出席該會議的一位波蘭同志和一位俄國同志寫的兩篇書面報告。我們首先根據這些消息一般地講講這個會議，然後進而對於這個會議加以估計以及對於我黨底任務加以估計。

出席會議的有下列各黨和集團底代表：(一)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二)瑞士的黨；(三)瑞典左派的黨(如大家所知道的，它已經和勃朗亭底機會主義的黨斷絕了一切聯系)；(四)挪威的黨；(五)丹麥的黨(在我們的材料中並沒有說明，是否就是以斯多寧部長爲首的正式的、機會主義的丹麥的黨)；(六)芬蘭社會民主黨；(七)羅馬尼亞的黨；(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派；(九)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孟塞維克派(巴寧已經書面聲明，他將不參加，理由是這個會議是不完全的；而阿零洛德則有時出席，却沒有在宣言上簽字)；(十)國際主義者孟塞維克；(十一)美國『基督敎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集團(?)；(十二)美國『社會民主主義宣傳團』(根據外表看來，該團就是在我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底任務(無產階級政黨底綱領草案)這個小冊子二十四頁上曾所說到的一個集團，因爲該團在一九一七年一月開始發行國際主義者報)；(十三)統一在『邊疆理事會』裏面的波蘭社會民主黨；(十四)奧國的反對派(即在弗里德里赫、阿德勒刺死斯

* 參看本選集十卷七十一頁。

徒格以後被奧國政府封閉的【卡爾·馬克思俱樂部】；我在同一小冊子底二十五頁上曾經提到這個俱樂部）；（十五）保加利亞【獨立總工會】（如我手邊的一封信底作者所附帶說明的，這是不屬於【狹窄派】——即不屬於左派的，國際主義的保加利亞的黨，而是屬於【寬廣派】，即屬於機會主義的保加利亞的黨；保加利亞的代表在會議結束後才到的，正如（十六）塞爾維亞的黨底代表一樣。

在這十六個政黨和集團當中，屬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舊曆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我黨代表會議底決議（以及我底小冊子二十三頁所說的，這個小冊子把這個派別叫做【事實上的國際主義者】派）所說的【第三】派的是第（三），（八），（十），（十二），（十三），和（十四）；其次接近於這個【左派】，或者說，介於這個派別與考茨基主義的【中派】之間的，是集團（四）和（十六），雖然，要準確地決定他們底地位是非常困難的——有可能他們是屬於【中派】。再則，集團（一），可能集團（二），（六）和（七），集團（十），可能，以及集團（十五），都屬於考茨基主義的【中派】。集團（五）（假使它就是斯多寧黨的話）和（九），是保衛祖國派，部長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最後，集團（十一），顯然是完全偶然的。

從這裏可以看出，會議底成分會是非常龐雜的，甚至妄誕的，因為集合起來開會的，是些基本上不一致、從而不能真正友好地、真正共同地行動的人們，這些人在他們

屬政策之基本的方向上不可避免地是彼此分歧的。當然，這些人們「合作」之「結果」，不是吵嘴或「相罵」，就是為抹殺真理而寫下的、橡皮式的、妥協的決議。關於這方面的例子和證據，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舊曆十月）

* 手續到這裏遺失了。

——編輯部註

共產國際 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詞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我受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委託，宣告第一次國際共產主義代表大會開幕。首先，請全體代表起立，向第三國際底最優秀的代表：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沙·盧森堡致敬，以示紀念。（全體起立）

同志們！我們底集會有着偉大的全世界歷史的意義。它證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一切幻想之破產。因為，不單在俄國，而且在歐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在德國，國內戰爭都已經變成事實了。

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感到非常駭怕。假如我們注意一下，帝國主義戰爭後的事變進程不可避免地要推進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國際的世界革命在一切國家內都在開始和強化着，那末，這種情形是容易了解的。

人民都日益意識到了目前的鬥爭底規模和意義。現在必要的，只是找一個可使無產階級實現其統治的實踐的形式。這種形式就是具有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制度。無產

階級專政！——這幾個字在以前，對於羣衆是拉丁文。由於蘇維埃制度之擴展於全世界，這個拉丁文已經翻譯成一切現代的語言了；專政底實踐形式已爲工人羣衆所找到了。由於俄國的蘇維埃政權，由於德國的斯巴達克團及其他各國的類似的組織，如英國工廠庶務委員會，這個實踐的形式，已爲廣大的工人羣衆所了解了。這一切都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底革命形式已經被找到了，無產階級現在已經能夠在實踐上使用他們的統治了。

同志們，我想在俄國的事變以後，在德國的一月鬥爭以後，特別重要的，應該是指出：無產階級運動底最新的形式，在其他各國也日益實現並達到統治。例如，我今天在一個反社會主義的報紙上，就讀到一個電訊，謂英國政府曾接見白明漢工人代表蘇維埃，並聲明準備承認該蘇維埃爲經濟組織。蘇維埃制度，不但在落後的俄國，而且在歐洲最發展的國度——在德國，以及在最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度——在英國，也都勝利了。

讓資產階級還在狂暴吧，讓他們還在殺害成千的工人吧——但勝利却是屬於我們的，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底勝利已經有保證了。

同志們！我代表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你們致熱烈的敬禮，並提議現在就進行主席團之選舉。請大家提名吧。

共產國際 第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

假如我們做到了不管一切警察方面的阻難和追捕，而聚首一堂，假如我們能夠在短促的時間內，對於今日革命時代底一切火急的問題做了重要的決議，而沒有本質的意見差異，那末，這是由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羣衆已經用他們的行動在實踐上把這些問題提在議事日程上，並且在實踐上開始解決它們了。

在這裏，我們須要記載下的，只是羣衆在他們的革命鬥爭中所已經獲得的成就。

不但在東歐各國，而且在西歐各國，不但在戰敗各國，而且在戰勝各國（例如英國），擁護蘇維埃的運動，都在越來越廣地擴展着，這個運動並不是別的，正是一種以建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爲目的之運動，它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共產主義完全勝利的最重要的一步。

讓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繼續狂亂下去吧，讓他們放逐、監禁、甚至殺害斯巴達克團團員和布爾塞維克吧——但這一切對於他們不會再有所幫助了。這只能作爲對羣衆之啓

衆，只能作爲把他們從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偏見之下解放出來，在鬥爭中把他們加以鍛鍊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已經有保障了。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之建立已為近一日了。（熱烈地鼓掌）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位置

各協約國底帝國主義者封鎖俄國，力謀把蘇維埃共和國當做一個傳染病底發源地和資本主義世界隔離開來。這些以其制度之「民主主義」自誇的人們，竟為他們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深惡痛恨眩感到這種地步，以致看不到他們把自己弄成怎樣可笑的樣子。只要想一想：那渾身武裝、在軍事上不可分地統治全地球的、先進的、最文明的、最「民主的」國度，竟害怕由一個凋敝的、飢餓的、落後的、在他們看來甚至半野蠻的國度來的思想上的傳染病，如同害怕火一樣！

單單這個矛盾，就可以打開一切國度的勞動羣衆底眼睛，幫助揭發帝國主義者克里蒙梭、勞合喬治、威爾遜及其政府底假面具了。

可是，不僅資本家彼其對蘇維埃的深惡痛恨之眩感，而且他們相互間的爭吵，都在幫助我們，刺激他們互相損害。他們已經互相定下了真正的緘默陰謀，因為他們害怕一般地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真實消息之傳播，特別是它底正式文獻之傳播，他們害怕這些，比什麼都厲害。可是，法國資產階級底主要機關報時報却發表了關於第三共產國

際在莫斯科成立的新聞。

以此，我們向法國資產階級底主要機關報，向法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底這位領袖，致我們的最恭敬的謝意。我們準備寄一幅莊嚴的信給時報，以表示我們對他們如此有效地、如此技巧地幫助我們感謝之意。

從時報曾經怎樣地根據我們的無線電廣播編成了它的新聞這一點上，就可以完全明白地看出這個錢袋機關報底動機。它想用針刺一下威爾遜：你看，你允許與之談判的人，是些什麼人啊！根據錢袋底要求而寫作的這些聰明人，却不知道：他們拿布爾塞維克來恐嚇威爾遜的辦法，如何在勞動羣衆的眼中竟變成布爾塞維克底廣告了。再說一遍：向法國百萬富翁底這個機關報致我們的最恭敬的謝意。

第三國際是在這樣的世界環境之下成立的：即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或資本主義走狗（如德國的謝德曼們，奧國的倫涅爾們）底任何禁令、任何卑劣的可憐的狡計，都不能阻止關於這個國際的消息和對於這個國際的同情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之傳播。這種環境是由各地，每日，甚至每一時，都在顯然增長着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所造成的。這種環境是由勞動羣衆中的蘇維埃運動所造成的，這種運動已經達到了使它真正成爲國際運動的這樣的力量了。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年）曾爲準備工人向資本的革命的進攻而奠定了他們的國際組織之基礎。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曾是無產階級運動底

國際組織，其時這種運動的增長日益廣泛，就難免有革命水準底暫時的降低，難免有機會主義底暫時的壯大，這種機會主義終於走上了這一國際底可恥的崩潰。

第三國際實際上成立於一九一八年，那時反對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多年的鬥爭過程，尤其在大戰期中，曾經在好多國度裏面引導到了共產黨之成立。在形式上，第三國際是在其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第三國際底最大的特色，它底使命：就在於完成和實現馬克思主義底遺訓，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底百年來的理想，——第三國際底這個最大的特色，已因新的第三『國際工人協會』現在在某種程度上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同時發生，而立刻表現出來了。

第一國際曾奠定了國際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底基礎。

第二國際曾是為運動在很多的國家內準備廣泛的，羣衆性的擴展底基礎之時代。

第三國際接受了第二國際底工作之成果，丟棄了它底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廢物，而開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

領導世界上最革命的運動，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本騷擾的運動之各政黨，其國際聯合，現在已經有了就鞏固性講來空前未有的根據地：幾個蘇維埃共和國了，這些蘇維埃共和國在國際範圍內正在體現着無產階級專政，體現着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勝利。

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底世界歷史的意義，是在於它開始實現了馬克思底偉大口號，這個口號把百年來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底發展作了個總結，這個口號可以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表現出來。

這個天才的預見，這個天才的理論，正在變成現實了。

無產階級專政這幾個拉丁字，現在已經譯成了現代歐洲底一切活的民族語言，不僅如此，甚至譯成世界底一切語言了。

世界史底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了。

人類正從自己身上丟掉最後的一個奴隸制形式：資本主義的奴隸制或僱傭奴隸制。

人類從奴隸制解放出來時，便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了。

爲什麼最落後的歐洲國家之一竟成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組織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呢？假如我們說：正是俄國底落後性和它『跳躍』到民主主義底最高形式，超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跳躍』到蘇維埃民主主義或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之間的這個矛盾，正是這個矛盾，乃是使西歐特別難以了解或遲遲了解蘇維埃作用的原因之一（撇開機會主義的習慣和庸人的偏見，對社會主義大多數領袖之壓力不講），那末，我們差不多是不會錯的。

全世界的工人羣衆，都本能地理解了蘇維埃乃是無產階級鬥爭工具和作爲無產階級國家形式的意義。但是，爲

機會主義所損傷的「領袖們」曾經繼續，現在還在繼續歌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把它稱爲一般的「民主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首先表示出了俄國底落後性和它越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跳躍」之間的「矛盾」，這奇怪嗎？假如歷史沒有一系列矛盾而賜與我們實現一種民主主義底新的形式，那才奇怪呢。

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每一個懂得現代一般科學的人，都要毫不遲疑地否定地答覆下面這個問題的：即「各種各樣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否平衡地或協調地成正比例地轉到無產階級專政去呢？」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面，從來沒有過，而且也永遠不能有什麼平衡、協調和比例的。每一個國度，有的特別凸出地發展了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這一側面，或特徵或一批特性，有的則特別凸出地發展了那一側面或特徵，或一批特性。發展底過程是不平衡的。

當法國進行其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從而喚起整個歐洲大陸走向歷史上新的生活的時候，英國却已做了反革命同盟底領袖，雖然那時英國在資本主義上，遠較法國要發展得多。但那個時代的英國工人運動，却天才地預言了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底許多東西。

當英國向世界提供第一個廣泛的、真正羣衆性的、政治上定型化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運動，即大憲章運動的時候，在歐洲大陸上在多數場合之下則發生了些微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法國却爆發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名

第一次偉大的國內戰爭。資產階級各個地並在各國用不同的方式擊敗了無產階級底各個不同的民族隊伍。

英國曾成了這樣一個國度底榜樣，在這個國度內，用恩格斯的話說，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的貴族並列曾創造了無產階級底最資產階級化的上層。就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底意義講，這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却在幾十年之內成了落後的國度。法國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工人階級兩次反對資產階級的英勇的、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提供了好多東西的起義裏面，耗盡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此後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工人運動國際底領導權，便轉到德國去了，那時德國在經濟上既落後於英國，也落後於法國。可是當德國在經濟上趕上了這兩個國度時，即到二十世紀底第二個十年時，那領導德國全世界模範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的，却是一撮聲名狼藉的無賴漢，最卑鄙的，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們的敗類，從謝德曼和諾斯克起，一直到達維德和列棋這般爲君主政體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服務的工人中的最可惡的鬍子手止。

世界歷史是在不可阻撓地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所走的却遠非是平坦的、簡單的和直捷的路。

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底叛徒（當他力謀和謝德曼輩統一，並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以反對蘇維埃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候，便成了馬克思主義底叛徒）時，他在二十世紀之初曾寫過一篇論文：斯塔夫夫人與革命。*在這篇論文裏面，他曾分析了那

國際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有轉到斯拉夫手中去的可能性的歷史條件。

結果確是如此。在一個時期內——自然只在一個短時期內——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轉到俄國人手中來了，正像在十九世紀底不同的時期內，英國人，然後爲法國人，再後爲德國人握過這種領導權一樣。

我已經不止一次地說過：和各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俄國人會比較容易地開始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就完全組織社會主義社會的意義說，他們却更難繼續這種革命，把這種革命堅持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比較容易地開始，因爲，第一，沙皇君主政體底非常的——就二十世紀底歐洲說來——政治落後性曾喚起了羣衆底革命襲擊底非常的力量；第二，俄國底落後性曾經特殊地把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反地主的農民革命匯合在一起了。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舊曆十月)，就是這樣開始的，假如我們不這樣開始，那末，我們在當時就不能那樣容易地得到勝利的。馬克思於一八五六年，講到普魯士時，就曾經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和農民戰爭底一種特殊結合底可能性。從一九〇五年初起，布爾塞維克

* 此文發表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火星報第十八期。列寧曾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此文亦收集在本卷內)第一章曾詳細地論及這篇論文。

就堅持工農底革命民主專政底思想。第三，一九〇五年革命，無論從工農羣衆底先鋒隊熟悉西歐社會主義底『最後一言』的意義上說來，或是從羣衆底革命行動的意義上說來，對於他們都作了非常之多的政治教育。沒有像一九〇五年這樣的『總演習』，那末，一九一七年之革命，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也好，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也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國底地理條件曾允許它比別的國家能更長久地抵抗外部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各國底優勢。第五，無產階級對農民的特殊關係，便利了由資產階級革命之轉到社會主義革命，便利了城市無產階級對於鄉村勞動羣衆中半無產階級的與貧苦的階層的影響。第六，罷工鬥爭底長期訓練和歐洲羣衆性的工人運動底經驗，都便利了像蘇維埃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底特殊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銳的革命局面下之產生。

這樣的列舉自然是不完全的。但是我們暫時可以此爲限。

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已經在俄國產生了。和巴黎公社比較，已經完成了第二個世界歷史的步驟。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已是世界上第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了。它作爲國家底一個新的典型再不會滅亡的了。它在今天已不是孤立的了。

爲着把社會主義建設底工作繼續下去，爲着把這種工作進行到底，還需要着很多很多的東西。在文化程度較高，無產階級比重與影響較大的諸國，假如他們一走上了

無產階級專政底道路，那末，它們底蘇維埃共和國就有趕過俄國的一切機會。

已經破產的第二國際，現在正在死亡着，正在活活的腐爛着。它實際上扮演着國際資產階級底僕役的角色。它是一個真正的黃色國際。它底最大的思想上的領袖，如考茨基之類，頌揚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把它叫做一般「民主主義」或者——更愚蠢、更粗暴地——叫做「純粹的民主主義」。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已經過時了，正如第二國際已經過時了一樣，當在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底範圍內訓練工人羣衆底工作還擺在議事日程上的時候，那時第二國際曾做了一種歷史上必要的、有益的工作。

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不是也不能是別的，只是資本鎮壓勞動羣衆的機器，只是資本底政權之工具，資產階級專政罷了。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曾作了以政權給大多數人的諾言，曾宣佈了這樣的政權，但是，只要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底私有制一日存在，就永遠不能實現這樣的政權。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面的「自由」，實際上曾是富人底自由。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這種「自由」去準備他們的力量以推翻資本，戰勝資產階級的民主，但是事實上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羣衆照例却不能利用這種民主。

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第一次在世界上創造了

爲大眾的，爲勞動人民的，爲工人和小農的民主。

世界上像蘇維埃政權這樣的大多數人民的國家政權，這種真正大多數人民底政權，還從來沒有過。

它是壓服剝削者及其走狗們底『自由』的，它剝奪了他們的剝削的『自由』，靠飢荒發財的『自由』，力謀恢復資本政權的『自由』，和外國資產階級妥協來反對祖國工人和農民的『自由』。

讓考茨基們去保衛這樣的自由吧。這樣，就非做馬克思主義底叛徒，社會主義底叛徒不可了。

第二國際底思想上的領袖們，如希菲丁和考茨基者，他們底破產之表現，最露骨的不在別的地方，正在於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去理解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底意義，它和巴黎公社的關係，它的歷史地位，它底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底形式之必然性。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獨立的』（應讀爲庸俗的、市儈的、小資產階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機關報自由報底第七十四期，曾發表了一篇告德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宣言。

這篇宣言是由黨底主席團及其在『國民會議』即德國『立憲會議』裏面的整個黨團簽字的。

這篇宣言責備謝德曼們，說他們力謀取消蘇維埃，而提議——不要開玩笑吧！——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給與蘇維埃以某些政治上的權利，憲法上的某種地

把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竟要調和起來，聯合起來！是多麼簡單呀！這是一種多麼天才的庸人的思想呀！

只可惜，在俄國，在克倫斯基時代，聯合起來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已經把這種思想試驗過了。

誰在讀馬克思底著作時，不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在每一個緊急的時機，在每一次嚴重的階級衝突當中，有可能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那誰就絲毫不知道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及政治學說。

可是如果要完全說盡二月十一日這個極度奇妙的和可笑的宣言裏面所包含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荒謬言論，那末，對於希非丁、考茨基及其同伴把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和平聯合起來的天才的庸人的思想，還須加以特別的分析。這只好留待另一篇文章去作吧。*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 見伯恩施坦與奧地利的門徒一文，全集第二十四卷，三一七——三二四頁。

第二編

共產國際底基本原則及其第二次代表大會

論第三國際底任務

——列姆西·麥克唐納論第三國際——

(三) ●

列姆西·麥克唐納以「沙龍」社會主義者（「沙龍」社會主義者，總是亂發言論，而絲毫不懂得這些言論底嚴重意義，絲毫不想一想，言論要對於行動負責的）底可笑而素樸性宣稱：在伯恩曾「向非社會主義的輿論作了讓步」。

一點也不錯！我們把整個的伯恩國際看做黃色的、叛道的、鬆動的，因為它底全部政策是對資產階級的「讓步」。

列姆西·麥克唐納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們已經成立了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空無保留地決裂了，因為我們已經確信了它的毫無希望，它的無法改善，它的充任帝國主

* 這裏只選了第三、四、五、六兩章；全文見全
集第二十四卷三八二——三九九頁。

——譯者稿

義奴僕的作用，充任在工人運動中散佈資產階級影響，資產階級欺騙及資產階級沮喪的嚮導者的作用。假如麥克唐納希望考察第三國際而避開問題底本質，徒繞圈子，大放空洞之詞，不談應該談的事情，那末，這就是他的錯處，他的罪惡。因為無產階級需要的是真理，對於它的事業最有害的，莫過於外表堂堂的、道貌昂然的、庸人的造謠了。

關於帝國主義及其與工人運動裏面的機會主義的聯繫，與工人領袖對於工人事業的叛變的聯繫的問題，在很久很久以前早就被提出來了。

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二年這四十年的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斷地指出了英國工人階級底上層因英國經濟的特殊性(殖民地，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等等)而資產階級化的情形。馬克思在前世紀七十年代，就招致了當時的「伯恩」國際派底卑鄙的英雄們、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之光榮的憎恨，因為他大罵英國職工會底許多領袖們，說他們是一些把自己出賣給資產階級，或者因在工人運動內部為他們底階級服務而被資產階級收買的人。

當英國與布爾戰爭之時，麥格魯薩克遜的報紙，已經把帝國主義當做資本主義底最新(和最後)階段的問題完全明白地提出來了。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末，當時退出了「費邊社」這個「伯恩」國際底雛型，這個被恩格斯在他和佐爾格的通訊裏面以天才的力量、明確性及真實性所奏效的機會主義底發源地和標本的，並不是別人，正是列姆

爾·麥克唐納。「費邊帝國主義」——這就是當時英國社會主義文獻所流行的一個名詞。

假如列姆西·麥克唐納忘記了這件事情，那對於他更其糟糕。

「費邊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是同一個東西：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事實上的帝國主義，機會主義之長成爲帝國主義。這種現象，在現在，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期間和以後，已經成了一個全世界的事實了。不懂得這個事實，乃是「伯恩」黃色國際底最大的盲目症和其最大的罪惡。機會主義或改良主義不可避免地要長成爲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或社會沙文主義；因爲帝國主義分出了區區少數掠奪整個世界的、非常富足的、先進的民族，從而使這些國家底資產階級得以他們的壟斷的額外利潤（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去賄買這些國家底工人階級上層。

在帝國主義下，這一事實底經濟上的不可免性，只有完全無知的人或欺騙工人的騙子才看不見，這些騙子老是重複關於資本主義的那一套話，並用這種方法去遮掩那在社會主義內部的一個完整的派別轉變到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苦痛的真理。

可是從這個事實却可以得出兩個不可爭辯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伯恩」國際，就其真正的歷史的和政治的作用講，與其黨員之善良的意志和無邪的願望無關，實際上是一個國際帝國主義代理人底組織，這些代理人在

工人運動內部活動，在它裏面傳播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觀念，資產階級的欺騙，資產階級的頹廢。

在具有舊民主議會制度文化的國度裏，資產階級不但極高明地學會了使用武力，而且學會了使用欺騙、賄賂、諂媚，直到這些手法底最狡猾的形式。英國「工人領袖」（即資產階級愚弄工人的事務員）底「早餐」所以出名，並不是無因的，恩格斯就曾經提到過它。克里蒙梭先生之「有魔力地」接見社會叛徒麥爾赫，協約國底部長們之親切地接見「伯恩」國際底領袖們，諸如此類的事，都是一樣的性質。一位聰明的英國女資本家曾向社會帝國主義者海德曼說道：「你們教育他們，而我們是收買他們。」海德曼在他的回憶錄裏，告訴我們：這位太太——比「伯恩」國際底一切領袖們加起來還要更有識見些——如何估計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關於從工人隊伍中訓練出社會主義領袖們的「工作」。

在大戰期間，當汪德衛、勃朗亭以及這一整批叛徒會舉行「國際」會議時，法國各資產階級的報紙，極刻毒而又極正確地嘲笑道：「這些汪德衛們有一種如面部痙攣病之類之毛病。而像害面部痙攣病的人們沒有可怕的面部肌肉之痙攣而不能說出兩句話一樣，汪德衛們不羈鶻式地重複說：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底國際團結，無產階級革命等，便不能在政治上發表言論了。讓他們隨便重複聖靈的公式吧，不過他們在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和奴役工人時，只是幫助牽着工人底鼻子走，給我們資本家們服務罷

了。」

英法資產階級有時是很聰明的，他們非常漂亮地估計着「伯恩」國際的奴才作用。

馬爾托夫曾在什麼地方寫道：「你們布爾塞維克辱罵伯恩國際，可是「你們的」朋友洛里歐却是加入該國際的。」

這是一種無賴漢底論據。因為誰都知道，洛里歐正是公開地、真誠地、英勇地爲第三國際而奮鬥的。當蘇巴托夫於一九〇二年在莫斯科舉行工人會議，以使用「警察的社會主義」愚弄工人的時候，工人巴布什金（我從一八九四年起認識他，其時他曾參加我的聖彼得堡工人小組，他是最好的，最忠實的工人，火星報派，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領導者之一，一九〇六年，在西伯利亞爲倫涅克夫所槍殺）曾出席蘇巴托夫的會議，爲的反對蘇巴托夫主義，把工人從它的巨爪之下挽救出來。巴布什金之很少是「蘇巴托夫派」，正如洛里歐很少是「伯恩派」一樣。

(四)

第二個結論：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之成立，其目的恰恰在於不允許「社會主義者們」再以口頭上承認革命敷衍了事，列姆西·麥克唐納在他的論文中就提供了這種口頭承認革命的榜樣。口頭上承認革命，事實上則掩飾澈頭澈尾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

政策，這就是第二國際底基本罪惡，我們正爲着反對這種罪行而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

當說第二國際已經死了，它已經遭受可恥的破產的時候，應該善於了解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機會主義、改良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破產了和死了。因爲第二國際曾有歷史的功勞，永遠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從不能放棄的成績，那就是工人底羣衆組織——協作社的、職工會的和政治的組織之建立，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一般機構之利用，等等。

爲着真正地戰勝那使第二國際遭受可恥的死亡的機會主義，爲着真正地幫助那甚至列姆西·麥克唐納也不能不承認其日益迫近的革命，就必須：

第一，與改良底觀點相抗衡！從革命底觀點，進行全部的宣傳和鼓動，理論上和實踐上，在議會的、職工會的、協作社的等等工作底每一步驟上，有系統地向羣衆解釋這兩種觀點的對立。無論在什麼場合（作爲例外的特殊場合除外），決不應放棄對議會制度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一切「自由」之利用，決不應放棄改良，但是把改良只當作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鬥爭底副結果罷了。「伯恩」國際底各黨中沒有一個能滿足這種要求的。甚至沒有一個表示理解，應該怎樣去進行全部的宣傳和鼓動，解釋改良與革命的區別，應該怎樣不屈不撓地對黨和羣衆去進行革命的教育。

第二，必須把合法的和非法的工作結合起來。布爾喬

維克在任何時候，特別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的時候，更堅決地教導了這一點。卑鄙的機會主義底英雄們曾經嘲笑這一點。他們滿足地頌揚西歐各國、各共和國等等底『法治』、『民主』和『自由』。現在，只有用空談欺騙工人的直接的騙子，才會否認，布爾塞維克是正確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最先進、『最自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不籠罩着資產階級底恐怖，不禁止對社會主義革命的鼓動底自由，以及同一方向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的自由。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從不承認過這一點及不違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議會底法律以進行有系統的、多方面的非法工作的黨，乃是叛徒們與匪棍底黨，是用對革命的口頭上的承認去欺騙人民的黨。這類的黨，只有在黃色『伯恩』國際內才有地位的。在共產國際裏面是不會有這種黨的。

第三，需要進行一種不屈不撓的和無情的鬥爭，把那些在大戰前和特別是在大戰期間，在政治上和特別是在職工會和在協作社裏面暴露了他們真面目的、機會主義的領袖們，從工人運動中完全趕出去。『中立』論是一條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幫助資產階級奪取羣衆的騙人的和卑鄙的遁辭。那在口頭上擁護革命，但實際上却不進行不屈不撓的工作以擴大革命的、也只有革命的政黨在一切和各種各樣的羣衆性的工人組織中之影響的黨，那只是叛徒們底黨罷了。

第四，決不容認這種情形，即：在口頭上宣稱帝國主義，但在實際上却不進行革命的鬥爭，把殖民地（和附屬

國)從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這就是欺騙。這就是資產階級代理人在工人運動中底政策。美、法、荷、比各國的黨，都是在口頭上仇視帝國主義，而在實際上却不在「自己的」殖民地內進行以革命的鬥爭推翻「自己的」資產階級，不有系統地去援助殖民地裏面到處已經開始了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黨用的武器和文獻輸入到殖民地去，這些黨，都只是叛徒們與無賴底黨罷了。

第五，「伯恩」國際底各黨其典型的現象就是最大的騙局：即在口頭上承認革命，以他們承認革命的美麗詞句誇示於工人，但在實際上則以純粹改良主義的方式對待革命增長之徵候、萌芽、表現——羣衆撕毀資產階級的法律，衝破一切合法性的一切行動，如羣衆罷工、街頭示威，士兵抗議，軍隊中的羣衆大會，在營房和野營發傳單等等，都是這種革命增長之萌芽。

假如隨便問一位「伯恩」國際底英雄，他的黨是不是做這類有系統的工作，那末，他不是以掩飾未做這種工作的不得要領的空話：任何組織和機關都不作這種工作，他的黨沒有能力做這一類工作……答你，便是以反對「盲動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等等諸如此類的言論答你。「伯恩」國際對工人階級之叛變，其在實際上之轉入資產階級營壘，正是在這裏。

「伯恩」國際底無賴領袖們，都宣稱，他們對一般革命，特別是對俄國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只有樹子或

傻瓜才會不了解，俄國革命底特別迅速的勝利，是和革命的政黨在上述方向上的、長期的工作有聯系的，那時曾經年復一年地建立了一種領導示威運動和罷工及在軍隊中工作的有系統的非法的機關，曾經年復一年地仔細研究了工作方法，建立了一種總結經驗和以革命之必要性的思想教育全黨的非法出版物，訓練出了這些上面的羣衆領袖，等等，等等。

(五)

綜括上述一切，並說明革命的無產階級與「伯恩」國際勢必要進行不可調和的理論上的和實踐政治上的鬥爭的最深刻最根本的意見分歧，乃是關於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內戰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伯恩」國際之爲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俘虜，其最大的表現，在於它不了解（或者：不願了解，或者：裝着不了解）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不了解把該戰爭變爲一切先進國家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內戰之不可避免性。

當布爾塞維克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就指出這種不可避免性的時候，各國底庸人們都容以愚蠢的嘲笑，而「伯恩」國際底一切領袖們都在這些庸人們之列。現在，帝國主義戰爭之轉變爲國內戰爭，在很多的國度裏，——不僅在俄國，而且在芬蘭，在匈牙利，在德國，甚至在中立的瑞士

都成爲事實了，而國內戰爭底生長，在一切先進的國度內，都無例外地可以看到，感覺到，捉摸到了。

現在以保持緘默來迴避這個問題（如列姆西·麥克唐納之所爲），或者用甜蜜的調和文句來支吾不可避免的國內戰爭（如考茨基一派的老爺們之所爲），那就等於對無產階級之直接叛變，等於真正投入資產階級方面去。因爲，資產階級底真正的政治領袖們，早已理解了國內戰爭底不可避免性，並且漂亮地、熟慮地、有系統地準備這種戰爭，增強自己的障地以防備這種戰爭。

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傾其全力，使用着巨大的精力、智力、毅力、不怕任何罪惡，在使好多國度遭受飢餓和完全撲滅的命運時，準備在日益逼近的國內戰爭中壓迫無產階級。可是，「伯恩」國際底英雄們，却像傻瓜或騙人的鸚鵡式教授的迂腐一樣，唱着舊的、過時的、無味的、改良主義的小調！再沒有比這更令人討厭、更令人惡心的光景了！

考茨基們和麥克唐納們仍繼續在用革命恐嚇資本家，用內戰威脅資產階級，以便獲得他們的讓步，對於改良主義道路的同意。整個「伯恩」國際底一切文章，整套哲學，整套政策，都可歸結爲這一點。

這種可憐的奴才手法，我們在俄國於一九〇五年在自由主義者（立憲民主黨人）方面看見過，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方面也看見過。至於說，應該以內戰中戰勝資產階級的不可避免性及必要條

這種意識去教育羣衆，應該在這一目標底觀點之下去進行全部政策，應該從這個觀點，只有從這個觀點來精研、提出、解決一切問題——關於這，「伯恩」國際底奴才們是想也不想的。因此，我們的目標必須僅僅在於把這些不可改正的改良主義者，即「伯恩」國際底十分之九的領袖們，最後傾倒在資產階級助手空垃圾坑裏去。

資產階級正需要這樣的一部分工人階級可以信任的僕從，這種僕從則用改良主義道路可以走得通的空話去裝飾和頌揚資產階級，用這種空話去迷惑人民底眼睛，用描畫改良主義道路底可能和魔力的方法，使人民離開革命。

考茨基們以及我們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一切著作，都可以歸結爲這類的描畫，歸結爲害怕革命的、胆怯的、市儈們底哭泣。

在這裏，我們沒有可能去詳細地重述，究竟是哪些經濟的基本原因竟使革命的道路，而且只有革命的道路成爲不可避免，使除開國內戰爭以外一切別的解決被歷史所提上議事日程的問題的方法，成爲不可能。關於這，應當寫成幾卷書，而且將來要寫成幾卷書的。如果考茨基們這些老爺們和「伯恩」國際及其他領袖們，沒有懂得這些價，那末，只可以說：愚昧無知之距離真理，比偏見要好一些。

因爲現在在大戰以後，愚昧無知但却誠實的勞動人民和勞動人民底辯護者，都比那些充滿了最學究式的改良主義偏見的考茨基們、麥克唐納們、汪德衛們、勃胡亭們、

杜拉第們諸如此類的老爺們，更容易地了解革命、國內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之不可避免性的。

羣衆中革命意識增長的現象非常的多，到處都可以感覺到，巴比塞底小說在火綫下和光明，可以承認是這種現象底特別明白的證據之一。前一部小說已經譯成了一切語言，在法國已銷售了二十三萬冊。在這本書裏，非常有力地、天才地、逼真地描寫了一個完全無知的、全然爲觀念和偏見所窒息的庸人和羣衆中的一個勞動者，恰恰因受戰爭底影響而轉成一個革命者。

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羣衆，都在擁護我們，並且一天天地、甚至一小時一小時地轉到我們方面來了。「伯恩」國際是一個沒有軍隊的司令部，只要在羣衆面前把它激發揭破，那它就會像骨牌搭成的房子一樣倒塌下來。

在大戰期間，卡爾·李卜克內西底名字曾被協約國所有的資產階級報紙利用去欺騙羣衆，以便把英法帝國主義底強盜和掠奪者們描寫成同情這位英雄，這位——如他們所說的——「唯一真誠的德國人」似的。

現在，「伯恩」國際底英雄們正和謀殺了卡爾·李卜克內西和露沙·盧森堡的謝德曼們，正和扮演了工人隊伍中的劊子手角色，並爲資產階級執行劊子手職務的謝德曼們同在一個組織裏面。在口頭上虛偽地企圖「責備」謝德曼們（好像事情因「責備」而改變似的），但事實上却和兇手們同在一個組織裏面。

已故的左羅奇，曾於一九〇七年被德國政府驅逐出斯

徒持加持，爲的他把歐洲外交家底會議稱做『竊賊會議』。
『伯恩』國際底領袖們不僅是一個竊賊們底集會，而且是卑鄙的殺人犯底集會。

他們是不能逃避革命工人底審判的。

(六)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列姆西·麥克唐納把它作爲一種關於自由和民主的論戰底對象，敷衍了兩句。

不是的。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辯論已經太晚了。

『伯恩』國際方面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口頭上的承認。這些人可以承認一切，簽字於一切，只是爲的保持他們在工人運動中的領袖地位罷了。現在，考茨基就已經說，他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法國社會抄文主義者和『中派』也都簽字於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決議！

他們是不值得信任的。

需要的不是一種口頭上的承認，而是與改良主義的政策在事實上完全決裂，與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民主的福見在事實上完全決裂，在事實上實行革命的階級鬥爭底政策。

他們企圖，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實則與無產階級專政並列而在暗中私自輸入『大多數人底意志』，『公民投票』（如考茨基之所爲），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

放棄對整個資產階級國家機關之完全毀滅、破壞，澈底粉碎。改良主義底這種新的遁辭，這種新的逃路，應該成爲人們最可怕的東西。

假如人口底大多數不是由無產者與半無產者構成的，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了。考茨基們企圖把這個真理曲解成這樣，似乎須有一種『大多數人的投票』，爲的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確的』。

是多麼可笑的學究啊！他們沒有懂得，在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底框子內、制度內、習慣內的公民投票，乃是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底一部分，爲着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爲着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到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就應當把這種國家機關從上至下地加以破壞和毀滅。

他們不懂得，一般說來，當無產階級專政被歷史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政治底一切嚴重問題，不是用投票來解決，而是由內戰去解決的。

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階級底政權，這個階級把新的國家底整個機關都握在自己手裏，戰勝資產階級，使全體小資產階級、農民、小市民階層、知識分子等中立。

考茨基們和麥克唐納們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爲的在事實上在歷史底最緊要的關頭，在無產階級爲解放而鬥爭的最緊要的關頭，即在無產階級於奪取國家政權之後，並由半無產階級所支持，而借助這種政權繼續進行階級鬥爭，一直到階級消滅爲止的時候，他們忘却階級鬥爭。

像道地的庸人一樣，「伯恩」國際底領袖們，重複着那關於自由、平等、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詞句，而沒有看到，他們正重複着那關於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的觀念底斷片，而沒有懂得，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爲了它底敵人、剝削者、資本家底「自由」，而是爲着壓服他們。

商品所有者底自由和平等已經死去了，正像資本主義已經死去了一樣。考茨基們和麥克唐納們是不能使資本主義復活的。

無產階級需要消滅階級——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的自由（即對資本家之自由，對商品交換的自由），無產階級的平等（不是階級底平等——考茨基們、汪德衛們和麥克唐納們都是抱着這樣的淺薄見解的——而是推翻掉資本和資本主義的勞動羣衆底平等）底現實的內容。

只要階級存在一日，則階級底自由和平等便都是資產階級的欺騙。無產階級將要奪取政權，成爲統治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壓服資產階級，壓服其他一切階級恢復資本主義的一切企圖；給勞動者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這只有在廢除了生產手段底私有制以後才能實現），不僅給他們以「權利」而已，而且使他們現實地利用那從資產階級那兒剝奪來的一切。

誰不贊無產階級專政（或者是蘇維埃政權或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底這種內容，那誰就白白地在口頭上使用這

個字。

在這裏，我不能更詳細地發揮這種思想了，這種思想，我在國家與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革命與街巷考察基※※小冊子裏面已經闡釋過了。我可以結束本文說，我要把這些話獻給將出席一九一九年八月十日「伯恩」國際路澤大會的代表們。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 參考本選集第十二卷1——128頁。——校閱者

※※ 同上，129——241頁。——校閱者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關於馬克思主義戰略與策略通俗講述的嘗試——

(一) 在那個意義上 才可以講俄國革命底國際主義？

在無產階級奪取俄國政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國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後的最初幾個月，可使人以為，似乎落後的俄國與先進的西歐各國之間的巨大差異，要使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跟俄國的很少相似。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很充分的國際經驗，可以十二分確定地說：俄國革命底某些基本特點，並非是有着地方的、特殊民族的、僅是俄羅斯的意義，而是有着國際的意義。而且我在這裏所講的國際意義，並非就其廣義而言的：如果就俄國革命對於一切國度的影響講來，那末，並不是俄國革命底某些特點有着國際的意義，而是其一切基本的和許多次要的特點都有國際的意義。不，我是就這個字的最狹的意思而言的，就是說，我所理解的國際意義是指那在俄國所發生的，是有着國際的效力，或者要在國際範圍內重演的歷史的不可避免性而言的，這樣就不得不承認，俄國革命底

某些基本特點是具有這樣的意義的。

如果誇大這個真理，把這個真理不僅擴充到俄國革命基本特點中的某些特點而已，那自然是一個最大的錯誤。同樣，忽略下面這一點，即在無產階級革命即使在先進國度中的某一國勝利以後，十之八九會來一個急劇的轉變，即：俄國在這以後很快地不成爲模範的國度，而又成爲落後的國度了（就『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講），也是錯誤的。

但是在當前的歷史的關頭，事情正是這樣的，即：俄國的榜樣，正向一切國度表示出了在它們的不可避免的和不斷的將來將要發生的某種事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各國先進的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而且往往與其說是懂得了，不如說是因其革命階級的本能而把握到了、感覺到了這一點。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塞維克理論和策略底基礎之國際【意義】（狹義地說）就是由此來的。第二國際底『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註一），英國的鮑威爾（註二）和阿德勒（註三）之類，都不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叛變行爲底辯護士。就中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匿名的世界革命這個小冊子（註四），特別明顯地表明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過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一點說，表明了他們的愚蠢無知、學究氣味、卑污齷齪和對工人階級利益之背叛——而且，這一切都是在『保衛』『世界革命』理想的委曲之下進行的。

關於這本小冊子，以後有機會再更詳細地講吧。在這裏只是還要指出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處理問題時，他曾預先看到了有來到這樣一種局面的可能，就是在這種局面下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將成爲西歐的模範。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斯拉夫人與革命。在這篇文章裏面他曾寫道：

【現時】（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想，不僅斯拉夫人已經加入了革命的人民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也日漸向斯拉夫人方面轉移着。革命的中心，正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着。在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的中心曾在法國，有時曾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的民族底隊伍……。新的世紀是以這些事變開始的，這些事件使人想到我們正在迎接着革命中心之進一步的轉移，即它向俄國之轉移……。俄國曾從西方吸取了這樣的革命的主動性，現在或許它本身準備要作爲西方革命精力底泉源了。如火如荼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有力的藥劑，根絕那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枯萎的庸人行爲與怯懦的政客底精神，使鬥爭底熱忱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的熱情的忠誠重新光芒萬丈地發揚光大起來。俄國久已不復成爲西歐反動與專制主義底簡單堡壘了。現在事情恰恰相反。西歐日益變成俄國反動與

專制主義底堡壘了……。如果俄國革命者不須同時進行反對俄皇底同盟者——歐洲資本之鬥爭，那末，他們也許早就把俄皇結束了。我們希望，這次他們能夠做到把兩個敵人都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老祖宗更垮台得快些。可是無論俄國現在的鬥爭如何結局，但烈士們(可惜它產生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鮮血與幸福，是不會白流的。他們的鮮血和幸福正在滋養着整個文明世界裏社會革命底嫩芽，使之更茂盛、更迅速地發育起來。在一八四八年，斯拉夫人曾是嚴霜，它摧殘了人民之春的鮮花。也許現在他們注定將成爲大風暴，衝碎反動之冰，給各國人民帶來新的、幸福的春。」(卡爾·考茨基：斯拉夫人與革命，見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第十八期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的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

在十八年以前考茨基可寫得多麼漂亮呵！

(二) 布爾塞維克成功底基本條件之一

的確，現在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已經看到，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最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對它的最完全的和熱忱的支持，就是說，沒有工人階級中有思想的、誠實的、肯犧牲的、有權威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分分子對它的最完全的和熱誠的支持，那末，布爾塞維克，莫說兩年半，即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

政權了。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反對更強大的敵人，反對資產階級的一種最熱忱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它之被推翻（即使是在一個國家內）而更十倍地加強了，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之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底國際聯系之力量和牢固，而且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小生產可惜在世界上保留下來的還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却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並且大量地在產生着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根據一切這些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沒有一種長期的、百折不回的、不瀕生死的戰爭，沒有一種需要堅忍、紀律、堅強、不屈不撓和意志統一的戰爭，那末，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地告訴那一切不善於思索或對此問題不願加以熟慮的人們說：無產階級底無條件的集中化與最嚴格的紀律，乃是戰勝資產階級底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一點，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呢？——關於這些問題却熟慮得很不夠。難道不應當在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致歡迎詞時，更要時時伴以極其鄭重地分析布爾塞維克為什麼能夠養成革命的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之原因嗎？

布爾塞維主義從一九〇三年起，就作為政治思想派別與政黨而存在着。只有布爾塞維主義自其存在以來的整個

時期底歷史，才能滿意地說明，布爾塞維主義何以能夠養成並且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底紀律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是用什麼東西來檢驗的？是用什麼東西來鞏固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自覺性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它的堅忍性，它的自我犧牲，它的英雄主義；第二，是靠它善於同最廣大的勞動羣衆——首先是同無產階級的羣衆，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如果願意的話，在某種程度上同它們融成一片的才能；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它的政治的戰略和策略底正確性，而以最廣大的羣衆根據自身的經驗確信這種正確性爲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正能夠成爲先進階級（以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政黨，其紀律是不能實現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創立紀律底企圖，將不可避免地要流爲空話、空談、笑話的。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却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它們只有經過長期的勞動，嚴重的經驗，才能造成的：正確的革命理論可以促進這些條件的造成，但這種理論又不是教條，而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系起來，才能最後形成的。

如果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之下，能夠造成並勝利地實現最嚴格的集中

制與鐵的紀律，那末，其原因簡簡單單地只是在於俄國的許多歷史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塞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底最堅固的基礎上誕生的。而這個——僅僅這個——革命理論之正確性，不但已為整個十九世紀的全世界經驗所證明，而且特別是已為俄國革命思想迷惑、動搖、錯誤和失望底經驗所證明。在大約半世紀的期間，大約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俄國的先進思想，在空前未有的、野蠻的與反動的俄皇專制主義底壓迫之下，曾經熱渴地尋求了一種正確的革命理論，並以驚人的熱忱與縝密的態度追求歐美在這一方面的任何的和每一種的『最後的一言』。俄國以半世紀的歷史真正受盡了空前未有的痛苦與犧牲，受盡了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主義，受盡了難以置信的精力，及熱忱尋求、學習、實際體驗、失望、檢查、比較歐洲經驗的辛苦，才獲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由於為俄皇專制主義所迫使而不得不僑居國外的辦法，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便擁有了為世界任何國家所沒有的這樣豐富的國際聯系，這樣卓越的對於革命運動底全世界形式與理論之熟悉。

另一方面，在這個花崗石般的理論基礎上誕生出來的布爾塞維主義，曾經經歷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的歷史，這種歷史，就經驗之豐富講，是世界上沒有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内，就革命的經驗，其運動底各種形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觀

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彼此交替之迅速和多樣性說來，沒有一國甚至大體地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沒有一國曾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聚集了現代社會一切階級底鬥爭之這樣豐富的形式、色彩和方法；而且因為俄國底落後與俄皇專制主義壓迫之殘酷，這種鬥爭特別迅速地成熟起來了，特別飢渴似地和順利地通曉了歐美政治經驗底相適應的『最後的一言』。

(三) 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底 幾個主要階段

準備革命之幾年（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到處都感覺到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都在醞釀和準備。國外僑民的報紙，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底代表，三個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用『社會民主』派與『社會革命』派的招牌遮掩着）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都以綱領觀點上與策略觀點上底最激烈的鬥爭，預示和準備各階級之未來的公開的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以求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的報紙上找到它們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方向之間，自然還有無數居中的、過渡的，騎牆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各種機關報、政黨、政派、集團之鬥爭中，形成了那些成爲真正階級的、

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方向；各階級都各自鍛鍊出了應有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武器，準備來日的廝殺。

革命的幾年（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了。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見解，都被羣衆底行動所檢驗了。罷工鬥爭底廣泛與尖銳，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的、動搖的、不穩定的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受到了實踐上的檢驗。在鬥爭底自發的發展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預示了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的偉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制度的策略與參加國會制度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等等之交替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與聯系，——凡此種種，都具有驚人的豐富的内容。就學習政治科學底基本知識——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而言，這時期底每一個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政的」發展時期的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反動的諸年（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俄皇主義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被擊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變節、色情文學代替了政治。對於哲學唯心論的傾向加強了；神祕主義成爲掩飾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却給了革命的政黨與革命的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歷史辯證法底教訓，關於進行

政治鬥爭的理解、才能及藝術之教訓。患難之中認識朋友，戰敗之軍善於學習。

勝利的俄皇主義會不得不加速破壞俄國資產階級以前的、宗法的生活方法底殘餘。俄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很迅速地向前進着。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幻想，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從此煙消雲散了。階級鬥爭採取了一種全新的、更其明顯的形式。

革命的政黨必須學習到底。它們曾經學會了怎樣進攻。現在它們不得不懂得，這種科學必須要補充以更正確地執行退却的科學。不得不懂得——而且革命的階級根據它自身的痛苦的經驗，學會懂得——：如果沒有學會正確地執行進攻和正確地執行退却，那就不能勝利的。在一切被擊敗的反政府的和革命的政黨中間，布爾塞維克黨是退却得最有秩序的，他們的『軍隊』損失最小，該軍隊之核心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不可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最輕，最廣泛、最正確、最有力地恢復工作的能力最強。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地步，只是因為無情地揭穿了並驅逐了誇誇其談的革命家，這些誇誇其談的革命家不願了解：要退却，要善於執行退却、要務須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裏邊、在最反動的職工會、合作社、保險處等組織裏邊去合法地進行工作。

革命高漲的諸年（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最初，革命高漲會是最難以置信地緩慢的，後來，在一九一二年林那河事件以後，才稍微快些了。孟塞維克其作用乃是工人運

動中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種作用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爲整個資產階級所看中，所以，全部資產階級百般支持他們來反對布爾塞維克，而布爾塞維克會克服了莫大的困難，排擠掉了這些孟塞維克。可是，如果布爾塞維克沒有進行正確的策略，把非法的工作與對『合法的可能』之必要利用結合起來，那末，他們就永遠不能做到這一點了。在最反動的國會內，布爾塞維克會奪得了全部的工人議席。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在『國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合法的國會主義，替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替布爾塞維克，做了極有益的服務。布爾塞維克的議員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在國外僑民的報紙上，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與徹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的否定，一切這些色彩的觀點，都在我們這裏找到了充分的表現。第二國際底毒蟲們與老太婆們，以前曾經輕蔑地與驕傲地挺起鼻子，嘲笑俄國社會主義內『派別』之龐雜與其相互鬥爭之劇烈，可是，當大戰廢除了一切先進國內被稱頌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却不能甚至近似地組織這樣自由的（非法的）交換意見及這樣自由的（非法的）製定正確的觀點，如俄國革命黨在瑞士及其他許多國家裏所曾經做到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各國直接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壞的叛徒了。布爾塞維主義所以能夠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得到了勝利，其中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布爾塞維主義

從一九一四年末期，便無情地揭穿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註五〕主義，英國的獨立工黨與費邊派〔註六〕領袖們底見解，意大利的杜拉第〔註七〕等，都是與『考茨基主義』相同的）之醜惡、可憎、卑鄙，可是羣衆後來却本着自身的經驗日益相信了布爾塞維克底見解之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即俄舊曆二月至十月）。俄皇主義底異常衰老和陳腐，造成了（由於痛苦萬分的戰爭之打擊和重担）一種朝向反對它的不可置信的破壞力量。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了，它（在戰爭的環境裏）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自由些。像在最『嚴格國會主義的』共和國裏一樣，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開始組成政府，並且，國會內（雖然它是反動絕頂的國會）反政府黨領袖底稱銜，便使這種領袖以後在革命中容易起作用。

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很好地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關員主義者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之一切方法和手腕，一切論據和詭辯。凡是我們現在所讀到關於謝德曼〔註八〕們和諾斯克〔註九〕們，考茨基和希法亭〔註十〕，關於倫涅爾〔註十一〕和奧斯鐵里茨，奧託·鮑威爾和佛里茨·阿德勒，關於杜拉第和龍格，關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的一切，在我們看來（事實上也是）似乎都是一種著名的老調及枯燥無味的重述、再唱。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塞維克

那裏見過了。歷史竟演了滑稽劇，使落後各國底機會主義者，竟凌駕於許多先進各國底機會主義者之上了。

如果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遭受了破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的問題上丟了醜，如果現在退出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其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明顯地』丟了醜與一塌糊塗，如果所有他們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偏見底奴隸（完全在一八四八年自命爲『社會民主主義者』看的小資產者之精神上），那末，我們在孟塞維克這個例子上早已看見過所有這一切了。歷史竟演了這樣的滑稽劇：一九〇五年在俄國會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舊曆二月到十月），孟塞維克曾偽造了蘇維埃，而孟塞維克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和意義，所以已經破產了；現在，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又在全世界上產生了，它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並且第二國際底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塞維克一樣，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而到處都在破產着。經驗表明，在無產階級革命底有些極重要的問題上，各國都將不可避免地要幹俄國所幹過的一切的。

與現時在歐美各國所常聽到的那種意見相反，布爾塞維克曾經慎重地開始了而且並不是很簡單地準備了他們的勝利的反對代議制的（事實上）資產階級共和國和反對孟塞維克的鬥爭。在第二次革命時期的初期，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是解釋：如果沒有蘇維埃底分與情緒上的預

先的改變，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曾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抵制立憲會議，而是說——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會議起，便正式用黨底名義說，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比沒有立憲會議的這種共和國要好些，而「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則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議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月）就不能得到勝利，也不能保持這種勝利了。

（四）布爾塞維主義

是在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
作鬥爭中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這種機會主義到了一九一四年就最後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最後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而反對無產階級了。自然，這曾經是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這種敵人現在在國際範圍內依然還是主要的敵人。布爾塞維主義過去和現在都對這個敵人予以最大的注意。布爾塞維主義活動底這一方面，現在也為國外所熟知了。

講到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另一個敵人，就有點不同了。在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塞維主義是在反對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長期鬥爭中發育、形成和鍛鍊出來

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類似無政府主義，或者是從無政府主義剽竊了某些東西，它在一切主要點上，都放棄了堅忍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完全確定（並且已被一切歐洲的革命與革命運動之經驗所完全證實）：小有產者，小業主（是一種社會類型，在歐洲許多國度內有着極廣大的羣衆的代表），因在資本主義下經常感受壓迫，並且時常感受生活之極端劇烈而急速的惡化和破產，所以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但不能表現堅忍性、有組織性、有紀律及堅定不移。因資本主義之恐怖而『發狂』的小資產者，和無政府主義一樣，乃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度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性之不堅固，其毫無成果，其迅速轉變為馴服、消沉、空想，甚至『瘋狂』似地醉心於資產階級的某種『時髦』思潮的本性，——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對這些真理之理論的抽象的承認，還絲毫不能使革命的政黨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在獨特的——多少獨創的——環境裏，因意外的事端，總是以稍新的形式，以前此未曾見過的外衣或包圍物而出現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底一種懲罰。這兩種畸形是彼此互為補充的。在俄國，其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分較西歐各國要更多些，雖然如此，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時期及其準備期間，比較起來都只有微不足道的影響，其原因，無疑的一部分是歸功於布爾塞維主義，布爾塞維主義總是

進行最無情的和最不可調和的鬥爭以反對機會主義的。我說「一部登上者」因爲在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一事上會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乃是下面一點，即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有可能異常茂盛地發展，並徹底暴露自己的不正確性；暴露自己之不適於作爲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塞維主義在其於一九〇三年發生時，即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能同無政府主義吊膀子的）革命性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總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尤其是在我國；於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當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羣衆性的政黨奠定基礎時，這種傳統就特別鞏固起來了。布爾塞維主義在三個要點上曾承受了並繼續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之趨勢最甚的政黨，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該黨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熱切地不願（確切點說：不能）了解，在每次政治行動之前，對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有作嚴格客觀的估計之必要。第二，該黨看到自己的特殊的「革命性」或「左的精神」是在於承認個人恐怖，個人暗殺，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策略的。自然，我們曾經排斥只是出於便宜目的的個人恐怖；至於那些在「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或一般地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實行的恐怖之人，普列哈諾夫（註十三）（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就加以嘲笑和唾棄（詳

十四)。第三，「社會革命黨人」看到「左的精神」，是在於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比較不大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同時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却模仿該黨底極端的机会主義者。

附帶說明一下，現在歷史已在巨大的、世界歷史的範圍內證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一種意見，就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注意，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經要求開除伯恩斯坦〔註十五〕底黨籍〔註十六〕，而布爾塞維克總是繼承這個傳統，在一九一三年曾揭穿了列根〔註十七〕之卑鄙、下賤與叛變行爲）。最接近於革命的無產階級爲了能夠取得勝利而所需要的這種政黨。現在在一九二〇年，在戰爭時期與戰後最初幾年的一切可恥的歧途與危機以後，可以明顯地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也比其他各黨更早地重新恢復元氣，治好創傷及強健起來了。無論在斯巴達克黨團（註十八）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左的無產階級的一翼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來，這個左翼正在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以反對考茨基們、希法亭們、列德堡（註十九）們、克里斯賓（註二〇）們底機會主義和其毫無氣節的行爲。如果現在把已經完全結束的一個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爲止這一個時期加以總的考察，那末，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的一般關係，則具有完全確定的和不可爭辯的輪廓。馬克思主義終於是對的，如果說無政府主義者

會正當地指出了在大多數社會黨中間所盛行的對國家的見解之機會主義性，那末，第一，這種機會主義注是跟曲解或甚至直接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我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多即已指出，恩格斯有一封信，曾經特別凸出地、嚴厲地、直截地、明白地揭露了社會民主黨對國家的流行的觀點之機會主義，而倍倍爾（註二一）把它隱藏了三十六年——由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一年）有聯系的；第二，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這些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蘇維埃政權，承認它之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的，正是出於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一派之內部。

布爾塞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的偏向作鬥爭，有兩次曾採取了特別大的規模：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爲了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爲最反動的法律所限制的合法的工人團體的問題；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爲了可否容許有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的』布爾塞維克，因其固執成見，不願了解有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之必要，而被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優秀的革命家，他們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底忠實黨員——曾特別依靠於一九〇五年抵制國會的成功經驗。當俄皇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宣佈召集諮議式的『國會』時，布爾

* 參看本選集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頁。

塞維克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塞維克派相反，曾宣佈抵制國會，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的確掃除了國會。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因為一般地不參加反動的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地估計了那時客觀的形勢，這種形勢會使羣衆罷工迅速地轉變為政治罷工，以後又轉變為革命的罷工，再後又轉變為武裝起義了。並且，那時的鬥爭是爲了把第一次人民代表機關之召集，聽俄皇去辦理呢，還是企圖把這一召集從舊政權手中奪過來？因為沒有把握，也不能有把握斷定是否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同樣沒有把握也不能有把握斷定這種形勢的發展是否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所以，抵制國會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曾以非常有價值的經驗豐富了革命的無產階級，這次抵制指明，在合法的與非法的、國會的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結合之下，善於放棄國會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的，甚至於是必須的。但是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模仿地、無批評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環境中去，那是極大的錯誤。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不大的，容易改正的。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

* 凡適用於個人者——稍加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的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聰明的人是不犯很重要的錯誤和善於容易而迅速糾正錯誤的人。

抵制，則是極嚴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之很快的高潮及其轉變為武裝起義，而另一方面，在新的資產階級君主政體之整個歷史環境中，有把合法的與非法的工作互相配合之必要。現在你回顧一下一個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之聯系，已完全表現出來了），那末，就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假使布爾塞維克當時在最激烈的鬥爭中，不堅持一定要把合法的鬥爭形式跟非法的鬥爭形式配合起來，跟必須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許多其他為反動的法律所限制的機關（如保險儲金會等）配合起來，那末，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就不能保持（自然更說不到鞏固、發展和加強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底堅強核心了。

在一九一八年，不曾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我們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集團或『小組黨』，而且為時不久。在是年——一九一八年，『左派共產主義』底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註二二）、布哈林（註二三）等，都公開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以為布列斯特的約是在原則上不可容許的和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有害的與帝國主義者之妥協。這的確是一種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

* 關於那時期抵制國會及與『左派布爾塞維克』作鬥爭的情形詳見本選集六卷是否要抵制國家杜馬？（八六——九〇頁）及論抵制（一二三——一二二頁）兩文。

但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却是一種必須的妥協*。

如果我現在聽到人們例如『社會革命黨人』對我們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策略之攻擊，或者如果我聽到蘭斯伯雷（註二四）同志和我談話時所說的這一段話：『我們英國工聯會底領袖們說，如果妥協對於布爾塞維克是可以允許的話，那末妥協對於他們也是可以允許的』，那末，我通常首先就用一個簡明的和『通俗的』比喻來回答：假設武裝強盜攔住了你的汽車，你交出你的錢、護照、手槍、汽車。結果，你得以免去與強盜為伍。在這兒妥協是一目了然的，是不容置疑的。『Do ut des』（『我給』你錢、手槍、汽車，『爲的你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可以平安無事。）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頭腦健全的人，他會說這種妥協是『在原則上不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的人是強盜黨夥伴（雖然強盜有了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國帝國主義強盜底妥協，正和這樣的妥協相類似。

但是，當俄國的孟塞維克們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們（以及在可觀的程度上考茨基派），奧國的維威爾與阿德勒（更不用說倫涅爾這一流的老爺們了），法國的列諾迭里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

* 關於那時的布列斯特和約及黨內鬥爭，詳見本選集第十三卷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與結論一文（六一—七一頁）

人與「工黨黨人」等，他們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同自己的資產階級、而且有時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訂立妥協，以反對本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時候，所有這些老爺們底這種行動，才是同強盜打夥呢。

結論是明白的：「在原則上」否認妥協，否認任何一種妥協之任何許可性，這是一種甚至難以認真理睬的孩子氣。一個願意成為對革命的無產階級有益的政治家，就應當善於區別出那不可容許的、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為的這種妥協之具體情形，就應當善於用批評底全力，用無情的揭穿和不可調和的戰爭之鋒刃去反對這些具體的妥協，不讓那班富於經驗的、「實利主義」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主義的陰謀家以「一般妥協」的議論來脫身卸責。英國工聯會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領袖老爺們，恰恰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叛賣行為之責任，卸脫他們所訂立的這種妥協之責任，即真正表示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變節及叛賣行為的這種妥協之責任。

有各種不同的妥協。要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要學習把下面兩種人分別開來，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減少強盜所帶來的禍患，並使強盜易於受縛和被槍擊；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要入夥分贓。在政治上，這一點遠不是常常像這個簡單的小孩子般的例子那樣容易的。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想出一個包醫百病的藥方，或

者他作諾言說，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治上是不會有任何困難和任何錯綜複雜的情形，那末，他便是一個騙子。

爲了避免誤解起見，我冀圖指出分析具體妥協底幾個基本論點，雖然是很簡單的。

與德帝國主義者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實行妥協的黨，實際上從一九一四年底以來，就養成了它的國際主義。它不怕在兩夥帝國主義強盜的戰爭中主張俄皇帝制失敗，並排斥「保護祖國」的口號。這個黨底國會議員，未走在資產階級政府裏謀取總長高位的道路，而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打倒俄皇帝制而建立了民主共和國的革命，對這個黨作了新的極大的考驗：它跟「自己的」帝國主義者未作任何的妥協，而是準備推翻他們，並且把他們推倒了。這個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把地主的與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盡行沒收無遺。在公佈和撕毀帝國主義者底秘密條約以後，該黨向一切民族建議和平，僅在英法帝國主義者破壞和平，而布爾塞維克盡人力之所及以加速德國和其他各國的革命以後，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底暴力之下。該黨，在這樣的環境下所締結的這樣的妥協，其完全正確，對於一切人，都日益明白和顯而易見了。

俄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以及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是從叛節行爲開始，他們直接或間接主張「保護祖國」，即主張保護本國的掠奪的資產階級。他們以後繼續這種叛節行爲，與本國資產階級實行聯合，與本國資產階級一起反對本國革

命的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先與克倫斯基（註二七）及立憲民主黨之聯盟，後來又與高爾察克（註二八）及鄧尼金（註二九）之聯合，正如他們的國外同志與其各該國資產階級之聯合一樣，都是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以反對無產階級的。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自始至終是在於他們使自己成了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之人。*

（五）德國共產黨底「左派」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

我們現在要講的德國共產黨人，不是自稱為「左派」，而是自稱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正完全適合於「左派幼稚病」底症候，這從以後的說明中就可以看出來。

有一本代表這種反對派底觀點的小冊子，叫做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團）之分裂（「美因河佛蘭克府地方支部」出版）（註三〇），高度凸出地、精確地、明瞭而簡括地解釋了這個反對派底觀點之實質。為使讀者認識這種種實

* 關於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底叛變作用，其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者，參看本選集第九卷論革命底兩條路之一文；其在內戰時期者，參看第十二卷 205—207 頁，及第十卷與飢荒作鬥爭和索羅金底有價值的承認兩文。

質，只要從這裏引證幾段就夠了。

『共產黨乃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在政治上，這個過渡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乃是無產階級專政之時期……。』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底持有者：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呢？……在原則上，應力謀達到共產黨底專政呢，還是無產階級底專政呢？！』（着重點均按照原文。）

其次，小冊子著者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該『中央』正在尋求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聯合之道路，說該『中央』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鬥爭手段（包括國會主義）的問題』，只是爲了掩飾其真正的和主要的與獨立黨聯合的企圖。這本小冊子接着說道：

『反對派選擇了另一條路。它抱着這樣的意見，即關於共產黨之統治與黨之專政的問題，只是一個策略問題。無論如何，共產黨之統治，乃是黨之從來統治底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無產階級之專政。黨之一切措施、其組織、其鬥爭形式、其戰略和策略、都須適合於這一點。以此，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主義的鬥爭形式，凡是迂迴和妥協的政策，都應十分堅決地加以排斥。』『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鬥爭之方法，應有力地加以強調。可是，爲了使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和層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革命鬥爭起

見，務須在最廣大的基礎上，並在最廣大的範圍內建立新的組織形式。這個集合一切革命分子的地點，就是以工廠組織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聽從「退出職工會！」這個口號的一切工人，都應當加入該聯合會。在這裏可以把鬥爭的無產階級編成最廣大的戰鬥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以加入這種隊伍。對於鬥爭的羣衆之進步的一切政治教育及鬥爭中的政治方針，則是站在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底任務」……

「……因之，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互相對立着：

【一個是領袖底黨，這個黨力謀組織革命的鬥爭，並從上面管理這個鬥爭，採取妥協和國會主義的辦法，以便造成一種局面，可使他們參加似乎實行專政的聯合政府。】

【另一個是羣衆的黨，這個黨期待革命鬥爭從下面高漲起來，它爲了這種鬥爭，只知道和採用一種明確的走向目的去的方法，排斥任何國會主義的和機會主義的方法；這個唯一的方法，就是毫無保留地推翻資產階級，然後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去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

「……那裏是領袖底專政，——這裏是羣衆底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表徵德國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底觀點之最主要的

凡自覺地參加過或親切地觀察過一九〇五年以來布爾塞維主義發展的每個布爾塞維克，在讀了這一番議論之後，便會立刻說：「這是多麼陳腐的、老早就聽見過的廢話呵！這是多麼「左」的孩子氣呵！」

現在我們就來進一步地考察一下這種論調。

「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黨）還是羣衆底專政（黨）？」僅僅這一種發問的方法，就已經證明了他們思想混亂到什麼地步了。這些人本想發明出一種完全特別的東西，但沒有成功，反而弄巧成拙。誰都曉得，羣衆是分成各種階級的；只有把一般巨大的多數人（未按社會生產制度中的地位而分開的）與在社會生產制度中佔據特殊地位的諸範疇對立起來時，才可以把羣衆與階級對立起來；通常和在大多數場合下，至少在現代文明國度裏，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通例，政黨是由最有聲望、最有威信、最有經驗、被選到極負責地位的、稱爲領袖的人們所形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領導的。這都是初步常識。這都是簡單而明瞭的事情。爲什麼不如此，而偏要胡言亂語呢？偏要標新立異呢？一方面就外表看來，人們因黨底合法地位和非法地位之迅速遞變，破壞了領袖、政黨及階級間的通常的、正常的、簡單的關係而陷於困難的境地，以致搞糊塗。在德國，和在歐洲其他各國一樣，人們太習慣於合法行動，太習慣於由黨的定期代表大會自由而規則的選舉「領袖」，太習慣於用簡便的辦法，如國會選舉、羣衆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等等，來

檢查黨的階級成分了。當由於革命之風暴般的進展和國內戰爭之進展，不得不掉棄這種普通的工作形式，而迅速改用合法工作與非法工作互相更替，不得不改用兩者互相配合，改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以便分出或組織或保存【一批領袖】的時候，人們就張皇失措起來，開始虛構那荒謬絕倫的謬論了。大概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註三一）自己弄糊塗，張皇失措，而幫助了這種荒謬的臆想，因為他們不幸生長於一個小國裏，有着特別特權的和特別穩固的合法地位之傳統，這些人從來不曾見過合法地位與非法地位之互相更替。

另一方面，這裏只是毫不思索的、毫無聯系的使用【羣衆】、【領袖】這些現今【時髦】的名詞。人們關於對【領袖】之攻擊，關於把領袖和【羣衆】對立起來的事情，聽得很多了，並且牢牢地記在心裏了，但是却不會想一想結果如何，不會把問題弄清楚。

在帝國主義大戰末期以及在大戰以後，在一切國度裏，【領袖】與【羣衆】之分歧，曾經特別明顯地和峻峭地表現出來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到一八九二年把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曾用英國的例子解釋過好多次。英國底壟斷地位，從羣衆中分化出了一種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底領袖會不斷地投奔資產階級方面去，並為資產階級——直接地或間接地——所養。馬克思所以獲得這班混蛋們之光榮的憎恨，就是因為他曾公開地指斥他們為叛徒。近代的（二十世紀的）帝

極主義，替若干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地位，並在這個基礎上，在第二國際裏到處都造出了笨徒領袖、機會主義者、沙文主義者的類型，他們只顧自己行會主義底利益，自己少數的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於是造成了機會主義政黨之脫離「羣衆」，就是說，脫離最廣大的勞動者階層，脫離他們中間的大多數，脫離報酬最低的工人。不同這種禍害作鬥爭，不揭穿、指斥、驅逐機會主義的出賣階級的領袖，則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所進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

從這個問題說起，一直說到一般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乃是可笑的荒謬與愚蠢。尤其可笑的，就是（在「打倒領袖」這個口號的掩飾之下），事實上推出了一些專講瘋狂的荒唐話和糊塗話的新領袖，來代替那對於簡單事物具有凡人見解的舊領袖。這些新領袖在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沃里夫赫木、霍爾赫爾、什列迭爾、文迭爾、額列爾等。額列爾「加深」問題及宣佈一般不需要政黨及政黨具有「資產階級性」的企圖，那是荒謬至極，我們只有聳聳肩而已。這真是：如果固執錯誤，如果深刻地找尋理由來辯護錯誤，如果把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小的錯誤總要弄成極大的錯誤的。

否認黨性和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的主張所得到的結果。而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正是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不定性、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有步伐一致的行動，這種劣橫

性，如果加以縱容，勢必要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否認黨性，這就是說不是從資本主義崩潰底前夜（在德國）飛躍到共產主義底最低階段和中間階段，而是飛躍到它底最高階段。我們在俄國正經歷着（推翻資產階級後的第三年）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最低階段的最初幾步。階級是依舊存留着的，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還會存留多年的。這種時期，在沒有農民（但仍有小業主！）的英國，或許可以縮短些。消滅階級，這不僅是

◆ 共產主義工人日報（註三七）（漢堡，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第三十二期）上額列爾論解散政黨一文說：「如不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則工人階級便不能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如不破壞政黨，則他就不可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

於丁各國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最穩健的頭腦，才能「心滿意足」，因為顯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堅固的德國人（額列爾及亞爾薩爾都以其在上述報紙所發表的文章，特別堅固地證明：他們那自命為堅固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可笑地說出了荒謬絕倫的廢話，顯示出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ABC之不理解），說出了完全不合適的東西。單是承認馬克思主義，這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知道這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俄國常是特別「時髦」的。

說趕走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是說消滅小商品生產者，而這種小商品生產者，是不能驅逐他們的，是不能壓服他們的，而要與他們共居，只有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他們用這種自發性侵潤無產階級，他們用這種自發性破壞無產階級，不斷地在無產階級內部引起小資產階級的無節操、散漫性、個人主義、由熱心變為消沉之復發。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內部須要有最嚴格的集中化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推行無產階級底組織作用（而這是無產階級底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反對舊社會勢力和傳統的頑強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之力量，乃是一種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鐵一樣的和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如果沒有在本階級內享有全體正直分子信任的黨，沒有善於注視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就不能順利地進行這個鬥爭。戰勝強大而集中化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倍，而小業主以其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的、不可捉摸的、起腐化作用的活動，實現那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結果，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結果。誰要是稍稍削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在事實上他就是幫助着資產階級，以反對

無產階級。

與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羣衆的問題並列，還應提出關於「反動」的工會的問題。但首先讓我根據我們黨的經驗，再說幾句結束的話。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在我們黨內過去是常常有的：我記得第一次這樣的攻擊是在一八九五年，當時形式上還沒有黨，可是彼得堡的中央集團已開始形成，而且應担負起對各區集團之領導。在我們黨底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有過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寡頭政治」等等。因此，德國「共產黨左派」的「幼稚病」，並沒有什麼稀奇的、什麼新的、什麼可怕的地方。這個病症會安全渡過的，病後機體甚至更加強健些。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之迅速交替（這種交替是與正是把總司令部，正是把領袖特別「隱藏起來」，特別保守秘密之必要有關的），有時會使我們達到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是在一九一二年，奸細馬林諾夫斯基（註三八）混進布爾塞維克黨底中央委員會。他使數十個數十個最好的和最忠實的同志被捕，使他們遭受徒刑，加速他們中間許多人之死。要是他還沒有造成大禍的話，那是因為我們曾經正確地確定了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之相互關係。馬林諾夫斯基任中央委員和國會議員，爲了獲得我們底信任起見，他不得不幫助我們辦合法的日報，這些日報雖在俄皇帝制下面，也能夠進行反對孟塞維克底機會主義的鬥爭，能夠採用相當的掩蔽方式去宣傳布爾塞維主義的原則。馬林諾夫

斯基一隻手送布爾塞維克數十個數十個優秀的幹部，去做苦工和去受死，而另外一隻手却幫助我們經過合法的報章和雜誌訓練出數萬數萬個新的布爾塞維克。正面對着應在反動工會內學習進行革命工作這一任務之德國同志（以及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對於上述事實，好好地加以思索*。

在許多國度裏，連最先進的國度在內，資產階級無疑地現在正在派遣而且將來也要派遣奸細到共產黨內部裏來。防範這種危險的手段之一，就是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巧妙地配合起來。（註四〇）

* 馬林諾夫斯基在大戰時曾在德國。當他於布爾塞維克黨當政時回到俄國時，他曾立刻被我們的工人提交法庭，並把他槍決。孟塞維克曾特別惡意地因這個錯誤——一個奸細混進中央委員會而攻擊我們。但是我們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會要求逮捕國會黨派洛派科（註三九），並待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大戰以前就已曉得馬林諾夫斯基底奸細行動，而不通知國會中的勞動派和工人，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洛派科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窮尼金去了。

(六) 革命者應否在 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

德國「左派」認為：對此問題必須無條件地作否定的回答，乃是對自己已經決定不移的事了。根據他們的意見，發表幾篇反對「反動的」和「反革命的」職工會的宣言和說幾句怒氣衝衝的驚嘆詞句，就足以（在這件事務上特別「堅固」和特別愚蠢的，要推霍爾語爾）「證明」，革命者、共產黨人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派的、列根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允許的。

不論德國「左派」怎樣相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但是在事實上它是根本錯誤的，其中除空話而外，別無內容。

爲了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的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和現在策略上可以普遍應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應用於西歐。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底相互關係，同時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在我國具體地表現如下：組織在蘇維埃裏的無產階級實現專政，而無產階級是由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領導的，而黨，

根據最近黨的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共有黨員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以前，甚至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黨員人數要少得多(註四一)。我們害怕黨之過於擴大，因為升官發財和那些只值得槍斃之人，勢必力謀鑽入當政的黨裏來。最近一次，即在尤鄴尼赤(註四二)只距彼得堡幾俄里，鄴尼金已抵奧勒爾(距莫斯科僅僅三百五十俄里)的那些日子，即在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和冒險家、野心家、鑽營祿位者以及一般不堅定的分子，無論如何不能指望加入共產黨作為升官發財捷徑(寧是只能等待絞刑和嚴刑)的那些日子(一九一九年冬季)，我們才——只是對工人和農民——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黨代表大會(最近一次是每一千黨員選代表一人)，由大會所選舉的十九人組織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並且莫斯科的日常工作，只是由還要更狹小的機關即所謂「組織局」與「政治局」來進行的，而這兩個機關是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各有五個中央委員。這樣一來，便是真正的「寡頭政治」了。沒有黨的中央底領導性的指示，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於職工會，據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現在職工會會員計有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事實上絕大多數工會底一切領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總工會中央(全俄職工會中央委員會)都是由共產黨人組成的，它

們實行黨的一切命令。結果，整個兒說來，造成一個形式上非共產主義的、靈活的、比較廣大的、非常強大的、無產階級的機關，黨是經過這種機關與階級和羣衆密切聯繫起來，而階級底專政就是經過這個機關，並在黨的領導之下來實現的。如果沒有與職工會的極親密的聯系，如果沒有職工會的熱烈支持，如果沒有職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的最不顧犧牲的工作，那末，自然，我們不要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和實現專政了。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系，在實踐上是一件很複雜的和多樣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職工會底一般有影響的工作者及時地而且經常地舉行會議，與孟塞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塞維克直到現在還有若干信徒（雖然不很多），他們教唆信徒實行各種可能的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起，從宣傳職工會底【獨立】性（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一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怠工等等爲止。

經過職工會而與『羣衆』的聯系，我們承認是不夠的。在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這樣一種制度，如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同時，我們力認用全力去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注視羣衆底情緒，接近他們，滿足他們的要求，從他們中間提拔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擔任國家的職務等等。在最近將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改組爲『工農監察院』的訓令之一中，黨允許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舉國家監察人員去擔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其次，黨底全部工作，自然是經過蘇維埃來進行的，而蘇維埃不問職業區別，團結一切勞動羣衆。蘇維埃代表大會是這樣一種民主機關，這種機關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最·好的也不曾夢見過；經過這些代表大會（黨是極力細心地注視這種大會的），並經過黨經常派遣自覺的工人到鄉村去擔任各項職務，來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實行與富有的、資產階級的、剝削的、投機的農民作有系統的鬥爭等等。

【從上至下】近來，從實現專政的實踐之觀點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總機構，就是如此。希望讀者能懂得：俄國布爾塞維克既熟悉這種機構，又親眼看見這種機構在二十五年内怎樣從小小的、非法的、地下的小組發展起來，他們聽了什麼【自上】或是【自下】，領袖專政或是羣衆專政種種議論，不能不認爲這種議論是一些幼稚可笑的胡說八道，好像關於左脚對人更有益處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益處這類的爭論一樣。

德國左派底一些鄭重其事的、完全學究的、非常革命似的論調，如說，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應在反動的工會中工作，可以拒絕這項工作，必須退出職工會，必須另外創立一個嶄新的、清一色的、由很可愛的（大部分很年輕的）共產黨人所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在我們看來，也不能不是這種幼稚可笑的胡說八道。

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乃是工人中間從有的數百年來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差

異，另一方面，則是職工會，這種職工會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多年月，才可以發展起來，而且將發展為規模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產業工會（包含整個的產業，而不僅包含同行、同一手藝和同一職業），然後再經過這些產業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教育、訓練、和培養各方面都發展的和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人，會做一切事情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的，它應當是向這個方向走的，並且定能走到的，不過須要經過長久的年月罷了。今日就企圖在實踐上預想這種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的和成形的、完全開展的和成熟的共產主義底未來成果，這無異於教四歲小孩學高等數學。

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不用幻想的和不用由我們專門造就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不用說是【很困難】的，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決這個任務的辦法都是開玩笑的，竟至不值得一提的。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從工人底散慢性和無力到階級團結之萌芽之過渡。當無產者底階級團結之最高形式，無產階級底革命政黨（只要這種政黨沒有學會把領袖與階級及羣衆聯繫起來而成爲一個整體，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東西一天，它便不配叫這樣名稱的）開始長成的時候，職工會就開始不可避免地要暴露若干反動的特色，暴露若干行會的狹隘性，暴露若干不問政治的偏向、若干暮氣沉沉等等。

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底相互影響之外，在世界任何地方，無產階級是沒有別的發展道路的，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乃是作為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底一大進步，黨在這個時候，不僅用舊的方法和舊的精神而已——還要用新的方法和新的精神教育職工會，領導職工會；但同時不要忘記，職工會依然是、並且將來長久還要是一個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和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是工人底必要的團結，有了這種團結，才能使全國經濟的管理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業）底手中，然後轉到全體勞動者的手中。

在上述的意義上，職工會底若干『反動性』，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是不可避免的。不懂得這點，那就是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根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性』，企圖避開它，跳過它，那是最大的愚笨，因為這就是說害怕無產階級底作用，這種作用就在於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羣衆，並吸引他們參加新的生活。另一方面，把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擱置到再沒有一個在職業上狹隘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會和工聯成見的工人的時候，那是更大錯而特錯。政治家底藝術（和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了解）就在於正確地計算一種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順利地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以後它能夠得到工人階級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底充分廣大的階層之

充分贊助，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能夠教育、訓練、吸引日益廣大的勞動羣衆，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先進的國度裏，職工會底若干反動性，無疑義地曾經表現得而且應當表現得比在我們俄國更厲害些。在我們這裏，孟塞維克從前在職工會裏所以有支柱（現在部分地在很少數的工會內也還有），正由於行會的狹隘性、職業的自私主義和機會主義。在西歐，那裏的孟塞維克在職工會裏比在我國更『根深蒂固』些，在那裏形成了一個比在我國更強大的職業主義的、狹隘的、自私的、平庸的、貪婪的、市儈式的、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爲帝國主義所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敗壞的『工人貴族』層級。這是不容爭論的。在西歐同賈彼爾斯們（註四三）、如沃們（註四四）、漢得遜們（註四五）、麥爾赫姆們（註四六）、列根們作鬥爭，比較我們這裏同孟塞維克作鬥爭要困難得多，我們的孟塞維克，乃是一種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完全同質的類型。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而且像我們過去所作的那樣，一定要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底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們完全揭破，並把他們從工會裏趕出去爲止。如果這種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該試圖奪取政權），並且這種『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度裏和在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只有各個國度裏無產階級底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政治領導

者，才能正確地計算這種程度。（例如在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即俄舊曆十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革命以後幾天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就可以作為這門爭勝利之尺度，並且在這次選舉中，孟塞維克會一敗塗地，他們僅獲得七十萬票，^①加上南高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有一百四十萬票；而布爾塞維克所得的却有九百萬票。請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的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見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八期*。）

但是，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羣衆的名義進行的，並且爲的是要吸引工人羣衆到我們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作鬥爭，爲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基本的和最明顯的真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正是做了這種愚蠢的事，他們因職工會上層分子底反動性和反革命性，便妄論……退出職工會！！拒絕在職工會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一種不可寬恕的愚蠢，這種愚蠢無異共產黨人向資產階級作最大的効勞。因爲我們的孟塞維克，像職工會底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無非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像我們常常反對孟塞維克所說的），或者是「資本家階級底工人僱員」（Labor-lieutenants

* 見本選集第十一卷下冊。

of the capitalist class)，這是美國丹尼耳·德·立昂（註四七）底信徒之很好的和極確切的說法。不要在反動的工會內工作，這就是說，把不十分發展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委棄在反動的領袖、資產階級代理人、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一八五二年關於英國工人給馬克思的信）（註四八）底影響之下。

正是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的職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表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是如何輕浮地對待影響「羣衆」的問題，他們是怎樣濫用「羣衆」這一個名詞的。爲了善於幫助「羣衆」，並獲得「羣衆」底同情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領袖們」（這些「領袖們」都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在大多數場合之下他們都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在一起的）底挑剔、陷害、侮辱和追究，凡是有羣衆的地方，便一定要進去工作。應當善於忍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強不拔地、耐心地在一切機關、社會、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動的工作，不管這些組織如何反動，只要那裏有無產階級羣衆或半無產階級羣衆，我們就應該在裏面進行工作。而職工會與工人合作社，正是（後者至少有時是）有羣衆的這種組織。依據瑞典人民政治日報（註四九）底統計（一九二〇年三月十

● 在原稿及第一版上都誤印爲一九一九年。

日)，在英國，工聯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九。至一九一九年末，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頭沒有關於德法兩國這一類的材料，但一般確鑿的事實，證明這兩國的職工會會員都有大量的增長。

這些事實，都最明白不過地說明了，而且也爲其他千百個例證所證實的事實，這就是正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在「下層」羣衆中，在落後羣衆中，覺悟程度和組織要求都在日益增長着。英、法、德的成百萬的工人，都初次由完全沒有組織的現象轉到初步的、最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作到的（對那還受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所熏染的人們而說的）組織形式，即職工會上來了，而革命的、但不合理的「左派」共產黨人，却並排地站着，空喊「羣衆」、「羣衆」！——拒絕在職工會內工作！以職工會的「反動性」爲藉口而拒絕這種工作！想出了一種新的、純粹的、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成見的、沒有沾染行會主義和陰險職業主義這種惡習的「工人聯合會」，說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會，只要求（只要求！）「承認蘇維埃制度與專政」，就可以加入該會（參看前面引文）！！

再想像不出比「左派」革命家對革命所作的更大的不合理、更大的危害了！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空前地戰勝俄國以及協約國資產階級兩年半以後，對職工會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的條件，那我們就做了蠢事，損壞了自己對羣衆的影響，幫助了孟塞維克。因爲共產黨人底

全部任務，就是在於善於說服落後羣衆，善於在落後羣衆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用虛構的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把自己與羣衆隔離開來。

無疑的，賈彼爾斯們、漢得遜們、如沃們、列根們這些老爺們，都是很感謝這些「左的」革命家的，因為他們像德國的「原則的反對派」（天保佑我們避免這種「原則」吧！）一樣，或像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會」（註五〇）裏的若干革命者一樣，都是高唱退出反動的職工會，並拒絕在其中作工作的。無疑的，機會主義底「領袖」老爺們都會援用資產階級外交底一切勾當，都會乞援於資產階級的政府、牧師、警察、法庭，以便不許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擠出職工會，使他們在工會中的工作做得盡可能地更不痛快，以便侮辱他們、搜捕他們和取締他們。應當善於抗抵這一切，應不怕任何犧牲，甚至——在必要時——不惜採取任何巧計、妙策、非法手段、沉默、隱蔽真情，以期打入職工會，留在工會裏面，無論如何要在裏面進行共產黨的工作。在俄皇政府時代，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沒有絲毫「合法的可能性」，但是當偵探局長蘇巴托夫（註五一）舉行黑色百人團的工人大會和組織反動的工人團體，以便捕獲革命黨人並與他們作鬥爭時，我們就派遣了我們黨的黨員到這種大會和團體中去（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什金同志，他是彼得堡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被俄皇將軍槍斃了），他們在那裏建立了與羣衆的聯系，巧妙地進行自己的鼓動，並使

工人脫離了蘇巴托夫派的影響。自然，在西歐，因合法主義的、立憲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特別根深蒂固，要進行上述的工作，則更困難些。但是這種工作，是能夠進行的，而且應當進行的，並且要有系統進行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一般地直接責斥，並應當向下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提議責斥那一般不參加反動的職工會的政策（應當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之不合理性及它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之危害）；特別要指斥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底行為路線，因為他們——不管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公開地或隱蔽地、整個地或部分地，都是一樣——都是支持了這種不正確的政策。第三國際應當與第二國際底策略斷絕關係，不要迴避，不要扶煞棘手問題，而要露骨地提出它們。我們已經公正地給「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說出了全部實話，現在我們也要公正地給「左派」共產黨人說出全部實話。

* 賓彼爾斯們、漢得遜們、如沃們、列提們，無非都是蘇巴托夫們，與我國蘇巴托夫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穿着西歐的服裝，表現歐洲的風彩，當他們實行自己的無恥的政策時，採用文明、細巧、民主的粉飾辦法而已。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是以巨大的輕視態度——而且以巨大的輕浮態度——否定地答覆這個問題的。他們的論據呢？在下面的引證中我們曾經看到：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主義之鬥爭形式的舉動……我們都應十分堅決地加以拒絕。」

這真是張大其詞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顯然是不正確的。「回頭再去採用」國會主義！也許在德國已存在着魏瑪共和國吧？似乎沒有的吧！那末，怎麼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一句空話嗎？

國會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在宣傳的意義上講起來，這是對的。但是誰都曉得，從這一點到實際的克服，還相隔很遠。資本主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而且有充分的權利宣佈是「在歷史上已經過時的了」，可是這絲毫沒有排斥有在資本主義底基礎上作很長期和很持久的鬥爭之必要。就全世界歷史的意義講來，國會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即是說，資產階級國會主義底時代已告終結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已經開始了。這是不可爭辯的。但是全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計算的。早或遲十年——二十年，這從全世界歷史的尺度看起來，是無足輕重的，這從全世界歷史的觀點看起來，不過是一件甚

至不能大概計算的小事。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實際政策問題上，援引全世界歷史的尺度，那是一個極大的理論錯誤。

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這是對的話，那末「左派」底立場是很穩固的。可是這一點應該用極嚴肅的分析去證明，但是「左派」甚至連試行這種分析的門徑都是摸不着的。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一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February〔註五二〕1920）所載關於國會主義的提綱——這篇提綱顯然表現荷蘭左派或「左的」荷蘭派底意向——內他們的分析，如在後面我們看到的，也是十分惡劣的。

第一，大家都知道，還在一九一九年一月間，德國「左派」就認為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種意見是與像盧森堡（註五三）、李卜克內西（註五四）這種卓絕的政治領導者底見解相反的。大家都知道，「左派」是錯了。只這一點，就一下子根本推翻了國會主義彷彿「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點。「左派」應該證明，為什麼他們當時所犯的毫無疑義的錯誤，現在却已經不復成為錯誤了。他們舉不出一點點兒證據來，而且也不能舉出一點點兒證據來。一個政黨對其錯誤的態度，乃是該黨之嚴肅性和在事實上執行它對於本階級和對於勞動羣衆的義務之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發錯誤底原因，澈底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細心地審議糾正錯誤。

的手段，——這才是一個嚴肅的政黨底標誌，這才是它對自己義務之履行，這才是對於階級、然後對於羣衆的教育和訓練。德國（以及荷蘭的）『左派』沒有履行自己的這種義務，沒有以極端注意、縝密和慎重的態度去研究自己的彰明較著的錯誤，這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而只是一個小組，不是羣衆底政黨，而只是一個知識分子和重複了知識分子底壞的方面的少數工人底小集團罷了。

第二，在上面我們詳細摘引了一段的那本『左派』佛蘭克府地方支部所出版的小冊子中，我們讀到：

『……還在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的『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是反革命的。鄉村無產者提供了大批反革命軍團。』（見原書第三百）

從一切方面可以看出，這幾句話顯然說得太豪放、太誇大了。但這裏所敘述的基本事實，是確鑿的，『左派』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證明了他們的錯誤。既然『數百萬』和無產者『軍隊』，還不僅贊成一般的國會主義，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怎麼還能夠說『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可見國會主義在德國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可見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客觀的現實。這是對革命家的一個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俄皇制度底加倍野蠻和殘暴的壓迫，曾經特別長久地並以特別多樣的形式產生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而且是非常忠實、熱忱、英雄主義、意

志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底這類錯誤，我們曾特別親切地觀察過，特別細心地研究過，現在特別很好地知道，因而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在德國共產黨人看來，國會主義自然是「政治上過時了」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對我們過時了的，也當作對階級過時了的，也當作對羣衆過時了的。由此我們又可以看出，「左派」不會判理推事，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羣衆底政黨自處。你們一定要不要把自己降到羣衆底水平綫上去，不要降到階級中落後階層底水平綫上去。這是不可爭辯的。你們須把逆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務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國會主義的偏見，叫做偏見。但是同時你們務須清醒地注視恰恰整個階級（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恰恰全體勞動羣衆（不僅是他們的先進分子）底覺悟和準備底現實情況。

如果不僅「數百萬」和「大批」產業工人，而且，可憐的少數產業工人，都在跟隨着基督教神父走，鄉村工人在跟隨着地主富農走，那末，從這裏就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做出結論說，國會主義在德國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參加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講台上的鬥爭，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之政黨是必須的，其目的，正在於教育本階級底落後階層，正在於喚醒和啓發不發展的、被壓抑的、愚昧的鄉村羣衆。只要你們一天沒有力量解散資產階級的國會和別一類型的其他任何反動機關，那你們便一天務須要在這些機關內部工作，正因為在那裏還有被神父及鄉村陋習所愚

弄的工人；不然，你們便有只成爲誇誇其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說了很多好話。有時禁不住要說：少恭維我們幾句，多鑽研一下布爾塞維克底策略，多認識一下這個策略！我們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一月間曾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國會——立憲會議底選舉。我們的策略是不是對的呢？如果不對，便該明白地指出來，並加以證明，這對於國際共產主義製定正確的策略是必要的。如果是對的，便應該從這裏做出一定的結論。自然，這裏是談不到把俄國底條件與西歐底條件相等起來。但是「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個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在專門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務須要確切地顧計到俄國的經驗，因爲，如果不顧計到具體的經驗，則這類的觀念就很容易變成空話。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一月間，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有沒有比西歐任何共產黨人更多的權利，認爲國會主義在俄國在政治上已經過了時呢？自然，我們是有這種權利的，因爲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存在已久或是不久，而在於廣大的勞動羣衆對於接受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或允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際上）達到什麼程度。至於在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因爲種種特殊的條件，對於接受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曾經有了歷史上罕見的準備，這是無可爭辯的和完全確定了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塞維克不是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

政權以前以及奪取政權以後，都參加了選舉。至於這次選舉曾經給了非常有價值的（對於無產階級極度有益的）政治成果，那末，我敢希望，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詳細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材料的那篇論文上，已經加以證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毫無爭辯的結論：事實證明，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之前幾星期，甚至在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的國會，不但不危害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使無產階級得以容易向落後的羣衆證明，爲什麼此種國會值得解散，使得解散國會更加容易成功，使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更容易「在政治上過時」。如果不顧到這種經驗，而同時却冀圖隸屬於那應當用國際的精神來製定自己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正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就是說，犯了極大的錯誤，正是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却違背了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荷蘭左派」不參加國會的論據。上面所說的「荷蘭派的」提綱中最重要的一條——第四條——之譯文（從英文譯出的）如下：

「當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已被破壞和社會正處在革命狀態中的時候，國會的活動，與羣衆本身的行動相較，便漸漸失去了意義。當在這種情況之下，國會日益成爲反革命的中樞和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正建立蘇維埃，作爲自己政權武器的時候，拒絕任何參加國會活動，甚至可以成爲必要。」

第一句話就顯然是錯誤的，因爲羣衆底行動——例如

大罷工——總比國會的活動更重要些，而並不只是在於革命時期或在革命的形勢之下。這個顯然沒有根據的、在歷史上和政治上統統錯誤的論據，只是特別明顯地表明，作者既絕對沒有顧到全歐洲的經驗（一八四八年，以及一八七〇年革命前的法國經驗；德國一八七八到一八九〇年間的德國經驗等等），也絕對沒有顧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文），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配合起來是如何之重要。這個問題，不論一般講來或專門講來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在一切文明的和先進的國度裏，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內戰日益增長與逼近，由於百般破壞合法權利的共和政府及一般資產階級政府（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對於共產黨人之瘋狂取締等等，這種配合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日益成必須的時期，正在迅速地逼近着。荷蘭人和一般「左派」都是絲毫不懂得這個異常重要的問題的。

第二句話，首先就歷史上說來是錯誤的。我們布爾塞維克曾參加過最反革命的國會，經驗告訴我們：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〇五年）之後，為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即俄舊曆二月），然後為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即俄舊曆十月），這一參加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之政黨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是顯著地不合邏輯的。從國會日益成為反革命底機關和「中樞」（附帶說一句，事實上，它從沒有而且也不能成為反革命底「中樞」），而工人正

在建立蘇維埃作為自己政權底工具——這兩句話，便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工人必須準備——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準備——蘇維埃反對國會的鬥爭，用蘇維埃來解散國會。但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解散，因反革命的國會內部有反對政府的蘇維埃派出席，而感到困難或者不容易做到。我們在同鄧尼金和高爾察克進行勝利的鬥爭的時候，從未說過，在他們裏面有反對他們的、蘇維埃的、無產階級派別之存在，對於我們的勝利是沒有關係的。我們深深知道，我們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俄舊曆十五日）解散立憲會議，並沒有因被解散的反革命的立憲會議內部既有徹底的布爾塞維克的反對派，又有不徹底的、社會革命黨左派的蘇維埃反對派，而感到困難，反而容易進行。這個提綱底作者，完全鬧糊塗了，他們忘記了許多革命底經驗，即使他們沒有忘記一切革命底經驗；這種經驗證明：在革命時期把反動的國會以外的羣衆行動跟這個國會內部同情革命的（直接贊助革命的更好）反政府派配合起來，是怎樣特別有益的。荷蘭人與一般『左派』在這裏都是革命底教條主義者，亂發議論，他們都從未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都從未思索過革命底歷史，或者都是天真地把對某一反動機關之主觀上的『否認』，當作用許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對它的現實的破壞。

糟蹋和危害一種新的政治（不僅是政治的）思想之最可靠的手段，就是在擁護這種思想底名義之下把它弄成荒謬絕倫。因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作的『過度』（如老款

茨根（註五五）所說的一樣）的話，如果把它誇大的話，如果使它超出於它實際應用底限度以外的話，那就可以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而且在上述情形之下，它甚至不可避免地要變為荒謬絕倫。荷蘭的及德國的「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國會的這個新的真理，正是作了這種蠢笨的服務。自然，誰要是照舊地並且一般地說，拒絕參加資產階級國會，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是不可允許的，那就錯了。在什麼條件下抵制國會是有益的，在這裏我不試圖提出一個公式，因為本底任務是比較簡單得多：就是與國際共產主義策略底若何迫切問題相聯系，考慮俄國的經驗。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布爾塞維克應用抵制國會的策略，一次是成功的，正確的（一九〇五年），一次是錯的（一九〇六年）。在分析第一次情形時，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曾經做到了沒有允許反動的政權，在國會以外的羣衆革命行動（尤其是罷工運動）以特殊的速度日益增長的環境下，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中任何一個層級都不能對反動的政權予以任何支持的環境下，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以罷工鬥爭與土地革命運動保證自己對廣大的落後羣衆的影響的環境下，召集反動的國會。十分明顯的，這個經驗不適用於目下歐洲的條件。同樣十分明顯的——根據上述的理由——，荷蘭人及「左派」擁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雖說這種擁護是有條件的），是根本不正確的，是對革命無產階級的事業有害的。

在西歐與美國，國會已成了工人階級中先進的革命家

所特別厭惡的東西，這是不可爭辯的。這是完全明白的，因為很難想像出比在大戰期間和戰後絕大多數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在國會裏的行為更卑污、更下流、更變節的事情了。但是，在解決應怎樣與公認的弊害作鬥爭的問題時，屈服於這種情緒，那不僅是不智，而且簡直是罪過。在西歐許多國度裏，革命的情緒，現時可說是一種『新奇的東西』或者『珍奇的東西』，我們白費心機地、不可耐煩地把這種情緒期待得太長久了，或許因此而如此容易為情緒所屈。自然，沒有羣衆中的革命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增長的條件，革命的策略就不能轉化爲行動，但我們在俄國受了太長期的、艱苦的、流血的經驗，確信一個真理，就是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僅僅建築在革命的情緒之上的。策略須根據於對本國（以及鄰近各國和世界上一切國家）一切階級力量底清醒的、嚴格客觀的計算，並須根據於對革命運動底經驗之計算。用僅僅咒罵國會機會主義的辦法，用僅僅否認參加國會的辦法，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這是很容易的，但是，正因為這太容易了，所以，這是不能解決困難的和最困難的任務的。在歐洲各國國會裏，建立真正革命的國會黨團，比在俄國要困難得多。這是當然的。但是這只是下面這個一般真理底局部表現，即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具體的、歷史上非常特異的形勢下曾經很容易地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然而俄國要把這種革命繼續下去，進行到底，則較歐洲各國要困難些。我在一九一八年初就不得不指出這種情形^{*}，此後兩年來的

經驗已經完全證實了這種意見之正確性。這樣的一些特殊條件，比如：（一）可以把蘇維埃革命與因此來結束那使工農受盡痛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情，兩相配合起來之可能；（二）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全世界上強大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底拚命鬥爭，兩大集團都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之可能；（三）部分地由於地域遼闊和交通不便，可以支持比較持久的內戰之可能；（四）農民中有如此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之存在，竟使無產階級底政黨採用了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即其大多數激烈仇視布爾塞維主義的黨）底革命要求，並因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而一下子實現了這些要求；——有些特殊的條件，現在在西歐都是沒有的，這些條件或類似條件之重演，是很不容易的。這就是爲什麼（除開許多其他的原因以外）西歐開始社會主義革命要比我們俄國更困難的原因。企圖「迴避」這種困難，「跳過」爲革命目的而利用反動的國會之困難事情，那真是十足的幼稚行爲。你們想建設新社會嗎？但是你們却害怕由有信心、忠實、英勇的共產黨人在反動國會內建立一個好的國會黨團的困難！難道這不是幼稚行爲嗎？如果德國的李卜克內西和瑞典的赫龍德，甚至沒有下層羣衆的贊助，尙能造成真正革命的利用反動國會之榜樣，那末一個迅速增長的羣衆的革命的

政黨，在戰後羣衆失望和怨恨的環境之下，怎麼不能在最惡劣的國會裏面給自己鍛鍊出一個共產主義的黨團呢！正因為西歐工人底落後羣衆，尤其是小農底落後羣衆，浸染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國會主義的偏見，比在俄國更其厲害，所以共產黨人只有從資產階級國會這種機關的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頑強的、不顧一切困難的鬥爭，去揭發、打消和克服這些偏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底壞「領袖」，而陷於失望，以至於說出了「否認」「領袖」的可笑的話。但是在「領袖」們常常不得不隱蔽在地下的條件下，要造就優秀的、可靠的、經過考驗的和有聲望的「領袖」，乃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如果不把合法工作與非法工作配合起來，如果不在國會講台上考驗「領袖」，那是不能順利地克服這些困難的。批評——而且是最嚴厲的、最無情的、最不可調和的批評——不應該用來反對國會主義或國會的活動，而應該用來反對那些不善於——尤其那些不願以革命的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利用國會選舉和利用國會講台的領袖們。只有這樣的批評——同時當然要驅逐不適當的領袖，而代以適當的領袖——，才是有益的和有成果的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不愧成爲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的領袖，同時訓練羣衆，使他們學會正確地識別政治形勢，並學會了解從這種形勢中產生出來的往往非常複雜的和錯綜的任務。■

* 我很少有機會去認識「意大利極左」的共產主義。不庸置疑的，波爾蒂加及其「共產黨人抵制派」的小組織，擁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那是不對的。可是根據他的兩期蘇維埃報（註五八）（第三期和第四期，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和二月一日出版），根據塞拉底（註五九）底四期很好的「共產主義雜誌」（註六〇）（第一期至第四期，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出版），以及根據我能夠看到的零散的幾期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報紙來判斷，我以為波爾蒂加在一點上是對的，即：波爾蒂加同志及其小組對於杜拉第及其同道者的攻擊是對的，因為杜拉第等仍留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裏，却依然做着國會議員，繼續進行他們的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老政策。塞拉第及其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坐視容忍這一點，這自然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有發生像在匈牙利所發生的這種深刻的禍害和危險之虞，匈牙利的杜拉第一流的老爺們，會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怠工。對機會主義的議員們所採取的這種籠統的、不澈底的或毫無氣節的態度，一方面產生了「左的」共產主義，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祖護了「左」的共產主義之存在。塞拉第同志指斥議員杜拉第「不澈底」（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顯然是不對的，但真正「不澈底」的，正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它容忍了保杜拉第這類機會主義的議員。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從佛蘭克府那本小冊子的引證中，我們看到，【左派】是何等堅決地提出這個口號。可憐，無疑義地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願意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却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乃是罕有的而且極罕有的著作家，這些著作家們底每部大著底每句話，都有極深遠的內容，恩格斯於一八七四年在反對三十三個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宣言時寫道：

「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因爲我們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不停頓於中間階段，不作妥協，因爲，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時日，延長奴隸制度之期間……。」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成爲共產黨人，是因爲他們經過一切爲歷史發展進程所造成而不是由他們所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清楚看到並且經常追求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各階級，建立再不會有土地和一切生產手段私有制的這種社會制度。三十三個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成爲共產主義者，是因爲他們幻想：他們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那末，這件事情便算辦妥了，如果（這是他們確信的）這幾日『動手』，政權落在他們的手中，那末，後天，【共產主義就會實現了】。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辦到

的話，那末，他們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

『把自己的急燥，當作理論的根據，這是幼稚的天真。』〔見恩格斯著：勃朗基派社員底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人民國家報第七十三期（註六一），一八七四年出版，引自俄文版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論文集一二——五三頁，一九一九年彼得格勒出版）

恩格斯在本文中對瓦揚（註六二）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並提到瓦揚底『不可爭辯的功績』（瓦揚，和黑德（註六三）一樣，以前曾是國際社會主義底大領袖，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後才叛變了社會主義）。但是恩格斯對明顯的錯誤，不能不予以詳盡的分析。自然，在很年幼而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同樣，甚至在很有歲數很有經驗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來看，『容許妥協』，好像是異常『危險的』，不可了解的，錯誤似的。許多詭辯家（他們是太『有經驗』的政客）正像蘭斯伯雷所講的英國機會主義底領袖這樣推論的：『既允許布爾塞維克可以同人家進行某種妥協，那末爲什麼不許我們同人家進行任何妥協呢？』但是凡經過多次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這一種表現來說）訓練的無產者，通常都能深深地領會恩格斯所述的深遠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經歷過罷工，在其要求全未達到，或同意局部的滿足而不得不上工時，都經歷過同他深入骨髓的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妥協』。每個無產者，由於他底生活的羣衆鬥爭和階級對立劇烈尖

銳化底環境，都會看出下列兩種妥協之差別：一種妥協是為客觀的條件所迫（罷工者備金窮盡，沒有外力援助，他們飢寒交迫，困苦不堪了），這種妥協，絲毫沒有減少成立這種妥協的工人們之革命忠心及準備進一步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底妥協，他們把自己的利己主義（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自己的怯懦，自己甘為資本家効勞的願望，自己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嚇，有時屈服於勸說，有時屈服於小小賄物，有時屈服於利誘的精神，都委之於客觀原因（叛賊底這種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中，工聯會領袖進行得特別的多，然而差不多各國的工人，都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上看見過類似的現象）。

自然，也有異常困難和複雜的個別情形，其時只有用極大的力量才能做到正確地規定某個『妥協』底真實性質——例如有時有殺人案件，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為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為（如必要的防衛），抑或是不可饒恕的怠慢或者甚至是精密陰險的奸計。當然，在政治上，有時是對於各階級與各政黨間的極複雜的——國內的、國際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這裏有許多問題，要比關於罷工時合法的『妥協』的問題或關於工賊、出賣階級的領袖所進行的背叛階級的『妥協』的問題等等，更困難得多。要製造出一種適用於一切情形的藥方或通例（不【作任何妥協！】），那是荒謬的專橫。我們必須用自己的頭腦，善於分別每一個別の場合。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的領袖之意義，除其他不計外，就在於用本階級底一

一切能夠運用思想的代表之長期的、頑強的、多樣的、全面的工作，來造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及經驗之外——政治敏感性，以便迅速而正確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

天真的和毫無經驗的人們想像，以為，只要承認一般妥協是可以允許的，就足以塗掉機會主義（對於機會主義，我們正在進行並且應該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的任何界限。但是如果這些人們，他們還不曉得，自然界及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可動的，而且在一定程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末，除了長期的教育、訓練、啓發以及政治的和生活的經驗外，再不能有任何別的幫助了。在每一個個別的或特殊的歷史關頭在實際的政治問題上，重要的是善於分別出這種問題，即：表現不可容許的、發責的、體現對革命階級致命的機會主義的各種妥協之最主要的類型，並集中全力去說明它們，

在每個階級中，甚至在最開明的國民之條件下，甚至在最先進的和因目前形勢而能把一切精神力量發揚到極高度的階級中，總是有——而且只要階級存在一天，只要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完全強大起來，沒有完全鞏固起來，沒有在本身基礎上發展起來一天，這將是不可避免的——階級底不運用思想和不能思想的代表。假如不是這樣的話，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

與它們作鬥爭。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夥同是掠奪和同是強盜的國度中間所進行的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機會主義底這種最主要的、最基本的類型，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對『保護祖國』之支持，這種『保護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事實上等於保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底掠奪的利益。在大戰以後，擁護那強盜式的『國際聯盟』；擁護與本國資產階級底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盟，以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反對『蘇維埃』運動；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以反對『蘇維埃政權』——凡此種種都是那些不可容許的和叛節的妥協底最主要的表現，這些妥協，綜合起來，就成為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事業致命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佛朗克福小冊子中寫道：

「……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與其他政黨作任何妥協……應當拒絕迂迴和協調的任何政策。」

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這種見解，却沒有對布爾塞維主義予以堅決的責斥！德國『左派』不會不曉得，布爾塞維主義底全部歷史，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十月革命以後，都充滿着對其他政黨（這對資產階級政黨在內）迂迴、遷融和妥協的事實！

進行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的戰爭，較之通常國與國間的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更要困難百倍，持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種戰爭，而却事先拒絕迂迴，拒絕利用敵人中間的利害之矛盾（即令是暫時的），拒絕與可能的（即

令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難道這不是大笑話嗎？難道這不像假定我們在艱苦的攀登迄今人跡未至和不可達到的高山時，事先就拒絕有時要走彎路，有時要後退，有時要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方向嗎？荷蘭共產黨的一些黨員竟然能支持——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如此缺乏覺悟和沒有經驗的人（如果真是因為他們年青，那還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這一類蠢話的）！！

在無產階級底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將長久地依然弱於資產階級，這很簡單地是由於資產階級有很廣大的國際聯系，其次是由於這個已經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底小商品生產者之自發的和不斷的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最大的努力和務須最精細、最關心、最謹慎、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空隙（即令是最小的空隙也要利用），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個別國度內部各類或各種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他方面利用給自己取得聯繫性的同盟者之一切可能（即令是極小的可能也好），即便這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同盟者也好。誰不懂得這一層，那誰就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現代的一般社會主義。誰要是在相當長久的時期和在相當多樣的政治形勢中，不在實踐上證明自己的真正應用

這個真理的才能，那末，他就還沒有學會在革命階級爲把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中去幫助這個革命階級。以上所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的時期，都同樣適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註六四），考茨基、奧託·鮑威爾等等這些「專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在於他們不悟這一點，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底最重要的關頭應用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前一時期的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車爾內舍夫斯基（註六五）就已經說過，「政治的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的康莊大道」（這是彼得堡一條清潔寬廣、平坦、筆直的大街）（註六六）。自車爾內舍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而付出了無數的犧牲。無論如何要辦到：使西歐和美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及忠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要像落後的俄國人一樣，爲領會這個真理而付出這麼高的代價。

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俄皇制度倒台以前，曾經屢次利用資產階級自由派底効勞，就是說，同他們締結過大批的有礙的妥協。還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的時候，還在布爾塞維主義發生之前，火星報底老編輯部（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哈諾夫、阿魯洛德（註六七）、查蘇里奇（註六八）、馬爾托夫（註六九）、波特列索夫（註七〇）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底政治領袖司徒魯威（註七一）訂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不錯，爲時並不

長) (註七二)；同時不是停止，而是善於進行最無情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以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防止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影響在工人運動內部之極小表現。布爾塞維克總是繼續這種政策的。自一九〇五年起，他們有系統地堅持工人階級與農民之聯盟，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與沙皇制度，同時從未拒絕贊助資產階級，以反對沙皇主義（例如在複選時），也沒有停止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人」的最不可調和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揭破「社會革命黨人」乃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九〇七年，布爾塞維克在國會的選舉中，在一個短時期內曾與「社會革命黨人」訂立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在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二年，我們常有好幾年在形式上與孟塞維克處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裏，但從沒有停止與他們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把他們當作向無產階級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來鬥爭的。在大戰時期，我們會同「考茨基派」、左的孟塞維克（馬爾托夫）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如車爾洛夫（註七三）、那唐松（註七四））締結過某些妥協，我們同他們在齊米爾瓦德和金泰爾坐在一起開會，發表共同的宣言，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停止也沒有減弱與「考茨基派」、馬爾托夫們及車爾洛夫們作思想政治上的鬥爭（那唐松死於一九一九年，他那時是一個完全接近我們，幾乎與我們意見一致的「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民粹派（註七五））。正在十月革命的當兒，我們會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締結了

雖不是正式的、但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極順利的）政治同盟，那時我們會整個兒地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政綱，未加絲毫改變，這就是說，成立了毫不懷疑的妥協，以便給農民證明，我們所願的不是以武力壓服他們，而是想同他們和解。同時，我們會向「社會革命黨左派」提議，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以後便實現了這種同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到締結布列斯特條約後，他們却撕破了這個同盟，以後到一九一八年七月，達到武裝暴動，以反對我們，後來更進行武裝鬥爭，以反對我們*。

因此，很明顯的，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和「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的念頭，便攻擊該中央委員會，在我們看來，是「左派」底輕舉妄動，是「左派」錯誤的明證。在我們俄國，也同樣有過孟塞維克右派（曾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他們是相當於德國謝德曼們的；也有過孟塞維克左派（馬爾托夫），他們是反對孟塞維克右派，他們是相當於德國考茨基派的。工人羣衆之逐漸離開孟塞維克而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可以顯然地看出來：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共只佔百分之十三。多數是在社會革命黨

* 詳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聯盟之命運一文，見本選集第十四卷。

人與孟達維克方面。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即俄舊曆十月二十五日），我們已佔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了。爲什麼在德國這樣一種與俄國完全相同的、工人由右而左的傾向，不是引導到立刻增強共產黨人底勞力，而是引導到先增強中間黨的「獨立」派，雖然這個「獨立」黨從沒有過任何獨立的政治思想，從沒有過任何獨立的政策，而只搖擺於謝德曼們和共產黨人之間罷了。

很明顯的，其中原因之一，乃是德國共產黨人底錯誤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泰然而誠實地承認這個錯誤，並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在於拒絕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和反動的職工會，錯誤就在於「左派」幼稚病底大量的表現，這種幼稚病現在已經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因此可以更好、更快、對於機體更有利益地加以治療。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在該黨內，除却那些已經證明了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意義，不能了解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老機會主義領袖（如考茨基、希法亭，其他如克里斯賓、列迭市雷之流，在可觀的程度內，似乎也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左的、無產階級的一翼，而且這一翼正在很迅速地增長着。該黨數十萬黨員（似乎有七十五萬黨員）都是離棄謝德曼而迅速走向共產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翼在獨立黨人底萊比錫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已經建議立刻和無條件地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該黨底這個左翼

【妥協】，那簡直是可笑的事情。相反的，對於共產黨人，務須尋求而且找得適當的與他們妥協的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促進並加速與該黨底必要的完全的合併，而他方面，絲毫不阻礙共產黨人在其中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以反對【獨立黨人】底機會主義的右翼。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可能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騙子，才能給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允許以【容易的】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潔的】無產階級，不為大量的極端龐雜的從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即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而謀取生活資料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小手工業者、小家庭工業者、一般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的過渡類型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內部，沒有比較發展的和不發達之分別，沒有階級、職業、有時宗教等等的分別，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由此絕對必然地可以得出結論說，對無產者其他各集團、對工人及小業主的各政黨採用迂迴、通融和妥協辦法，對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對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對共產黨，是必要的，而且有無條件的必要。全部事情就在於善於應用這個策略，以提高無產階級覺悟性、革命性、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底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應當順便指出：布爾塞維克對孟塞維克之勝利，不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即在十月革命以後，都要求要應用迂迴、通融、妥協底策略，自然，是要應用這樣的迂迴、和這種的通融及妥協，即可

以促進、加速、鞏固、增強布爾塞維克而削弱孟塞維克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塞維克派也在內）不可避免地要動搖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動搖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之間，動搖於改良主義與革命性之間，動搖於愛惜工人與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等等。共產黨人底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些動搖，而決不是輕視這些動搖；要利用，便應當對於那些傾向於無產階級的分分子讓步，視他們傾向於無產階級的時間和程度，來決定我們對他們讓步的時間和程度，——同時，要進行鬥爭，以反對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的分分子。在應用正確策略底結果，遂使孟塞維主義在我們俄國日漸瓦解，而且還在瓦解着，使頑強地機會主義的領袖孤立起來，把最好的工人，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好的分子都轉入到我們的營壘裏來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那十萬火急的「決定」，例如「不作任何妥協、不作任何迂迴！」這只能危害增強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影響與擴大其力量的事業。

末了，德國「左派」直綫地固執已見，不承認凡爾賽條約，這也是他們的毫無疑義的錯誤之一。例如霍爾斯爾把這種見解撮述得愈「堅固」和愈「重要」，愈「堅決」和愈武斷，則這種說法就愈少聰明。僅僅放棄荒謬絕倫的「民族布爾塞維主義」（勞芬別爾格等）——這個「民族布爾塞維主義」甚至主張在目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清况下，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以便和協約國作戰——，是不夠的。要明白，不許蘇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蘇維

埃共和國不久可以產生的話）有在一定時間內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的義務。這個策略是根本錯誤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說，在謝德曼們高踞政府的時候，在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倒的時候，在維也納蘇維埃革命還不是沒有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可能的時候，在當時的條件之下，『獨立黨人』提出簽訂凡爾賽和約的要求，是正確的。那時獨立黨人把迂迴和機動都做得很不好，因為他們多少替叛徒謝德曼們負擔了責任，他們多少離開了與謝德曼們作無情的（而且是冷靜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滾到『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上去了。

然而現在的形勢顯然是這樣的，就是德國共產黨人不應束縛自己的兩手，不應當允諾，在共產主義勝利時，就一定和必定要推翻凡爾賽和約。如果這樣幹，那就是愚蠢。應該說，謝德曼們和考茨基們曾作了一連串的叛賣行爲，他們這種叛賣行爲，障礙了使與蘇維埃俄羅斯之聯合與蘇維埃匈牙利之聯合困難起來（部分地是直接斷送了這種事情）。我們共產黨人，將用一切手段來促進和準備這種聯合，並且我們並不須一定要而且並不必立刻就否認凡爾賽條約。順利地推翻凡爾賽條約的可能，不僅有賴於德國蘇維埃運動之勝利，而且有賴於國際蘇維埃運動之勝利。謝德曼們和考茨基們是阻礙這種運動的，而我們却正在幫助着這種運動。問題的本質在此，根本的差別也在此。如果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走狗、謝德曼們和考茨基們，空空放過了許許多多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運

動、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革命的機曾，那末，罪過就落在他們身上。德國蘇維埃革命將加強國際蘇維埃運動，而國際蘇維埃運動乃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個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一個堅固的、不可戰勝的、全世界有威力的堡壘）。池解脫凡爾賽和約的問題，一定要而且確實和立刻要放在第一位，放在把其他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各國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問題之前，乃是市儈的民族主義（只配考茨基們、希法亭們、奧托·鮑威爾們信奉），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歐洲無論那一個大國裏，連德國在內，推翻資產階級，乃是國際革命底一個大贏利，爲了這一贏利，如果有必要的話，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如果俄羅斯一國能夠忍受布列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而對於革命有益，那末，蘇維埃德意志與蘇維埃俄羅斯聯合起來，亦何嘗不可以忍受凡爾賽和約底比較長期的存在而對於革命有益呢！

法英等國帝國主義者，向德國共產黨人挑釁，給他們安下圈套：『說吧，你們不要簽訂凡爾賽和約！』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像小孩子一樣，果然陷入他們所設置的圈套，而不去巧妙地運用機動的辦法，以反對狡猾的、而且此刻是比較強大的敵人；不去向敵人說：『現在我們要簽訂凡爾賽和約了。』事先束縛自己的兩手，公開地告訴目前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將同他作戰，何時將同他作戰，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在戰鬥顯然

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自己時，而前去應戰，這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的政治家，不善於進行「迂迴、通融、妥協」，以避免分明不利於己的戰役，那末，這種政治家是毫無用處的。

九 英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註七六)

在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已有了新起的、廣泛的、強大的、迅速增長的、前途有極大希望的共產主義運動；已有了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如「不列顛社會黨」、「社會主義工黨」、「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它們都願成立共產黨，而且它們之間為起見在進行談判。「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週刊工人無畏（第六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註七七）——由S.潘克斯特（註七八）同志主編——載有他的走向共產黨一文，係敘述上述四個組織之間關於根據加入第三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代替國會制度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來建立新的共產黨之談判經過。似乎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底主要障礙之一，乃是關於參加國會問題及關於新成立的共產黨加入老的、職業主義的、主要由工聯會構成的、機會主義的及社會沙文主義的工黨的問題之爭執。「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社會主義工黨」也是一樣——反對參加國會選舉，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加入「工黨」，在這一關係上它是和「不列

類社會黨」全體或者多數黨員意見分歧的，而「不列顛社會黨」在他們的眼中，乃是英國「各種共產主義政黨底右翼」（第五頁，潘克斯特底論文）。

由此可見，根本的區別，竟和德國如出一轍——雖然在爭論表現之形式（德國的這種形式，比英國的形式，更接近於「俄國」的形式）以及在其他一整列的情況上，都很大的差別。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左派」底證據。

關於參加國會問題，潘克斯特引證登載於該期的加拉契（註七九）同志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契以格拉茲奇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底名義寫的（註八〇）。他寫道：

「這個委員會是確定地反對國會主義的，它以各種政治組織底左翼為後盾。我們代表蘇格蘭的革命運動，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中）建立革命的組織，並在全國各處建立以社會委員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正式的國會議員們爭吵好久了。向他們宣佈公開的戰爭，我們以為大可不必，而他們也害怕揭開對我們的攻擊。

然而這種情勢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我們正在全綫上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底大批黨員，一想起國會，一天

● 似乎「社會主義工黨」是反對加入「工黨」的，但不是全體都反對參加國會。

比一天更嫌惡起來；差不多一切地方團體，都是贊成「蘇維埃」（俄文蘇維埃一詞的英譯）「或工人蘇維埃的」。當然，這對於那些以政治為謀生手段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老爺們，有着重大的意義，因此他們用盡一切手段，說服自己的黨員回到國會主義胸懷裏去。革命的同志們不應當（所有着重點都是作者加上的）支持這夥匪徒。在這裏，我們的鬥爭將是很艱苦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特點之一，將是那些只顧私人利益不顧革命利益的人們之叛賣行為。對於國會主義之任何支持，都只是幫助把政權落在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們和諾斯克們的手裏罷了。漢得遜、克路英斯之徒，都是不可救藥地反動的了。官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資產階級自由派及勢力所支配了，這些自由派……在麥克唐納（註八二）、斯諾登（註八三）這一夥人的營壘中給自己找到了精神避難所。官式的獨立工黨是極端仇視第三國際的，而羣衆則是贊成第三國際的。無論用什麼方法去支持機會主義者及議員們，那是說簡單地只是對上述那班老爺們有利罷了。不列顛社會黨，在這裏毫無作用……在這裏是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工業組織和依照明白的、確切規定的科學的原則而行動的共產黨。如果我們的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去建立這兩個組織，那我們甘願接受他們的幫助；如果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支持反動分子以叛賣革命，那末，就請千萬不要過問吧，那些

反動分子都是熱中地力謀攫取國會的「榮譽」（——問號是作者加上的）稱銜，並且他們非常熱心地願意證明，他們能夠像「主人」自己一樣，像階級政治家這樣順利地統治國家。」

這一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青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開始走向共產主義的、羣衆出身的工人底情緒和觀點，表現得非常之好。這種情緒是最令人愉快和最有價值的；應善於器重和支持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在任何別的国家裏亦然——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沒有希望的。那些善於表現羣衆底這種情緒的人，善於喚起羣衆底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尙未覺醒的）情緒的人，應該愛護和關心地對他們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地和公開地告訴他們：在大革命的鬥爭中，單是情緒一項，對領導羣衆是不夠的，忠實於革命的人們甘願犯的或正在犯的某些錯誤，乃是可以對革命事業予以危害的錯誤。加拉契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表明了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正在犯的和俄國「左派」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八年所犯過的那一切錯誤底萌芽。

這封信的作者，充滿了最高貴的無產階級的（還不僅對於無產者，而且對於一切勞動者，如用德國名詞說來，對一切「小人物」，都是可以了解和親切的）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之仇恨。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代表者之這種仇恨真正才是「一切智慧之母」，真正才是各種社會主

護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之基礎。但是這封信的作者，顯然沒有計算到，政治是一種科學和藝術，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白白來的，無產階級如果想要戰勝資產階級的話，那就須要給自己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種政治家不劣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這封信的作者非常懂得，並不是國會，而只有工人蘇維埃才能夠成爲達到無產階級底目的之工具，自然，那些直到現在還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個最有學問的人，是個最有經驗的政治家，是個最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是個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個最篤實的公民，是個最篤實的家長，他總是個最兇惡的反動者。然而，這封信的作者，却甚至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沒有想到有提出這個問題之必要，即：不使「蘇維埃」政治家加入到國會內部去，不從國會內部來瓦解國會制度，不從國會內部去準備蘇維埃在其行將到來的解散國會這一個任務上的勝利，那能否使蘇維埃戰勝國會呢？但這封信的作者，却說出了完全正確的意見，謂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第一，科學要求要顧計到其他各國之經驗，尤其是在其他同樣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經歷着或在不久以前曾經歷過十分類似的經驗的時候；第二，科學要求要顧計到在該國內部行動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羣衆，而絕不要僅僅根只是一個集團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覺悟程度與據鬥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至於說漢得遜們，克略英斯們，麥克唐納們，斯諾登

們，都是反動已極的，那是對的。同樣，說他們願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附帶說一句，他們同時寧願同資產階級聯合），說他們願依照資產階級的老方案來「統治」，說他們一旦當政，一定要像謝德曼們和諾斯克們一樣來辦事，這也是對的。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說，支持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了革命底利益，應該給這些老爺們以一定的國會方面的支持。爲了說明這個思想起見，我可舉兩個現代的英國的政治文件：（一）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內閣總理魯易·喬治（註八四）的演說（根據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曼徹斯特導報（註八五）上面的記載）及（二）「左派」共產主義者潘克斯特同志在其上述論文中的結論。

魯易·喬治在他的演講中，曾與愛斯葵遜（註八六）（當時他曾特被邀到會，但他拒絕到會）及其他不願與保守黨聯合而願與工黨接近的自由黨人論戰（從加拉契致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同樣看到，他曾指出了自由黨人轉到獨立工黨方面去的事實）。魯易·喬治證明，自由黨與保守黨有聯合之必要，而且要密切的聯合，因爲不然的話，那魯易·喬治「寧願叫做」社會主義的及力謀實行生產工具「公有」的工黨，就能夠得到勝利的。英國資產階級底這位領袖通俗地向其聽衆，向自由黨底國會議員（這些人以前大概還不知道這一點）解釋道：「在法國，這叫做共產主義；在德國，這叫做社會主義；在俄國，這叫做布爾塞維主義。」魯易·喬治說，這對於自由黨人，在原則

上是不能接受的，因為自由黨人在原則是贊成私有財產的。他說，「文明正處於危險之中」，因此，自由黨與保守黨應該聯合起來……

「如果你們到國甚區域去旅行一趟——魯易·喬治說——，那末，我很同意，你們在那裏會看到舊時的黨派還依舊保存着。在那裏危險還是很遠的。在那裏危險還是沒有的。但是你到鄉村區域去看一下，那就可以看見，危險是很大的，正如它現在在若干工業區一樣的大。我國人口五分之四，是從專工商業；而不到五分之一才是從事農業的。這是我在想到將來的危險時經常所提到的情況之一。在法國，人口還是務農的，你們在那裏可以看到某一見解底鞏固基礎，這種基礎變動得並不很快，也不容易受革命運動所刺激。在我國，情形就不同了，我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容易顛覆，如果它一旦動搖起來，那末，因為上面所講過的原因，它將比其他國家崩壞得更厲害些。」

讀者由這裏可以看出，魯易·喬治不僅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是一個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會了不少東西的人，我們也不妨向魯易·喬治學習一下。

更有趣的是在魯易·喬治演講以後進行討論時下面的一段插話：

「華來斯(Wallace)(註八七)先生：我要問，現時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黨員，我們從他們那裏得到這麼多的幫助，首相怎樣看他們在工業區域

裏對於產業工人政策之結果呢？將來會不會發生這樣一種可能的結果，即：目下都誠懇幫助我們的工人，會使工黨底勢力大大加強？

首相：我抱着完全不同的見解。自由黨人互相鬥爭的事實，無疑義地，將推動數目可觀的自由黨人，因失望而轉投工黨，你們看到工黨內已有數目可觀的自由黨人了，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人，現在，他們都以破壞政府威信為能事。結果，無疑義地，將是有利於工黨的社會情緒，大大鞏固起來。社會輿論，不是轉向於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是轉向於工黨，個別地區的改革選，就證明了這一點。」

附帶說一句，這一段話特別證明，資產階級底最聰明的人物，是怎樣糾纏不清，而不能不幹不可救藥的蠢事。資產階級正要滅亡在這一點上的。我們的人，可能甚至也做蠢事（雖然，是在這種條件之下，卻這種蠢事不會太大，而會及時改正的），但歸根結底，仍要成為勝利者的。

另一個政治文件，就是「左派」共產主義者潘克斯特底下面的議論：

「……應克平（註八）同志（不列顛社會黨書記）把工黨叫做「工人階級運動底主要組織」。不列顛社會黨底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觀點表現得更加凸出。他說：「我們把工黨看做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一種對工黨的見解。工黨在數量上

是很巨大的，雖然其很大的一部分黨員是不活動的和對政治冷淡的。他們都是加入了工聯的男女工人，因為他們在工廠中的同伴都是工聯會員，因為他們都想領取津貼。

但是，我們承認，工黨之所以有這樣多的黨員，也是由於這種事實，即：它是一個思想派別之產物，英國工人階級之大多數，還沒有越出這個思想派別底範圍，雖然在人民底腦子裏正在準備着極大的變化，人民快要改變這種形勢的……

不列顛工黨，像其他各國社會愛國主義者的組織一樣，在社會底自然發展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上台的。共產黨人底任務，就在於建設推翻社會愛國派的力量，我們在我國既不應當拖延這種活動，更不應當動搖。

我們不應當增加工黨底力量，分散我們的精力；工黨的上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集中自己的力量於建立共產主義運動，以便戰勝工黨。工黨快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政府派，應時時準備，以便進攻工黨政府……」

由此可見，自由資產階級將要放棄歷史上為數百年經驗所視為神聖的——而且對於剝削者非常有利的——【兩黨】（剝削者的兩個政黨）制，認為必須將兩黨的力量聯合起來，以便與工黨作鬥爭。一部分自由主義者，像行將沉沒的大船上的老鼠一樣，紛紛跑到工黨方面來了。左派

共產主義者認為政權之轉到工黨是不可避免的，並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都是贊成工黨的。他們從此作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潘克斯特把這個結論撮述如下：

【共產黨不應當締結妥協……它應當保持自己主義底純潔，保持自己的獨立，使它不沾染改良主義；它底使命是勇往前進，不停頓，不轉彎，沿着筆直的道路一直走向共產主義革命。】

恰恰相反，從英國多數工人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們或謝德曼們走，從他們還沒有對付由這班人組成的政府之經驗，如俄國和德國為使工人大批的轉向共產主義所必要的那種經驗一樣，從這一切就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參加國會制度，應當從國會內部幫助工人羣衆在事實上去認清漢得遜和新諾登政府之結果，應當幫助漢得遜們和新諾登們戰勝聯合起來的魯易·喬治與邱吉爾（註八九）。如果不這樣幹，那就使革命事業困難起來，因為如果沒有工人階級中多數人底見解之轉變，那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從不能僅僅由宣傳造成的。現在分明無力的少數工人知道（或者無論如何應當知道），多數工人經過一個短促的時期，在漢得遜和新諾登戰勝魯易·喬治和邱吉爾的條件下，將要對自己的領袖失望，而轉來支持共產主義（或者無論如何，對共產黨人保持中立態度，而且多半是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果這種少數人說：『不妥協，不轉彎，勇往前進』，那末，這種口號，分明是錯誤的。這正如

有一萬兵士投入戰鬥，與五萬敵人作戰一樣，他們本應當「停止」、「轉變」、甚至於締結「妥協」，以等待不能即刻到達的十萬援兵之到來。然而他們不這樣幹，却前去與敵人拚命，這是知識分子的幼稚行爲，而不是革命階級底嚴肅的策略。

由一個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俄國三次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要革命，光是被剝削和被壓迫羣衆意識到了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改變，還是不夠的；要革命，還須要剝削者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在「下層」不願照舊的和「上層」不能照舊統治時，只有這個時候，革命才能勝利的。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出來，就是：沒有全國的危機（牽動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要革命，第一，要做到多數工人（至少多數覺悟的、有思想能力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底必要性，並有爲了革命而赴湯蹈火的決心；第二，要做到使統治階級遭受一種政府的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於政治之中（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乃是以以前對政治冷淡的勞動者和被壓迫羣衆中間能作政治鬥爭的代表，其數量迅速增加至十倍或甚至百倍），削弱政府底勢力，使革命者能夠很快地推翻政府。

在英國，順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兩個條件，都在很明顯地在增長着，這正可以從魯易·喬治底演說詞中看出來。「左派」共產主義者底錯誤現時之所以加倍危險，正

因為我們看到，有些革命者，對於這兩個條件的任何一個，都採取了一種未充分思索、未充分注意、未充分自覺、未充分考慮遇到的態度。如果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革命階級底政黨，如果我們要吸引羣衆跟着我們走（倘不如此，我們便有流爲誇誇其談者的危險），那末，第一，我們就應當幫助漢得遜或斯諾登去打倒魯易·喬治和邱吉爾（甚至更確切一點說：迫使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爲前者是害怕自己勝利的！）；第二，我們應當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信服我們的正當，這就是說，信服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之完全無用，信服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叛徒的天性，信服他們破產之不可避免性；第三，我們應使這樣的一種時辰逼近，那時根據多數工人對漢得遜們之失望，可以一舉而推翻漢得遜們之政府，而有嚴重的勝利之機會，因爲如果甚至那個極精明強幹的、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大資產階級的魯易·喬治，尙且表現充分的張皇失措，並且因昨天和邱吉爾鬧「磨擦」，今天和愛斯麥斯鬧「磨擦」，而日益使自己（及全體資產階級）削弱，那末，到了那個時候，漢得遜們之政府更加要風雨飄搖了。

我再具體地說一說。在我看起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把自己的四個黨派（四個都是很弱的，其中有一兩個更弱得不堪了），根據第三國底原則和務須參加國會的原則合併起來而成爲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可向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提議「妥協」，選舉上的妥協：我們一塊兒來反對魯

易·喬治和保守黨底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共產黨的票數來分割國會中的議席（不在選舉時，而是根據特別的表決），保留鼓動、宣傳、及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沒有後邊這個條件，那自然就不能和他們聯盟，因為這將是叛賣階級的行爲了。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應當堅持和實行揭發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之完全自由，正如俄國布爾塞維克（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共十五年之久）對於俄國的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即孟塞維克）所堅持和實行的一樣。

如果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贊同在這些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便贏利了，因為國會內議席的多少，對於我們並不重要，我們並不追求這個，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儘可讓步的（但漢得遜們，特別是他們的新朋友——或是他們的新主人——即轉到獨立工黨方面來的自由派，都是最愛追求議席的）。我們就贏得勝利了，因為在魯易·喬治自己「激發」羣衆的這種時機，我們便打入羣衆，進行我們自己的鼓動，我們不僅幫助工黨更快地組織其政府，而且幫助羣衆更快地了解我們的共產主義的全部宣傳，我們將毫無限制、毫不避諱地進行這種宣傳，以反對漢得遜們。

如果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同我們訂立聯盟，那我們更加贏得勝利了。因為我們可以一下子向羣衆指出（必須注意，甚至在純粹孟塞維克的、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羣衆都是贊成蘇維埃的），漢得遜們寧願接近資本案，而不願把一切工人團結起來。我們可

以一下子在羣衆面前贏得勝利，這些羣衆特別是在魯易·喬治底漂亮的和高度正確的、很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解釋之後，將同情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魯易·喬治與保守黨之聯盟。我們可以一下子贏得勝利，因為我們可以在羣衆面前宣佈，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害怕戰勝魯易·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偷偷摸摸地力謀獲得魯易·喬治底支持，而魯易·喬治則是公開地與保守黨伸出手來，反對工黨。應當指出，在我們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舊曆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以後，布爾塞維克反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即反對俄國的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的宣傳，正因為上述的情況才贏得了勝利。我們曾經告訴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拋開資產階級，取得全部政權吧，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着多數(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只佔百分之十三的票數)。但是俄國的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曾經害怕拋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當時資產階級深知，立憲會議選舉可使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這兩個政黨曾結成了親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它們都是代表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獲得多數，於是把這個選舉再三延擱下去，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却沒有力量毅然和澈底反對這種延期。

在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拒絕同共產主義者訂立同盟時，那共產主義者在爭取羣衆之同情及破壞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之信用上，便可一下子贏得勝利，即令我們因此而失

去若干國會議席，這對於我們是完全不重要的。我們只有在極少數的極端可憐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的候選人，即在我們候選人之提出不至會使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的候選人。那對我們便可以進行選舉的鼓勵了，散發有利於共產主義的傳單，並在沒有我們候選人的一切區域內，提議投票贊成工黨黨員，反對資本家。如果潘克斯特和加拉契同志，認為這是對共產主義之背叛，或是放棄與社會叛徒作鬥爭，那他們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無疑義地可以因此而贏得勝利的。

現在英國共產主義者甚至接近羣衆，甚至使羣衆聽自己的話，都時常感覺困難。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出來講演，並宣稱，請投票贊成漢得遜，反對魯易·喬治，那羣衆一定會聽我的話的了。那時我不僅可以淺顯地說明，為什麼蘇維埃優於國會，及無產階級專政優於邱吉爾專政(這種專政是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招牌來掩護的)，而且也可以說明，我願投票支持漢得遜，正如繩索支持統

* 根據包括三千六百萬選民以上的材料，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塞維克曾獲得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地主和資產階級底各黨，獲得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以及與他們有若干血緣的團體，共獲得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

犯一樣；可以說明，漢得遜們之接近於他們自己的政府，可以證明我的意見之正確，可以吸引羣衆到我這方面來，可以促進漢得遜們和斯諾登們底政治上的死亡，正像他們在俄德兩區裏的同道者所遭遇的命運一樣。

如果有人出來反對我說，這是一個太「狡猾」、太複雜的策略，羣衆是不會了解它的，它會分散割裂我們的力量，妨礙集中我們的力量於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那末，我便要對這般「左的」反對者答道：不要把自己的教條主義推諉在羣衆的身上吧！大概俄國羣衆底文化程度，不是比英國高，而是比英國低。然而羣衆却了解了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革命底前夜，在一九一七年九月，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名單，以備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立憲會議），而在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舊曆十月），他們又選舉了該立憲會議，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舊曆五日）他們又解散了該立憲會議，這種情況並沒有妨礙布爾塞維克，而是幫助了布爾塞維克。

我在這裏不能詳述英國共產主義者間的第二個爭執，即是否要加入工黨的爭執了。我手中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太少了，而這個問題又是一個特別複雜的問題，因為英國「工黨」異常特別，在本身結構上，太不像歐洲大陸上普通的政黨了。可是第一，毫無疑義的，如果羣衆從這樣的原則，如：「共產黨應保持自己主義底純潔和自己的獨立，以免沾染改良主義；它的使命是不停頓，不轉彎，沿着維

直的大道向共產主義勇往前進」，來得出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策略，那誰在這個問題上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的。因為類似的原則，只是重演法國魏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錯誤，這些公社社員在一八七四年曾宣佈「否認」任何妥協和任何中間階段。第二，毫無疑義的，這裏的任務，像任何時候一樣，就在於善於把共產主義底一般的和根本的原則，應用於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底特殊性上去，應用於向共產主義的宏觀發展中之特殊性上去，而這種特殊性是為各個國度所固有的，應該善於研究、找尋、推量這種特殊性。

然而，我們不僅要和英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聯繫起來講這一點，而且要和關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度內共產主義發展之一般結論聯繫起來講這一點。現在我們就來講這個問題。

十 若干結論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暴露了世界歷史底一個異常奇特的轉變：在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度之一中，罷工運動竟首次在世界上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廣度和力量。在一九〇五年正月一個月內，罷工人數竟比過去十年內（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四年）平均每年罷工人數，超過十倍以上，而自一九〇五年正月到十月，罷工曾經不斷地和大規模地增長。落後的俄國，在許多十分特殊的歷史條件之影響下，竟頭一個不僅向全世界指示出了被壓迫羣衆在革

命時期獨立性之飛躍式的增長（這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示出了無產階級底重要性比其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要無窮無盡地高，表示出了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之配合及政治罷工之轉變為武裝起義，表示出了資本主義所壓迫的各階級之羣衆鬥爭和羣衆組織底新形式——蘇維埃之產生。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蘇維埃在全國範圍內達到了全面的發展，然後使蘇維埃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當中得到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顯露出了蘇維埃底國際性質，顯露出了這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之普及於全世界工人運動，顯露出了蘇維埃的歷史使命乃是做資產階級國會制度、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掘墓人、繼承人。

不僅如此。現在，工人運動底歷史正指出，在一切國度內，工人運動都將要（而且已經開始）經歷一種日益增長的、日益強大的、向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首先而且主要地反對本國（就每個國度說）的『孟塞維主義』，即反對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之鬥爭；第二，——這可說是一種補充——是反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之鬥爭。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度內，似乎毫無例外，都已經展開了，如第二國際（目前它在事實上已經被擊斃了）與第三國際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會』及無政府工團派底一部分，都在固執着共產主義『左派』底錯誤，雖然這

些組織差不多是普遍地、差不多一律地承認地蘇維埃制度的），以及在法國（前工團派底一部分，對於政黨及國會主義之態度，同時他們也是承認蘇維埃制度的），都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說，毫無疑義的，非但在國際的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都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每個國度底工人運動，雖然到處都要經過實質上相同的戰勝資產階級的預備學校，但各國工人運動都是按各自的道路進行這一發展的。並且，大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各國，走上這一條道路，要比布爾塞維主義決得多，布爾塞維主義爲了準備它成爲一個有組織的政治派別，以達到勝利，在歷史上曾經費了十五年的工夫。第三國際在一年這樣短的時間內，就已經獲得了斷然的勝利，擊敗了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第二國際在幾個月以前，還比第三國際無比地強大，似乎是很牢固、很強大的，享有世界資產階級各方面的——直接的和間接的、物質上的（關員位置、護照、報章）和思想上的——幫助，而今却被第三國際擊敗了。

現在全部問題就在於每個國度底共產黨人既要完全自覺地計算到與機會主義和「左」的教條主義作鬥爭底基本的原則上的任務，又要計算到一些具體的特點，這些具體特點是這種鬥爭依照各個國度經濟、政治、文化、其民族成分（愛爾蘭等）、其殖民地、其宗教派別……等等原有特色而在各該國所具有的並且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具有的。因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因它的不會或沒有能力去討

立真正集中化的、真正領導性的、能夠指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在其爲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中的國際策略之中心，現在到處都感覺到對於它的不滿，而且這種不滿還在擴大着和增長着。必須要認識清楚，這種領導性的中心，不論如何，不能建築在使鬥爭底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一、以異爲同的基礎之上。只要各民族之間和各國度之間的民族的和國家的差別存在一天——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還將要保持很久很久的一一，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性，就不是要求排除多樣性，不是消滅民族的差別（這在目前是癡人作夢），而是要求這樣的應用共產主義底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應用在一些細節上可以正確地變更這些原則，使這些原則正確地適應和應用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在每個國度採取具體的辦法，以便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以便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的教條主義，以便推翻資產階級，以便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應當調查、研究、探索、推量、把握民族特點和民族特有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先進國度（不僅先進國度而已）所處的歷史關頭底主要任務。在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上，在使這個先鋒隊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而反對機會主義，轉到無產階級專政方面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這個問題上，主要的事情（自然，遠遠不是全部的事情，然而主要的）已經做到了。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集中於下一步驟上

面，這個步驟，看來好像——而且從某種觀點看來，確實是——不是基本的，但它因此而在實際上却更接近於任務底實際解決的，這個步驟就是要鑽研轉到或處理無產階級革命之各種形式。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被取得了。這是主要的事情。沒有辦到這件事情，那就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距勝利還是很遠的。僅靠先鋒隊一個是不能獲得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或是沒有採取直接支持先鋒隊之立場，或是至少沒有對先鋒隊採取善意的中立態度和表示完全不能支持它的敵人的時候，只是把先鋒隊投入堅決戰鬥之中，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爲了使真正整個的階級、爲了使勞動的和被資本所壓迫的真正廣大的羣衆，站在這種立場上，僅靠宣傳、僅靠鼓勵是不夠的。爲了做到這一點，則需要有羣衆底自身的政治經驗。這就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條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彰明較着地證實了。不僅文化很低、往往目不識丁的俄國羣衆，即文化程度很高、個個識字的德國羣衆，也必須要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去體驗那第二國際騎士們所組織的政府之毫無力量、全無氣節、孤立無援、對資產階級的奴顏婢膝行爲、卑鄙醜態，去體驗那極端反動派（俄國的柯爾尼洛夫〔註九〇〕，德國的卡普〔註九一〕之徒）專政之不可避免性，作爲除了無產階級專政外再無法可想的唯一道路，以便堅決地轉向共產主義。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

集團、共產主義派別之迫切任務，是在於引導廣大的（現在在大多數場合之下還是酣睡的、消沉的、墨守成規的、因循的、沒有醒悟的）羣衆到他們的這種新的地位上來，或確切一點說，不僅要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要善於領導這些羣衆，使他們接近、轉到新的立場上來。如果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就不能解決第一個歷史任務（吸引無產階級底覺悟的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那末，現在不取消「左的」教條主義錯誤，不完全克服它的錯誤，不免除這些錯誤，也就不能完成目前日益迫切的第二個任務，即善於引導羣衆到新的、能夠保證先鋒隊在革命中得到勝利的立場上來。

當問題（而且現在還依然是）只是吸引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時候，這時而且在這個程度以內宣傳佔第一位；在這裏，甚至那些有着小組一切弱點的小組也是有益的，可產生豐富的成果。但是當談到羣衆底實際行動的時候，談到百萬大軍底配置（假使可以這樣說的）的時候，談到特定社會內一切階級力量底配置，以便作最後的和堅決的戰鬥的時候，這時你當靠宣傳的老一套，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之真理，是絲毫沒有用處的。這時，不能只計算到幾千人，像在本質上計算宣傳員，計算還不能領導羣衆的小團體會員一樣；這時，應當以幾百萬人和幾千萬人計算。這時，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否說服了革命階級底先鋒隊，而且還要問：特定社會中

一切階級（一定要一切階級，毫無例外）底在歷史上發生作用的力量是否這樣配置的，即堅決的戰役已經完全成熟了，是否這樣配置的，即（一）仇視我們的一切階級力量，已經錯亂夠了，已經彼此打架夠了，已經因他們力不勝任的鬥爭而使自己衰弱夠了；（二）一切動搖的、躊躇的、不堅定的中間分子，即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都已經在民衆面前充分揭露了自己，都因為實際上的破產而充分丟醜了；（三）在無產階級中，羣衆的情緒已經開始並且日愈高漲，而有利於支持極堅決、極勇敢的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了。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就成熟了，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勝利了，如果我們正確地估計到了上面所講的、上面所簡括描繪的條件和正確地選擇了時機，我們的勝利就有保障了。

一方面哥吉爾們和魯易·喬治們（這些政治上的典型各國都是有的，只帶些微小的民族上的差異罷了）之間的分歧，另一方面，漢得遜們和魯易·喬治們之間的分歧，從純粹的、即抽象的共產主義，亦即還沒有成空到實踐的、羣衆的、政治行動的共產主義底觀點看來，都是完全不重要的和渺小的。但從羣衆底這種實際行動底觀點看來，這些差別却是極端而極端重要的。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他不僅願做一個自覺的、有信心、思想上的宣傳家，而且願做一個革命中的羣衆底實際領導者，那末，他的整個任務，他的全部事業，便在於計算這些差別，確定這些「朋友們」中間不可避免的、使得所有這些「朋友們」一

齊削弱和失去力量的衝突底完全成熟之時機。要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極嚴格的忠心跟善於從事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迂迴、通融、曲折、退却等等才能二者結合起來，以便加速漢得遜們（如果不舉出個別人的名字的話，那末，就可以說第二國際底英雄們，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代表者）政權之實現和隨之而喪失；加速他們在實際上的不可避免的破產，而這種破產正是以我們的精神，正是以共產主義的方向來啓發羣衆的；加速漢得遜們——魯易、喬治們——邱吉爾們之間（孟塞維克們與社會革命黨人們之間——立憲民主黨人們與君主主義者們之間；謝德曼們——資產階級——卡普們之間等等）的不可避免的劇變、紛爭、衝突及完全的瓦解；並正確地選擇一切這些『神聖私有產底台柱』之間的澈頭澈尾瓦解之時機，以便以無產階級底堅決進攻，擊敗所有這一班人，並奪取政權。

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底歷史，比最好的政黨，比最先進的階級底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總是內容豐富些，多樣性些，多方面些，生動些，『狡猾』些。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爲最好的先鋒隊，是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幻想的，而在人們一切能力特別興奮和緊張的當兒，實現革命的，却是被各階級底最尖銳的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幻想。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的階級，爲了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應善於掌握（沒有絲毫例外）社會活動底一

切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完成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所未完成的事情，有時候有很大的冒險和巨大的危險）；第二，革命的階級，應當準備用一種形式去最迅速的、意外的更換別一種形式。

一個軍隊，如不準備學會和使用敵人所有的或所能夠有的各種武器、各種鬥爭手段和方法，那誰也要同意這種行爲是愚蠢的，或者甚至是罪惡的。這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其如此。在政治上，更少可能事先知道，在未來的某種條件之下，究竟那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是適用和有利的。不精通一切鬥爭手段時，如果其他各階級底狀況上發生不依我們的意旨爲轉移的變動，把我們所特別見拙的這種活動形式提到日程上，那我們就會遭受極大的——有時甚至是決定的——失敗。精通一切鬥爭手段時，只要我們代表真正先進的、真正革命的階級之利益，甚至即使情況不容許我們運用對敵人最危險的武器、最快不過的給敵人以致命打擊的武器，那我們也一定會得到勝利的。沒有經驗的革命者時常以爲，合法的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爲資產階級在這種競技場上特別是常常（尤其在「和平」的、非革命的時期）欺騙和愚弄工人的；——而非法的鬥爭手段却是革命的。這是不對的。是的，例如像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其時最自由民主的各國底資產階級，都極無恥地和極狂暴地欺騙工人，禁止說出關於戰爭底強盜性質的真理，在這樣一種條件之下，那些不善於和不膽（請不要說；「我不能」），而說：「我不

願」吧）應用非法的鬥爭手段的政黨和領袖，的確都是機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叛徒。但是革命者，如果不善於把非法的鬥爭形式和一切合法的鬥爭形式結合起來，那末，他們便是極不好的革命者。在革命已經爆發和已經燃燒起來的時候，在人人由於簡單的狂熱，由於時髦，甚至有時由於個人升官發財之利益，而附和革命的時候，是不難認為一個革命者的。無產階級在其勝利以後，在最艱苦的工作以後，在可以說殉道的痛苦以後，是值得「解救」這樣的革命家的。善於在還沒有直接的、公開的、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鬥爭條件的時候成為一個革命者，善於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關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了解有革命的行動方法之必要的那些羣衆中，捍衛革命之利益（用宣傳、鼓動、組織的方法），這就困難得多了——也就有價值得多了。善於尋找、探索、正確地確定事變底具體道路或事變底特別轉變關頭、而能引導羣衆走向真正的、堅決的、最後的、偉大的革命鬥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現代共產主義底主要任務。

以英國為例。我們不能知道——任何人都不能事先確定——英國將怎樣很快地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及什麼緣由最能喚醒、燃起、推動極廣大的、今日還在睡着的羣衆去進行鬥爭。因此，我們務須要這樣地進行我們的一切準備工作，以便成為四隻腳都釘上鐵掌（像放普列哈諾夫當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時所愛說說的一樣）。有可能國會危機引起「破裂」，「打碎堅冰」；有可能從

那極端錯亂的、日益痛苦和尖銳化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產生危機；有可能是第三種危機等等。我們所說的，並不是那一鬥爭將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之命運（這個問題，絕沒有引起任何共產黨人底疑竇，這個問題對我們大家都已經解決了，而且是已經切實解決了），我們所說的，是那可以喚醒今日還在沉寢的無產階級羣衆動作起來並引導他們緊緊迫近革命的緣由。我們不要忘記，例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在國際方面和國內方面比現在百倍不革命的環境下，只要有這樣的一種『意外的』和這樣『微小的』緣由，如反動軍閥成千成萬無恥勾當之一（德列福斯案〔註九二〕）者，就足以引導人民緊緊迫近國內戰爭了！

共產主義者在英國必須不斷地、不減弱地和不偏不倚地利用國會選舉，及不列顛政府底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全世界帝國主義政策之一切變化，以及社會生活底一切其他領域、範圍、方面；在一切事情上用新的方法、用共產主義的方法，不是用第二國際底精神，而是用第三國際底精神，去進行工作。我在此地沒有時間和篇幅，來描寫『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的』參加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鬥爭底方法，但是，我可以使外國共產主義者相信，這曾經完全不像普通西歐的國會選舉運動。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呵，在你們俄國，情形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裏，國會主義却是另一個樣子。』這是一個很錯誤的結論。共產主義者——各國擁護第三國際的人存在在世界

上，都是爲了同一的目的，就是在整個路綫上，在生活底一切領域內，把那舊的社會主義的、工聯派的、工團主義的國會工作，加以改造，使之變爲新的、共產主義的國會工作。在我們俄國的選舉中，機會主義的和純粹資產階級的、專務主義的、騙人的資本主義的行爲，也常常是很多的。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應學會創造一種新的、不平常的、非機會主義的、非貪圖祿位的國會主義，爲的共產主義者底政黨能提出自己的口號，爲的真正無產者在沒有組織的和備受壓抑的貧民底幫助之下散發傳單，訪問工人底住所，訪問鄉村無產者和僻塞（幸而在歐洲，窮鄉僻野要比我們俄國少得多，在英國尤少）農民底茅舍，到最平民化的酒店裏去，打入最平民化的會社和臨時集會，不要用學者的口吻（也不要用於國會性的語氣）同人民說話，絲毫不要爭逐國會的「小小議席」，而要到處啓發思想，深入羣衆，抓住資產階級所說的話，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利用資產階級所舉行的選舉，利用資產階級向全體人民所發的號召，要像在選舉運動以外（自然除開大罷工的時機不講，在大罷工時，這樣一種全民鼓勵的機關，在我國工作得更加緊張）從不能做到認識（在資產階級底統治下）的那樣來使人民盡量認識布爾塞維主義。在西歐和美國要進行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而且是十分困難的，但是這是可以作的而且必須做的，因爲不費勞力，則一般共產主義底任務，就不能解決，要解決日益多樣性的、與社會生活各部門日益聯系起來的、日益把資產階級

的一個一個部門、一個一個領域奪取過來的實踐任務，就應當費一些心血。

在同一的英國，也要這樣以新的方法（不是按照社會黨的方法，而是按照共產黨的方法，不是用改良主義的精神，而是用革命的精神）在軍隊中和『自己』國家底被壓迫的和不平等的民族（如愛爾蘭、各殖民地）中進行宣傳、鼓動、組織工作。因為社會生活底一切這些領域，在一般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現在在大戰以後，在使人民痛苦不堪和迅速使人張開眼睛去認識真理（即：幾千萬人陣亡和變為殘廢，只為的解決一個問題：是英國強盜還是德國強盜來掠奪更多的國家）的大戰以後，都特別充滿着引火材料，並造成特別多的發生衝突、危機、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緣由。現在，在各國因受全世界經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到處都散滿着巨量火星，我們不曉得，而且不能曉得，就羣衆特別醒覺的意義說，到底那個火星將能燃起大火，因此，我們務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去着手『耕耘』一切和各種甚至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來沒有希望的舞台，因為不如此，我們便不能解決任務，便不能成為全面的，便不會掌握各種武器，對於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曾經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建設了社會生活底各方面，——而現在也瓦解了它們）既沒有準備，而對於將來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法，改組全盤社會生活，也沒有準備。

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出乎資

產階級及庸俗分子意外的勝利以後，現在全世界已成了另一個樣子，資產階級也到處成了另一個樣子了。資產階級爲『布爾塞維主義』所嚇倒了，他們痛恨『布爾塞維主義』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了，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們一方面，是加速事變之發展，而另一方面，則是聚精會神用暴力來壓服布爾塞維主義，以此來削弱自己在其他許多舞台上的障地。一切先進國度底共產主義者在決定策略時都應當計算到這兩種情況。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及克倫斯基大肆獵捕布爾塞維克的時候——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一九一七年六月和七月尤甚——，他們『做得過火』了。幾百萬份用各種陸諷大罵布爾塞維克的資產階級的報紙，曾經幫助吸引羣衆來品價布爾塞維主義；除了報章以外，整個社會生活，正由於資產階級底『熱心』，而紛紛爭論布爾塞維主義了。現在國際範圍內，各國百萬富豪的行動都是這樣的，以致我們不得不衷心感謝他們。他們以同樣的『熱心』獵捕布爾塞維主義，與從前克倫斯基獵捕它一樣；而且他們也同樣『做得過火』了，也同樣在幫助我們，正如克倫斯基一樣。當法國資產階級大罵比較溫和的或動搖的社會黨人，說他們信仰布爾塞維主義，把布爾塞維主義做爲選舉運動的中心問題的時候，——當美國資產階級完全張皇失措，以布爾塞維主義的嫌疑捉拿成千成萬的人，並到處散佈謠言，說布爾塞維克陰謀不軌，造成一種狼狽氣氛的時候；——當世界上『最牢固的』英國資產階級，不管其如何聰明和有

經驗，却做出難以置信的蠢事，它建立經費極充足的「反共協會」，出版專門評論布爾塞維主義的書報，僱備大量的學者、鼓動家、牧師來與布爾塞維主義作鬥爭的時候，——我們應向這些資本家老爺們，鞠躬致謝。他們是替我們工作的。他們幫助我們使羣衆對於布爾塞維主義實質和意義的問題發生興趣。他們是不能有別種作爲的，因爲「沉默不談」、窒死布爾塞維主義，他們已經辦不到的了。

然而，同時資產階級差不多只看見布爾塞維主義底一個方面：起義、暴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力謀特別在這一方面準備反擊和抵抗。有可能，在個別情形之下，在個別國度裏，在某一短促的時期內，資產階級能夠做到這一點：應計算到這一種可能性，資產階級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的地方。共產主義正在從社會生活底各方面堅決地「發育着」，它的嫩芽簡直到處都是有的，「瘟疫」（假使使用資產階級及其警察所喜歡的和對他們最「快意」的比喻來說的話）已經深深侵入機體，並侵蝕全部機體了。如果特別小心地「堵住」一個出口——但「瘟疫」却找到了另一個出口，有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出口。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讓資產階級去瘋狂怒罵、痛恨、做得過火、作出蠢事、事先報復布爾塞維克，力謀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成百、成千、成萬的明天的或昨天的布爾塞維克吧：資產階級這樣做時，其行爲正和以前被歷史注定滅亡的各種階級之行動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無論如何，未來總是屬於我們的，因爲

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把偉大的革命鬥爭中的極大的熱情跟對資產階級敵人的最冷靜和最清醒的計算兩者結合起來。在一九〇五年人們曾經殘酷地撲滅了俄國的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人們曾經擊敗了俄國的布爾塞維克*；人們藉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保皇黨將軍們底巧妙的挑撥和靈敏的手腕屠殺了一萬五千以上的德國共產黨人；在芬蘭和在匈牙利，白色恐怖還在猖獗着。然而，在一切情形之下和在一切國度裏，共產主義却都在鍛鍊着和生長着；它已經根深蒂固了，以致追捕辦法不是在削弱它，減少它的力量，而是在加強它了。使我們更有信心和更切實地走向勝利的，只缺少一點，這就是：各國一切共產黨人對其策略須有高度靈活性之普遍而徹底深思熟慮的意識。特別是在先進各國裏，蓬勃發展的共產主義，現在正缺乏這種意識及在實際上應用這種意識之才能。

像考茨基、陶威爾等如此飽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如此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所發生的一切，可以（而且應當）做爲有益的教訓。他們曾經完全意識到了採取靈活的必要性，他們曾經學習了馬克思的辯證法，而且轉授於別人（他們在這一方面所作的當中的好多將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底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應用這種辯證法的時候，却犯了這樣的錯誤，或者在實際上竟成了

* 詳見一九一七年七月號日，見本選集第十一卷

這樣的一種非辯證論者，竟成了一種不著於估計形式迅速轉換和以新的內容迅速充實舊形式的人，以致他們的命運再沒有比甘特曼（註九三）、格得、普列哈諾夫底命運更可羨慕的了。他們破產底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凝視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增長底一個確定的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之片面性，害怕看到那因客觀條件的緣故而成爲不可避免的東西之急遽變革，他們繼續重複那簡單的、背熟了的、驟然看去是不可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與其說是像算術，毋寧說是像代數，與其說是像初等數學，毋寧說是像高等數學。在現實上，社會主義運動底一切舊形式，都已充實了新的內容，因此，在數字前面，已出現了新的符號：「負號」，可是，我們的學究却固執地繼續（而且還在繼續着）勸自己和別人相信，「負三」大於「負二」。

要努力於使共產主義者不要再重複「左派」共產主義者只是從別一方面所犯的同樣的錯誤，更確切一點說，要更快地糾正和更快地、對身體無痛苦地消除那「左派」共產主義者只是從另一方面所犯的同樣的錯誤。不僅右的教條主義是一種錯誤，就是「左的」教條主義也是一種錯誤。在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的」教條主義底錯誤，比較「右的」教條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底錯誤，其危險性與嚴重程度當然要小一千倍，然而這所以如此者，只是因爲「左的」共產主義還只是一種很年幼的思潮，還是剛剛發生的一種思潮罷了。只因爲這個緣故，

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之下才能容易醫治好，因此，必須用極大的精力來從事這種醫治。

舊的形式已經破裂了，因為其新的內容——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已經達到了過度的發展。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底觀點看來，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樣堅固、這樣強大、這樣有力的工作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了，以致這種內容却可以而且應該在任何新的和舊的形式上把自己表現出來，它可以而且應該改造、戰勝、征服一切形式——不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舊的形式，——其目的並不是爲了容忍舊的形式，而是爲了善於使一切和各種各樣的新的和舊的形式成爲共產主義底完全和最後的、堅決的和不可顛覆的勝利之工具。

共產主義者應用全副力量，使工人運動及一般社會的發展由最直接和最迅速的道路朝向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的勝利。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真理。可是，再向前多走一小步——似乎是同一方面上的一步——真理便變成錯誤了。只要像德國和英國「左的」共產主義者所說的一樣，說：我們只承認一條路，只承認一條筆直的路，我們不允許有迂迴、通融和妥協，那這就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足以使共產主義受到——局部地已經受到——而且現在還在走着——極嚴重的損害。右的教條主義沒有看見新的內容，固執於只承認舊的形式一種，因此已經完全破產了。「左的」教條主義是固執於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的形式，而沒有看到新的內容正在經過一切和各

種各樣的形式而爲自己開闢着道路，沒有看到，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另一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一種形式，使自己的策略適應於各種不是由我們的階級或不是由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這樣的任何更替。

世界革命，已因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底慘酷、卑鄙、齷齪及它所造成的絕望情況而強有力的被推動和被加速了——這個革命，正以這樣優越的速度，正以這樣十分豐富的互相更替的形式，正以對各教條主義的這樣有益的實踐的駁覆，日益廣泛而深入地發展着，以致有充分的根據可以令人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可以迅速而完全地醫治好「左派」共產主義底幼稚病。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增 補

直到我國——全世界帝國主義者都會掠奪它，以報復無產階級革命，並且不管向他們本國工人作了怎樣的諾言，但他們仍繼續掠奪它和封鎖它——，直到我國印刷局出版我的小冊子時，才從國外得到了補充材料。我並無意冀圖使我的小冊子成爲一部比政論家底隨筆更大的什麼著作，因此，我只是簡括地再講幾點。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已成爲事實了。「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外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工黨」，以區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也好像弄到分裂的地步了——我說「好像」，因爲我僅有新到的「左派」的報紙蘇維埃報兩期（第七期和第八期），在這兩期上面公開討論着分裂底可能與必要，並且也講到「抵制派」（註九四）（即反對參加國會的一派）底代表大會，這個派別直到現在還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的。

可以憂慮的是，與「左派」即「反國會派」（其中有

一部分是反對政治、反對政黨和反對在職工會內的工作的人們）之分裂，像跟「中派」（考茨基派、郎格派、「獨立工黨派」等等）之分裂一樣，將成爲國際的現象。就讓它這樣吧。分裂總比觀念糊塗好些，因爲觀念糊塗，是要阻礙黨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增長和成熟的，是要阻礙黨的和衷共濟的、真正有組織的、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工作的。

讓「左派」在事實上，在國際的和國內的範圍內，去考驗自己吧，讓他們去試一試沒有嚴格集中化的、有鐵般紀律的黨，沒有掌握政治工作與文化工作底各方面、各部門、各種樣式的才能，而去準備（並且接着就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罷。實際的經驗會很快地教訓他們的。

工人運動中一切誠懇而自願地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分子，在最近的將來，將不可避免地而且必然要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政黨，現在，只是要竭盡全力，使與「左派」的分裂不至妨礙或儘可能地少妨礙這種匯合。在俄國，布爾塞維克底特別幸運，就在於他們遠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的羣衆性的鬥爭以前，就已有了一十五年的功夫，去進行有系統的和貫徹到底的鬥爭，以及對孟塞維克（即機會主義者與「中派」）及反對「左派」了，而在歐洲和美國，現在不得不用「總行軍」的辦法來進行這種工作。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企圖做領袖而沒有成功的人，會在長期內固執他們的錯誤（如果他們沒有充分的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和不「光明正大」的話），但工人

羣衆在時機成熟的當兒，會容易而迅速地自行聯合起來，並把一切誠實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黨，能實現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黨的。*

* 關於「左派」共產黨人，反國會派與一般共產黨人將來合併的問題，我還要指出下列一點。據我所讀到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及一般德國共產黨人底報紙判斷起來，「左派」有一格長處，就是他們在羣衆中比較一般共產黨人善於作鼓動工作。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歷史上，我也屢屢看到過類似的事情——不過只是範圍較小，並且是在個別的地方組織裏，而不是在全國的範圍內罷了。例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左派」布爾塞維克，有些時候和有些地方，就在羣衆中作鼓動，比我們更加有效些。這部分地可用下面一點來說明，即在革命的當兒或者在對於革命的回憶尚歷歷在目時，採用「簡單」否定的策略，是比較容易接近羣衆的。然而這還不是證明這種策略正確的理由。無論如何，毫無疑義的，共產黨要想真正成爲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先頭部隊，而且它想要學會不僅領導無產階級的廣大羣衆，而且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羣衆——勞動者和被壓迫者羣衆，那末，它就必須要善於最接近、最明瞭、最清楚、最生動地在工廠裏「街頭」或鄉下去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動工作。

(二) 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裏已經發表了一種意見，說共產黨人與獨立派左翼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要實現這個妥協，却是不容易的。此後我所收到的幾份報紙，就證實了這兩種意見。在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團）機關報紅旗報第三十二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上，載有該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卡普和留特維茨（註九五）軍事「盲動」（軍事陰謀、軍事冒險）及「社會主義政府」的「聲明」。無論從基本前提底觀點看來，或從實際結論底觀點看來，這個聲明都是完全正確的。基本的前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在目前還是沒有的，因為「城市工人底大多數」還是擁護獨立黨人的。結論是：尤諾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政黨除外的社會主義政府」採取「善意的反對派」態度（即放棄對「暴力推翻」之準備）。

這個策略，無疑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即使對這個說法的一些小的不確切的地方就不講了，但是仍不能緘默不言的是，不能把社會叛徒底政府稱為「社會主義的」政府（在共產黨底正式聲明書裏），謝德曼們及考茨基們和克里斯賓們底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那就不能說什麼「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政黨」除外這一類話，不應寫出像「聲明」第四條這樣的東西，該條說

道：

【……政治自由可以無限制地利用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不能成爲資本底專政，這種狀態，從無產階級專政發展之觀點看來，對於進一步把無產階級羣衆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是極重要的……】

這樣一種狀態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德國的邁得遜們（謝德曼們）和斯諾登們（克里斯賓們）不會越出也不能越出資產階級民主制之範圍，而這種民主制又不能不成爲資本底專政。從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完全正確地力求達到的實際成果之觀點看來，完全而且不應寫這些原則上不正確和政治上有害的東西。爲了這一點，只說下面一點就夠了（如果你想從事國會式的客套的話）：當城市工人的大多數還在跟着獨立黨人走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便不能阻礙這些工人根據「他們」政府底經驗去消滅他們的最後的市儈式的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的幻想。這種說法已足以作爲妥協之根據，這種妥協在事實上是必要的，這種妥協應在於在一定時期以內放棄用暴力推翻那多數城市工人所信仰的政府之企圖。在日常的、羣衆性的、那不受官方的國會的客套所拘束的鼓動中，自然可以附加一句：讓謝德曼們這班下流東西及考茨基——克里斯賓們這班庸人，去在事實上揭穿，他們自己是多麼受人愚弄和他們又多麼愚弄工人的；他們的「清潔」的政府將「最清潔不遜地」進行「清洗」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各種社會變節行爲的奧吉王的馬戲

這種工作的。

現今「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說這些領袖們已經喪失了任何影響，那是不對的，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命為共產主義者而且允諾「支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更危險些）底真正面目，在德國的柯爾尼洛夫事變時，即在卡普和留特維茨老爺們底政變時^{*}，又暴露了一次。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自由報（獨立黨人底機關報）所載考茨基底決定的關頭（註九六）和克里斯賓底論政局（註九七）（同上，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兩篇短文都提供了一個小而明白的例證。這些老爺們都絕對地不善於像革命家那樣地思索和論斷。他們都是一些喜歡假哭泣的市儈式的民主派，如果這些民主派宣佈自己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末，他們對於無產階級更要危險千倍，因為他們在事實上在每一個困難而危險的關頭，都不可避免地要叛變的……可是，他們却抱着一種「極誠懇的」信念，以為他們是在幫助無產階級的！原來改名為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當他們因胆小如鼠和毫無氣節，而認為匈牙利蘇維埃政府

*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在奧國共產黨底出色的報紙「紅旗」上面會把這次政變異常明確、簡單、確切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加以說明（見蘇俄紅旗報第二六六和二六七期[L. L. 德國革命底新階段一文]）。

底形勢已經沒有希望及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剝子手底走狗前面痛哭流涕的時候，他們也是希望「幫助」無產階級的！

(三) 意大利的杜拉第及其同夥

上面所提到的那幾期意大利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關於意大利社會黨底錯誤所說的話。該黨竟容忍這樣的黨員及甚至這樣的議員集團留在自己的隊伍裏面。像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報紙曼徹斯特導報駐羅馬通訊員這樣的旁觀的證人，更證實了這一點，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該報發表了自己的一篇杜拉第訪問記（註九八）。這個通訊員寫道：

「杜拉第以爲，革命的危險並沒有大到在意大利可以引起無謂的憂慮。極端派玩弄蘇維埃理論底烈火，只是爲了要使羣衆底情緒保持在高漲與興奮狀態之中。然而這種理論都是純粹無稽的概念，都是沒有成熟的綱領，這些綱領是不適於實際的使用的。這種理論，只宜於使勞動階級處於期待的狀態之中。那些把這些理論用作香餌去眩惑無產者眼睛的人們，看到自己不得不爲了獲得若干、往往是微小的經濟上的改良而進行日常的鬥爭，以便遷延時日，好叫工人階級不至失掉自己的幻想和對於自己的可愛的神話的信仰。由此發生大小不同和動機不同的一連串的罷工，直到最近郵政和鐵路部門的罷工爲止，——這些罷

工，使得國內空嚴重情況更加嚴重。因奧亞得利亞海問題有關的困難之原故，全國已經激怒起來了，因外債和濫發紙幣而情緒不振了，但是全國還遠沒有意識到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只有這種勞動紀律才能恢復秩序與幸福的……。

很明顯的，英國通訊員把杜拉第自己及其在意大利的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帮手、指導員等所掩蔽和粉飾的實際情形，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這種真實情形，就在於，杜拉第、特列佛斯（註九九）、毛底連尼（註一〇〇）杜郭尼（註一〇一）這班老爺們底思想及政治工作，和英國記者所描寫的確是一樣，恰好一樣。這是一種激頭激尾的社會變節行爲。主張那些處於僱傭奴隸地位，爲資本家發財而工作的工人，遵守秩序與紀律，僅僅就這一點講來，是多麼可惡啊！我們俄國人是如何地熟悉這種孟塞維克的說話啊！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這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對於自發地爆發的罷工運動底革命作用絲毫不懂，這是何等愚鈍，何等資產階級式的卑劣！是的，是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底記者，是替杜拉第這一般老爺們効了一番蠢勞，他最好不過地證實了波爾蒂加同志及其蘇維埃報的友人所提出的要求之正確，他們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如果它願真正擁護第三國際的話，那就應當聲罪致討，把杜拉第這班老爺們趕出自己的隊伍，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爲共產黨。

(四) 從正確的前提中做出錯誤的結論

但是波爾蒂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從其對於杜拉第及其夥伴們所作的正確的批評中，却做出錯誤的結論，以為一般參加國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並不能舉出絲毫鄭重的替這種觀點辯護的論據。他們簡單地不知道（或力謀忘記）國際間利用資產階級國會的模範例子，而這種利用是真正革命的、真正共產主義的，對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毫無疑義地是有益處的。他們簡單地不設想一下『新的』東西，而只是高聲大嘆，口口聲聲重複那『舊的』、非布爾塞維克的、利用國會主義的方法。

這就是他們的根本錯誤之所在。共產主義不僅在國會的舞台上，而且在活動底一切舞台上，都應該加入（如果不進行長期的、堅定的、百折不回的工作，它是不能加入的）原則上新的、根本上與第二國際傳統沒有關係的東西（同時要保留和發展第二國際所提供的好的東西）。

就拿新聞記者的工作來說吧。報章、小冊子、傳單，都執行着必要的宣傳、鼓動、組織工作。在稍微文明的制度內，任何羣衆運動，如沒有新聞機關，都是不能進行的。對『領袖』的任何辱罵，保持羣衆的純潔使不受領袖影響的任何宣誓，都不能免除有利用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來進行這個工作之必要，都不能免除這個工作

在資本主義下於其中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私有制的』氣氛和環境。甚至在推翻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已有兩年半之久，我們在自己的周圍還可以看到羣衆的（農民的、手工業者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私有關係之這種氣氛，這種環境。

國會主義是一種工作形式，新聞事業是另一種形式。如果在這兩方面工作的人員都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都是無產階級的羣衆性的政黨之真正黨員，那末，這兩種工作底內容都可以成爲共產主義的，而且應當成爲共產主義的。但是，不論在這一方面也好，或在那一方面也好，——及在資本主義之下以及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論在那一個工作範圍以內，——都不能避免那些困難，那些特殊的任務，這些困難和任務，無產階級都應當加以克服和解決，以便利利用那些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以便戰勝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偏見和影響，以便削弱小資產階級環境底阻力（以後還要完全改造小資產階級環境）。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以前，難道我們沒有在一切國度內看到非常衆多的例子，那時，很『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及其他等等，都痛罵國會主義，嘲笑資產階級式地庸俗的社會黨議員們，抨擊他們的經營祿位的行動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却借着新聞事業，借着工會裏的工作，去做同樣的資產階級式的經營祿位的勾當？如果只就法國來說，難道如沃和麥爾赫這些老爺們的

例子，不是標本的例子嗎？

【否認】參加國會制度之幼稚性，是在於，他們想用這樣「簡單的」、「輕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式，就可以「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資產階級民主的影響作鬥爭這個困難的任務，但事實上他們只是避開自身的影兒，只是閉起眼睛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極端無恥的鑽營祿位，對國會議席之資產階級式的利用，對國會工作的彰明較著的改良主義的曲解，卑劣的市僧式的墨守成規，——凡此種種，毫無疑義的，都是資本主義到處而且不僅在工人運動以外，而且還在工人運動以內所產生的、通常的和最流行的特徵。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種環境，就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也消滅得很緩慢，因為農民在不斷地重新產生着資產階級），都堅決地在工作和生活之各領域內產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別、而本質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祿位、民族沙文主義、市僧的卑劣行爲等等。

親愛的抵制派和反國會派！你們以為你們自己是「非常革命的」、但在事實上，你們是為反對工人運動內部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底比較不大的困難所嚇倒了，然而你們的勝利，即推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將以更大的、不可比擬的更大的規模，造成這些同樣的困難。你們同小孩子一樣，已經為那今日擺在你們面前的小小困難所嚇倒了，你們不曉得，到了明天和後天，你們還要不得不學會，不得不澈底學會克服那不知大多少倍的同樣的困難。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還有更大量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分子混入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裏來。他們侵入蘇維埃、侵入法庭、侵入行政管理機關，因為不用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建設共產主義，因為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應當戰勝、改造、消化、重新教育他們，——正如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要重新教育無產者本身一樣，無產者不是一下子、不是用什麼奇蹟、不是依照聖母底命令，也不是用口號、決議、指示，去解脫自身的小資產階級的偏見的，只有在反對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影響的長期而艱苦的羣衆性的鬥爭中才能辦到的。現在反國會主義派這樣自高自大，這樣趾高氣揚，這樣輕舉妄動，這樣幼稚無知，一舉手而拋開的這些任務，殊不知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在蘇維埃內部，在蘇維埃行政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辯護士』（我們在俄國已經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而且做得很好——但是這種律師制度却在我們蘇維埃『辯護士』底名義之下又重新產生出來了）內部，都要重新產生出來的。在蘇維埃的工程師內部，在蘇維埃的小學教師內部，在蘇維埃工廠中享受特權的，就是說在最熟練和待遇最好的工人內部，我們也看到了那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壞處之不斷復生，我們只有用無產階級組織性和紀律性之反覆的、不倦的、長期的百折不回的鬥爭，才能——逐漸地——戰勝這種禍害。

自然，在資產階級底統治下面，戰勝自己的、即工人

政黨內的資產階級的陋習是很『困難』的；從黨內趕走那習慣了的、被資產階級的偏見所完全污損的做國會議員的領袖們，是『困難』的，使資產階級出身的一批所絕對必要的人（即令是一定的有限的人數）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困難』的；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裏建立完全堪稱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黨團，是『困難的』；要使共產黨的議員不是作資產階級國會的兒戲，而是在羣衆中從事迫切的宣傳、鼓動、組織工作，是『困難的』。凡此種種都是『困難的』，這是不用說的；這些曾經在俄國都是困難的，現在在西歐和美國更要無比地困難些，因為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要強大得多，資產階級民主的傳統勢力等等也要強大得多。

但是所有這些『困難』，如果與那無產階級爲了自己的勝利及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乃至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同樣不可避免地需要加以解決的完全同類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是小孩般的困難而已。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須要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小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使他們統通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這些巨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末，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國會裏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底真正共產主義的黨團，乃是一樁易如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的』以及反國會的同志們，現在甚至不學會克服這樣的小小的困難，那末，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

將來不是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使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機關服從自己 and 改造他們，便是將來一定要倉卒補習一切這些，而且這種倉卒一定要使無產階級的事業受到很大的損害，一定要犯比平常更多的錯誤，一定要表現出比平常更大的弱點和無能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天沒有被推翻，其次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一天沒有完全消失，則資產階級的環境，私有產的習慣，市儈的傳統，都將要從工人運動的外部乃至內部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而且所損害的範圍，不僅在國會活動範圍以內，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切文化和政治的舞臺上，毫無例外。企圖躲開、迴避某一工作領域內的「不痛快的」任務或困難之一，那是絕大的錯誤，以後不可避免地要償還這種錯誤的。要學習而且要學會精通工作和活動於一切領域，而毫無例外，要學習而且要學會到處戰勝一切困難和一切資產階級的陋習、傳統和習慣。不然，另一種提問題的方法，簡簡單單地是不嚴肅，簡簡單單地是兒戲罷了。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五)

在這本書蘇俄文版內，關於整個荷蘭共產黨在國際革命政策方面所行動，我有一點兒說得不正確。因此我利用這個機會來公佈我們的荷蘭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稿，

並改正我在俄文版上所用的『荷蘭論境況』這個名詞，而用『荷蘭共產黨底一些共產黨員』這句話去代替。

列·寧

瓦英庫普（註一〇三）底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三十日寫於莫斯科——

親愛的列寧同志：

我們，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荷蘭代表，由於你的關照，能夠在你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譯成西歐文字而未公佈之前，讀到你這一著作，在你這本書裏，你好幾次特別提到你不贊同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在國際政治上所起的那種作用。

我們應當提出抗議，反對你把這幾個人行為底責任，加在共產黨身上。這是極端不確切的，而且這是不公允的。因為荷蘭共產黨中這些黨員很少參加，或者完全不參加我們黨底日常工作；他們也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在共產黨內部實行反對派的口號；荷蘭共產黨及其所有的機關曾經進行並且直到現在都不斷進

○ 我們已在原文上加以改正了。

——列寧底註

行極努力的鬥爭，去反對這些口號。 敬
兄弟的敬禮！

瓦英庫普代表蔣爾共產黨代表鑒啓

註釋

(一)考茨基(1854—1939)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時代馬克思主義之大理論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一八七四年，加入奧國社會民主黨，依附於該黨由塞伊和莫斯特所領導的半無政府主義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響之下，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在【特殊法】時期(1878—1890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蘇立支非法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上合作。一八八三年，創辦了學術性的雜誌新時代(“Die Neue Zeit”)，任它的編輯至一九一七年為止。在九十年代，寫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土地問題等)。一八九八年，經過大動搖之後，出而反對伯恩斯坦底修正主義(反伯恩斯坦)。但是，在其這一時期底著作中，即已有了好多漏洞和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如關於辯證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對馬赫哲學的調和態度等)。在其走向政黨之道路一著中，對於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估計，一般說來，還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從這個時候起，機會主義的【中派】的趨勢(考茨基的這種趨勢，始終是很厲害的)，在其一切政治理論的活動中便逐漸佔了斷然的優勢。他成了西歐【中

派」底最有名的代表，而所謂「中派」者，就是機會主義的變種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他最後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用國際主義的辭句掩蔽自己立場的真正社會沙文主義。他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創立人之一，後來成了該黨的右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反對蘇維埃制度，堅持所謂「純粹」的民主制度和國會主義。在德國十一月革命後，任愛伯特、謝德曼第一次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在任內實行爲協約國奴隸般服務的政策，竭力阻止與蘇維埃俄羅斯恢復關係，在伯恩會議上，以最鄙視的方式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第二半國際創立人之一。一九二二年，贊助它回到第二國際的隊伍內。在其晚年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兩卷半的唯物史觀（一九二七年）一著中，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叛賣，達到極端地步。他是蘇聯底最兇惡的敵人之一，公開宣傳反蘇戰爭和武裝干涉。可參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見本書六、二一、二八、九五、九九、一〇三、一〇四、二四九、一六四頁）

（二）鮑威爾（生於1882年），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一次大戰前爲該黨左翼，鬥爭雜誌編輯，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之有名頭子。著有許多關於工人運動、哲學及民族問題的小冊子。在其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一著中，主張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論。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爲考茨基主義者；一九一四年爲俄國俘虜，拘留於西伯利亞，後由克倫斯基政府依彼得堡蘇維埃的要求，從該地釋放。在其短期停留於彼得堡期間，

贊成孟塞維克國際主義派底立場。在奧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後，爲社會民主黨人倫涅爾聯合政府底外交部長（倫涅爾曾幫助協約國封鎖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〇年爲第二半國際組織者之一。反對第三國際，着了幾本反對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書，如世界革命（一九一九年）、布爾塞維主義與社會民主黨（一九二〇年）、蘇維埃俄羅斯的新方針（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迫不得已而公開承認：『在蘇聯新經濟政策底基礎上面，正在進行着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這一鬥爭可說有社會主義勝利之希望』；但同時却說，聯共正在使資本主義復辟。一九二七年七月他領導奧國社會民主黨，使用該黨的影響，以鎮壓維也納工人底起義。現爲第二國際執行委員。（見六一、二一、三四、九五、一〇四、一四九頁）

（三）阿德勒（生於1879年） 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父爲維克多·阿德勒。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一年爲瑞士蘇立支大學理論物理學助教，同時兼任瑞士社會民主黨機關報人民權利主筆，以後爲奧國社會民主黨書記。帝國主義大戰時，採取和平主義立場。因羣衆的工人運動底低落而感到失望，於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刺死奧國總理勃杜克伯爵，以是被判死刑，以作苦工十八年代死。一九一八年奧國革命後出獄，出而反對俄國十月革命。同時，他竭力消滅日益發展的奧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二〇年企圖成立「中派」的第二半國際。一九二二年，根據他的提

議，此第二半國際與復辟的第二國際合併，他任國際社會主義局主席。「左」的社會民主黨是以革命詞句掩蔽社會民主黨政策底資產階級的實質，而阿德勒正是這種「左」的社會民主黨底代表者。在哲學上，他是屬於馬哈主義者。（見同上六、二一、三四頁）

（四）全世界革命 這本小冊子，是奧托·鮑威爾著的。

（五）朗格（生於1876年）法國社會黨黨員，律師，在帝國主義大戰幾年間，採取和平主義立場，並且始終投票贊成軍事公債。「Le Poulair」報底創辦人和主筆，該黨內部右派底首領，在一九一八年斯特拉斯堡大會上，該黨多數採取朗格立場，而朗格遂成了人道報底思想家和編輯。十月革命後，在羣衆中左傾情緒壓力之下，反對武裝干涉蘇維埃俄羅斯，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爲「恢復國際委員會」主要活動者之一。在一九二〇年圖爾大會後（在該大會上共產黨人獲得勝利），與他的同道者一同退出黨，以後依附於維也納第二半國際；再後，又回到第二國際。列寧對於朗格的批評，可看政論家的簡評一文（全集二十五卷，三十一至三十九頁）。（見二一頁）

（六）費邊派 這就是所謂費邊社的社員，該社以羅馬的名將費邊、匡克塔托爾（匡克塔托爾是拉丁語，意義就是做事遲慢的人）底名字命名，於一八八四年在英國成立，該社成立的用意，就是要用和平的辦法來宣傳社會主

義，而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合會相抗衡。該社正式宣佈的宗旨，就是要用民主的精神來修改英國的憲法，並宣傳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去組織生產。該社不放棄政治鬥爭，不拒絕參加國會選舉，同時它却否認階級鬥爭，宣傳階級合作，不承認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七）杜拉第（生於1857年）意大利改良派社會主義者，就其所受教育講，為法學家、著作家。從一八九二年起，為意大利社會黨領導人之一。一八九八年，因參加所謂「飢民騷動」，被判處十二年徒刑。但過了一年，被政府釋放，並建議要他作部長。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他反對意大利參戰；在意大利參戰以後，則贊助以威爾遜主義為精神的妥協派的「民主的」和平；在大戰之後，在社會黨大會上，領導右的改良派，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與共產國際接近；在一九二二年分裂之後，成為統一社會黨黨首領。（見二一、八五、一六五、一六七頁）

（八）謝德曼（生於186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青年時代為排字工人。一九〇三年，被選為國會議員；不久，即在國會中佔據顯要地位，為倍倍爾底密切合作者。一九一二年，被選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同年，在社會民主黨於國會選舉中大勝利以後，為黨團主席團委員和國會副議長。在倍倍爾逝世以後，與愛伯特同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主要領導人，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該黨的一切叛賣活動，都是在他領導之下進行的。在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之前，企圖挽救君主政體，加入巴登斯基

親王內閣。在革命以後，當選入「人民代表委員會——德國社會主義共和國臨時政府。曾用一切方法，鎮壓日益開展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見二一、九八、一〇三、一〇九、一一八、一三八、一四九、一六二頁）

（九）諾斯克（生於1868年）德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木工；長久在職工會中工作，佔據它的領導職位。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二年，任哥尼斯堡、剎姆尼斯及布爾登堡等地社會民主黨報紙底主筆。一九〇六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尚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前，即擁護德國資產階級底殖民地政策。在大戰諸年間，依附於謝德曼底立場，並與社會民主黨底多數黨員一同支持政府，投票贊成軍事公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壓服基爾海員起義，此後，被委為基爾總督。隨着革命運動底加強，諾斯克以殘酷鎮壓海員有功，被召至柏林，加入「人民代表委員會」。他依靠反革命的軍人——留特維茨等，殘酷地壓服了一九一九年柏林工人的一月起義。任謝德曼內閣國防部長時，在保皇派軍官幫助之下，並用大批恐怖的手段，壓服了革命的工人運動。德國資產階級利用他作為鎮壓日益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工具，並在他協助之下，準備了卡普「自動」之基礎，卡普暴動，才結束了他的部長野心。（見二一、一〇九、一一三、一四九頁）

（一〇）希法亭（生於187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者領之一，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底有名的理論家和代表者。一九〇六年旅居德國，在這裏積極參加社會民主黨黨

校之領導工作，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合作，並編輯前進報（Vor worts）（一九〇七——一九一五）。一九一〇年發表其主要著作財政資本論，其中圖謀調和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不論何時，總接近於考茨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為「中派」。一九一七年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為其中央刊物自由編輯和中央委員。為該黨底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策之主要代表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革命後，為政府「社會主義化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反對獨立派加入共產國際。一九二三年為斯特萊施曼聯合內閣財政部長；一九二八——二九年為社會民主黨人繆勒聯合內閣財政部長。在社會民主黨基爾大會上（一九二七年）辯護「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現在為社會法西斯主義思想家之一。（見二一、二八、九〇、一〇四頁）

（一一）倫涅爾（生於1870年） 奧國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底有名代表者。在其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中，關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自治論」作了最初的解釋。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為顯明的社會國防派。在一九一八年奧國革命以後，任奧地利共和國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堅持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從一九二〇年起，為國民會議議員。（見二一、三四頁）

（一二）奧斯鐵里茨（1862—1931） 奧國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屬於該黨右翼，國會維也納議員，該黨中央

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曾採取鮮明地沙文主義（極端侵略性的國家主義）的立場。（見二一頁）

（一三）普列哈諾夫（1856—1918）列寧以前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奠基人與最大的代表者。起初參加『土地與意志』黨，在一八七九年該黨分裂以後，成爲『黑分社』首領。一八八三年，流亡國外，脫離民粹主義，與阿克雪洛德、查蘇里奇等，成立了俄國頭一個社會民主組織『勞動解放社』。在九十年代，跟民粹主義、伯恩斯坦主義及其在俄國土壤上的反映——經濟主義，作了積極的鬥爭。在九十年代，成了火星報與曙光報編輯之一，曾受兩報底委託，起草黨綱草案，這個草案受到列寧方面的嚴厲批評，在普列哈諾夫修正以後，才作爲火星報黨綱草案原則和理論部分底基礎（其土地部分主要爲列寧所寫的），這個草案，經過小小的改變，被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第二次大會所通過。在一九〇三年該黨分裂以後，頭一個時期，依附於布爾塞維克，後來又依附於孟塞維克，但是經過若干時期，在組織上脫離他們，但在思想上始終是接近於孟塞維克。自取消主義發生後，在反對它的鬥爭中，不久又與布爾塞維克接近。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做了極右的國防派（『號召』）底首領；在二月革命以後，仍繼續這條路線（『統一』），同時堅決主張擁護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諸日以後，採取了完全反革命的立場，堅持『威的政權』之思想。仇視十月革命。列寧曾對普列哈諾夫的理

論和哲學著作評價很高，但同時指出了他的一系列的重大錯誤（例如承認象形論，對辯證法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論之不正確了解等）。（見二七、二八、九六、一六〇頁）

（一四）列寧所指的，是普列哈諾夫所著的白色恐怖一文，該論文登載於一九〇三年第四十八期火星報上。普列哈諾夫在這篇論文中關於法國大革命底恐怖寫道：比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厲害的恐怖，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把真正的金剛力士抬出歷史舞台，它好像「天上的雷雨風暴一樣光臨法國。它無情地破壞了「舊制度」底一切殘餘。然而這種恐怖是什麼呢？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它的巨大力量是由什麼地方得來的呢？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究竟是什麼呢？據馬魯額正確的意見，恐怖開始於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打破巴士底獄的時候。它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運動底力量，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上主要特點，就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維持和加強羣衆底革命自動精神。這種恐怖，並不是由於對羣衆運動底力是發生「失望」心理所引起的，而是相反的，是由毫不動搖的，相信這種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

「……恐怖底代表，乃是法國人民反對歐洲反革命聯合力量而進行的英勇決鬥中的領導者。這種恐怖的歷史，對於俄國的革命者，是異常值得學習的。然而它之所以值得學習，正因為它不斷向我們說：必須準備我們俄國的民衆去打破我們全俄各處的巴士底獄。」（見普列哈諾夫文集第十二卷第四四九至四五〇頁）

(一五) 伯恩斯坦(生於1850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爲該黨非法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九十年代中期，在該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常發表論文，企圖修改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而代以調和階級矛盾的理論，否認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導人，雖有指斥，但是這種批評很不夠，德國仍請他留在黨底隊伍內，宣傳他的觀點。在伯恩斯坦底觀點出現以後，列寧當即予以澈底的抨擊(可參看全集第二卷四七三—四八六頁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一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爲社會和平主義者。現爲第二國際底首領之一。其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完全獲得了勝利，這從一九二五年所通過的新黨綱內即可看出來。(見二八頁)

(一六) 列寧所指的是普列哈諾夫著的、登在一九〇一年第二—三期早霞雜誌上的Cont反對康德或者是伯恩斯坦先生底精神遺囑(Cont的發音與康德同，字義是口是心非——譯者註)這篇論文上的下列一段話：「伯恩斯坦先生意見中，現在只剩下社會主義底很少的痕跡。實際上他接近於主張「社會改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比接近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多得多。然而他依然做一個「同志」，人們並沒有把它清洗出黨。」(見普列哈諾夫文集第十一卷第六十三頁)

(一七) 列根(1828--1920) 德國職工運動底活動者，最右的社會民主黨人之一，修正主義者，職業是金屬

盤旋工。一八九〇年，當選爲德國工會總委員會主席；從一九〇三年起，爲國際職工會聯合會秘書；從一九一三年起，爲該會主席。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爲逐端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利用自己的威信，使職工會服從軍閥的利益。一九一九年，爲國民大會底委員。（見二八頁）

（一八）『斯巴達克團』是祕密的組織，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以李卜克內西爲首的德國左派建立這個組織，目的在於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鼓動。該團雖曾開展真正革命的反戰鼓動，然而它却不能解脫中派底影響，它看不見與各種機會主義者有分裂之必要，它依然留在社會民主黨底範圍以內。一九一六年『獨立黨人』（加阿捷、列選布爾）與社會沙文主義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分裂以後，『斯巴達克團』曾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同時即保留自己的組織，依然爲一個特別的團體。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以及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派和獨立黨人組織了政府以後，『斯巴達克團』才與獨立黨人斷絕關係，到了那年十二月，該團宣佈取消，而組織德國共產黨。

（一九）列德堡（生於185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採取『中派』立場，曾出席齊美爾瓦德會議，堅決反對『齊美爾瓦德左派』。自『獨立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後，爲該黨首領之一。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義時期，與李卜克內西和肖德同爲柏林革命委員會委員，但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擁護所

籍【民主】。自共產黨人在加勒大會（一九二〇）勝利以後，與【獨立派】在一起；但是，自【獨立派】與第二國際底社會民主黨人聯合以後，則拒絕跟從他們，而保持自己的小團體之存在。（見二八、九九頁）

（二〇）**克里斯賓**（生於1875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社會民主黨分裂（一九一六年）以後，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著名的黨員和領導人。一九二〇年夏季，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進行關於【獨立派】加入第二國際的談判，但是回到德國以後，却拒絕聯合共產國際。一九二二年與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殘餘部分又回到德國社會民主黨裏。（見二八、九九、一六四頁）

（二一）**倍倍爾**（1840——1913） 旋盤工人出身。在V.李卜克內西影響之下，於一八六五年加入第一國際，而成為馬克思底擁護者。一八六九年和李卜克內西成立社會民主工黨，一八七五年該黨與拉薩爾派合併，而成為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以後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次當選為國會社會民主黨議員。一八七二年與李卜克內西同被判兩年徒刑，拘禁於堡壘。被當局放逐和拘禁數次之多。為黨的大會之經常參加者。在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上起有顯著的作用。在理論上，常自認為馬、恩學生。屬於黨的左翼，常常猛烈抨擊黨內和國際上的伯恩斯坦主義和機會主義。晚年採取【中派】立場。著有好多書、小冊子及講演，流行頗廣。（見二九頁）

（二二）**拉狄克**（K. Radek，生於1883年） 加里西亞

人。暗藏在布爾塞維克隊伍內的好細。從一九〇一年起，在加里西亞社會民主黨中工作；自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在波蘭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此後赴德國，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一九一七年十月，赴俄國，加入布爾塞維克黨。據一九三七年蘇聯叛國案審判的揭露的材料，一九一八年與暗藏好細分子布哈林在一起，號稱所謂「左派共產黨人」，藉口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就圖謀破壞蘇維埃政權，殺害列寧和斯大林；從一九二四年起，加入托季反對派，並為該派領導人之一，積極反對聯共領導。

一九二七年聯共第十五次大會將其開除；一九二九年承認錯誤，恢復黨籍。從一九三一年起，任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編輯委員，但暗中在托、布反革命聯盟領導之下，為了反對聯共領導和蘇維埃政權，與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勾結，出賣蘇聯國家秘密，積極進行暗害和破壞活動，並力謀帝國主義者侵略蘇聯，企圖在戰爭中使紅軍失敗，推翻蘇維埃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一九三七年蘇聯法庭判處徒刑八年。（見三三頁）

（二三）布哈林（1888——1937）據一九三七年蘇聯叛國案審判所揭露出來的材料，在十月革命最初幾天起，他就陰謀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一九一八年初，自稱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反對布列斯特和約，主張繼續戰爭，圖謀以此斷送年輕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一八年春，陰謀反對列寧，並勾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圖謀逮捕和殺害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

一九一八年夏季，主謀槍擊列寧，使列寧受傷；一九二一年，爲了從內部動搖和推翻列寧的領導，故意使黨內意見分歧趨於尖銳；在列寧臥病和逝世以後，積極企圖推翻聯共的領導；一九二八——二九年反對聯共全國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總路線；以後爲了反對聯共領導與蘇維埃政權，與反革命的托季聯盟攜手，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積極進行暗害、軍事破壞、爆炸工作；殺害基羅夫、明仁斯基、奎其舍夫、高爾基；還企圖殺害人民所愛戴的大批黨政領袖；並與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勾結，出賣蘇聯國家秘密，以間諜消息供給外國偵探機關；努力執行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底意志，力謀破壞聯共和蘇聯，毀壞國防，破壞建設，協助外國武裝干涉，準備使紅軍遭受失敗，分裂蘇聯；把蘇聯遠東沿海劃割給日本，把蘇維埃白俄羅斯割給波蘭，把蘇維埃烏克蘭割給德國，消滅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使資本主義制度復辟。因罪大惡極，蘇聯法庭於一九三七年判決槍斃。（見三三頁）

（二四）斯伯雷（生於1859年）有名的英國政治家，工黨黨員，下院議員。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做市長。爲社會主義每日快報（“Daily Herald”）創辦人和編輯之一。爲了考察俄國工人底革命勝利，曾兩次訪問蘇維埃俄羅斯（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六年）。在每日快報和工人週刊（“Lansbury's Labour Weekly”）上，對於俄國革命底事件，常作同情的解釋。（見八八頁）

（二五）倫諾德（生於1871年）法國社會黨首領之

一，新聞記者。在佐列斯被害以後，爲人道報編輯，把該報變爲社會愛國主義和反對國際主義底機關報。在一九二〇年該黨圖爾大會上，爲少數派，與其同道者退出大會，而與一部分【中派】（郎格）保持機會主義的法國社會黨，今日該黨已經滾到社會法西斯主義方面去了。爲共產主義和蘇聯底最顯明的敵人。（見三四頁）

（二六）工黨黨人乃是英國工黨底黨員，該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它在自己的隊伍中包括工聯底會員以及其做工人組織底會員，它的目的，主要是國會鬥爭和進行選舉運動。在第二國際中，工黨是極右派。

（二七）克倫斯基（生於1881年）俄國二月革命底小資產階級首領之一；律師。因在政治案件中充任辯護師而著名；從一九一二年起，爲國會議員，在這裏加入勞動派黨團。從帝國主義戰爭開始起，爲社會愛國派。在二月革命後，加入【社會革命黨】；曾任彼得格勒蘇維埃副主席，違反該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不許作臨時政府部長的決定，竟加入臨時政府爲司法部長。在爾亦考夫辭職後，任海陸軍部長，依照協約國的要求，調動俄軍於六月進攻德軍，但結果完全失敗。在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底七月運動被壓服以後，曾任迅速更換的幾次聯合內閣底總理。在柯爾尼諾夫事變以後，曾任總理和最高總司令。他以國家元首資格，實行妥協政策，而滾到反革命和波那帕特主義方面去，一九一七年十月間，他企圖依靠前綫，組織向彼得格勒的進軍，但結果被彼得格勒的工人赤衛隊所擊敗。十

月革命以後，逃至國外，進行積極的反蘇聯活動。（見三七、五〇、九八、一一八、一四六頁）

（二八）高爾察克（1873——1920年） 帝俄海軍將官；十月革命後爲西伯利亞反革命政府之一的頭子。帝國主義大戰時（從一九一六年起）爲裏海海軍總司令。二月革命以後，被追去職，逃至國外。十月革命以後，一九一八年，接受英人和俄國反革命者底提議，到哈爾濱，組織反革命的白衛軍。秋季到奧姆斯克，由【社會革命黨】內閣委爲反革命的海軍部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反革命的軍閥、大資產階級及英人支持之下，在奧姆斯克舉行政變，將【社會革命黨】的內閣閣員逮捕，宣佈自己爲【俄羅斯最高統治者】。是年十二月，在烏發，逮捕了【立憲會議委員會】的委員，並在英法政府援助之下，開始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其綱領是用軍事獨裁和肉體消滅工人階級的辦法，使君主政體復辟。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把俄國變爲帝國主義殖民地。但是英勇的紅軍和革命的游擊戰，終於消滅了他。他本人被俘虜。一九二〇年二月，根據伊爾庫茨基革命委員會的決定，把他及其末了一個總理樸別拉也夫槍斃了。（見三七、八〇頁）

（二九）鄧尼金（生於1872年） 帝俄軍官，在蘇聯十月革命後內戰時，爲反革命的白衛軍頭子之一。一九一七年，依靠富裕的哥薩克和英國的財政軍事援助，堅決幫助柯爾尼洛夫。十月革命以後，逃至頓河，參加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在一九一八年柯爾尼洛夫逝世以後，爲南俄

反革命的白衛軍總司令。在他的活動中，企圖依靠於俄國社會底「活的力量」。爲了這一目的，根據他的提議，在總司令之下，設立「特別會議」，其參加者，除極端的保皇黨之外，還有立憲民主黨人。但是「特別會議」從其成立之日起，就暴露了其內部的大磨擦和毫無生氣。他並企圖用「土地改革」的辦法，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但亦未成功。他被紅軍擊敗後，於一九二〇年三月間，將總司令名義，讓位於當時還盤據在克里米亞的反革命的弗爾格爾，此後他本人逃至英國。（見三七、五〇、五二、七八頁）

（三〇）萊因河佛郎克府地方出版的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團）之分裂（“Die Spaltung der K. P. D. C Spartakusbund” Frankfurt a. M.）這本小冊子，是「左派」共產黨人的團體所出版的，其中所論述的要點，後來就成爲德國共產黨政綱底基礎。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罷工被很厲害地被鎮壓下去，這就使得一部分德國共產黨人主張審查黨的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不久以後，還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德國共產黨底裂痕就已表現出來了。新派底人（什列迭爾、永格、威德列爾）認爲無產階級失敗底主要原因，第一就是工人階級分散在好些政黨之內；第二，就是過於重視公開的鬥爭方法，它們以爲實際上這種方法使羣衆底革命自動精神降低。「左派」共產黨人，反對黨底策略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主張組織全國工人聯合會（Allgemeine Arbeiterunion），來統一所有主張直接爭取無產階級

專政和蘇維埃制度的革命工人；『左派』共產黨人堅持『直接行動』，要求共產黨人拒絕參加反動工會中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在甘迭里別爾格的黨代表大會上，『左派』舉手反對德共中央底『甘迭里別爾格的提綱』，他們被剝奪了繼續參加黨代表大會工作的權利，並被開除出黨。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反對派底柏林代表大會上（該大會代表了幾千個反對派分子），『左派』組織了新黨，叫做德國共產工黨，開始與德國統一的共產黨進行持久的鬥爭，使革命無產階級底隊伍大形渙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致德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一期共產國際雜誌）上指出德國共產工黨底綱領式的宣言、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原則，『顯然離開共產主義』……『而走到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政策方面去』。德國共產工黨與羣衆的工人運動沒有聯系，它的綱領上和策略上的原則乃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觀點底混淆，所以不明確和不固定，因為這個緣故，就在共產工黨裏，有了產生新的、顯然表示『民族主義』的右傾反對派之餘地。在該黨內部，形成了而且發育了右的派別，即所謂『漢堡派』（“Hamdurger Richtung”）。

（三）本書俄文版第一版此句本爲『荷蘭論壇派』。與俄文版同時出版的有英、德、法文版，列寧在他專門寫給英文版的增補中，指出必須把他在俄文版上所用的『荷蘭論壇派』這一個名詞，改爲『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故這裏俄文版原文已經照列寧的這一指示而加以改正了。

【論壇派】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國際以後，就建立了荷蘭共產黨，後來由荷蘭共產黨中產生了【左派共產黨員】。不久之後，左派底領袖——洛朗德·郭里斯特與郭爾鐵爾離開了政治活動。

（三二）勞芬別爾格（生於1872年）漢堡社會民主黨人，以後加入共產黨。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德國共產黨海德堡大會上，與沃里夫赫木和呂勒領導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左派共產黨人】。在共產黨分裂以後，被開除黨籍。參加過成立【共產主義工黨】的領導工作。一九二〇年初，與沃里夫赫木組織所謂【漢堡派】，其目的是在把【一切民主分子】連資產階級在內，吸引到共產黨人方面來，以反對法國。他的所謂【民族布爾塞維主義】並沒有成功，以後他就脫離了工人運動。（見四五頁）

（三三）沃里夫赫木 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一九一九年十月與勞芬別爾格及奧托·魯爾，在共產黨海得堡大會上同代表【左】翼，被開除黨籍。在共產黨分裂後，參加組織【共產主義工黨】的事情。一九二〇年初，以所謂【民族布爾塞維主義】理論出現，號召一切【民族分子】連資產階級在內，【做布爾塞維克】，以與法國作鬥爭。（見四五頁）

（三四）霍爾聶爾（安頓·潘涅庫克底筆名）荷蘭左派社會主義者，氣象學教授，一九〇七年他和其同道者瓦英庫普、羅蘭戈斯特等被機會主義者開除黨籍，一九〇九年，建立了左派社會主義的報紙論壇報。自共產國際成

立後，加入共產國際。一九二〇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之前，在彼得格勒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世界革命底發展與共產國際底策略，發揮了『極左派』的政治主張。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責斥了『極左派』底立場；在大會以後，他在維也納又用自己的真名字出版了那個小冊子。在那小冊子補充中，他污蔑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為機會主義及拒絕加速革命以奪取非共產主義羣衆。現在他已經離開了工人運動。（見四五、五一、一〇二頁）

（三五）什列迭爾（生於185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二〇年，屬於『左派共產黨』，該派構成所謂『漢堡派』，其信徒號召『一切民族分子』，包括資產階級在內，在『民族布爾塞維主義』旗幟之下，與法國鬥爭。（見四五頁）

（三六）文迭爾 一九二〇年加入『左派共產黨』，為『共產工黨』創立人之一。『漢堡派』底思想上領導人之一，該派在工人中間沒有什麼影響，不久即消聲匿跡了。（見四五頁）

（三七）“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共產主義工人報）乃是德國共產工黨的機關報。該報自一九一九年起開始出版，至一九二七年停版。開始時是日刊，後來改為每星期出版兩次。該報擁護『直接行動』底方法，激烈反對利用公開的鬥爭，例如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會及加入工會。

（三八）馬林諾夫斯基（1876——1918）俄國四層

國會莫斯科省工人黨事通議員，同時爲警察廳底秘密職員。他利用自己講演才能，突出於其他議員中間。一九一三年夏季，根據華考夫斯基（他與警察廳亦有關係）底要求，不得不退出國會而出國。一九一八年，他回至彼得格勒，被最高法院判處槍決。（見五〇頁）

（三九）洛強科（1859—1924）葉卡切林洛斯基夫省的最大地主。帝俄第三和第四屆國會主席。二月革命以後，爲國會議員臨時委員會主席，克倫斯基時代大資產階級反動底積極組織者。十月革命以後，逃往國外。（見五〇頁）

（四〇）最後這一段話，由列寧建議，曾完全採入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提綱，該提綱是肯能和庫西寧起草的。

（四一）根據聯共（布）歷來大會底統計，由一九一七年四月會議起至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止，黨員人數底變更如下：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底全俄四月會議，計八萬人；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計十七萬七千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底第八次代表大會，計三十一萬四千人；一九二〇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計六十一萬一千人。

（四二）尤登尼赤（生於1862年）帝俄底軍官，十月革命以後，逃至芬蘭。一九一九年，爲反革命的「西北政府」（係英國人在愛沙尼亞所組織）的軍隊首領，兩次

企圖奪佔彼得堡（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和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圖謀進攻彼得堡時，被紅軍所擊敗，率其殘部隱藏至愛沙尼亞，以後又逃至英國。（見五二頁）

（四三）貢彼爾斯(S. Gompers) (1850—1924) 美國捲煙工人。任美國勞動聯合會主席達四十年之久，該聯合會擁護享有特權的工人貴族之狹隘職業的利益，宣傳「階級利益之協和一致」，並猛烈反對無產階級中間的革命趨勢。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依靠於美國工人階級底右傾分子，積極支持威爾遜總統底政策。一九一九年參加巴黎和平會議工作，任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二年充任華府會議美國代表團團員。主張對蘇實行孤立政策，積極反蘇。曾任「全國公民聯合會」——由「資本、勞動、及其他公民」代表組成的團體，以有名的億兆富翁莫根爲主席——副主席。他甚至認爲美國的職工運動都太左了。（見五九、六六頁）

（四四）如沃（生於1876年）法國勞動總聯合會書記，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爲顯明的社會愛國派。一九一六年爲國際職工聯絡局（此局是爲了代替柏林國際秘書處而設立的）主任。一九一九年爲國際聯盟國際立法委員會主席。如沃曾促成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國總罷工的失敗。他是改良派的亞姆斯特丹國際底首領之一。爲法國駐國聯代表。（見五九、六四、一七〇頁）

(四五) 漢德遜 (1863——1940年) (即漢德森) 英國職工運動和英國工黨底有力首領之一，就職業講為鋼鐵工人。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實行與自由黨政府妥協之政策。自基爾哈第辭去該黨主席職務 (一九〇八年) 以後，於兩年內曾佔據這個職位；後來於麥克唐納因其和平主義而放棄這個職位後，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再度担任此職。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初，與哈第一同簽署以第二國際英國分部名義告英國工人書，號召反對戰爭，但在英國參戰後，却採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進行徵募自願軍的運動。一九一五年為第一次聯合內閣教育大臣，一九一六年為魯易喬治戰時內閣不管部大臣。但一九一七年被迫辭職，因贊同在斯托哥爾姆召集國際社會主義大會的思想，遂引起了英國渴望「澈底勝利」的資產階級的憤怒。在麥克唐納爾第一次內閣時 (一九二四年) 為內務大臣，第二次內閣時 (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 為外交大臣。在麥克唐納爾投入保守黨陣營後，曾領導黨內偽善的「反對派」。一九三九年德國法西斯匪徒進攻波蘭，發動世界大戰前，為英國駐德大使，力謀與德國希特勒妥協。(見五九、六四、一〇九、一一二、一一九、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一三七、一二一八頁)

(四六) 麥爾肯 (1881——1925) 法國工團主義者，汽鍋工人工團底組織者，以後為魯貝勞動介紹所底領導者。一九〇五年，當選為金屬人聯合會秘書處委員，指導該聯合會達十八年之久。法國勞動總聯合會歷次大會底

參加者。一九一五年，與布德龍同為工團主義運動左翼底代表者，曾代表法人出席齊美爾瓦德會議，並與德國代表會共同簽署反戰宣言。回到法國以後，積極參加組織『恢復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工作。一九一六年，在工團主義組織與勞動介紹所代表會議上，跟如沃一同投票贊成歡迎威爾遜的決議案。一九一八年，轉至如沃方面，成了亞姆斯特丹職工國際底擁護者。蘇維埃俄羅斯底敵人。（見五九、一七〇頁）

（四七）丹尼爾·德·立昂（1852——1914）美國社會黨底領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底創立人與領導人之一，曾跟美國職工會領導者的機會主義和背叛行為作鬥爭，一九一二——一五年為國際社會主義局委員。在其文字工作中，發揮了『工業國家』組織的思想，在新社會的建設上給了無產階級職工組織以過分的意義，過高估計了工人政黨之作用和意義。（見六一頁）

（四八）列寧所指的是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在這封信裏，恩格斯寫道：『工人們在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變之後，由於暫時的經濟繁榮，由於他們期待「帝國底榮譽」，似乎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請看馬恩書札一書。該書是由阿多拉特斯基翻譯、核訂和註釋的。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七〇頁）

（四九）人民政治日刊 是瑞典共產黨底日報。一九一六年為赫格龍特所創辦。一九二〇年該報主張必須進行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實行了努力的鼓動，以反對參加瑞典政府的正式社會主義者（以勃朗亭爲首）所實行的讓步政策。

（五〇）世界產業工人會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 W. W.) 是美國工人底革命組織。一九〇四年，當西部礦工聯合會底鬥爭正激烈的時候，產生了這個組織以便與妥協的美國勞動聯合對立起來。這個組織到了一九〇五年才在組織上完全形成，它具有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性質。世界產業工人會底主要活動，就是多半在無產階級最落後和無組織的階層中組織罷工。在罷工的時候，這個組織用革命鬥爭底方法來行動，與警察衝突的時候，就組織工人來自衛。一九一二與一九一三年間，世界產業工人會底會員實行了幾十次大罷工而得到大勝利。在大戰的時候，世界產業工人會並沒有中止羣衆的罷工鬥爭，因此它的會員備受政府壓迫。十月革命以後，在美國成立共產黨以後，世界產業工人會敵視美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只是在共產國際執委向世界產業工人會發表宣言以後，這個組織對共產黨所採取的態度才改變了性質，而且在一九二〇年甚至進行了談判，討論世界產業工人會執行委員會底代表與統一共產黨底代表是否可以召集共同會議的問題。

（五一）蘇巴托夫（1864——1917）「蘇巴托夫主義」或「警察社會主義」底鼓吹者和組織者。從一八九九年起爲莫斯科暗探局副局長，以後爲正局長；曾在俄國

好幾城市（維爾諾、明斯克等）發展廣泛的奸細活動。一九〇二年組織工會（『莫斯科機器工廠工人互助會』，『彼得堡工廠工人互助會』），其目的是在使工人離開革命活動。一九〇三年辭職，以後由官廳放逐至烏拉第米爾。一九一五年在特列樸夫又加入警廳。一九一七年二月被槍斃。（見六五頁）

（五二）此地所指的是荷蘭『左派』共產黨人關於國會議主義的提綱，該提綱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第一期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上（“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 1, February 1920）。

（五三）盧森堡（1871——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和德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德國、波蘭、和俄國工人運動底參加者。著有許多關於經濟等問題的理論著作。生於波蘭，一八八九年流亡蘇立支，一八九三年，參加『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底成立工作。從一八九七年起，差不多曾未中斷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隊伍內工作，自光輝地進行反對伯恩斯坦主義和米萊蘭主義以後，在該黨內和第二國際內佔有顯著地位。一九〇四年，在組織問題上，堅持孟塞維克底觀點；後來才脫離了孟塞維克。一九〇七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大會上與布爾塞維克在一起，出而反對孟塞維克。是年秋季，在司徒加大會上，與列寧在一起，對於戰爭決議案提出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前不久，出而反對考茨基

和「中派」的其他代表者，領導黨內左傾急進反對派，但卻沒有提出與他們斷絕關係的問題。在布爾塞維克與取消派的鬥爭中，採取調和派立場，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支持孟塞維克。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起，採取國際主義立場，但是在組織上沒有決心與社會民主黨脫離。差不多在全部大戰期間（從一九一五年二月起），處在獄中，在非法的斯巴達克通信上合作，提出「領導原則」——國際主義者底政治主張，這個政治主張，於一九一六年六月間，在「國際社」全德會議上通過。是年春季，在獄中，用尤尼烏斯的筆名，寫了一本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小冊子，其中指出了有成立第三國際的必要。在獄中所寫的俄國革命小冊子（一九一八年九月）中，在對於十月革命的估計上，犯了許多錯誤的論點，這些錯誤論點的大部分，以後都改正了。在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後，脫離社會民主黨，創辦和編輯紅旗（“Rote Fahne”）雜誌。參加過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領導工作。在德國一九一九年一月起義被壓服以後，為謝德曼政府所逮捕和戕殺。盧森堡對於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有巨大的革命功績，但同時在其理論與策略觀點上（「盧森堡主義」）犯了一系列的半孟塞維克性的大錯誤（例如關於政黨作用，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關於農民問題，關於不斷革命問題，等等。（見七〇頁）

（五四）李卜克內西（1871——1919） 德國革命的工人運動底領袖和德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共產主義青年

運動底奠基人。威兼·李卜克內西底兒子。從其政治活動底最初起，即依附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熱烈主張組織青年工人以進行反軍閥的宣傳。一九〇七年司徒嘉青年國際底奠基人。是年，曾出版軍閥主義與反軍閥主義一書，因此，入獄一年半。在世界大戰宣佈以後，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在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內發言，反對投票贊成軍事公債，但八月四日在黨的紀律壓力之下，與其他一切人一同投票贊成該軍事公債。在下一大表決中（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他是投票反對軍事公債底唯一議員。一九一五年着手組織「斯巴達克團」，並以小叢書方式，出版非法的刊物，取名為斯巴達克叢書。在被動員以後，未能出席齊美爾瓦德會議，但致函該會議，號召作堅決的階級鬥爭。一九一六年五月一號，在柏林散發反戰傳單，這次行動，曾轉變為革命工人的遊行示威，從此被捕，被判決做苦工四年半，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才釋放了他。在俄國布爾塞維克勝利以後，他雖處在獄中，但他是德國首先站在俄國革命方面的人們之一，他號召德國工人仿效俄國榜樣組織蘇維埃，而且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確實組織了蘇維埃。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義期間，任革命委員會委員，領導運動；在革命委員會取消以後，被謝德曼政府所逮捕，與盧森堡同被反革命的德國軍人所殘害。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李卜克內西的名字，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象徵和共產國際的旗幟，他是共產國際底思想上的創立人之一。（見七〇、八二頁）

(五五) 迪茨根 (1828——1888) 職業是皮匠，沒有任過學校，自學成爲工人哲學家，恩格斯底朋友。有一個時期曾旅居彼得堡。後來又到美國，在該地社會主義運動上起了巨大作用。在哲學上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而獨立地另外創造了一套觀點，該觀點與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則相近。其哲學著作有：人類頭腦工作之本質、哲學的勝利、社會主義者認識論漫談。(見七九頁)

(五五) 列寧此地所指的是迪茨根所著的哲學底成績和關於邏輯的信 (“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and Briefe übu Logik”) 書中下列一段話：『同時只須慎重其事，不要誇大區別，不要使這種區別過度，以便不至於荒謬。』

(五六) 赫龍德 (生於1884年) 瑞典左派社會黨底首領。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爲革命的國際主義者，齊美爾瓦德會議底參加者，在該會議上加入『齊美爾瓦德左派』。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工人反戰大會上出席講演，此次被控叛國，判處三年苦役。從一九二二年起爲共產黨人，兼共產主義的“Stormklockan”報編輯；一九二四年，因機會主義 (尤其他堅持共產黨人可以信仰宗教) 被開除出共產國際，現爲第二國際底黨員，修正主義者布蘭丁文集底出版人。(見八二頁)

(五七) 波爾蒂加 (生於1889年) 有名的意國共產黨人，工程師。一九一〇年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一四年曾出席在安科納所舉行的社會黨大會，堅持社會黨左翼底立場。同年組織鐵路罷工，以抗議當局對羅曼納和馬

那哈兩地起義之殘酷鎮壓，因此被解職。帝國主義大戰時反對社會愛國主義者。一九一七年成立「不參加派」小組，以後該小組與格爾斯派同為意國共產黨底核心（一九二一年）。一九一七年為他所辦的意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週刊先鋒和蘇維埃日報編輯。意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為超左觀點底熱烈擁護者，堅決反對共產黨人參加資產階級國會。一九二一年一月在意國社會黨大會上要求與改良派決裂。大會結局是社會黨分裂，另成立意國共產黨。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執委第三次擴大會議責斥其「抵制觀點」，以後他與共產國際之間，關於統一戰線策略、工人政府等問題又暴露了新的分歧。他企圖在意國共產黨內另成立小組，但是這一企圖為共產國際執委和意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所堅決指責。一九二七年法西斯政府將他逮捕，放逐至烏斯吉克島。（見八四、一六八頁）

（五八）“11 Soviet”即蘇維埃日報 一九一八年左派社會主義者——擁護第三國際的人，在亞阿坡里地方創辦該報。主筆是波爾蒂加。列寧所指的是下列三篇論文：
（一）意大利社會黨中共產主義的懷疑派（“Frazione Comunista Astensionista del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見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第三期蘇維埃日報）；（二）列寧與懷疑派（“Lenin e l'astensionismo”，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三）錯誤（“11 Fallo”，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

(五九) 塞拉第 (1872—1926) 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底有名代表者。意大利社會黨左翼——馬克思主義派底組織者和領袖；從一九一五年起，爲該黨中央機關報“Avanti”編輯。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採取國際主義的立場，積極參加成立齊美爾瓦德聯合會的工作。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爲意大利代表團領袖，並加入大會主席團，但半年以後，在意大利社會黨大會上，拒絕服從『莫斯科』條件（要求與改良派——杜拉第、毛底連尼、特別佛斯等毫無保留的決裂）之一。全黨中派都是附和塞拉第的。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將意大利社會黨從國際陣除出去。格蘭西、鏡拉利、波爾蒂加等遂成立意大利共產黨，塞拉第與他的同黨繼續與改良派在一起，但是，在下層工人和法西斯蒂反革命運動壓力之下，他逐漸向左激進，於一九二四年加入意大利共產黨。（見八四頁）

(六〇) “Comunismo”（共產主義雜誌）每兩星期出版一次，由塞拉第主編。一九一九年辦。列寧此地所指的，是下列兩篇論文：（1）社會黨在波洛尼亞所召集的大會（“I Congresso Socialista di Bologna”，見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至三十日的第二期共產主義雜誌）；（2）杜拉第與最高限度派（“Filippo Turati e il Massimalismo”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期共產主義雜誌）。

(六一) 人民國家 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舊時中央機關報，在萊布齊地方出版，由威廉·李卜克內西主編。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六年間，恩格斯在人民報上做了許多論

文，後來把這些論文搜集起來，出了一本小冊子。一九〇六年求知社把這本小冊子譯成俄文出版，名為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的文集（斯米爾諾夫翻譯，薩文校訂）。一九一九年由北方書局出版。列寧所引論的是最近出版的本子。

（六二）瓦揚（1840——1915）（書中譯為瓦爾揚）法國社會主義者。青年時代即參加革命運動，而為勃朗基底熱心的擁護者之一。曾任「巴黎公社」國民教育委員與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二國際時代，代表法國，參加第二國際國際社會主義局。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數日後，即叛變革命，而跑到保護祖國方面去了。（見八八頁）

（六三）黑德（Guesde）（1845——1922）有名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一八八一年與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一同起草了法國社會黨綱領。積極跟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以及機會主義者、實行派、伯恩斯坦派的流派作鬥爭。尤其猛烈反對佐列斯的與資產階級聯盟和妥協的政策。為反對社會黨黨員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米萊蘭主義）而進行的廣泛的革命運動，其功績亦屬於黑德。在法國聯合社會黨（在一九〇四年亞姆斯特丹國際大會後，黑德派與佐列斯派聯合而組成的）內，黑德派為左翼，但逐漸演進而為「中派」方向。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之初，顯明地背叛自己的革命歷史，屈服於「愛國主義」的情緒，成立了與資產階級的「神聖聯盟」，並加入

資產階級的民族國防政府。（見八八、一五〇頁）

（六四）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維什爾威茨加亞的信中寫道：「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革命進程底解釋，這種進程引起了一整串的密切聯系的、彼此追隨的現象。」（看馬恩書札一書。這本書由阿多拉特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三五七頁）

（六五）車爾內舍夫斯基（1828——1882）「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精巧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底破產」（馬克思），數代俄國革命者底導師。經濟學家，以翻譯米勒經濟學原理聞名，用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精神，對該書加以自己的註釋；並著有好多關於社會主義思想通俗化和批評一八六一年農民改革的著作。同時，他又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在現代人雜誌（他是該雜誌領導人之一）上，寫了許多光輝的論文（譬如戈果里時代論，論列辛以及關於普希金的文章）。他認為俄國公社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底可能的萌芽。為俄國六十年代革命運動底領袖和七十八十年代革命運動鼓勵者之一。一八六二年被捕，一直處在獄中和充軍中，幾乎到一八八九年死為止，失掉了直接參加社會活動和著作活動的可能。對俄國社會思想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見九五頁）

（六六）列寧顯然是只憑自己的記憶來引述這一段文字的。車爾內舍夫斯基對於克里所著的致北美合眾國總統的關於政治經濟問題的信一書之俄文譯本，做了一篇評

論，他在評論上說：『歷史的道路，並不是涅瓦大街，這是一條大路，有時經過塵土飛揚的田野，有時經過泥濘卑鄙的田野，有時經過空地，有時經過叢密的森林。誰要害怕塵土的田野飛揚，害怕弄髒鞋子，誰就不要從事社會的活動。』（請看車爾內舍夫斯基全集，一九一八年版，第八卷，第三七至三八頁）

（六七）阿克雪洛德（1850—1928）第二國際底思想家和領導者之一，俄國孟塞維克底頭子。於七十年代參加民粹派運動，依附於『暴徒巴庫寧派』。一八八三年與普列哈諾夫等在國外成立『勞動解放社』。一九〇〇年參加火星報編輯部。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為少數派頭子之一，從此時起便成了布爾塞維主義底極不可調和的敵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為取消派頭子，堅持社會民主黨底活動須合法化，並須廢除秘密的黨的組織。仇視十月革命。在反布爾塞維主義的鬥爭中，隨黨到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基礎和自由主義政策的地步。為第二國際國際社會主義局委員，贊成第二國際首領們對蘇維埃俄羅斯的仇視態度，主張有武裝干涉蘇聯之必要。（見九六頁）

（六八）查蘇里奇（女）（1851—1919）起初是民粹派，以後成為社會民主黨人；六十年代末開始革命活動；一八六九年被捕，坐獄兩年，一八七五年被充軍。一八七八年因彼得堡總督格列波夫侮辱政治犯鮑戈雷波夫（受審刑）而憤慨，用手槍擊中格列波夫，格列波夫受重

傷。被落審裁判所釋放。一八八〇年流亡國外，與普列哈諾夫等一同成立『勞動解放社』，參加該社的文字活動，首次把馬克思的幾部主要著作譯成俄文。後來非法地回到俄國，從一九〇〇年起，與列寧等一同經營火星報。在一九〇三年分裂以後，依附於孟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與取消派沆瀣在一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為社會沙文主義者。反對十月革命。（見九六頁）

（六九）馬爾托夫（1873—1923）。孟塞維主義底有名首領和政論家之一。於一八九五年開始革命活動，參加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會』，火星報與曙光報編輯員。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為少數派首領，從那時起，便成了孟塞維主義底有名的思想家和政論家。一九〇六年被捕並驅逐至國外。俄國第二次國會選舉時，為孟塞維克小組總領導者，堅持與立憲民主黨聯盟。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為取消派首領之一，編輯該派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的呼聲。一九一三年末回至俄國，以工人日報編輯的資格，領導社會民主黨右翼反對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在帝國主義大戰諸年間，旅居國外，採取『中派』立場，以革命辭句掩護其社會沙文主義。曾出席齊美爾瓦德會議（中派）和京塔爾會議。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經過德國回至俄國，成了官方孟塞維主義底反對派，支持新生活派，但是沒有脫離孟塞維主義。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堅持必須由一切社會主義政黨去代表組織政府，在孟塞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以後，仍

留下參加大會，但是不久，對於蘇維埃政權就採取了不可調和的仇視的態度。一九二〇年僑居柏林，在該地創辦和編輯孟塞維克的中央機關報社會主義月刊，進行反蘇聯活動。（見九六、九七、九八頁）

（七〇）波特列索夫（巴斯達洛威爾）（生於一八六九年）孟塞維主義首領之一。一九〇〇年充軍期滿後，流亡國外，與列寧一同參加火星報與曙光報的組織。在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依附於孟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和在反動時期，曾領導孟塞維主義中的右派。為取消主義底理論家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諸年間，為社會愛國主義底最公開的辯護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在進行瘋狂的反布爾塞維克運動的資產階級的今日報上，起有領導的作用。十月革命以後，在國家檔案總處工作。自一九二六年起，逃至國外，為孟塞維主義底極右翼。積極反對蘇聯，為克倫斯基今日週刊底密切合作者和民主社會主義叢書的編輯。（見九六頁）

（七一）司徒魯威（生於一八七〇年）九十年代社會民主黨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底起草人；「合法馬克思主義」最有名的代表者。在一九〇〇年末到一九〇一年初，曾以「民主反對派」代表的資格，與火星報派合作，但不久就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最後脫離，而投入自由派陣營，成為立憲派「解放社」底首領。為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淪到最反動的黑色百人團的國家主義方面。在十月革命後，蘇聯內戰期間，參

加反革命的鄂尼金政府；以後又做了白匪烏爾格爾政府底部長；再後，編輯白黨在布拉加出版的俄國思想雜誌，把右派立憲民主黨人和保皇黨都聯合在一起。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編輯白黨在巴黎出版的正統保皇黨的復活日報。（見九六頁）

（七二）此地所講的，是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二年火星報編輯部在苗漢地方與司徒魯威所代表的『民主反對派』底談判。談判內容，就是磋商司徒魯威及其團體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合作的條件。談判結果，根據司徒魯威所提出並為火星派大多數違反列寧的意見所通過的條件而擬好協定，但在實際上，這種協定，却沒有實行。（詳細情形，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六十八至六十九頁，以及第五六七頁上的第三六註解）

（七三）車爾洛夫（生於1873年）社會革命黨底思想家和頭子，一直是該黨的中央委員和其中央機關報革命的俄羅斯底編輯，一再出而『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企圖證明馬克思主義不能應用於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採取動搖的立場，搖擺於國際主義與國防主義之間；曾出席齊美爾瓦德會議（在表決該會議宣言時棄權）。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為顯明的社會國防派，任臨時政府第一次聯合內閣農業部長，七月事變以後辭職。立憲會議主席。十月革命以後，為蘇維埃政權底最兇惡的敵人。一九一八年積極參加捷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伏爾加的叛亂，並領導立憲會議代表在烏發的大會。一九二一年出

席在巴黎舉行的白黨前立憲會議代表會議，該會議成立一委員會，其委員均為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克隆斯措特叛亂時，曾特至勒佛爾贊助。近年來為所謂『構成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之變種）黨代表者之一。（見九七頁）

（七四）那唐松（波布羅夫）（1850—1919） 俄國『土地與意志』黨創立人之一，一八七二年充軍至西伯利亞。一八七八年，因加入『友人會』又充軍至西伯利亞，直至一八八七年為止。一八九三年，與別的民粹派一同組織了『民權社會革命黨』，以代議制度代替專制政體為目的，但不久，在一系列的逮捕以後，該黨即行瓦解。自九十年代『社會革命黨』成立起，即加入該黨中央委員會，幾乎從無更替。在反動諸年，曾反對該黨內誠悔和沒落的情緒。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起，採取和平主義立場，與車爾洛夫一同參加齊美爾瓦德和京塔會議，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反對社會革命黨中央底妥協政策；與車爾洛夫分手，成為當時跟着布爾塞維克黨走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首領，一九一八年，堅持十月革命底勝利，責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並且完全與『革命的共產黨人』（他們於一九二〇年加入了俄共）採取一致立場。（見九七頁）

（七五）革命的共產主義者，乃是米爾巴黑（米爾巴黑是德國的外交家，一九一八年締結布列斯特條約以後，曾被任為駐蘇俄大使；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企圖破壞與

德國所締結的和約，在莫斯科作亂，殺死了米爾巴黑——譯者註）被殺以及『社會革命黨』左派暴動（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後，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分子。一九一八年七月末，在薩拉托夫地方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組織和團體，舉行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決定召集代表大會並組織新的民粹黨。根據會議底決定，在莫斯科出版勞動意志報，這個報紙開始時是由亞歷山大洛夫、巴捷里、比層科、多布洛霍托夫、科列加葉夫、烏斯亭諾夫主編的（後來這個報紙改為雜誌）。

九月二十五日在勞動意志派代表大會上奠定左派民粹黨底基礎，該黨自稱為革命共產主義黨。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上特別指出該黨底策略立場如下：『新政黨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政綱說來，依然是民粹黨，同時它採取切實的和誠意的與布爾塞維克合作的策略，採取真正蘇維埃政黨底立場。』『……它放棄秘密的活動，也不去破壞共產黨員底內外政策，它承認共產黨員是革命主要的領導力量。』『黨承認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的階級勝利必要的條件，承認蘇維埃政權創造客觀的先決條件去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黨認為只有蘇維埃政權是第三國際理想和社會主義底唯一的和真正代表，所以它在國際政策問題上，認為只有不削弱和不破壞蘇維埃政權而是鞏固這種政權的種種辦法，才是適當的。』

當時那唐松在他致勞動意志報編輯部的信中，也完全同意於代表大會底決議（見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勞動意志

報第十四期上)。

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該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該黨的政綱。這個政綱雖然企圖放棄「社會革命黨」的傳統見解（例如這個政綱提出必須實行農業集體化），然而它依然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它是民粹派折衷主義底表現。但同時這個政綱特別明顯指出這個政黨底策略基礎是擁護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政黨底策略基礎。

一九二〇年四月，該黨由於對蘇維埃政權底設施——對組織勞動軍以及勞動軍事化——究應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而召集該黨底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該黨底右傾分子佔多數，他們企圖使黨走上積匪反對布爾塞維克的道路。然而該黨在中央委員會底逼迫之下（中央委員會甚至不惜把大會解散了），依然能夠保持原有的策略立場。自從那個時候起，革命共產主義者開始準備轉入俄國共產黨（布）。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該大會上許可革命共產主義者派兩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通過關於一個國家內只能有一個共產黨的決議之後，革命共產黨就在一九二〇年八九月間的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加入俄國共產黨（布）的決議。

（七六）這在大不列顛共產黨未成立好久以前，就產生了「左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儼然成爲一派。這個運動底基本特點，就是劇烈反對國會活動和反對英國工黨。左派中最大的組織——社會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在這個問題上曾採取最不調和的態度。這個政黨的基本特

心，就是一九〇三年脫離社會民主黨聯盟（該聯盟在甘特曼底領導之下，降到右的社會愛國主義組織的水平）的左右的分子以及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加入社會工黨的革命工人（因為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社會工黨底革命的、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和宣傳曾在英國工人羣衆中起了極大的影響）。社會工黨參加了關於統一問題的談判，要把凡是贊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立場的左派組織合併起來成爲統一的共產黨，然而它却提出以不加入工黨作爲統一的不易條件，但是沒有得到不列顛社會黨方面的贊助，因此拒絕繼續談判，同時該黨的耍人坡烏里、馬克曼勞斯和別里在這個問題上表示讓步，並繼續參加統一會議，因此被開除出黨。附和左派的第二個組織——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乃是威爾斯地方積極的煤礦工人比較不大的一個團體，它帶了工國主義的性質。這個團體極端不主張革命的政黨參加國會，這就使得它與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接近起來，而這個聯合會裏面，多半是婦女，她們在西爾維亞·潘克斯特底領導之下，採取了極左的反國會的立場，這種立場在實質上只是該聯合會一般不主張政治活動的局部表現。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後來改名爲共產黨）宣佈自己加入共產國際之後，依然堅持自己政綱上和策略上的觀點，在共產國際裏保持『左的』反對派底地位。在蘇格蘭工人中間，影響比較大的，是工廠工人委員會（Shop Stewards Committee），這些委員會是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組織起來的，它們維

織起來的目的，就是要反對那些宣傳階級和平並放棄罷工鬥爭的妥協派的工聯。工廠工人委員會不僅領導了這一時期的罷工鬥爭，而且也進行了公開的反戰宣傳。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尤其是在武裝干涉和封鎖的時期，工廠工人委員會曾努力進行了鼓動工作，來擁護蘇俄，要求英國政府承認蘇維埃政權並與它恢復商業關係。在對內問題上，工廠工人委員會堅持必須進行羣衆的革命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以便建立依靠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廠工人委員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它們同時進行了激烈鬥爭，以反對工黨在國會內和國會外的活動。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工廠工人委員會底代表會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工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八月六日最後一次會議上，列寧在自己的關於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講演中，曾批評工廠工人委員會反對加入工黨的態度。大不列顛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至三日），把參加國會選舉和加入工黨這兩項列入自己的政綱，而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左的團體，却依然沒有加入共產黨。它們依然獨立存在，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里德斯地方舉行共產主義組織和團體底代表大會的時候為止。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大不列顛共產黨，共產黨（以前的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蘇格蘭共產工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格拉茲郭地方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以及其他幾個共產主義團體合併起來，成爲大不

列類統一的共產黨，它們完全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社會工黨這一次也不同意合併，在該黨的上層分子中間，對於加入工黨的問題，保持激烈反對的態度。該黨地方組織中有很多黨員曾主張與共產黨員合併。

(七七) “Workes Dreadnought” (工人無畏艦)，乃是一九一四年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 (W. S. F.) 在倫敦所創辦的機關雜誌。主筆是西爾維亞·潘克斯特。該雜誌進行了反國會的鼓動，並聲言反對英國無產階級底革命組織加入英國工黨。

(七八) 潘克斯特(女) (1882—1928) 英國社會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為英國婦女參政運動底領導者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曾進行公開的反軍閥主義的宣傳，因此，遭受資產階級政府方面底緝捕。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參加極左的社會主義工人聯合的組織（其會員主要為婦女）。這個組織對國會活動抱否定態度，反對加入工黨。該聯合會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工人無畏艦週刊，以潘克斯特為編輯。一九二〇年，曾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以後因拒絕工人無畏艦服從黨的領導，開除黨籍。（見一〇七、一一三、一一六、一一八、一二六頁）

(七九) 加拉契 蘇格蘭工人，一九〇四——一九一二年為礦工工會執委委員；一九〇六年出席在柏林所召集的國際礦工大會；『左派共產主義者』；一九二〇年主張反對國會主義和共產黨人加入英國工黨。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堅持其與共產國際基本路線顯然分歧的觀點。

其立場（代表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底觀點）爲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責斥。爲英國共產主義運動積極參加人之一，英共中央委員。（見一〇七、一一三、一二六頁）

（八〇）加拉契所著的論文底完全標題，是“A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W. Gallacher in the name of the Scottish Workers Committee of Glasgow”（“Worker Dreadnought” No. 48, 21 February 1920）（加拉契用洛拉茲郭地方的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底名義致主筆的一封信）（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工人無畏雜誌第四十八期上）。

（八一）克略英（生於1869年）英國工黨首領之一，國會議員，非熟練工人聯合會主席。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爲國會工黨黨團主席。一九二四年，加入英國工人政府，爲不管部大臣。（一〇九、一一二頁）

（八二）麥克唐納（1866——1939）英國工黨首領；第二國際首領之一；所謂「構成的社會主義」底理論家。工黨和工人代議制委員會創立人之一和工黨書記（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二）；從一九〇六年起，爲國會議員；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爲國會工黨黨團首領。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採取和平主義立場。一九二二年再度爲國會工黨黨團首領，並爲官方反對派首領。從一九二四年起，經過若干時期的左傾（當時他加入第二半國際）以後，他又回到第二國際的懷抱裏，最後，依附於工黨的右翼（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及其期間，卽爲該翼首領）●一九二四年，

爲第一次『工人政府』首相兼外相，實行溫和自由主義的政策。從一九二九年六月起，又任第二次『工人政府』首相，這個政府，在本質上，乃是繼續保守黨的反工人的和帝國主義的政策。在一九三一年秋季，該政府倒台以後，轉入保守黨陣營，領導聯合的『國民』內閣（工黨、保守黨、自由黨），其任務是挽救英國資本主義。（見一〇九、一一二頁）

（八三）斯諾登（生於1864年）英國社會主義者；獨立工黨出席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的代表（爲該黨右翼）；下院議員；一九二四年，加入麥克納爾內閣，任財相；一九二七年末，退出獨立工黨。（見一〇九、一一二、一一九、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一六二頁）

（八四）魯易·喬治（生於1863年）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屢任首相職務。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竭力實行民主改良。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估計爲『擁護正義』的『民主戰爭』，在這個時候，他與保守黨聯盟，實行帝國主義者專政，廢止工人階級底獲得和英國憲法底基本原則，實行義務兵役制，以武力鎮壓愛爾蘭獨立運動。在三年之內，他用英國公款幫助俄國的白衛軍匪徒，反對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在白衛軍最後失敗以後，他主張與蘇維埃俄國恢復商務關係。（見一一三、一一四、一一九、一二一、一二三、一二四、一三七頁）

（八五）曼徹斯特導報 是英國最有勢力的地方報紙

之一，在曼徹斯特地方出版，反映自由黨左派底利益。一八二一年創刊。現時主筆是斯科特。

列寧在此地所講到的魯易·喬治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在下議院自由黨黨團會議上所作的，並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二九六五期曼徹斯特導報上所發表的演說，標題爲：“Mr. Lloyd George's Speech to the Liberal M.P.S.”（魯易·喬治對國會自由黨黨團所作的演說）。

（八六）埃斯萊斯（1852—1928）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一九〇八年爲首相；一九一五年爲聯合內閣（有社會主義者漢德遜等參加）首領；一九一六年讓位於魯易·喬治。當魯易·喬治與保守黨聯合時，另成立「獨立自由黨」左翼，脫離自由黨，出而反對魯易·喬治底政策。在魯易·喬治內閣倒台後，兩個自由黨合併，但各派間之鬥爭仍繼續進行。在一九二四年國會選舉中，又遭受失敗。一九二五年得貴族稱銜，爲上院議員。鮮明的反蘇分子之一。（見一一三、一二二頁）

（八七）華萊斯（生於1868年）英國自由黨黨員。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爲國會議員。（見一一五頁）

（八八）應克平（生於1884年）英國工人運動底著名活動者之一；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一九年，爲不列顛社會黨機關報導報召集編輯。一九二〇年英國共產黨成立後，爲該黨總書記。一九二二年因爲在英國傳播共產主義刊物而入獄。（一一六頁）

（八九）邱吉爾（生於1874年）英國政治家；自由

黨黨員；從一九〇〇到一九〇六年，爲國會保守黨議員；從一九〇六到一九二〇年爲國會自由黨議員；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爲內政大臣，曾用軍隊鎮壓罷工的利物浦工人。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爲陸軍大臣；一九二一年任殖民地大臣；一九二四年，在國會選舉中，反對自由黨官方政策；在十月革命以後，反對蘇維埃埃羅斯，並竭力主張武裝干涉蘇維埃政權。在今日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主張與蘇聯攜手，共同反對德國法西斯匪徒。（見一一九、一二二、一二六頁）

（九〇）柯爾尼洛夫（1870——1918）帝俄軍官，蘇聯內戰時期反革命頭子之一。曾參加俄日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五年，指揮在加里西亞的部隊，退却時，被奧軍俘虜，以後偷跑。一九一七年四月爲彼得格勒軍區司令，曾下令調動炮兵，鎮壓工人遊行示威，後根據彼得格勒蘇維埃底要求，被迫去職。七月事變以後，被委爲最高總司令，迫使臨時政府恢復前綫死刑，差不多將選舉的士兵委員會之權利取消，採取殘酷的辦法以對付軍隊中的布爾塞維克情緒。一九一七年八月，在反革命的軍人支持和同情之下，企圖建立軍事獨裁，以此目的，向彼得格勒進軍，結果完全失敗。十月革命以後，由貝霍夫監獄逃至頓河，在該處與反革命的阿列克歇耶夫一同領導反革命的白衛軍，反對蘇維埃政權，但被紅軍所擊敗。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葉卡切林諾達爾之戰役中被擊斃。（見一三四頁）

(九一) 卡普 (1868——1925) 德國政治活動者；保守派；帝國主義大戰前，因係農業信用機關底組織者和領導者，與東普魯士大地產者有密切關係。在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前，為國會議員和「祖國黨」創立人之一。一九二〇年為反革命的國家政變——所謂「卡普昏動」底主要領導者，當時，他成為政府底首領，但僅維持幾天而已。卡普政府為德國工人總罷工所推翻，此後，他逃至瑞典，在流亡中死掉。（見一三四、一六三頁）

(九二) 德列福斯 (1859——1927) 法國參謀總部一位軍官，猶太人，一八九四年因被誣告叛國，被軍事法庭判處終身單獨監禁。他是在保皇派、教會派、反猶太主義者所把持的法國參謀部之壓力下被判罪的，這些人的目的是把出賣軍事秘密給德國的真正罪犯掩蔽起來（真正罪惡都是法軍當中最反動的軍官），而想藉此給共和政體以精神上的打擊，因為共和政體是允許猶太人有在法軍中任官佐職務之權的。一八九七年秋季，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最進步的分子發動重審「德列福斯案件」的運動，這個時候，關於德列福斯的問題，立即獲得了顯明的政治性質。在擁護和反對重審的口號之下所進行的鬥爭，事實上是共和派與保皇派的鬥爭，而保皇派屢謀舉行軍專政變。這次審判，引起了全國的巨大騷動——羣衆的示威遊行、報紙上的激烈爭論，在輿論壓力之下，德列福斯終於被赦免了。（見一四二頁）

(九三) 甘曼特 (1845——1911) 有名的英國社會

主義者、律師、新聞記者。私人與馬、恩相識。一八八三年成立『社會民主聯盟』，以後改名為『社會民主黨』，一九一一年又改組為『不列顛社會黨』。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為國際社會主義局主席。帝國主義大戰轉向擁護帝國主義；在大戰期間成了極端社會沙文主義者。一九一六年四月在不列顛社會黨撒爾福特大會上（大多數反對戰爭），與其信徒一同被開除黨籍。之後，成立民族社會黨，一九二一年又改取老名稱『社會民主聯盟』。反對蘇維埃制度，主張干涉和封鎖蘇聯。甘特曼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他的評論，可看列寧甘特曼論馬克思一文。（全集第十五卷二六七——二七〇頁）（見一五〇頁）

（九四）抵制派乃是意大利社會黨底左派小組織，它在波爾蒂加底領導之下，努力與改良派作鬥爭，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後來到一九二一年，在里沃爾地方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懷疑派由社會黨中分裂出來，成為組織意大利共產黨的基本核心。

（九五）留特維茨（生於1859年）德國軍人，反動派，一九一九年曾積極參加對斯巴達克團起義的鎮壓。為一九二〇年卡普『盲動』底組織者之一，當時，德國政權有幾天曾落在以卡普為首的反革命政府手中。（見一六三頁）

（九六）考茨基所著的論文“Entscheidende Stunden”（決勝負的關頭），講到魯爾區域中鎮壓工人武裝起義的事情。考茨基寫道：『魯爾區域中目前的波動，只是卡普

和留特維茨底國家政任所引起來的反動。如果沒有這一次政變，魯爾區的工人就不致於實行武裝起義，那裏直到現在都會極其平靜。政府避開參加政變的人而逃到什徒特加特去，以避免流血慘劇，政府並不以此事爲丟醜。政府自從得到勝利以後直到現在，也沒有懲罰參加政變的任何一人。政府是否能夠用自己的仁慈態度（雖然稍微有一點仁慈態度也好）去對待更加勤勉的工人（整個德國底生命有賴於這些工人們底手所做的工作）呢？如果政府在這一方面不採取任何辦法，那時德國人民就要受苦，那時德國人民就要過黑暗的日子。」（見“Freiheit”報第九十七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九七）克里斯賓底論文“Zur Politischen Situation”（論政局）登載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第一二二期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底自由報上（“Freiheit”）。

（九八）列寧此地所引證的，是E.C. 著的論文“An Interview with Turati”（E.C. 著：與杜拉第的談話），該論文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第二二九五期的曼徹斯特導報上（“The Manchester Guardian”）。

（九九）特列佛斯 意大利社會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其中央機關報“Avanti”底編輯，直到一九一二年爲止。國會議員，意大利改良主義底理論家，杜拉第底信徒。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爲和平主義者。（見一六七頁）

（一〇〇）毛底連尼 意大利老社會主義者之一，國會議員，大利意社會黨改良派底有名活動者。曾出席齊美

爾瓦德和京塔爾會議。（見一六七頁）

（一〇一）杜郭尼 意大利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者，就其觀點說，依附於杜拉第派，主張與資產階級合作，並主張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見一六七頁）

（一〇二）瓦英庫普 荷蘭左派社會主義者。一九〇七年與左派（溫尼平克、羅爾戈斯特、戈爾特等）創辦並編輯左的急進的論壇報，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國際。從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起到一九二六年荷蘭共產黨開除其黨籍止，一直為反對派。以後他曾組織了一個特別的『荷蘭共產黨』，並要求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承認它為共產國際荷蘭支部。第六次大會拒絕了這一聲明書。現在他已承認自己的錯誤，恢復黨籍。（見一七七頁）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已於八月七日結束了。從它成立以來已經一年多一點了，在這個短促的時期內已獲得了巨大的、決定的勝利。

在一年以前，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只是展開了共產主義底旗幟，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力量應該在這種旗幟之周圍團結起來；對於那團結社會叛徒們的黃色國際——第二國際曾宣佈了戰爭，這些叛徒們已經投到資產階級方面以反對無產階級，而跟資本主義又結成同盟，以反對工人革命了。

在這一年來，達到了那些巨大的勝利，這除開別的以外，可以從如下的事情看出來：即工人羣衆對共產主義同情之日益增長，曾使屬於第二國際的最重要的歐洲和美洲的各黨——法國社會黨，德國和英國的「獨立」黨，美國獨立黨——不能不退出第二國際了。

在世界一切國度內，革命工人底最優秀的代表都已經站到共產主義方面，擁護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了。在歐洲和美洲一切先進的國度，都已經有了共產黨或很多的共產主義集團了。在八月七日所結束的代表大會上，不

僅團結了無產階級革命底先進的預言者，而且團結了跟無產階級羣衆有聯系的、強大的、有力的組織底代表。一個全世界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軍隊，現正保衛着共產主義，而且在剛結束的代表大會上，這個軍隊已經獲得了它的組織和一個明白的、精確的、詳細的行動綱領了。

大會曾拒絕了那些在自己的隊伍中還保存有『資產階級主義』、社會變節行爲、機會主義底有威望代表的黨——例如上述的已經退出了黃色的第二國際的各黨——即刻加入共產國際。

大會在好多十分確定的決議上，杜絕了機會主義一切進路，要求和機會主義實行無條件的決裂。那些在大會上報告的不容懷疑的材料，都指示出：工人羣衆是操縱我們的，現在，機會主義者將要被徹底地戰勝的。

大會糾正了若干國家內那些無條件地尊願『向左的』共產主義者所犯的錯誤，這些共產主義者否定了有在資產階級的議會中，在反動的職工會內工作之必要性，否定了有在有千百萬工人的一切地方工作之必要性，資本家及其出身於工人階級隊伍的走狗（即黃色第二國際底會員）還在愚弄着這些工人。

大會造成了全世界共產黨從所未有的團結和紀律，這種團結和紀律爲使無產階級革命底先鋒隊大踏步地向着他們偉大的目的，向推翻資本壓迫的、偉大的目標前進。

由於同時舉行的國際婦女會議，大會曾鞏固了跟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聯系。

由強盜民族底『文明』聯合所如此野蠻地掠奪、壓迫、奴役的東方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底共產主義集團和共產黨，也同樣有他們的代表出席大會。如果歐洲和美洲的工人，在其反對資本的鬥爭中不跟被這些資本所壓迫的、數萬萬的『殖民地』奴隸完全地和密切地團結起來，那末，先進國度底革命運動就是一種簡單的騙局而已。

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對地主和資本家，對尤登尼赤，對哥薩克，對鄒尼金，對波蘭反革命者，對他們的幫兇——法、英、美、日——都獲得了巨大的軍事上的勝利。

可是，我們在工人、勞動者、為資本所壓迫的羣衆底頭腦和心坎中所獲得的勝利，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組織在全世界底勝利，還要更巨大得多。

無產階級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壓迫的鬥爭，正在地球底一切國度內前進着，而且日益要變成現實了。

一九二〇年八月九日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底 主要任務提綱

(一)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底發展中，當前時機底特徵，就在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度內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最優秀的代表都完全明白了共產國際底基本原則，即：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並以無限的熱忱站到共產國際方面來了。尤其更重要的、更大的向前的一步，則在於：無論在什麼地方，不但在城市無產階級底最廣大的羣衆當中，而且在農村工人底先進的一部分當中，完全明白地確定了他們對於這些基本原則的無條件的同情。

另一方面，却出現了空前急速增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底兩個錯誤或弱點。對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勝利的極嚴重的和非常大的直接的危險是在於：第三國際底一部分老的領袖和老的黨，其中一部分則是半自覺地對羣衆底願望和壓力讓步，一部分是自覺地欺騙羣衆，以保持自己過去在工人運動內部充任資產階級代理人 and 助手的角色，他們都宣稱他們有條件的或甚至無條件的加入第三國際，但在事實上，在其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底全部實踐上都依舊留在第二國際底水準上面。這樣的一種情形是完全不允許

的，因為它直接引起羣衆底頹廢，破壞對於第三國際的尊重，並有重演這樣一種變節的危險，如急急改名爲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底變節一樣。另一個比較不大重要的、寧可說是運動進展中的一種病態的錯誤，是在於『左的』傾向，這種傾向引導到對於黨對階級和羣衆的作用和任務，引導到對於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在資產階級議會中和在反動的職工會中做工作的義務，加以不正確的估計。

不諱言自己的運動底弱點，而公開地批判這種弱點，以便更迅速地和澈底地避免這種弱點，這乃是共產主義者底義務和責任。爲着這些目的，必須：第一，特別根據已得的實際經驗，更具體地去確定『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諸概念底內容；第二，指出在一切國家內實現這些口號而進行的迫切的和有系統的準備工作，可以而且應該是些什麼工作；第三，指示糾正我們運動底缺點的路徑和手段。

一 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底本質

(二) 社會主義(作爲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對資本主義的勝利，要求唯一的真正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解決如下的三個任務。第一個任務：推翻剝削者，首先推翻他們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主要代表——資產階級；致命的打

倒他們；壓服他們的反抗；使他們恢復資本羈絆和奴隸制度的任何企圖成爲不可能。第二個任務：無產階級底革命先鋒隊，它的共產黨，不但要吸引和領導整個無產階級或其壓倒的、絕大的多數，而且要吸引和領導全體勞動和被資本剝削的整個羣衆；在反對剝削者的無限勇敢的和無情堅決的鬥爭底過程本身中，啓發他們、組織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紀律化；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度內這種佔壓倒多數的人口從對資產階級的依賴之下解放出來，用實際經驗教導他們信任無產階級和它的革命的先鋒隊之領導作用。第三個任務：使農業、工業、商業的小有產者階級——這個階級差不多在一切先進的國家內，數目都還相當大，雖然它只是佔人口底少數——以及跟這個階級相適應的知識分子、職員等階層，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間，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蘇維埃政權中間的不可避免的動搖中立起來或使之不能爲害。

第一個和第二個任務都是獨立的任務，它們中的每一個都要求對剝削者和對被剝削者要有自己的特殊的行動方式。第三個任務則是由前兩個任務產生出來的，只要求依照每一種個別的動搖事件底具體情況，把第一類和第二類的處理方法技巧的、及時的和靈活的結合起來。

(三) 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進、最強大、最有數養、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度內，由於軍閥主義、帝國主義，由於對殖民地和弱小國度的壓榨，由於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由於凡爾賽【和約】而造成了一種具體的局面，

在這種局面下，凡和平地使資本家服從於被剝削者大多數意志的思想，凡和平地、改良主義地轉變到社會主義去的思想，都不只是極庸俗的癡想，而且是對工人的直接的欺騙，對資本主義僱傭奴隸制的粉飾、對真理的隱蔽。這種真理是在於：那最有教養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現在已不惜作任何的欺騙和罪惡，已不惜對於成百萬工人和農民加以屠殺，去拯救生產手段底私人佔有。只有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沒收他們的財產，從上至下破壞全部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議會的、司法的、軍事的、官僚的、行政的、自治的機關等等——一直到完全驅逐和隔離最危險的和最頑強的剝削者，建立對他們的嚴格監督，以防止他們反抗和恢復資本主義奴隸制的不可避免的企圖，只有這些措施才能保證對整個剝削階級之真正征服。

另一方面，那第二國際底老黨和老領袖們中間所習見的思想：彷彿在資本主義奴隸制之下，在資產階級底壓迫（它採取無限的多種多樣的方式，某一資本主義國度愈是文明，則這種方式愈是精巧，同時愈是殘酷，愈是無情）之下，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大多數可以為自己造成社會主義意識底充分的明確性、社會主義信仰和個性底堅定性——這種思想恰恰就是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粉飾，對工人的欺騙。事實上，只有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在這一整個的唯一革命的階級或這一階級底大多數底支持之下，推翻剝削者，鎮壓剝削者，把被剝削者從他們的奴隸地位中解放出來，並立刻以被剝削的資本家底資源改善

他們的生活條件以後——只有在這以後以及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過程本身中，才能實現在無產階級之周圍，在它的影響和領導之下，啓發、教育、組織最廣大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才能實現把他們從那些由私有財產所產生出來的自私自利、散漫、惡習和弱點中拯救出來，才能實現把他們轉變成為自由的工作人員底自由聯盟。

(四)爲着戰勝資本主義，在領導的共產黨、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即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之間，需要有一種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要是它在事實上確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要是它包含了這個階級底一切最優秀的代表，要是它是由那些爲頑強的革命鬥爭底經驗所教育出和鍛鍊出來的完全覺悟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構成的，要是這個黨能把自己跟本階級底全部生活不可分地聯繫起來，並通過本階級跟被剝削者底整個羣衆不可拆離地聯繫起來，而給這個階級和這個羣衆貫徹以充分的信任，那末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在最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反對資本主義一切權力的鬥爭中領導無產階級。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只有在這樣的黨底領導之下，才能發揮它的革命進取底全部力量，才能克服極少數爲資本主義所愚弄的工人貴族、老工聯會和合作社底老領袖們等等之不可避免的冷淡和局部地反抗，只有這樣，它才能發展它的整個的力量，這種力量，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結構本身，要比無產階級在人口上所佔的成數大到不可比擬了。最後，只有在事實上從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之

壓迫下解放了出來，只有獲得了真正自由地（即沒有剝削地）組織在他們的蘇維埃裏面的可能性的羣衆，即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才能第一次在歷史上發揮成千萬的人們其爲資本主義所壓抑的、整個的創造性和整個的力量。只有在蘇維埃成了唯一的國家機關時，才能實現被剝削者整個羣衆之參加國家管理，這種羣衆，即使在最開明的最自由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下，事實上也是百分之九十九都常被摒棄於參加國家管理之外的。只有在蘇維埃裏面，被剝削者羣衆，才開始不是從書本上，而是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去真正地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新的社會紀律之造成、自由的工作人員底自由聯盟之造成。

二 應如何立刻並隨處準備 無產階級專政？

（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底發展中，當前時機的特徵，是在於在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度內，無產階級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準備還沒有完成，甚至往往還沒有系統地開始。從這裏不能得出結論說，在最近的將來，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它是完全可能的，因爲整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都含有非常豐富的使這種革命意外爆發的引火物和機緣；除無產階級底準備性以外，革命底另一條件，則是：一切統治的政黨和一切資產階級的政黨內部的一般危機狀態，同樣也已經具備了。可是，從上述的一切

却可以得出結論說：現在，共產黨底迫切的任務，並不在於加速革命，而在於加強無產階級底準備。另一方面，上述的好多社會主義政黨底歷史上的事件，則使得我們不能不注意：『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單在口頭的承認上面。

因此，從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底任務看來，目前共產黨底主要任務，乃是團結散漫的共產主義的力量，在每一個國度內成立統一的共產黨（或加強和刷新現存的黨），十倍地加緊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而且是用無產階級專政底形式去奪取政權）的準備工作。那些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集團和政黨底普通的社會黨式的工作，遠遠沒有充分地實行根本的改組和刷新，這種改組和刷新在承認這種工作是共產黨式的工作和與無產階級專政前夜底任務相適應的工作上是必要的。

（六）無產階級之取得政權，並沒有停止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相反地，而是使這種鬥爭特別廣泛、尖銳和無情了。凡是完全地或部分地站在改良主義、『中派』等等立場上的一切集團、一切政黨、工人運動的一切工作者，都不可避免地由於階級鬥爭極端尖銳化而不是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就是投在動搖者之列，或是（那是最危險的）陷在勝利的無產階級底不可靠的友人之列了。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之準備，不僅要求加強反對改良主義和『中派』傾向的鬥爭，而且要求改變這種鬥爭底性質。這種鬥爭，不能只限於說明這種傾向底錯誤性質，而且必須

毅然地和無情地揭露工人運動內部那表現這種傾向的一切工作者，因為，否則，無產階級就無從認識：它是同誰在一起從事反對資產階級的最堅決的鬥爭的。這是一種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而且為經驗所已經指示的、正在用武器去批評去代替批評底武器的鬥爭。在揭發那表現為改良主義者或「中派」的人們時，一切不徹底或弱點都意味着資產階級推翻無產階級政權的危險，那在今日，近視的人們只認為是「理論上的意見分歧」的東西，在明日資產階級就會利用做反革命的勾當的。

(七) 特別是不能只限於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任何合作，任何「協力論」，作普通的原則上的否定。在保存生產手段底私有制下，對「自由」和「平等」之簡單的擁護，在從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滅私有產的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就要變成跟資產階級的「合作」，而這種「合作」要直接葬送工人階級底政權的。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要用國家——利用整個的國家機關——鞏固和擁護對剝削者繼續其壓迫和剝削事業之「不自由」，鞏固和擁護私有者（即私人佔有一定的、由社會勞動所創造的生產手段之人）與一無所有的人們中間的「不平等」。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前，認為只是關於「民主主義」問題的一種理論的意見分歧的東西，在明天，在勝利之後，就不可避免地要變成以武力來解決的問題了。因此，如不徹底改變那反對「中派」和「民主擁護者」的鬥爭底全部性質，那即使是羣衆對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作預先的準備，也是不可能

的。

(八)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底最堅決的和最革命的形式。這樣的鬥爭，只有在無產階級底最革命的先鋒隊領導本階級底壓倒的多數跟着自己走時，才能勝利。因此，對無產階級專政之準備，不但需要解釋每一種改良主義在保存生產手段私人佔有制下對於民主主義之每一種搆護底資產階級性質，不但需要揭露那在實際上等於在工人運動內部為資產階級實行搆護的這種傾向之表現，而且需要在一切無產階級的組織中，不但在政治的組織中，而且在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教育的及其他的組織中，以共產主義者去代替舊的領袖。在一定的國度內，資產階級民主底統治愈長久，愈完全，愈鞏固，則資產階級愈能做到用那些為他們所訓練出，為他們的觀點和成見所滲透、並往往為他們直接間接所收買的人們去充當領袖職位。必須比過去更百倍勇敢地把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的工人底這些代表們從其一切職務上排擠出去，而以甚至全無經驗的工人去代替他們，只要他們跟被剝削的羣衆聯系在一起並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享有這些羣衆底信任。無產階級專政需要委任這樣的沒有經驗的工人去擔負最負責的國家職務，否則，工人政府的政權就沒有力量了，不能為羣衆所擁護了。

(九)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由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所準備好去擔負領導作用的唯一的階級方面，對於一切被資本家階級所壓迫、所窒息、所抑壓、所屈服、所分散、所欺

驅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領導之最完全的實現。因此，必須到處並立刻使用如下的方法開始對無產階級專政底準備。

在一切毫無例外的組織裏面，在工會裏面，在協會（政治的、職工會的、軍事的、合作社的、體育的、文化的等等團體）裏面，首先是在無產階級底這種組織裏面，其次是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底這種組織裏面，必須建立共產黨集團或支部——主要的是公開的，可是也要有祕密的，這在資產階級打算禁止這些支部、逮捕或驅逐其成員的一切場合，是不可缺少的；而且這些支部彼此之間並與黨中央須有密切聯系，互相交換自己的經驗，進行鼓動、宣傳、組織底工作，堅決地順應社會生活底一切方面，堅決地順應勞動者羣衆底一切種類和分支，必須以這些多方面的工作有系統地去教育自己、教育黨、階級和羣衆。

在這裏，非常重要的，是在實踐上創造出一切工作方法上的必要的差別性，如一方面對於那些往往不可救藥地爲小資產階級的及帝國主義的成見所損壞的「領袖們」和「負責的代表們」；——必須無情地揭露這些「領袖們」，把他們從工人運動中趕出去；另一方面對於羣衆，——羣衆大部分，特別在帝國主義大戰後，都傾向於聽聽關於無產階級領導之必要性乃解脫資本主義奴隸制的唯一出路的學說；必須學會特別耐心地慎重地去接近羣衆，以便能夠了解這些羣衆每一階層、每一職業等心理底特殊性、特點。

（一〇）特別是共產黨人集團或支部之一，即議會黨

團，就是說，那些在資產階級代表機關（首先是國會，以及地方的、自治的代表機關）裏面當議員的黨員集團，值得黨予以特別注意和關心。一方面，正是在落後的或滲透小資產階級成見的勞動羣衆底最廣大階層之眼光中，這種講壇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因此，共產黨員正應從這種講壇去做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並向羣衆解釋：爲什麼在俄國，資產階級的議會爲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所解散是正確的（並且將來在一定的時機，在任何國度內都是正確的）。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全部歷史，特別在先進的國度內，把議會講壇變成了空前未有的欺詐人民、在財政上和政治上欺騙人民、墮官發財、虛偽、壓迫勞動者底最主要的領域或最主要的領域之一。因此，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最優秀的代表對議會深惡痛絕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共產黨以及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政黨——特別是在這些政黨不是經過與舊黨分裂及經過反對舊黨的長期而頑強的鬥爭，而是經過舊黨轉到新的立場（往往只是名義上的）來的道路而發生的那種場合——必須對它的議會黨團採取極嚴格的態度：使它們完全服從黨底中央委員會之監督和指示；主要地使革命的工人加入它的組織，在黨報上和黨底會議上從他們的共產主義的堅定性的觀點去極仔細地分析議員們的演詞；派遣議員們在羣衆中做鼓動工作，從這些黨團中開除那些表現第二國際傾向的人們等等。

（一一）使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內革命的工人運動發

生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由於握有殖民地領地和財政資本底額外利潤等等，資本得以竟在這裏做到分化出了一個比較廣泛的和比較固定的為數不少的工人貴族階層。這種工人貴族享有較好的工資條件，並且為行會的偏狹精神、為市儈的及帝國主義的成見滲透得最厲害。這就是第二國際、改良主義者和「中派」底真正社會「支柱」，而在目前，這差不多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的社會支柱了。如果與這個階層不作即時的、有系統的、廣泛的、公開的鬥爭，則無產階級對推翻資產階級的任何事前的準備都是不可能的，這種階層——如經驗所已經完全證明的——無疑地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將要替資產階級的白軍提供不少的分子。一切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千萬要在生活上實現「深入羣衆！」、「與羣衆更密切聯系！」的口號，所謂羣衆，係指勞動者和被資本剝削者，特別是指那些最無組織、最不開通、最被壓迫、最難組織的人們底全體而言。

無產階級只有在它不鎖閉在狹小的行會圈子內時，只有在它作為全體勞動和被壓迫羣衆底領袖參加社會生活底一切表現和一切場所時才是革命的，而且，假如它沒有為戰勝資產階級而作巨大犧牲的準備和能力，那末，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專政。在這一點上，俄國的經驗有着原則上的和實踐上的意義，在俄國，假如無產階級在襲擊、戰爭、世界資產階級封鎖底最困難的時期，沒有作最大的犧牲，沒有比這個羣衆底一切其他階層更挨餓得厲害，那

末，它就不能實現其專政，就不能取得全部勞動羣衆底公認的尊重和信任。

特別是共產黨和整個先進的無產階級，特別須要對於廣泛的、自發的、羣衆的罷工運動予以各方面的和自我犧牲的援助。在資本底壓迫下，只有這種運動才能真正地喚醒、感動、啓發、組織羣衆，在他們中間培養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領導作用底充分信任。沒有這樣的準備，那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是不可能的，而在加入共產國際的各黨裏面，凡是公開出而反對罷工的人們，如德國的考茨基，意大利的杜拉第，都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自然，這對於那些工聯主義和議會主義的領袖們，尤其是如此，這些領袖們常常出賣工人，他們不根據罷工經驗教育工人革命，反而教他們以改良主義（例如最近數年在英國和德國）。

（一二）對於一切國度，甚至對於「最自由」、「最合法」、在階級鬥爭最不尖銳的意義上說來「最和平的」國度，都已經成熟到這樣一個時期了：這時把合法的和非合法的工作，把合法的和非法的組織有系統的結合起來，對於每一個共產黨都是無條件地必要的了。因為，在具有「最穩固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最有教養」和「最自由的」國度裏，政府都已經不願他們的欺人的和虛偽的聲明，而有系統地在製造共產黨人底秘密名冊，無止境違犯他們自己的憲法，半秘密和完全秘密地援助白黨和協助一切國度對共產黨員的屠殺了，秘密準備逮捕共產黨員，派遣奸細到共產黨的隊伍中去了。諸如此類，不勝舉述。只

有最反動的市儈，不管他們用如何美麗的【民主的】和和平主義的詞句掩飾自己，才能否認這一事實或從這一事實所得到的不可避免的結論：爲着有系統的非法的工作和充分準備那資產階級開始追究的時機之到來，一切合法的共產黨必須即刻成立非法的組織。在陸海軍和警察中的非法的工作是特別必要的；因爲，在帝國主義大戰後，全世界各國政府都開始害怕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充當的全民軍隊了，都秘密地改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建立專從資產階級中選拔來、並專用特別改進的技術所裝備的部隊了。

另一方面，同樣在一切毫無例外的場合之下，都必須不只限於進行非法的工作，而且也要進行合法的工作，爲着這箇目的，要克服一切困難，並成立各種各樣的、必要時常常可以變換名稱的合法的出版機關和合法的組織。比如，在芬蘭、匈牙利，部分地在德國、波蘭、拉脫維亞……等國不合法的共產黨，都是這樣做的。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I.W.W.)也必須這樣做，一切現時合法的共產黨，如果檢察官一旦高興起來根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實行追究時，也必須這樣做。

把非法的和合法的工作結合起來底無條件的、原則上的重要性，不僅取決於目前所處這一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前夜這一時期底各種特殊性之總和，而且取決於這一重要性，即須向資產階級證明，共產黨不能爭取的工作部門和場所是一個也沒有的，而且也是不能有的，尤其取決於這一點，即到處還都有着更廣大的無產階級階層和更廣

大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和被剝削羣衆階層，他們還在信任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合法性，破除他們的這種信仰對於我們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一三)特別是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裏，工人出版物底狀況，特別明顯地指示出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下自由和平等之虛偽性，特別明顯地表明了有系統的把合法的和非法的工作結合起來之重要性。無論在戰敗的德國也好，或有戰勝的英國也好，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底全部力量，及其財政大王底一切伎倆，都被用來取消工人的出版物；對主筆的法庭的追究和逮捕（或利用被僱用的兇手刺殺），禁止郵寄、收回執照等事無不如此。此外，日報所必須的新聞材料，都握在資產階級新聞通訊社的手裏，而廣告（沒有廣告，一個大報館便不能存在）又爲資本家所「自由」支配的。總括起來說，資產階級用欺騙、用資本和資產階級國家底壓力，剝奪了革命無產階級底出版物。

爲着反對這些起見，共產黨必須建立一種新型的定期出版物，以便大批地在工人中發行；第一、合法的出版物，它必須學會不以共產主義者自命、不談自己屬於何黨，利用微小的合法性，如布爾塞維克於一九〇五年在沙皇統治下所作的；第二、非法的傳單，即使篇幅極小，而且出版不定期，但它可以由工人在印刷所中大批地（秘密地、或在運動壯大時用革命地佔領印刷所的辦法）翻印，供給無產階級以自由的、革命的報導和革命的口號。

沒有一種爲共產主義出版物底自由而進行的取締羣衆

參加的革命鬥爭，那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準備便是不可靠的。

三 加入共產國際或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各黨底路線以及部分的成分之糾正

(一四) 最重要的各國——從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觀點看來——之無產階級對實現其專政的準備程度，是以如下的事實最客觀地最精密地表現其特徵：即第二國際底最有權威的各黨，如法國社會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英國獨立工黨、美國社會黨，都退出了這個黃色的國際，而決定——前三黨是有條件的，後一黨甚至無條件的——加入第三國際了。這證明，不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且它的大多數，都為事變底全部過程所說服，開始轉到我們方面來了。現在主要的事情，是要使這種轉變進行到底，並牢固地在組織上鞏固已達到的成就，以便能夠沒有絲毫的動搖而在全線上向前邁進。

(一五) 上述各黨（此外，還要加上瑞士社會黨，如果那個說它決定加入第三國際的電訊不錯的話）底全部活動都在證明——而且這些黨底每一種定期出版物都在明顯地證實——，這種活動還不是共產主義的活動，而且往往與共產國際底基本原則（即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以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直接相抵觸的。

因此，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必須決定：它認為立刻吸收這些黨加入是不可能的；它批准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致德國【獨立黨】的覆信*，它批准自己與一切退出第二國際而願意與第三國際接近的各黨進行談判的決心；它允許這些黨底代表們在自己的一切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上有發言權；爲着這些（和相似的）黨跟共產國際之完全聯合起來，它提出如下的條件：

（1）在各黨底一切定期出版物上公佈共產國際一切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底一切決議；

（2）在各黨底一切分部或地方組織底特別會議上討論這些決議；

（3）在這種討論之後召集黨底臨時代表大會以便進行總結；

（4）清除黨中繼續以第二國際底精神從事活動的分子；

（5）把黨底一切定期機關刊物移交全係共產主義者的編輯部手中。

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應委託它的執行委員會，在事先考查這些條件確已執行及黨底活動之性質已成爲共產主義的性質以後，正式吸收上述的和相似各黨加入第三

* 見全集二十五卷，三七八—三八五頁，對德國獨立黨提議談判的覆信提綱。——編輯部。

國際。

(一六) 在上述的和相似的各黨底負責職位上至今懸着少數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底行爲應該怎樣呢？關於這個問題，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應規定：鑒於關於這些政黨的工人當中那種對共產主義的異誠同情之顯著的成長，只要他們在這些黨底內部還能夠在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的精神上進行工作，只要對於還留在這些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能加以批評，那末共產主義者退出這些黨，並不是所希望的。

同時，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必須堅持英國共產主義的或同情共產主義的集團和組織併入「工黨」，雖然「工黨」是加入第二國際的。因為，只要該黨對加入它的組織能保持其目前的批評自由及維護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鼓動和組織活動自由，只要該黨能保持其聯合工人階級一切職工會組織之性質，那共產主義者就必須採取一切步驟，作某些妥協，以便有可能去影響最廣大的工人羣衆，從最高的和羣衆所能看見的台上去揭露它們的機會主義的領袖，加速政治權力之從資產階級底直接代表之手轉到「資本家階級底工人辯護士」的手中來，以便在這一點上儘可能迅速地將羣衆從最後的幻想中挽救出來。

(一七) 至說到意大利社會黨：則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認爲那些用該黨杜林 (Turin) 分部名義作爲向該黨全國委員會的建議並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八日在新秩序雜誌上發表過的，對該黨的批評和實際的建議，大體上

是正確的，這些批評和建議與共產國際底一切基本原則完全一致的。

因此，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請意大利社會黨召集一次黨底臨時代表大會，以便討論這些建議及共產國際兩次代表大會底一切決議，以糾正黨底政治路線，並實行清洗黨中、特別是它的議會黨團的非共產主義的分子。

(一八)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承認，在這次大會底特別決定上詳予駁斥的一些關於黨對階級和對羣衆的關係的觀點，關於共產黨不必參加資產階級國會和極反動的職工會的觀點，是錯誤的；最充分的維護這種觀點的是「德國共產主義工黨」，部分的是「瑞士共產黨」，共產國際東歐秘書處在維也納的機關刊共產主義，現已被解散在亞姆斯特丹秘密處以及幾位荷蘭同志，其次是英國的若干共產主義團體，例如「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等；此外，還有美國「世界產業工人」(I.W.W.)和英國「工廠工人委員會」等等。

可是，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認為，各該團體當中那些尚未正式加入共產國際的團體即刻加入仍然是可能而且是所希望的，因為在這裏，我們所遇到的，是一個欲須

* 係週刊，意大利社會黨左翼機關刊，一九三〇年創刊於杜林。從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到它被法西斯政府封閉時爲止，爲意大利共產黨每日出版的機關報。

歐尼無產階級的羣衆的運動，這種運動基本上是實際站在共產國際基本原則底立場上面的，特別對美國和澳洲「世界產業工人」以及對英國「工廠工人委員會」，更是如此。這些組織中對於參加資產階級國會的錯誤觀點，不僅可用資產階級出身的作用（他們帶來了自己的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的觀點，無政府主義者底觀點常是如此）一點來說明，而且可用完全革命的並與羣衆有聯系的無產者之政治上的無經驗來說明。

因此，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要求盎格魯撒克遜各國一切共產主義組織和集團，即使在「世界產業工人」和「工廠工人委員會」沒有立即加入第三國際，亦應對這些組織進行最友誼的關係之政策，與這些組織以及同情於這些組織的羣衆進行親近的政策，從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俄國三次革命底經驗的觀點，很友誼地向他們說明，上述的他們的觀點乃是錯誤的，而不放棄與這些組織合併而成爲一個統一的共產黨的再接再厲的企圖。

（一九）同這件事情相聯系，大會特請全體同志，特別是拉丁各國和盎格魯撒克遜各國的同志注意，在戰後，在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中，在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的態度的問題上將發生深刻的思想上的分化。在這場合，正是在那些對第二國際各黨底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之正當憎惡往往把他們推向無政府主義的無產階級分子當中，特別可以看出對於這些原則的一種正確的了解，而且這些無產階級分子愈懇切地熟悉俄國、芬蘭、匈牙利、

立陶宛、波蘭、德國的經驗，則這種了解亦愈加流行。

因此，大會認為用一切方法去幫助無產階級羣衆中的一切分子從無政府主義轉到第三國際方面來，乃是全體同志底義務。大會指出，真正共產黨的工作之成績，除開別的以外，應以如下的事情去衡量，即他們把一切不是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而是羣衆中的無產階級分子從無政府主義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已經做到了怎樣的程度。

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底基本任務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
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關於共產國際基本任務問題提綱已經用各國文字發表了，它並沒有提供（特別在俄國同志們看來）在本質上是新的東西，因為我們革命經驗底若干特點及我們革命運動底教訓大半已傳播於很多西方各國，傳播於西歐了。因此，在我的報告中，我打算把交給我的題目底第一部分，即國際形勢稍微多講一點（雖然只在簡短的輪廓上）。

目前所造成的整個的國際形勢底基礎，就是帝國主義底經濟關係。在整個二十世紀底過程當中，資本主義底這一新的、最高的與最後的階段已完全被規定了。自然，你們都曉得，帝國主義底最特別的特徵，最主要的特徵，就在於資本達到了絕大的規模。代替自由競爭，出現了巨大規模的獨佔。有時一個極小數目的資本家可以把整個的產業部門集中在他們手裏，這些產業部門都落到那些不少具有國際性的聯合公司、卡特爾、新迪加、托拉斯之手了。因此，不但個別國家中的整個產業部門，而且全世界

的整個產業部門，都在財政關係上、在財產關係上、部分地在生產關係上，被獨佔主義者所奪取了。於是一種極小數目的大銀行、財政大王、財政貴族底從前所未有的統治，就在這種基礎上發展了起來，這些大銀行，財政大王，財政貴族，甚至在事實上把最自由的共和國也轉化成為財政帝國了。舉例來說，這在大戰以前，像法國李西（Lysis）這樣快然非革命者的作家，就公開承認這一點了。

當整個世界不但在大資本家奪佔各種原料來源和生產手段的意義上，而且在殖民地預先瓜分已經完結的意義上，已被瓜分完畢的時候，少數資本家底這種統治已經達到了充分的發展。大約在四十年以前，屬於六個資本主義強國的殖民地之人口，不過二萬萬五千萬人。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前，殖民地的人口便差不多已經有六萬萬人了，如果，把當時已經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計算在內，那末，為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國度用殖民地依賴性手段所奴役的人口，便有一個指數——十萬萬人了。但是，你們知道，除開直接的國家的、法權上的依賴性以外，殖民地的依賴性，還須有以一連串的財政上的和經濟上的依賴關係為前提，還須有以一連串的戰爭為前提。這種戰爭，人們並不把它看作戰爭，因為，當那些用最現代的殺人武器以武裝起來的歐美帝國主義軍隊屠殺殖民地國家底手無寸鐵的和毫無防禦的居民時，這種戰爭常常變成一種大慘殺了。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便是不可避免地由這種對全地球之分割中，由這種資本主義的獨佔底統治中，由區區少數大銀行——一國不過兩家、三家、四家至多七八家這種萬能中而長成的。這次大戰之發生是爲了要重新分割全世界的。這次大戰之進行是爲區區兩大國家集團中那一個集團——英國集團呢，還是德國集團——獲得掠奪、窒息和剝削全地球的機會和權利。你們知道，大戰曾經如何有利於英國集團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在大戰底結果，我們看到，一切資本主義的矛盾，更不可計量地尖銳化了。戰爭一下子把地球上二萬萬五千萬左右的人口置於與殖民地地位相等的地位。戰爭拋棄了約有一萬萬三千萬左右人口的俄國，拋棄了不下於一萬萬二千萬人口的奧匈帝國、德國和保加利亞。這是部分地，像德國那樣，屬於最前進、最有教養、最文明、在技術上站在現代進步水平上面的諸國之二萬萬五千萬的人口啊。戰爭用凡爾賽條約的辦法，將這樣的條件強加於他們身上，即使一些先進的民族陷於殖民地依存性，陷於貧乏、飢荒、破產和毫無權利的境地，因爲這些民族將許多世代爲條約所束縛，而被置於任何一個文明民族都不讓生活的這種條件下。你們看到世界底這樣一幅圖畫：在大戰以後，不下於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口一下子遭受殖民地的壓迫，遭受最野獸般的資本主義之剝削，這種最野獸般的資本主義曾自誇爲愛好和平的，在五十年以前，當地球還未被完全瓜分時，當獨佔還未佔統治地位時，當資本

主義還能夠比較和平地、沒有巨大的軍事衝突而發展時，它是有若干權利這樣自諱的。

現在，在這個和平時代以後，我們所遇到的是壓迫底奇蹟般的尖銳化，我們看到，又倒退到比從前更壞的殖民地的與軍事的壓迫上去了。凡爾賽條約把德國和許多其他戰敗國置於經濟生存在物質上不可能的條件之下，置於完全無權無利和屈辱條件之下了。

享有這種情形的民族有多少呢？爲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憶一下，美國是惟一從戰爭中完全賺了錢的國家，它完全由一個有很多債務的國度變成了一個一切國家對它負債的國度，它的人口不過一萬萬人。日本也由於它立於歐美衝突之外而奪佔了龐大的亞洲大陸，而贏得了好多，其人口計五千萬人。除了這兩個國家以外，英國也獲利最大，其人口計五千萬人。假如再加上在戰爭中賺了錢而人口却爲數極小的中立國家，那末，便可得一個總數二萬萬五千萬人。

這樣，你們在大體上便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一幅世界圖畫了。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的殖民地——這是一些活生生地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及戰敗而被置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一些保存了它們的原有地位但在經濟上陷於對美依存，並且在戰爭期間在軍事上陷於依賴地位的國度，因爲戰爭捲入了全世界，不允許任何國家能真正地保持中立。最後，不到二萬萬五千萬的人口，是在那些國度

裏，在那裏，自然，只是上層分子，只是資本家才享有瓜分世界利益的。總共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球上的全部人口。我所以要向你們提醒這幅世界圖畫，是因為那引導到革命上去的資本主義底一切基本矛盾、帝國主義底一切基本矛盾，那引導到與第三國際作殘酷鬥爭的、工人運動中的一切基本矛盾（即主席所說過的基本矛盾）——一切這些都和地球人口之被瓜分有聯系的。

自然，這些數字只是粗枝大葉地描繪了一幅世界經濟的圖畫。並且，同志們，由於全世界人口這樣地被完全瓜分，財政資本之剝削，資本主義獨佔之剝削，更增長了好多倍，這是明白的事情。

不但殖民地國家和戰敗的國家陷入於依賴底地位，即在每一戰勝國內部，都發展了更尖銳的矛盾，一切資本主義的矛盾也都尖銳化了。我簡括地用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拿國債來說吧。我們曉得，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歐洲最主要的幾個國家總外債，增加了不下七倍之多。我還要引證一種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經濟材料：那就是英國外交家克因斯（Keynes），即和平之經濟效果一書底著者，他曾奉本國政府之命，參加了凡爾賽和平談判，他是從純粹資產階級的立場觀察了這次談判，他逐步仔細地研究了問題，並以經濟學者的資格參加了會議。於是 he 得出了結論，這些結論跟一個革命的共產黨人底任何結論比較起來，是更有力量的、更醒目的、更富於教訓的，因為這些

結論是一位有名的有產者所做的，是一位布爾塞維主義底
壓決敵人所做的，他如同英國的市儈一樣，把布爾塞維
主義描繪成畸形、兇惡的樣子。克因斯得出了結論說：歐
洲和全世界是隨着凡爾賽和約而走向破產了。克因斯解職
了，他把自己的書擲到政府面前，說：『你們做了荒謬絕
倫的事』。我把他底數字向你們引用一些吧，這大體上略
如下述：

主要列強間的債務關係是怎樣形成的呢？我以十個金
盧布等於一英鎊，把英鎊折成金盧布。這樣，美國資產便
有一百九十萬萬，而負債等於零。在戰前，美國曾是英
國底債務國。萊維（Levi）同志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在德國共產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在他的報告裏面完
全正確地指出，現在在世界上獨立行動的國度只剩下兩個
了：即英國和美國。只有美國在財政上是絕對獨立的。它
在戰前曾是債務國，現在它只是債權國了。世界上一切其
他的國家都是負債的了。英國陷入於資產一百七十萬萬，
負債八十萬萬的境地。它一半已經陷於債務國地位。而
且，屬於它的資產的，有六十萬萬是俄國底債務，俄國在
戰爭期中所購買的軍火，包括在俄國底債務以內了。不久
以前，當克拉辛以俄羅斯蘇維埃政府代表的資格和勞合·
喬洽談到債務協定時，他明白地向這位學者、政治家、英
國政府底領袖們解釋說，如果他們還打算收回債務的話，
那末，他們要犯重大錯誤的。而英國外交家克因斯，却已
經說穿了這種錯誤了。

當然，問題不只是在於，甚至不在於俄國革命政府不願償還債務，無論那一國的政府都不能償還債務的，因為這種債務是利上加利，是已經償還過二十次的了，這個對俄國革命運動沒有絲毫同情的有產者克因斯自己也說：『顯然的，不能把這項債務計算在以內了。』

說到法國時，克因斯舉出這樣一種數字：其資產為三十五萬萬，負債九十五萬萬！而且，如法國人自己所說的，法國是全世界底高利貸者，因為它的『儲蓄』數目是很大的；殖民地的和財政的掠奪給它造成了巨額的資本，這使它得以放出幾十萬萬幾十萬萬的債款，特別是向俄國，這種債款獲得了巨額的收入。然而，雖然如此，雖然勝利了，但法國仍然陷入於債務國的地位了。

布朗同志，一位共產主義者，在其誰應該償還戰債？一書裏（萊比錫，一九二〇年出版）所引用的一種美國資產階級的材料，確定負債與全部國家財產的比例如下：在戰勝區的英國和法國，負債佔全部國家財產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意大利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俄國為百分之九十。但是，如你們所知道的，這種債務並沒有使我們苦惱，因為稍稍在克因斯底一書出版以前，我們早就遵從他底很好的忠告——宣佈取消一切外債了。

克因斯只是在這裏暴露了普通的庸人的奇怪：在提出自己的宣佈取消一切債務的忠告時，他說，當然只有法國贏了，英國損失的也不甚大，因為反正從俄國是拿不到什麼東西的；美國可就要十分損失了。但克因斯却希望美國

能夠「寬大為懷」。在這一點上，我們底見解却和克因斯以及其他庸人的和平主義者不同的。我們以為，在宣佈取消債務的關係上，他們所應該期待的是另一些事情，他們所應該努力的是另一個方向，而不是希望資本家老爺們【寬大為懷】的方向。

從這些十分簡略的數字中，可以看出，帝國主義戰爭同樣對戰勝國也造成了一種不可能的地位。勞動工資和物價增長之間的巨大的不調和，就證明了這一點。今年三月八日，最高經濟委員會這一保護全世界資產階級秩序、防止日益高漲的革命的機關，曾通過了一個決議，其結語以秩序、勸勉、節約相號召，當然是在工人繼續做資本底奴隸的條件下。這個最高經濟委員會，這個協約國底機關，全世界資本家底機關，作了如下的總結：

在美國，生活資料價格平均漲了百分之一二〇，工資只提高了百分之一〇〇。在英國，生活資料價格漲了百分之一七〇，而工資提高了百分之一三〇。在法國，生活資料價格漲了百分之三〇〇，工資提高了百分之二〇〇。在日本，生活資料價格為百分之一三〇，工資為百分之六〇（我是把布朗同志在他的上述小冊子中的數字跟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泰晤士報所載最高經濟委員會底數字作比較的）。

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中間反抗情緒之生長，革命情緒和觀念之生長，自發的羣衆罷工之生長，乃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工人底狀況日益不可忍受了。工人機

據自己的經驗確信，資本家在戰爭中發了大財，却把開支和債務轉嫁在工人身上了。不久以前，有一個電訊說，美國想再把五百個共產黨員驅逐到我們俄國來，以便排除「有害的鼓動家」。

即使美國非只驅逐五百個，而是驅逐整整五十萬個俄國的、美國的、日本的、法國的「鼓動家」到我們俄國來，那於事情也絲毫沒有改變，因為物價之這種不調和仍將繼續存在的。這種不調和他們已無法應付了。他們之所以無法應付，是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制被嚴格地保存着，因為私有財產在他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不應忘記這一點，因為剝削者底私有財產，只有在俄國才被破壞了。資本家們是無法應付物價之這種不調和的，可是，工人們卻不能在舊的工資下生活下去了。用任何舊的方法都不能對付這種災難了，在這裏，任何的個別罷工，任何的議會鬥爭，任何的投票都不能有所成就了，因為「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資本家們却積累了這樣多的債務，使全世界竟被區區少數人所奴役，可是，工人底生活條件將日益不可忍受了。除開消滅剝削者底「私人財產」以外，再沒有任何別的出路了。

拉賓斯基同志在其英國與世界革命的小冊子裏面（一九二〇年二月間我們的外交人民委員部月報從其中發表了沒有價值的幾段）指出：在英國，煤炭出口價格比官廳的工業界所規定的價格高出兩倍。

在蘭開夏竟發展到這種地步，股票價格竟提高到了百

分之四〇〇。銀行之收入至少為百分之四〇至五〇，而且在這裏更應該指出的是，在確定銀行的收入時，一切銀行家都善於把收入之最大部分隱藏起來，不叫做收入，而叫做酬金、紅利等等。因此，正是在這裏，那些不可否認的經濟事實也指示出：區區少數人底財富是難以置信地增長了，極度的奢侈超過了一切限度，而同時工人階級底貧困却越來越大了。特別要指出的，就是萊維同志在他的上邊所說的報告裏面所非常着重地加以說明的這種情況，即：貨幣價值之變動。貨幣由於負債，由於發行紙幣等等，到處是貶值了。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那同一的資產階級的材料，即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最高經濟委員會底公告，核計貨幣價值之貶低，與美元比較，在英國將近三分之一，在法國和意大利為三分之二，在德國達百分之九六。

這一事實指示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底基礎正在熱鬧兒地崩潰着。在資本主義下，取得原料和銷售生產品難以維持的那種商業關係，再沒有繼續下去的可能了，所以再沒有把它們繼續下去的可能，正因為由於幣值之變動，使很多的國家都從屬於一個國家了。不論那一個最富的國度，都沒有生存的可能，都沒有經營商業的可能了，因為它不能出賣它的生產品，也不能獲得原料了。

這樣，就弄成了這樣的情形：即連一切國家都要服從的美國這個最富的國度，既不能買也不能賣了。曾經親身經歷凡爾賽談判底全部困難的那位克因斯，也不得不承認這種不可能性，不管他有不可動搖的保衛資本主義的決

心，不管他對布爾塞維主義的憎恨。順便說一下，我不以為，一篇共產主義的宣言或一篇一般革命的宣言其效力可以跟克因斯敘述實踐上的威爾遜和實踐上的「威爾遜主義」的地方相比擬的。威爾遜曾是市儈和和平主義者如克因斯及第二國際、甚至「二個半國際」底很多英雄們之類底偶像。這些傢伙歌頌威爾遜底「十四條」，甚至寫作關於威爾遜政策「根源」的「博學的」書，希望威爾遜能夠挽救「社會的和平」，能夠調停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能夠實現「社會改良」。克因斯曾經極明白地揭露了：威爾遜仍是一個笨伯，這一切幻想與以克里蒙梭與勞合·喬治諸位老爺為首的資本底實際的、切實的、商人般的政策一接觸，就烟消雲散了。現在，工人羣衆都根據他們生活的經驗一天天看得明白了，而學究們甚至從克因斯底書裏面也可以看出，威爾遜政策底「根源」只能歸結為僧侶式的愚蠢、小資產階級的空話、對階級鬥爭之完全不了解罷了。

由於一切這些事實，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兩個條件，兩種基本的情況。一方面是羣衆底貧困與破產驚人地生長了，首先是那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即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的人。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無權利的殖民地國度、附屬的國度，委託財政強盜們「管理」的國度。此外，凡爾賽條約鞏固了戰敗國之奴隸制，關於俄國的那些秘密條約也是一樣，誠然，這些秘密條約，其實際效力往往等於寫着我們負債多少萬萬的廢紙。這就是

世界歷史上以法律保證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掠奪、奴役、依賴、窮困和飢餓的第一個例子。

可是別一方面，在凡變成了債權國的國度裏，工人也陷入於一種不能忍受的境地了。戰爭帶來了一切資本主義矛盾之極度尖銳化；這就是那日益增長的極深刻的革命醞釀底源泉，因為在戰爭中，人們被置於軍事紀律的條件之下，被投到死路上或被置於立即軍事制裁的威脅之下。戰爭的情況使人沒有考察經濟現實的可能。作家、詩人、教師以及全部出版物，都致力於歌頌戰爭罷了。現在，在戰爭已告結束時，開始揭穿了。德國帝國主義和它的布列斯特和約被揭穿了。應成爲帝國主義勝利，而却成爲帝國主義失敗的凡爾賽和平被揭穿了。克因斯底實例告訴我們：歐洲和美洲幾萬幾十萬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出身的、稍微發展的、識字的人們，都應走克因斯所走過的路，克因斯已經辭去他的職位，而把那本揭破本國政府假面具的書擲到本國政府面前了。克因斯告訴我們：當幾萬幾十萬人們一旦理解這一切關於『爲自由而戰』等話頭全是欺騙伎倆、結果只是極少數人發財、而其餘的人都要破產與陷於奴役時，在這幾萬幾十萬的人們之意識上現在和將來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可是有產者克因斯卻說，英國人爲了挽救他們底性命，爲了挽救英國的經濟，必須力謀恢復德俄兩國間的自由的貿易關係！怎樣能夠做到這件事情呢？就是用這樣的辦法，如克因斯所建議的，宣佈一切債務無效！這不只是博學的經濟學者克因斯一個人底理想。

成百萬的人現在和將來都要達到這樣理想的。成百萬的人們聽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說，除開取消債務以外，是沒有任何其他的出路的。因此，就應「詛咒（已經取消了債務了）布爾塞維克」，請求美國「寬大為懷」吧！我以為對於這樣的贊助布爾塞維主義的經濟學者和鼓動者，是應該以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底名義致誠摯的謝意的！

如果一方面羣衆底經濟狀況已經是不可忍受的了，如果另一方面在區區少數強大的戰勝國中間已經開始了克因斯所描繪的崩潰，並且這種崩潰日益在加強着，那末，我們看到，世界革命兩個條件之增長已經具備了。

現在，我們看到了一幅稍稍完整的全世界圖畫了。我們知道，被置於不可能生存條件下的十二萬萬五千萬的人們，對區區少數富豪的這種依存性是什麼意思了。另一方面，當人們向各民族提出國聯盟約（國聯在該盟約中宣佈，它已經終止了戰爭，從今以後將再不允許任何人破壞和平了）時，當這種盟約，作為全世界勞動羣衆底最後希望，而發生效力時，這對我們就成了偉大的勝利了。當盟約還沒有發生效力時，人們曾說，不能使德國這樣的國度服從特殊的條件，如果有了盟約，那末，你們看到一切都平安無事了。可是，當盟約公佈以後，布爾塞維主義底最瘋狂的敵人却都拒絕它了！當盟約開始發生效力時，似乎，又叫區區少數的強國集團即「四巨頭」——克里蒙梭、勞合·喬治、奧爾蘭多及威爾遜——坐下來去建立新的關係了！當人們轉動盟約底機器時，這就引導到了完全的崩

潰！

我們在對俄的戰爭中已經看到這一點了。脆弱的、破產了的、被壓抑的俄國（它在支配全地球的一切國度底隊伍中、在富強的國家聯盟底隊伍中是最落後的一個國度）却成了勝利者。我們不能拿出稍稍相等的力量去向他們對抗，但我們却成了勝利者。爲什麼？因爲在他們中間沒有任何一致的痕跡，因爲他們底行動是一個反對一個的。法國希望俄國償還它的債務，並成爲反對德國的一個可怕的力量。英國則想瓜分俄國，英國會企圖佔領巴庫石油，而和俄國底邊疆各國簽訂了條約。而且英國官方的文件中間，有這樣的一本書，裏面非常誠實地歷舉了那允諾在半年前，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攻佔莫斯科與彼得格勒的一切國家（共十四國）。英國曾在這些國家上面建立了它的政策，給了這些國家好幾百萬的借款。可是，現在這一切算盤都被打破了，一切借款石沉海底了。

這就是國聯所造成的局面。這種盟約存在一天，就一天是替布爾塞維主義的最好的鼓動。因爲資本主義的『秩序』底最有力的擁護者指示出，他們無論在任何問題上都是彼此互相拆台的。爲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在日本、美國和法國之間咆哮着癡狂的鬥爭。

* 這裏是指法、英、美、意四個帝國主義國家集團而言，列寧把該四國底總理稱之爲『四巨頭』。

——編輯部註

這些國家底資產階級報紙都充滿着對他們『夥伴』之最瘋狂的攻擊、最激烈的怒罵，因為這些『夥伴』搶去了他們已經吃到嘴邊的食物。我們看到了這區區少數幾個最富國度底上層階級之完全崩潰。要使十二萬萬五千萬的人，如『先進的』和文明的資本主義想奴役他們的那樣生活下去，那是不可能的，要知道，這是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可是，區區少數幾個最富的國度，即英國、美國、日本（日本曾有榨取東方各國、亞細亞各國度的可能，但是如果沒有其他國家之援助，它却沒有獨立的財政上的和軍事上的力量）——這二、三國度並不能調整經濟的關係，它們只好企圖用自己的政策，以打破它們國聯裏面的盟友與夥伴底對策。於是發生了世界危機。而危機底這種經濟的根源，就是共產國際為什麼獲得了輝煌勝利之基本徵候。

同志們！我們現在來講我們的革命行動之基礎、革命危機的問題。在這裏我們必須首先要指出兩種很流行的錯誤。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用英國人的漂亮字眼說，把這種危機看做一種簡單的『不安靜』。另一方面，有時革命家力謀證明說，危機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這是一個錯誤。絕對無出路的情況是沒有的。資產階級正如自高自大的強盜，它做着一件件地蠢事，使現狀尖銳化，加速自己的滅亡。一切這些都是對的。但是，却不能『證明』說，資產階級，用某種小小的讓步去麻醉某些少數被剝削者，把某一部分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底某一種

一切或起義鎮壓下去，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如果人們事先就企圖「證明」「絕對」沒有出路，那末，這便是空洞的學究氣味，或玩弄概念與字眼的把戲。在這個和相似的問題上，真正的「證明」，只能是實踐。全世界上，資產階級的制度正在經歷着一種絕大的革命的危機。現在，必須用革命政黨底實踐去「證明」，它們有着充分地自覺性、組織性、與被剝削羣衆的聯系、堅決性及能力，足以利用這種危機以進行順利的、勝利的革命。

我們召集共產國際的這次大會，主要就是爲了預備這個「證據」。

機會主義如何地支配着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各黨，有些黨的工作還在如何地離開準備革命階級去利用革命的危機很遠，關於這點，我們可舉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列姆西·麥克唐納爲例。在他的議會與革命一書——該書恰好是討論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個基本問題——裏面，麥克唐納差不多是以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底精神來敘述目前的情況的。他承認，革命的危機是存在的，革命的情緒正在滋長着，工人羣衆是同情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注意：這裏是指英國而言）的，無產階級專政比目前英國資產階級底專政要好些。

但是，麥克唐納却仍然是一個澈頭澈尾的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者和妥協派，仍然是一個夢想一種超階級的政府的小資產者。麥克唐納同資產階級底一切騙子、詭辯家、學究一樣，承認階級鬥爭只是一種「記述的事實」。麥克

唐納對俄國克倫斯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建立「民主」的似乎超階級之政府的經驗，對匈牙利、德國等等底同類的經驗，都緘默不提。麥克唐納麻醉他的黨和那些不幸把這種有產者當作社會主義者、把這種市僧看作領袖的工人們，說：「我們知道，這（即革命的危機、革命的阻礙）將要安然渡過，將要風平浪靜的。」戰爭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危機的，但在戰爭以後，「一切要風平浪靜」的，臨別不是一下子。

一個成了黨底領袖而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人，就是這樣寫的。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對於下面這一點的在坦白上少有的、因而愈加寶貴的揭露：這就是在法國社會黨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底上層也同樣可以常常看到的一點：即不但不會，而且不願在革命意義上去利用革命的危機，或者換一句話說，不會也不願進行黨和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革命的準備工作。

這就是現在退出了第二國際的、很多很多的政黨底主要的罪惡。正因為如此，我要對於我向大會所提出的這些提綱，對於準備無產階級專政任務之盡可能具體的和精確的定義，多講一點。

再舉一個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部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書，這一類的書，現在在歐洲和美歐出版得非常之多，可是，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書出版得越多，則羣衆中間對於它的同情增長得越大越迅速。我說的是奧托·鮑威爾的布爾塞維主義呢？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一書。這

本書在這裏很醒目地告訴德國人，什麼是孟塞維克。孟塞維克在俄國革命中所起的可恥的作用，那是全世界各國的工人都充分知道的。奧托·鮑威爾寫了一本敵頭敵尾的孟塞維主義的時事論文，雖然他把他對孟塞維主義的同情隱藏起來了。可是，現在在歐洲和美洲，必須傳播一種什麼是孟塞維主義的更精確的知識，因為這是一切敵視布爾塞維主義的偽社會主義、偽社會民主主義等方向之祖傳概念。替歐洲寫一部什麼是孟塞維主義的書，這在我們俄國人看來是很乏味的。奧托·鮑威爾事實上在其書裏面却表明了這一點，我們預先就向將來出版這部書並譯成各國文字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和機會主義的出版家致謝吧。鮑威爾底書乃是共產主義教科書底一種有益的（雖則是製標的）補充品。拿奧托·鮑威爾底任何一節，任何議論來談，並證明孟塞維主義是在什麼地方，引導到社會主義叛徒，克倫斯基和謝德曼等底朋友的實踐上去的那些觀點之根源是在什麼地方——這就是【考試】時可以提出以確定某人是否已經把握住共產主義的一種有益的和成功的試題。如果你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末，你就還不是共產主義者，那你最好就不要加入共產黨了。

奧托·鮑威爾曾用一句話很卓絕地道出了全世界機會主義見解底全部本質：爲了這一句話，我們——如果我們在維也納能夠自由活動的話——應該在他生前就替他建立一個紀念碑。在現代民主主義底階級鬥爭中使用暴力——鮑威爾說——就是【對於力量底諸社會因素之一種暴

表】。

也許你們覺得這種說法有點奇妙而不容易懂吧？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把最革命的理論弄到什麼地步，而為剝削者如何辯護的一個例子。爲着建立一種『理論』說：所謂『力量之諸社會因素』就是數目、組織性、生產過程與分配過程中的地位、積極性、教育等。爲着建立這樣的一種理論，人們就需要德國式的市儈主義了。假如鄉村中的僱農，城市中的工人，對地主和資本家施以革命的暴力，那末，這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反對人民底剝削者與壓迫者的暴力行動。完全不是這樣的！這是『對於力量之諸社會因素的一種暴行』！

我的這個例子也許有點幽默。可是，今日機會主義底本質，正是這樣，這種機會主義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鬥爭，常常轉化爲一種可笑的東西。把工人階級、把他們中間一切有思想的分子吸收到國際孟塞維主義（麥克唐納、奧托·鮑威爾以及諸如此類的派別）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鬥爭中去——這是一件對於歐洲和美洲最有益的和最迫切的事情！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歐洲，這些派別之強固用什麼來解釋呢？爲什麼這種機會主義在西歐比在我國要強大呢？那是因爲先進各國靠十萬萬被壓迫人們之血汗來生活的可能，創造了並創造着他們的文化，因爲這些國度底資本家可以獲得好多超過他們所能獲得的利潤，好多超過他們由掠奪本國工人所能得到的利潤。

在大戰前，人們曾計算，三個最富的國度——英國、法國和德國，僅就資本輸出一項說（其他收入不講），每年就有八十萬萬至一百萬萬法郎的收入。

很明顯的，從這樣的一筆數目中，就可拋出五萬萬法郎，送給工人領袖、工人貴族，進行各種各樣的收買。整個的問題恰恰都歸結在收買上面。這是用千百種的方法來進行的：如提高最大的中心地點的文化，創辦教育機關，給合作社的領袖，給工聯底領袖，給國會黨團底領袖設置成千的官職。凡有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地方，到處都有這種事情發生的。這幾十萬萬的額外利潤，就是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我們在美國、在英國、在法國，都看到了機會主義領袖、工人階級上層、工人貴族之更無比強大的頑固性；他們給與共產主義運動以較大的阻力。因此，我們必須要作準備，歐美工人政黨之解除這種病態，跟在我國比較起來，要困難得多。我們知道，自從第三國際成立以來，我們在治療這種病態上已獲得了偉大的成績，可是，我們還沒有達到決定的終點；從全世界工人的政黨中、從無產階級底革命的政黨中清洗資產階級的影響、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還遠沒有完成。

關於我們應當如何具體地去執行這一點，我不詳細地說了。在我的已發表的提綱中，所說的就是這個問題。現在，我底任務是在於在這裏指出這種現象底深刻的經濟根源。這種病症已經拖延下去了，它底治療需要一個比樂觀

主義者所能希望的更長的時間。機會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工人運動上層中間的機會主義，並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實踐上已經證明，工人運動內部那些屬於機會主義派別的活動者乃是比有產者本身還更好的資產階級的辯護人。如果沒有他們對工人的顛導，那末，資產階級就不能保全自己。不但俄國克倫斯基政府的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而且以社會民主黨政府為首的德國民主共和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托瑪斯對其資產階級政府的關係，也可以證明這一點。英國和美國類似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我們主要敵人，我們必須戰勝這種敵人。我們必須抱着在一切黨裏面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的堅強的決心離開大會。這就是主要的任務。

跟這個任務比較起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錯誤」之糾正，乃是一種輕而易舉的任務。在很多的國度裏，我們看到了反議會主義，這種反議會主義與其說是由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分子所帶來，不如說是由若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因為痛恨舊的議會主義，因對英、法、意及一切國度裏面議會活動者行為之正當的、正確的、必要的性惡而支持的。共產國際須要發出領導性的指示，使同志們更深切地、更密切地認識俄國的經驗，認識無產階級政黨的使命。我們底工作就在解決這一任務。與無產階級運動裏面的這種錯誤、與這些缺點作鬥爭，比與那些在改良主義面具下加入第二國際底舊黨不是以無產階級的精神，而

是以資產階級的精神來進行其全部工作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比較起來，將容易千萬倍。

同志們！最後我還要指出一點。主席曾經說過，這次大會是值得叫做世界大會的。我以為他說得特別對的地方，就是因為在我們中間有不少殖民地國度和落後國度底革命運動底代表。這不過是一個微弱的序幕，但奠下了這個序幕就已經重要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底革命的無產者應與那些沒有或差不多沒有無產階級存在的國度底革命羣衆，應與東方殖民地各國底被壓迫羣衆聯合起來，這次大會實行了這一聯合。鞏固這種聯合——我堅信我們會這樣做的——將以我們爲轉移的。當每一國度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一旦進行革命的襲擊，戰勝市儈分子底反抗和區區少數工人貴族上層底影響，而與從來站在歷史外面，只是被看做歷史對象的數萬萬人的革命的襲擊合流起來，那末，世界帝國主義就非滅亡不可了。

帝國主義戰爭幫助了革命，資產階級曾經從殖民地，從落後的國度，從最偏僻的地區撤回軍隊，以便參加這個帝國主義戰爭。英國資產階級教訓印度的士兵說，保衛英國反對德國是印度農民底義務，法國資產階級教訓法國殖民地的士兵說，保衛法國是黑人底義務。人們教會了他們使用武器的技能。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技能，爲着這，我們必須深深地向資產階級致謝，以全體俄國工人和農民名義，尤其以俄國紅軍的名義致謝。帝國主義戰爭把附庸的民族都拖進到世界歷史裏面來了。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任

務之一，就在於考慮我們應該如何在非資本主義國度內樹立組織蘇維埃運動的頭一塊石頭。在那些地方，蘇維埃是可能的；但它們將不是工人蘇維埃，而是農民的蘇維埃或勞動人民的蘇維埃。

需要作很多的工作，錯誤將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條道路上將要碰到很多困難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底基本任務，就在於製定或草擬實踐的原則，以便使向來在數萬萬人們中間無組織地進行的工作，能有組織地、統一地、有系統地進行。

從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一點了，現在，我們對於第二國際是以戰勝者資格出現的；現在，蘇維埃的思想不僅普遍於文明國底工人中間，不僅為他們所了解所知曉；一切國度底工人都在嘲笑那些狡猾的傢伙，在他們中間，那自命為社會主義者而以學者或差不多以學者態度，議論蘇維埃「體系」如有體系的德國人之所喜歡表現的，或議論蘇維埃「思想」，如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表現的，為數實在不少；這些關於蘇維埃「體系」或蘇維埃「思想」的議論，往往模糊了工人底眼睛和智力。可是工人們掃去了這種學究式的垃圾，而拿起了蘇維埃所給與的武器。對蘇維埃作用與意義的了解，現在已經普及於東方各國了。

在整個的東方，在整個的亞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中間，蘇維埃運動已經肇始了。

被剝削者必須起來反抗剝削者，並成立自己蘇維埃的

命題，並不是什麼太複雜的事情。在我們的經驗以後，在俄國蘇維埃共和國底兩年半以後，在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這個命題已為全世界數萬萬被剝削者所壓迫的羣衆所了解了，如果我們現在在俄國，往往因為我們比國際帝國主義者弱，而不得不成立妥協和等待時間，那末，這十二萬萬五千萬的人口就是我們應當保護其利益的羣衆。那些每時都在消逝的障礙、成見、愚昧無知，還阻礙着我們，可是事情愈向前發展，則我們愈能在事實上代表和保衛這全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這種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羣衆。我們可以驕傲地說：在第一次大會上，我們在本質上還只是宣傳家，我們只是向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展開了基本的思想，我們只發出了鬥爭的號召，我們只是問：能夠踏着這條路前進的人們在那裏？那末現在，我們到處都有先進的無產階級了。現在到處都有無產階級軍存在，雖然它們往往是組織得不好，而需要改組的，假如現在我們的國際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組織一個統一的軍隊，那末，任何的缺點都不能阻礙我們去完成我們底事業了。這種事業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就是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事業。

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

共產國際第一次成立會，沒有製定個別的黨加入第三國際的精確條件。在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在大多數國度內只存在共產主義的派別與集團。

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是在另一種環境下召集的，現在，在大多數國度內，都不僅有了共產主義的派別與方向，而且有了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組織了。

現在，在不久以前還屬於第二國際，而現在願意加入第三國際，但却還沒有成爲真正共產主義組織的黨和集團，都紛紛請求加入共產國際。第二國際已經被澈底地打倒了。「中派」底各中間黨和中間集團，鑒於第二國際底全無希望，都企圖依靠於日益壯大的共產國際，但在這種場合，它們却希望保留這樣一種「自治」，即：使它們得以進行從前那機會主義的或「中派的」政策。共產國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爲時髦的東西了。

「中派」底若干領導集團現在要加入第二國際的願望乃是下列一事之間接的證實，即：共產國際已獲得了全世界絕大多數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底同情，並一天天地成爲一種偉大的力量了。

在某種情況下，共產國際可能受到這樣的一種危險所威脅，即：被那些還沒有解脫第二國際意識形態的動搖不定的和半吊子集團把它削弱。

此外，在若干大黨（意大利、瑞典）——其大多數是站在共產主義立場之上——裏面迄今還有着可觀的改良主義的和社會和平主義的一翼，這些人只是在等待時機，以便重新抬起頭來，開始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行積極的怠工，藉以幫助資產階級和第二國際。

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不應忘記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底教訓。匈牙利共產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之聯合，對於匈牙利的無產階級，實在犧牲太大了。

因此，第二次全世界代表大會認為，規定新黨加入的完全精確的條件，並向那已經加入了共產國際的黨，指出它應盡的義務，那是必要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茲決定：

隸屬於共產國際，應具備如下的條件：

（一）日常的宣傳鼓動，必須具有真正共產主義的性質。握在黨手裏面的一切出版機關，必須由可靠的共產主義者主編，這種共產主義者業已證明了他們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忠心。不應單純地像討論流行的、背熟的公式那樣，討論無產階級專政，而必須這樣地去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即從我們報紙天天所有系統地掲載的日常生活事實中，得出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每一個普通的男工、每一個女工、每一個兵士、每一個農民之必要性。在報紙底篇幅

上、在農民羣衆大會上、在職工會內、在合作社裏面——在第三國際底信徒者能夠達到的一切處所，都必須要不僅有系統地和無情地對資產階級加以污名，而且要同樣對他們底幫兇，一切色彩的改良主義者加以污名。

(二) 凡願意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有計劃地和有系統地從工人運動底一切稍微負責的職務（黨的組織、編輯部、職工會、國會黨團、合作社、市政機關等等）上趕走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信徒，而代以可靠的共產主義者，甚至有時在最初的時候，以普通的工人去代替「有經驗的」活動者，亦在所不顧。

(三) 在那些因為戒嚴或緊急懲治法而共產黨員沒有可能去合法地進行他們全部工作的一切國度裏，把合法的和非合法的工作結合起來，那是絕對必要的。差不多在歐洲和美洲底一切國度裏，階級鬥爭都進到了國內戰爭底階段。在這種情況之下，共產黨人再不能對資產階級的合法性有所信任了。他們必須到處建立平行的非法的機關，這種非法的機關，在決定時機，可以幫助去執行它對革命的責任。

(四) 必須在軍隊中進行頑強而有系統的宣傳鼓動，並在每一部隊裏面成立共產黨支部。這種工作大半需要共產黨人非法地進行，可是放棄這種工作，却等於出賣革命的義務，是與第三國際的隸屬性不相容的。

(五) 須要在鄉村裏面進行有系統的有計劃的鼓動。假如工人階級沒有鄉村僱農和貧農，即使是一部分也罷，

跟着自己走，沒有用自己的政策使鄉村居民底其餘一部分中立起來，那末，它便不能鞏固自己的勝利。在目前時代，共產黨人在鄉村的工作獲得了頭等的意義。這種工作，主要地必須經過和鄉村有聯系的、革命的、共產主義的工人來進行。放棄這種工作或把它交給不可靠的半改良主義者之手，就等於放棄無產階級革命。

(六) 凡願意隸屬於第三國際的每一個黨，不僅必須揭露公開的社會愛國主義，而且必須揭露社會和平主義底欺騙和虛偽；有系統的向工人證明，如果不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資本主義，則任何的國際仲裁法庭、任何關於縮減軍備的談話，對於國聯的任何『民主』的改組，都不能使人類避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

(七) 凡願意隸屬於共產國際的各黨，都必須承認有與改良主義及『中派』政策實行完全的和絕對的決裂之必要，有在最廣大的黨員羣衆裏面宣傳這種決裂之必要。否則，要進行一貫的共產主義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

共產國際無條件地和哀的美敦書式地要求在最短期間內實現這種決裂。共產國際不能容忍那些著名的改良主義者，如杜拉第、毛底連尼等等有權自稱隸屬於第三國際。這將引導到這種地步，即：使第三國際高度地與已經死亡的第二國際相似。

(八) 在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問題上，凡是本國資產階級擁有這種殖民地、並壓迫其他各民族的那些國度底黨，必須採取一種特別明確的和特別顯著的路綫。凡願隸

隸屬於第三國際的每一個黨，都必須無情地揭露「自己的」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裏的好謀，都必須不是在口頭上而在事實上援助殖民地裏面的任何解放運動，都必須要求把自己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從這些殖民地驅逐出來，都必須在本國工人底心坎中，培養對於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勞動人民的、真正兄弟般的關係，都必須在本國軍隊中進行有系統的鼓勵，以反對對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壓迫。

（九）凡願意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每一個黨，都必須在職工會、合作社及其他羣衆性的工人組織裏面有系統地和頑強地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在這些工會裏面，必須成立共產主義的支部，這種支部應該以長期的頑強的工作，奪取職工會，到擁護共產主義事業的這方面來。這些支部在他們日常工作中的每一步驟上，都必須揭露社會愛國主義者之變節行爲與「中派」之動搖。這種共產主義支部必須完全服從整個的黨。

（一〇）凡屬於共產國際的黨，必須進行反對黃色職工會阿姆斯特丹「國際」的艱苦的鬥爭。它必須在職工會的有組織的工人中間堅忍地宣傳有與黃色阿姆斯特丹國際決裂之必要。它必須用一切手段支持正在茁長的加入共產國際的、紅色職工會底國際聯合。

（一一）凡願意隸屬於第三國際的各黨，都必須實行修正本黨議會黨團底人的成分，趕走其中不可靠的分子，使這種黨團不是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服從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求每個無產者共產黨員以其全部活動服從真正

革命的宣傳鼓勵底利益。

(一二) 同樣，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出版物及一切出版機關，都必須整個兒地服從黨的中央委員會，不管整個黨在該時期是合法的抑或非法的；出版機關濫用自己自治，進行一種不完全與黨底政策相符合的政策，那是不允許的。

(一三) 隸屬於共產國際的黨，必須根據民主集中制底原則組織起來。在目前尖銳化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它以最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時，只有在一種近於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支配着它時，只有在它底中央將是一個握有為全體黨員所普遍信任的廣大全權的強大的有威信的機關時，才能完成它底責任。

(一四) 凡是共產黨員合法進行其工作的國度底共產黨，必須對黨底組織之黨員成分，舉行定期的清洗（重新登記），以便有系統地清洗出黨的那些不可避免地混到黨裏面來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一五) 凡願意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每一個黨，都必須在每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反對反革命力量的鬥爭中對它予以熱誠的支援。共產黨必須在工人中間進行不屈不撓的宣傳，使他們拒絕替蘇維埃共和國底敵人運輸軍火，必須合法地或非法地在那些被遣派去消滅工人共和國的部隊中間進行宣傳，等等。

(一六) 到現在為止還停留在舊的社會民主黨綱領下的各黨，都必須在極短的期間內修改這種綱領，並在共

產國際決議底精神下適應本國的特殊情況製出新的共產主義的綱領。照例，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每一個黨底政綱，都必須經共產國際底代表大會例會或它的執行委員會批准。在這個或那個黨底綱領未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批准時，當事的黨有權向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申訴。

(一七) 共產國際歷次代表大會底一切決議及其執行委員會底決議，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黨都有執行的義務。共產國際是在極尖銳的國內戰爭底局面下活動的，它組織得必須比第二國際更要集中。並且，共產國際和其執行委員會，在其全部工作中，自然，都須考慮到各黨在其下進行鬥爭和行動的條件之多樣性，一般約束性的決議，只有在這種決議有可能的這種問題上，才能提出。

(一八) 和這一切相聯系，凡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黨，都必須改變它們的名稱。凡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每一個黨，都應採用這樣的名稱：某某國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分部）。名稱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形式上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問題。共產國際已經向整個資產階級世界和一切黃色的社會民主黨宣告堅決的鬥爭了。使每個普通的勞動人民完全明白共產黨與那叛變了工人階級底權的、一切舊的御用的「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之間的差別，那是必要的。

(一九)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工作結束之後，凡願意隸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切黨，都必須在最短期間內召集一次本黨的臨時大會，以便在這個大會上以全黨的

名義，正式批准上面所說的各项義務。

一九二〇年七月

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演說

——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日在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

同志們！塞拉第曾說：我們還沒有發明什麼「辛色羅米突」（Sinsrometre），——這是一個新的法國名詞，誠實測量器之意。這樣的一種儀器還沒有發明出來，我們也用不着這個名詞，但我們却已經握有一種派別規定器了。塞拉第同志底錯誤（我在後面還要回頭說到這種錯誤的），就在於他沒有使用這種老早就已經知道的儀器。

關於克里斯賓同志，我只想說幾句話。我非常惋惜他今天沒有到會（狄特曼：「他有病了」）。這使我很惋惜。他的演說乃是文獻之一，它嚴格堅持了獨立社會民主黨右翼之政治方向。我不願提出任何個人的事情或瑣事來講，我只想說一說克里斯賓底演說裏面所明白表現的觀念。像我想的一樣，我能夠證明：這篇演說，整個地講，是完全在考茨基底精神之下作成的，克里斯賓同志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是和考茨基相同的。克里斯賓在答覆一句插話時說：「專政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它在愛爾福特綱領上就已經有了。」在愛爾福特綱領上，隻字未曾講到

無產階級專政；歷史已經證明，這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當我們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製定我黨底第一個黨綱時，我們就時時刻刻以愛爾福特綱領為榜樣；並且，普列哈諾夫曾特別強調地說：如果愛爾福特綱領上沒有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而在實踐上是對機會主義者的卑怯的讓步。在我們的綱領上，從一九〇三年起，就包含無產階級專政在內了。當時，同一普列哈諾夫曾正確地說：『要不是伯恩斯坦埋葬社會民主黨，就是社會民主黨埋葬他。』

假如現在克里斯賓同志說：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而且補充一句說：『我們永遠贊成奪取政治權力的』，那末，這就是說——迴避問題底本質。承認奪取政治權力，却不承認專政。所有的文獻，不只是德國的，而且是英國的和法國的，都在證明：機會主義黨底領導者們（例如英國的麥克唐納）都是贊成奪取政治權力的。這一切都是誠實的社會主義者——並非開玩笑——，但他們却都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假如我們要很快地有一個很好的，值得注意的，共產主義的革命政黨，那末，我們就必須與第二國際底舊的見解不同，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克里斯賓同志則塗抹和抹殺了這一點，而考茨基底一切信條所固有的基本錯誤也就在這裏。

克里斯賓同志繼續說：『我們是黨來們所舉出來的領導人。』這是一個形式主義的不正確的觀點，因為在德國獨立黨底大會上，我們已經明白地看到了各派別間的鬥爭。

爲着確定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各派別間的鬥爭是必然要存在的，而且已經存在着：擁護這一派的是革命的，亦即重新站在我們這方面的工人、反對工人貴族之人，擁護另一派的乃是在一切文明國度內由舊的領導者所領導的工人貴族——爲着確定這個簡單的事實，用不着像塞拉第那樣，去尋求一種誠實測量器，並加以囉嗦。克里斯賓是屬於舊領導者和工人貴族一派呢？還是屬於新的革命的工人、屬於羣衆一派？恰恰關於這一點，克里斯賓同志沒有給我們說明白。

克里斯賓同志是以怎樣的語調來談分裂的呢？他說：分裂乃是一件痛苦的必然之事，他曾長久爲此事痛哭過。這完全是站在考茨基底精神上說話的。究竟是和什麼人分裂呢？和謝德曼嗎？是的。克里斯賓說：『我們曾經實行了分裂。』第一，分裂實行的太晚了，假如所指的就是這一點，那末，便非這樣說不可了。第二，獨立黨人不應引此事爲遺憾，而必須說：國際工人階級還是處在工人貴族和機會主義者底壓迫之下的。在法國和英國，情形正是如此。克里斯賓同志並不是共產主義者式地，而完全是站在似乎沒有影響的考茨基的精神上去思考分裂的。

接着，克里斯賓講到了高類工資的問題。在德國，情形似乎是這樣的，即：工人們跟俄國工人和其他歐洲的工人比較起來，生活得頗不惡。如他所說，只有在革命『不太』惡化工人底狀況時，才能發生革命。試問在共產黨裏面可否用這種語句來說話呢？這是反革命的！在我們俄

國，毫無疑義的，生活水準確比在德國低，當我們實行專政時，那末其結果就是工人們餓得更厲害，他們底生活水準更要低下了。如沒有犧牲，沒有他們狀況之暫時的變化，則工人們就不能得到勝利的。我們必須告訴工人以與克里斯賓所說的相反的東西。當希望準備工人去專政，而告訴他們「不太」惡化時，却忘記了一件主要的事情。這就是：工人貴族，正是爲了幫助「自己的」資產階級用帝國主義的辦法侵略和窒息整個世界，以便由此保證較高的工資，才產生的。如果現在德國工人願意爲革命而工作，那末，他們就必須忍受犧牲，不應對此有所畏懼。

在一般的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說：在落後國度裏，某一個中國式的苦力不能進行革命，那是正確的；但在少數比較富庶的國度裏，由於帝國主義的掠奪，人們生活得要比比較舒適些，在這些國度裏向工人說，他們應害怕「太過」於窮困化，那就是反革命的。應告訴他們相反的東西。害怕犧牲，害怕在革命鬥爭時期「太」窮困化的這種工人貴族，是不能算在黨以內的。否則，專政就不可能，尤其是在西歐各國。

克里斯賓關於恐怖和暴力，說了些什麼呢？他說，這是兩件不同的事。在社會學教科書裏面，也許可以作這樣的區別的，可是，在政治的實踐上，尤其是在德國的情況下，却不能這樣做。對那些像在殺害李卜克內西和露沙·盧森堡時其行爲如同德國軍官的人們，對那些像斯丁尼斯和克虜伯（Krupp）收買刊物及其類似的人們，你就非用

暴力與恐怖不可。當然，沒有早先宣佈說我們必將採用恐怖手段的必要，但是，如果德國軍官和開普派依舊和今天一樣，如果克虜伯和斯丁尼斯還依然沒有改變，那末，使用恐怖手段將是不可避免的事了。不僅考茨基，而且是列德堡和克里斯賓都是站在完全反革命的意義上來討論暴力和恐怖的。抱有這樣的一種思想的黨，是不能參加專政的，那是明白的事情。

現在來談土地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克里斯賓特別興奮，並想給我們加以小資產階級的罪名；犧牲大地主，替小農做點事，似乎那是小資產階級的。應剝奪大地主，而把土地移交公社。這是書獃子的見解。甚至在高度發展的國度裏，連德國在內，都有足夠大的大土地佔有制，也還有不是用大資本主義的方式、而是用半封建的方式去耕種的地塊；可以不被破壞經濟，而把這種土地分一部分給小農。可以保存大規模的耕作，並給與小農一些對他們極成重要的東西。可惜，人們沒有想到這一點，可是在實踐上却非這樣做不可；否則，你就要犯錯誤的。例如，瓦爾加（前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的一書就證明了這一點，瓦爾加宣稱，無產階級專政之建立，差不多沒有改變匈牙利農村裏面的絲毫東西，農村工人沒有感到什麼，小農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在匈牙利，有極大的大土地佔有制；在匈牙利，大塊的土地都是半封建的經營。總可以找到，而且一定要找到這樣的一部分大土地佔有制，可以從這種土地中分出一點給小農（但不是當作私有財產，

而是當作個地），以便最小的農民也可以從沒收來的土地中獲得一些。否則，小農就不會感覺到從前的政府和蘇維埃專政之間的區別。假如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將來不這樣做的話，那末，它將不能維持下去的。

雖然克里斯賓曾經說：『你們不能否認我們有革命的信心』，但是，我回答說：『我就否認你們有這種信心』。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你們不願意革命地去行動，而是說你們不善於革命地去思維。我打賭，假如任意選出一個由一些受過教育的人所組成的委員會，並供給十本考茨基底著作和克里斯賓底演說，那末，這個委員會必定說：『這篇演說完全是在考茨基底精神下作成的，這全是考茨基的思想過程』；可是現在克里斯賓跑出來說：『考茨基對於我們的黨沒有任何的影響』。也許這句話是就後來才加入了黨的、革命的工人說的；可是，考茨基對克里斯賓、對克里斯賓底全部思想過程、對他底一切觀念，曾經而且現在還有着巨大的影響，這可說是已經絕對證明了的事實，克里斯賓底演說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不必發明誠實測量器，就可以說：克里斯賓底方向是與共產國際不相符的。在說這句話時，我們也就規定了整個共產國際底方向。

假如溫柯普和明岑堡同志，因我們曾經邀請獨立社會民主黨和它底代表進行談判，而表示不滿，那末，我以為這是不正確的。如果考茨基出而反對我們並寫書時，那我們就像和我們的階級敵人論戰一樣，同他論戰。可是，假如由於革命工人的大批加入而壯大起來的獨立社會民主黨

到這裏來談判時，那末，我們就應和它的代表談話，因為他們本身是代表革命工人底一部分的。關於國際，我們不能一下子和德國獨立黨人、和法國人、和英國人相衝突。溫柯普同志由他的每一次演說證明，他幾乎具有了班業庫克同志底一切變誤。溫柯普曾聲稱，他不贊成班業庫克底觀點，可是，他的演說，却證明了相反的東西。這就是這個左派的黨底基本錯誤。不過，這是發展中的無產階級運動底錯誤罷了。克里斯賓和狄特曼同志底發言，完完全全被浸透了資產階級的精神，用這樣的一種精神，你是不能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如果溫柯普和明岑堡同志在獨立社會民主黨底問題上還要更進一步，那末，我們就不能和他們一致了。

當然，我們沒有如塞拉第所說的誠實測量器，可以測驗一個人底善良的心，而且我們完全同意，問題不在於對於人的判斷，而在於對於局面的估量。我很惋惜，塞拉第雖然說了話，但並沒有說出什麼新的東西來。他的演說是和我們在第二國際所聽到的一樣的。

塞拉第說：『在法國，形勢不是革命的；在德國，則是革命的，在意大利，也是革命的。』這是不正確的。

是的，即使形勢是不革命的，但布爾塞維克黨底全部歷史却證明：如果第二國際甚至在一種非革命的形勢下不願而且不能實際上組織革命的宣傳和鼓動，那末，它就犯錯誤了，而且要負很大的罪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差別，正是在這裏，我們不願犯這樣的罪了。

塞拉第只是重複了一下克里斯安所說過的話。我們不願意說，某一天必須開除杜拉第。這個問題已經由執行委員會提出來了，塞拉第向我們說：『不要趕走，但來一個清黨吧。』我們應簡單地向意大利的同志們說：與共產國際的方向相符合的，乃是『新秩序』派的方向，而不是今日的社會黨和它底國會黨團底多數領導者。這些人斷言，似乎他們是願意保衛無產階級反對反動的。俄國的車爾洛夫，孟塞維克和其他很多人，也都同樣是保衛無產階級反對反動的，然而這還不是讓他們加入我們隊伍的根據。

因此，我們必須向意大利的同志們並向一切有右翼的黨說：這種改良主義的傾向和共產主義毫無相同之處。

意大利的同志們，請你們召集一次自己的黨的代表大會，並向它宣讀我們的提綱。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將願意留在共產國際裏面的。

共產黨底作用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在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要對鄧尼爾和麥克林同志底演說說幾句話。鄧尼爾說，他贊成無產階級專政，可是，他所想像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和我們所想像的完全一樣。他說，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本質上乃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和有階級覺悟的少數人底專政。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時代，工人羣衆遭受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揚他們的人的能力，這時工人政黨底最大特徵，正是它只能包括工人階級底少數。政黨只能聯合階級底少數，正如在一切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真正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只構成全體工人底少數一樣。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階級覺悟的少數才能領導廣大的工人羣衆，使他們跟着自己走。假如鄧尼爾同志說，他是政黨底敵人，但同時却主張最有組織最革命的工人之少數是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說，在實際上我們之間是沒有意見分歧的。什麼是組織的少數呢？假如這個少數是真正有階級覺悟的，假如這個少數善於領導羣衆跟着

自己走，假如這個少數能答覆每一個擺在日程上的問題，那末，這個少數在本質上說就是一個政黨。假如因為是羣衆運動底代表——關於英國社會黨底代表，就很難說得上——而爲我們特別重視的這些同志，如鄧尼爾者，假如這些同志主張一種有組織地爲專政而奮鬥，並在這個方向上教育工人羣衆的少數是存在的，那末，這樣的一種少數，在本質上不是別的，正是一個政黨。鄧尼爾同志說，這個少數應組織和領導全體工人羣衆。假如鄧尼爾同志和其他工廠工人委員會派及『世界產業工人』(I.W.W)派的同志們承認這一點——可是我們每天在和他們的談話中都看到，他們是真正承認這一點的——，假如他們贊成工人階級底有覺悟的共產主義的少數在領導着無產階級的這種情況，那末，他們也就應當同意，我們一切決議底意義正是這樣的。我們之間的唯一的分歧，是在於英國同志們對政黨所抱持的一種不信任的態度。他們所想像的政黨不是別的，只是貢彼爾斯和漢德遜式的，或者只是國會主義販子、出賣工人階級事業的叛徒底黨罷了。假如他們所想像的國會主義，正如今日英美的國會主義那樣，那末，我們也是這樣的一種國會主義和這樣的一種政黨底敵人。我們需要新的政黨，另外的一種政黨。我們是需要那經常和羣衆有實際聯系、並善於領導這種羣衆的這樣的政黨。

現在，我來講第三個問題，在這裏，我要和麥克林同志底演說聯系起來說。麥克林是贊成英國共產黨和工黨合併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在我的關於加入第三國際的

提綱裏面，表示過意見了。我曾經讓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可是，我和很多同志談話以後，却得了這樣一個信念：留在工黨裏面的決定乃是真正正確的決定。現在麥克林同志向我們說不要：太教條主義了，我認爲這種說法是完全恰當的。列姆西同志說：讓我們英國共產黨人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吧！假如每一個小派別都說：我們中間有的主張這個，有的則反對，讓我們自己來解決吧！——那還成什麼國際呢？那時，國際、代表大會、以及這次整個的辯論有何用處呢？麥克林同志只說了黨底作用，但這對於職工會和國會主義是同樣適用的。說優秀的革命者大部分反對併入工黨裏面去，因爲他們對作爲鬥爭手段的國會主義是採否定態度的，那是完全正確的。因此，最好把這個問題交給專門委員會去，在那裏，這個問題應從各方面加以辯論，而在第三國際底這次大會上加以解決。我們不能同意，這只是共產黨人底事。我們應一般地說，這種策略是正確的。

現在，與工黨問題相聯系，我詳細地說一說麥克林同志的若干論據。需要公開地說：共產主義者底黨，只有在它保存完全的批評自由及可以進行它自己的政策的條件下，才可以與工黨聯合。這是一個絕對重要的條件；假如塞拉第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說階級合作的話，那末，我聲明，在這裏是不會有這樣的合作的。假如意大利的同志們，允許

● 參看本書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一文。

——伏爾基

機會主義者如杜拉第及其一派之類，即資產階級分子，留在他們的黨內，那末，這才真正是階級合作哩。可是，在這種場合，在對英國工黨的關係上，所說的只是前進的少數英國工人和它底壓倒的多數合作的問題。英國工黨底黨員，全係職工會底會員。這是一個極特殊的機構，在別的國度裏，我們是找不到這種機構的。這個組織包括一切工會底六百萬至七百萬的工人。從沒有人過問他們底政治條件如何。讓塞拉第同志給我證明：誰在阻止我們在那裏面使用批評底權利吧。只有在你證明麥克林同志是犯了錯誤的時候，你才能證明這一點的。英國社會黨是可以完全自由地說：漢德遜是個叛徒，可是，他仍然留在工黨的隊伍裏面。在這裏實現了工人階級先鋒隊和落後工人、和後衛之合作。這種合作，對於整個運動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可使我們堅決地主張，英國共產黨人乃是黨即工人階級底少數和其餘全體工人羣衆之間的一個聯接環節。假如少數不善於領導羣衆，不善於與他們密切聯系，那末，它就不是一個政黨，就根本毫無價值，雖然它自稱爲政黨或工廠工人委員會全國委員會——據我所知，英國工廠工人委員會有個全國委員會。在相反的東西不能證明以前，我們可以說，英國工黨是由無產者組成的，留在他們的隊伍內，我們可以實現工人階級先鋒隊和落後工人之合作。假如這種合作不會有系統地實現，那時，共產黨就毫無價值，那時就根本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了。假如我們的意大利同志又沒有更說服人的論據，那末，我們就應稍後一點根據我

們所知道的，在這裏最後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得出結論說，加入工黨乃是正確的策略。

鄒尼爾同志和列姆西同志告訴我們，英國共產主義者大多數不同意合併。可是，我們應否必須同意多數呢？決不應該！如果他們還沒有了解那個策略是正確的話，那可以等一等，甚至兩個政黨在若干時期內並行存在，也比拒絕容許那個策略是正確的一個辦法要好些。當然，從大會一切代表之經驗出發，並根據這裏所引的一些論據，你們是不會堅持我們在這裏須通過一個在一切國度內即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決議的。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這裏可以公開地說出我們的意見，我們可以作出指示的。我們應在特別委員會裏面去研究英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問題，然後宣佈：正確的策略就是加入工黨。假如多數人反對這一點的話，那末，我們就應當把少數單獨組織起來。這將有着教育的意義。假如英國工人羣衆還相信舊的策略的話，那末，我們在下次大會上可以重新考察我們的結論。但是，我們却不能說，這個問題只和英國有關——這是對第二國際底最壞的習慣的仿效。我們應當公開地說出我們的意見。假如英國共產主義者不能有一致意見的話，假如不能成立一個羣衆的黨的話，那末，無論如何，分裂將是不可避免的。

土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作——

馬爾黑列夫斯基同志，在他的論文*裏面，很卓絕地發展了現在已成爲黃色的第二國際爲什麼不僅不能規定革命的無產階級在土地問題上的策略，而且甚至不能提出這個應提出的問題之那些原因。接着，馬爾黑列夫斯基同志對於第三國際底共產主義的土地綱領提供了些理論的基礎。

行將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開幕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其關於土地問題的一般的決議是可以（在我看來，而且應該）根據這些基礎製定的。

這個決議底初稿如下：

（一）只有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城市的與產業的無產階級，才能把鄉村的勞動羣衆從資本和大土地佔有制底壓迫之下，從經濟凋敝之下，從帝國主義戰爭之下拯救出來，

* 列寧說的是指登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共產國際雜誌第十二期上面的馬爾黑列夫斯基農民問題與世界革命一文。

——編輯部註——

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一再不可避免的。對於鄉村的勞動羣衆，除開與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聯盟以外，除了熱忱地支持無產階級推翻大地主大土地佔有者及資產階級壓迫的革命鬥爭以外，是沒有其他的出路的。

另一方面，假如產業工人閉關在狹隘地行會利益底與狹隘地職業利益底圈子內，而自滿地僅以關心和忙碌於自己的、有時過得去的市僧狀況之改善爲限，那末，他們就不能執行他們的把人類從資本壓迫和戰爭之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歷史的使命。

可是，在很多的先進國度裏面，『工人貴族』正是這樣，這些『工人貴族』乃是第二國際底僞社會主義黨之基礎，但實際上却是社會主義底最壞的敵人，是它底叛徒，是市僧的沙文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代理人。只有在無產階級作爲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先鋒隊，作爲他們在推翻剝削者鬥爭中的領導者而出現和行動的條件之下，它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真正社會主義地行動的階級，可是，如果不把階級鬥爭推移到鄉村裏面去，不把鄉村勞動羣衆團結在城市無產階級底共產黨之周圍，不進行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之教育，那末，這一點是不能辦到的。

(二) 城市無產階級應領導勞動者和被剝削羣衆進行鬥爭或至少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鄉村中的這些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裏是以如下的各階

級爲代表：

第一，農業無產階級，即僱傭工人（長工、短工、日工），這種僱傭工人是靠**在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裏面作僱傭工作以獲得生活資料的**。建立這個階級底一種獨立的、與農村居民其他集團分開來的組織（政治的、軍事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文化等等的），在這個階級中間加強宣傳和鼓動，把這個階級吸引到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這就是各國共產黨基本任務。

第二，半無產者或零散的小農，即半靠在農業和工業的資本主義企業裏面作僱傭工作、半靠在自有的或佃來的一小塊土地（這小塊土地僅替他們家庭提供食品底若干部分）上做工，以獲得生活資料的那些人。這個農村勞動居民集團，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內都是爲數極大的，其生存和其特殊地位，竟被資產階級底代表以及那些隸屬於第二國際的、黃色的「社會主義者」們所抹殺了，這些「社會主義者」們一部分是自覺地欺騙工人，一部分是盲目地屈服於市儈觀點底墨守成規的勢力之下，把這個集團與一般「農民」廣大羣衆混爲一談了。這種資產階級的欺弄工人方法，在德國和法國最容易看到，其次是在美國及其他各國。在共產黨正確地佈置工作之下，這個集團乃是它的可靠的擁護者，因爲這種半無產者底地位是非常艱苦的，他們從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所得到的利益是巨大而可以和即製作到的利益。

第三，小農，即小規模自耕農，自有或佃種不大的一

塊土地，以滿足其家族和其經營之需要，而不僱用他人的勞動力。這個階層，作為一個階層看，可以無條件地因無產階級底勝利而得到利益的；無產階級底勝利可以一下子和完全地使他們：（一）免除向大土地佔有者交納租金或繳納收穫物之一半（例如對分制之在德國，同樣在意大利，等等）；（二）免除抵押債務，（三）免除大土地佔有者的各種各樣的壓迫和依存性（森林地及其使用，等等）；（四）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方面對其經濟之即刻作到的援助（使用無產階級所沒收來的資本主義大農場上之農具和一部分建築物，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立刻將鄉村消費和農業互助社從這種組織即從在資本主義之下為富農和中農服務最多的組織變成為首先對窮農、即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等予以幫助的組織），諸如此類。

同時，共產黨必須明白地認識到，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即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這個階層裏面（至少部分地），那種傾向到毫無限制的商業自由和私有財產使用自由的方面去的動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個層級（即使在不大的程度上）乃是消費品底出賣者，早為投機和私有習慣所敗壞了。然而，在堅定的無產階級策略之下，在勝利的無產階級對大土地佔有者及富農底十足堅決的制裁之下，這個階層底動搖是不會很大的，是不會對如下的事實有所改變的，即整個兒說來，這個階層將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方面的。

（三）總括起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裏，上述這

三個集團構成農村居民底多數。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農村中也是有充分地保障的。一種相反的意見却廣泛地流行着，可是這只有由於如下的原因才能保持得住，即：第一，是由於資產階級科學和統計之有系統的欺騙，這種科學和統計，用一切手段抹殺農村中上述各階級與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之間的深刻的鴻溝，以及一方面半無產者及貧農與另一方面富農之間的深刻的鴻溝；第二，它之所以保持，是由於黃色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和先進各國被帝國主義特權所腐化的「工人貴族」，不善於而且不願在鄉村貧民中間進行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的宣傳、鼓動及組織工作；機會主義者底全部注意力，過去和現在都集中於構思與資產階級（包括富農和中農在內——關於這二者，我們在下面還要講到）作理論上的和實踐上的妥協，而不是集中於使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資產階級的政府和資產階級；第三，它之所以保持，是由於頑強地不了解——這種不了解已具有牢固的（與一切資產階級民主的及國會主義的成見相聯系）成見——那已由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所完全證明並由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所完全證實的這種真理，即：在一切、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度內空前未聞地被壓抑、被散漫、被壓迫、被判定處在一種半野蠻的生活條件下的上述三類的鄉村居民，在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都是深切關心社會主義之勝利，他們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只有在無產階級對大土地佔有者及資本家加以制裁以後，只有在這些被壓抑的人們在實

綫上看到：他們有了足以幫助和領導、足以指出正確門徑的充分強大而堅定的有組織的領袖與保衛者以後，才能堅決地擁護革命的無產階級的。

(四) 在經濟的意義上，所謂「中農」應了解為小自耕農，他們根據私有或租佃之權，也擁有不大的一塊土地，但這種土地，第一，在資本主義下，照例，不但可以維持家庭和經濟底可憐的生存，而且可以給與一種獲得某種盈餘的可能性，這種盈餘至少在豐年可以轉化成資本；第二，往往僱用他人的勞動力（例如每兩個或三個農戶之中，就有一個）。在德國，根據一九〇七年的人口統計，擁有五公畝至十公畝土地的一類農戶中，僱用農業僱傭工人的數目，約佔這類農戶總數三分之一*，這就可作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裏面的中農之一個具體例子。在法國，那需要在土地上投入特別大量的勞力的專門作物——例如葡萄園藝——比較發展，在該國，這類農人雇用他人的僱傭

* 確切的數字如下：擁有五公畝至十公畝土地的農戶為六五二、七九八戶（總農戶計五、七三六、〇八二戶）；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僱傭工人四八七、七〇四人和家屬勞動力二、〇〇三、六三三人。在奧國，根據一九〇二年的戶口統計，這類農戶只有三八三、三三一戶，其中一二六、一三六戶使用僱傭勞動；僱傭工人一四六、〇四四；家屬勞動力一、二六五、九六九。奧國農民總數為二、八五六、三四九戶。

傭勞動力，規模也許還要大些。

革命的無產階級——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開頭——不能以吸引這個階層到自己方面來為自己的任務，而應只限於使這個階層保持中立，就是說，使它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保持中立。這個階層動搖於這種和那種力量之間，乃是不可避免的，在新時代底開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內，它的主要的趨向是擁護資產階級的。因為在這裏是私有者底世界觀和情緒在佔着優勢，對投機、商業【自由】和私有產之【自由】是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的；與僱傭工人是直接的對抗。勝利的無產階級取消租金和抵押，使這一階層底狀況可以得到直接的改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決不可以實行立刻的完全的廢除私有財產，不論如何，它要保證小農與中農不僅把他們的地產保存在他們手裏，而且把他們的地產增加到他們向來所租借的全部耕地（取消租金）的規模。

把這一類的措施和反對資產階級的無情鬥爭結合起來，就可完全保證中立政策底勝利。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要用極度小心和漸進的辦法，要用模範的力量，不對中農使用任何暴力，實現向集體耕作的轉變。

（五）【富農】乃是農業裏面的資本主義的全業家，他們照例用若干僱傭工人經營，他們之與【農民】相聯系，只是由於他們的不高的文化水準、生活方式、本人在其經營中的體力工作。這是資產階級階層中為數最大的一

個階層，資產階級各階層都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直接的和堅決的敵人。共產黨在農村整個工作上的主要注意力，應集中於同這些階級作鬥爭，集中於把勞動的和被剝削的農村人口之大多數從這些剝削者底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等等。

在城市無產階級勝利以後，這個階層方面抵抗、怠工等之一切可能的表示，以及反革命性質的直接的武裝行動，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此，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立刻開始在精神和組織上準備必要的力量，以便完全剷除這個階層底武裝，與推翻工業裏面的資本家並行，在初次表示抵抗時，就給他們以堅決的、無情的、消滅性的打擊。爲着這個目的，必須武裝農村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組織蘇維埃，在這種蘇維埃裏面，應該沒有剝削者存在的餘地，要保障無產者與半無產者佔居優勢。

可是，甚至對富農之剝奪，決不能成爲勝利的無產階級底直接任務，因爲使這種經營社會化的那些物質的、特別是技術上的、其次是社會的條件，還沒有具備。在個別の場合，可能在例外的場合，會沒收他們土地中那租給小佃戶或對於周圍小農居民所特別必要的一部分；對後邊這種小農居民應保證，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無代價地使用富農底一部分農業機器，等等。照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應讓富農保有他們的土地，僅在抵抗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政權的場合，才沒收它們。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中，由於一連串的特殊情況，曾使反對富農的鬥爭複雜化，並拖長

了，這種經驗指示出：這個階層因反抗之微小企圖而得到適當的教訓以後，可以安分守己地執行無產階級國家所給與的任務，甚至——雖然非常遲慢——開始對保護一切勞動者而殘酷對付有錢的懶蟲的政權懷起尊敬之意來。

使俄國戰勝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反對富農的鬥爭複雜化和拖長之那些特殊情況，主要地可以歸結為以下這幾點，即：俄國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以後，才走完了「一般民主的」、即其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全體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之階段；其次是城市無產階級底文化的和數量上的薄弱；最後是非常廣闊的地域與極度惡劣的交通。因為在先進的國度裏沒有這些發生阻力的條件，所以，歐洲和美洲革命的無產階級，應更有力地去準備和更迅速、更堅決、更有效地去完成戰勝富農抵抗之完全的勝利，對富農抵抗底每一個最小可能性之完全的消滅。這是迫切地必要的，因為在這種完全的和充分的勝利以前，農村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羣衆便不能承認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是完全鞏固的。

（六）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須立刻和無條件地沒收地主、大土地佔有者，即這麼一些人底全部土地，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度裏面直接或通過其承租人有系統地剝削僱傭工人和近郊小農（往往一部分是中農）、自己絲毫不做任何體力勞動、而大多數是屬於封建主（俄國、德國、匈牙利的貴族，法國的復辟了的領主，英國的爵士，美國的過去的奴隸佔有者）後裔或屬於特別富有的財政巨頭、或屬於這

兩類剝削者與懶漢混血兒的一些人。

在共產黨隊伍裏面，宣傳或實行因剝奪大土地佔有者之土地而予以賠償辦法，是無論如何不能允許的，因為，在今日歐洲和美洲的情況下，這就是叛變社會主義和對因戰爭而受痛苦最大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加以新的負擔的意思，而戰爭却使百萬富人之數量倍增，使他們大發其財。

至於在由勝利的無產階級所沒收的大土地佔有者的土地上經營方式的問題，這在俄國，由於其經濟的落後性，曾經是以分割這種土地，交給農民使用為主，只有在比較罕少的例外的場合，才拿這種土地建立了所謂「蘇維埃農場」，無產階級國家用自己費用來經營這種農場，而把以前的僱傭工人變成了受國家委託而工作的工人和管理國家的蘇維埃委員。就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而言，共產國際承認把大規模的農業企業主要地保存起來，並按照俄國「蘇維埃農場」底方式去經營，那是正確的。

可是，誇大或機械地使用這個辦法，從不允許把被剝奪的剝削者的一部分土地無代價地交給周圍的小農，有時交給中農，那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第一，通常以大農作在技術上的優越性為藉口而反對這種辦法的意見，往往走到以最壞的機會主義和對革命的變節行為來代替一個不可爭辯的理論上的真理。爲了這一革命之勝利，無產階級不應在生產之暫時的減低面前止步，正如美國奴隸佔有制度之資產階級敵人曾經不害怕因

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內戰結果而棉花生產之暫時減低一樣。對於資產階級所重要的，是為生產而生產，對於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最重要的，是推翻剝削者和保證使勞動人民能夠有為自己而工作而非為資本家而工作的條件。保障無產階級底勝利和其鞏固，乃是無產階級底第一個和最基本的任務。可是，不使中農中立，不保證有極大的一部分——雖非全體——小農之援助，則無產階級政權之鞏固，是不可能的。

第二，不但提高農業中的大生產，而且甚至保存農業中的大生產，都須有十分發達的有革命覺悟的、經過堅固的職工會上和政治組織上的訓練的農村無產者為前提。在還沒有這種條件的地方，或者在沒有適宜地把事業付托給有階級覺悟的和有專長的工人的地方，過早地轉到國家經營大農場之企圖，只能使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遭受恥辱，在這些地方，在建立「蘇維埃農場」時，需要加倍的謹慎和激進的準備才行。

第三，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裏，甚至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裏，都還保存有大土地佔有者對周圍小農的中世紀的、半力役的剝削之殘餘，例如：德國的小佃戶，法國的對半分佃戶，美國的移分佃戶（在南方諸州在大多數場合之下，不僅黑人，而且有時也有白人遭受這樣的剝削）。在類似場合之下，無產階級國家方面必須無條件地把小農所租的土地交給以前的佃戶去無代價的使用，因為其他的經濟的和技術的基礎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把這

種基礎創造起來的。

大農戶底農具，必須無條件地被沒收而轉化為國家財產，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在以這種農具供給國營大農場以後，周圍的小農在遵守無產階級國家所製訂的條件之下，也能無代價地加以使用。

假如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的第一個時期，不但沒收大土地佔有者之地產，而且把作為反革命底領袖和全體農村居民底無情壓迫者的大土地佔有者加以驅逐或監禁，乃是無條件地必要的，那末，隨着無產階級政權不但在城市裏面，而且在鄉村裏面之日益鞏固起來的程度，就必須有系統地努力於利用這個階級中具有寶貴經驗、知識和組織才能的人們（在極可靠的工人共產黨員底特殊監督之下），去創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

（七）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社會主義的鞏固，只有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澈底壓服了剝削者底任何反抗和保證了對自己的完全的安定和完全的服役以後，依照大規模的集體生產的原則和根據最新的技術基礎（全部經濟電氣化），把全部工業加以改組的時候，才可以算有保障了。只有這，才能使城市得以對於落後的、散漫的農村給以這樣急進的技術的和社會的援助，以致這種援助替農作和一般農業勞動生產力之極度提高創造物質的基礎，藉以用模範的力量，刺激小自耕農為其自身的利益而轉到大規模的集體的、用機器耕種的農業經營上面去。這個不可爭辯的理論的真理，名義上為一切社會主義者所承認，但在

實際上則爲支配黃色第二國際和支配德英「獨立黨人」以及法國朗格派領袖們的機會主義所曲解。這種曲解就在於把注意力轉移到比較遼遠的、美麗的和玫瑰色的將來，把注意力從艱難的、具體的轉變和接近這種前途的最近的任務轉移開來了。在實踐上這就引導到教人與資產階級妥協，說教「社會和平」。就是說，引導到對無產階級之十足叛變了，而無產階級現在正是在到處因戰爭而造成的空前未有的破壞和貧困之條件下，正是在區區少數富豪由於戰爭而大發其財和卑鄙無恥之條件下鬥爭着。

正是在農村裏爲社會主義而順利鬥爭底真正的可能性，需要：第一，一切共產黨在工業無產階級中培養它有犧牲必要和爲了推翻資產階級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而甘心犧牲之意識，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其意就是無產階級組織與領導一切勞動的與被剝削的羣衆的才能，也就是先鋒隊爲了這個目的而作最大的犧牲之才能和英雄主義；第二，爲了勝利，需要使農村中勞動的和最受剝削的羣衆因工人之勝利用犧牲剝削者的辦法而得到其地位之立即的和大規模的改善，因爲不如此，則農村之援助工業無產階級是沒有保障的，特別是無產階級就不能保障城市之糧食供給。

(八) 鄉村中的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置在一種特別被壓抑、散漫、往往是半中世紀依存底條件之下，組織這種羣衆和教育這種羣衆去進行革命鬥爭之絕大困難，要求共產黨對農村中的罷工鬥爭予以特殊的注意，對農業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底羣衆罷工予以盡力的援助和各方面的發展。

俄國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有兩次革命底經驗，現在又由德國及其他先進各國底經驗所證實和擴展了，這種經驗指出：只有日益發展的羣衆罷工鬥爭（在鄉村中，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可以而且必須吸收小農加入這種羣衆罷工鬥爭），才能打破鄉村的睡眠狀態，喚醒鄉村中被剝削羣衆底階級意識和對於階級組織之必要性的意識，在他們面前明白地和實踐地顯露出他們和城市工人聯合之意義。

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責斥那些不但漠視農村中的罷工鬥爭，而且（如考茨基）從消費品生產有減少危險底觀點上出而反對這種鬥爭的社會主義者爲叛徒、爲變節者，這種社會主義者，可惜，不但在黃色第二國際裏面是有的，而在退前這假第二國際的歐洲特別重要的三個政黨裏面也是有的。假使不在實踐上用確鑿的事實證明：共產黨人和工人領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發展和勝利看作是高於世界上的一切，善於爲了這而作最嚴重的犧牲，那末，任何的綱領和莊嚴的宣言，都沒有任何價值，因爲除此以外，是沒有免除飢餓、破壞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出路和救救方法的。

特別必須指出的，就是舊社會主義底領袖和【工人貴族】底代表者，現在往往向共產主義作口頭上的讓步或甚至在名義上轉到共產主義的方面來，以保存其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羣衆中間的聲名，對於這些舊社會主義底領袖和【工人貴族】底代表者，應就其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的程度，就其担負負責職務的能力，即在革命的意識和革命的

鬥爭之發展日益劇烈，在土地佔有者和資產階級（富農）之反抗日益殘酷，在社會主義妥協派和共產主義革命派之間的區別日益明顯的這種工作中担負負責職務之能力，加以考驗。

（九）共產黨必須用一切力量，儘可能迅速地轉變到在農村中成立蘇維埃，首先是區庸工人和半無產者底代表蘇維埃上面去。只有與羣衆的罷工鬥爭及與最受壓迫的階級聯系起來時，蘇維埃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才能如此鞏固起來，以致使小農服從自己的影響（然後吸收在自己的機構以內）。如果由於土地佔有者和富農之壓迫之嚴重，及由於缺乏產業工人及其工會方面之援助，而罷工鬥爭尚不發展，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之能力還很薄弱，那末，在鄉村成立蘇維埃就要求進行一種長期的準備工作：建立共產黨支部，即使是極小的；加強鼓動，最通俗地解釋共產主義的要求；用特別突出的剝削與壓迫之實例去說明共產主義的要求；組織產業工人到農村去的有系統的旅行團，等等。

一九二〇年七月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作——

茲將下面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起草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草案，提交同志們討論，特請求全體同志，尤其是那些對這些非常複雜的問題中這個或那個問題有具體知識的同志，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提出修正，或提出補充，或以簡短的（最多不超過兩頁）方式加以具體的說明，特別是關於下列各點：

奧地利的經驗；

波蘭猶太人和烏克蘭人的經驗；

阿爾薩斯—洛林和比利時；

愛爾蘭；

丹麥—德意志的關係；

意大利和法蘭西與意大利和斯拉夫的關係；

巴爾幹各國的經驗；

東方各民族；

與大回教主義的鬥爭；

高加索的關係；

巴什基爾與韃靼共和國；

基爾共斯坦；

土耳其斯坦的經驗；

美洲黑人；

殖民地；

中國——朝鮮——日本。

N. 列寧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

(一)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因其本性，是慣於抽象地或形式地提出一般平等的問題，關於民族平等的問題，也是如此。在一般人的個性平等姿態之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宣佈，私有者與無產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在形式上或法律上一律平等，藉以實行對被壓迫階級的最巨大的欺騙。平等這個觀念本身乃是商品生產關係底一種反映，資產階級藉口似乎人的個性之絕對平等，把這一觀念變成反對消滅階級的鬥爭底工具了。但是，平等這個要求之真正的意義，就只是在於要求消滅階級。

(二) 共產黨乃是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羈絆而鬥爭之自覺的代表者，它按照其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鬥爭及揭露這種民主主義欺騙和虛偽的基本任務，在民族問題上，應當作為根基的、不是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則，而應當是：第一，精確估計歷史的具體情況，尤其是經濟的情況；第二，明白地把被壓迫階級、勞動者、被剝削者之利益跟表示統治階級利益的一般人民利益這個總的概念分別開來；第三，同樣明白地把被壓迫的、附屬的、不平等的民族跟壓迫的、剝削的、全權的民族區別開來，以與資產

階級民主主義的虛偽相對立，這種虛偽抹殺了那為財政資本及帝國主義時代所特有的極少數最富有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對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口之殖民地的和財政的奴役。

(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曾經以特別的明確性在全世界一切民族和被壓迫階級面前揭穿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詞句底欺騙性，在事實上表明了，聲名狼藉的「西歐民主主義」底凡爾賽條約跟德國地主和德皇底布列斯特條約比較起來，乃是對於弱小民族更殘酷的更無恥的暴行。國際聯盟和協約國戰後的全部政策，更明白更辛辣地暴露了這個真理，而到處加強了先進國度無產階級以及殖民地國度和附屬國一切勞動羣衆底革命鬥爭，加速了那在資本主義之下各民族可能和平共存和平等的小資產階級幻想之破滅。

(四)從上述的基本原則，可以得出結論說，共產國際對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底全部政策，須以一切民族及一切國度底無產者和勞動羣衆接近、以便進行為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共同的革命的鬥爭為根基。因為只有這種接近才能保證戰勝資本主義，沒有對資本主義的勝利，則民族壓迫與民族不平等之消滅，就不可能。

(五)現在世界政治環境已把無產階級專政提在議事日程上了，世界政治底一切事變，不可免地都要集中於一個中心點，即：全世界資產階級反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不可免地一方面要把一切國度內前進工人底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要把殖民地和被

壓迫民族底一切民族解放運動，統統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些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由於慘痛的經驗，堅信除了蘇維埃政權戰勝世界帝國主義以外，對於他們是沒有其他的出路的。

(六) 因此，在現今不能只限於僅僅承認或宣佈各民族勞動人民之互相接近，而須要進行一種實現一切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與蘇俄最密切聯盟之政策，而依照各國度無產階級中間共產主義運動或落後國度工人農民或落後民族中間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之發展程度，確定這種聯盟底形式。

(七) 聯邦 (Federation) 是走向各民族勞動人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無論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對其他蘇維埃共和國 (過去的匈牙利、芬蘭、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阿才拜疆、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 的關係來說，或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內部對從前既無自己國家存在、也無自治權的各民族 (例如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內部所建立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和韃靼自治共和國) 之關係來說，聯邦在實踐上都已經顯示出了自己的適當性了。

* 在校樣上，列舉在這裏有如下的補充：『(七) 增加：聯盟 (Konfederation) (斯大林) ？』

——校閱者

(八) 在這個關係上，共產國際底任務，就在於進一步發展和研究這些新的在蘇維埃制度與蘇維埃運動底基礎上而發生的聯邦，並根據經驗加以檢討。在承認聯邦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時，必須努力於一種日益密切的聯邦式的聯盟，並同時注意：第一，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底十分密切的聯盟，就不能保持這些蘇維埃共和國底生存，因為它們正處在全世界底軍事上無比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底包圍之中；第二，各蘇維埃共和國須要作密切的經濟聯盟，否則就不可能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和保障勞動人民之福利；第三，必須同時注意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而由一切民族無產階級所調節的、整個的全世界經濟之趨勢，這樣的一種趨勢，在資本主義下就已經完全公開地表現出來了，在社會主義下，更應無條件地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和充分的完成。

(九) 在國內關係方面，共產國際底民族政策，不能只限於單純地、形式地、純粹廣告式地、在實踐上不負任何責任地承認民族平等，如資產階級民主派之所作者——不管他們是否坦白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或如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用「社會主義者」的稱號把自己隱藏起來，都是一樣者。

● 在校樣上列寧在這裏有如下的補充：「(九) 增加無產階級的政策在消除民族爭吵當中的意義。」

——校閱者

共產黨不但在其全部的宣傳和鼓動上，在國會講台上和在國會以外——都須不屈不撓地揭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違反其「民主」憲法而對民族平等及少數民族權利保障之經常的侵害，而且必須第一，經常地普遍解釋：只有蘇維埃制度才能實行真正的民族平等，它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起初包括無產者，然後把全體勞動羣衆團結起來；第二，一切共產黨必須直接援助附庸的或不平等的民族（例如愛爾蘭、美洲黑人，等等）中間及殖民地裏面的革命運動。

沒有後邊這個特別重要的條件，則反對對附庸民族和殖民地壓迫之鬥爭，以及對其國家分離權之承認，都是虛偽的牌子，如我們在第二國際各黨裏面所見到者。

（一〇）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事實上在一切宣傳、鼓動和實際工作裏面則以市儈的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代替它，這不但在第二國際底各黨裏面，而且在退出了這個國際的各黨裏面，甚至往往在現在自稱爲共產黨的各黨裏面，都是十分普遍的現象。無產階級專政由一國專政（即只在一個國度內存在而不能規定全世界政治的專政）轉變爲國際專政（即至少若干先進國度底無產階級專政而能夠對整個世界政治起決定的影響）之任務愈是迫切，則反對這種弊害、反對最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的鬥爭，亦愈佔重要的地位。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只是把承認民族平等宣佈爲國際主義，把民族的利己主義（至於這種承認只是口頭上的承認，那更不必說了）仍神聖地

保存起來。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則要求：第一，一國的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須服從於全世界範圍內這一鬥爭底利益；第二，實現了戰勝資本主義的民族，要能夠而且準備為推翻國際資本而作最大的民族的犧牲。

因此，在已經完全是資本主義而有着事實上確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工人政黨的國度裏，與對國際主義這概念和政策的機會主義及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曲解作鬥爭，是第一個和最重要的任務。

(一一) 對比較落後的、以封建的或家長的和家長農民的關係佔優勢的國度和民族，必須特別注意下列各點：

第一，一切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度裏面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解放運動；首先，在殖民地的威財政的關係上為落後民族所依附的那些國度底工人，尤有給與最積極援助的義務；

第二，必須和在落後國度裏面有影響的教會及其他反動的與中世紀的分子作鬥爭；

第三，必須與大回教主義和類似思潮作鬥爭，因為這種大回教主義和思潮企圖把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和加強可汗、地主、回教僧侶等地位的圖謀聯合起來；

第四，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度裏面反對地主、反對大

* 在校本上，門下有如下的附註：「第二及第三條——校閱者」。

土地佔有制、反對封建主義一切表現或殘餘的農民運動，必須努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革命的性質，盡可能地實行西歐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和一般落後國農工農民革命運動之更密切的聯盟；

第五，必須跟那些給落後國家裏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解放潮流染上共產黨主義色彩的企圖作堅決的鬥爭；共產國際只有在能把落後國家裏面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真正的、非只是名義上的共產黨——底分子團結起來，並教育他們，使他們認識自己特殊的任務，即在跟他們民族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的任務這個條件之下，才應當援助殖民地與落後國度裏面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運動；共產國際應當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度資產階級民主派成立臨時的聯盟，但不要和他們合流起來，甚至在萌芽形迹之下，都必須無條件地保持無產階級運動底獨立性。

第六，必須堅定地在一切特別落後國度最廣大的勞動羣衆中間，解釋和揭露帝國主義列強有系統地所進行的欺騙，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製造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姿態之下，其實是在創造經濟上、財政上和軍事上完全依賴它們的國家；在今天的國際情況之下，除開與蘇維埃共和國聯

* 在按線上，列表有如下的補充：「第四點增加：尤其是必須集中一切力量，用建立「勞動者蘇維埃」等等的辦法，把蘇維埃制度底基本原則應用於那些由資本主義關係統治地帶的羣衆。」

—— 蘇維埃

盟以外，附屬的和落後的民族，是沒有其他的出路的。

(一二) 幾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對殖民地民族與弱小民族的壓迫，在被壓迫國度底勞動羣衆中間，不但留下了對一般壓迫民族和對這些民族底無產階級的憤恨，而且留下了對它們的不信任。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這些民族底無產階級或大多數官方領袖（其時社會沙文主義者，在「保衛祖國」這個口號掩護之下，保衛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壓迫殖民地與掠奪財政上附庸的國度的「權利」）對社會主義的卑鄙的叛變，不能不使這種完全合理的不信任更加強化。另一方面，其國意是落後，則其小農業經營、家長制關係、和閉塞風氣愈是強固，這就不可避免地引導到：那最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即民族利己主義與民族排他性底成見要特別強大和特別頑固。這些成見，只有在先進國度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消滅以後，只有在落後國度經濟生活的整個基礎澈底改變以後，才能消滅，因此，這種成見之死滅過程不能不是很慢的。由此可以知道，一切國度底階級覺悟的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必須對那些最長期受壓迫的國度和民族裏面的民族感情之殘餘，特別慎重和特別注意，同樣，必須作某種讓步，以期更迅速地克服這種不信任和潛裡成見。沒有一切國度和全世界民族無產階級乃至一切勞動羣衆自願聯合和統一的努力，則戰勝資本主義的事業是不能勝利完成的。

一九二〇年六月

民族解放運動與 共產國際之戰略和策略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代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我只限於作一個短短的緒論，然後馬林同志——我們委員會底秘書——關於我們在提綱裏面所作的修改將向你們作詳細的報告。在他之後，曾寫補充提綱的魯易同志講話。我們的委員會曾一致地通過了修改過的原來提綱以及補充提綱。所以關於一切重要的問題我們達到了完全的一致。現在我作幾點短短的說明。

第一，我們提綱底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麼呢？這就是對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之區別。我們強調這個區別，以與第二國際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相對立。在帝國主義時代，對於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特別重要的，是確定具體的經濟事實，並在解決一切殖民地民族問題時不要從抽象的命題出發，而要從具體現實所現象出發。

帝國主義特有的特點，就在於——現在整個的世界，如我們所看見的，乃分成了巨大數量的被壓迫民族和極少數

量的、擁有巨量財富和龐大軍事力量的壓迫民族。世界人口底絕大多數——共計十萬萬以上，假如我們估計世界人口爲數約十七萬萬五千萬，那末，大概十二萬萬五千萬左右，就是說，全世界人口約百分之七十，是屬於被壓迫民族，他們不是處於直接的殖民地的依賴關係之中，就是屬於殖民地的國家，例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或者就是爲某一帝國主義——大國底軍隊所征服，根據條約陷入了對該國的依賴地位。把各民族區別爲、劃分爲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這種思想，便貫穿了全部提綱——不但貫穿了我簽名和早就發表了的第一個提綱，而且貫穿了魯易同志底提綱。後一提綱，主要地是從印度及其他爲英國所壓迫的大民族地位之觀點寫成的，它們對於我們的極重大的意義也就在這裏。

我們提綱底第二個指導思想，就在於：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之下，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各民族底相互關係，各國底整個世界體系，乃是由帝國主義民族的不大集團與以蘇維埃俄羅斯爲首的蘇維埃運動和蘇維埃國家的鬥爭來決定的。假如我們忽視這一點，那末，我們既不能正確地提出民族問題，也不能正確地提出殖民地問題——即使所處理的問題是世界底極偏僻的一角。也只有站在這種觀點上時，共產黨才能正確地提出關於文明國度或落後國度的每一個政治問題和給與這些問題以答案。

第三，我想特別着重講一下落後國度裏面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曾經引起了若干意見底分

歧。我們曾經爭論：主張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應當援助落後國度裏面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這在原則上和理論上是不是正確的呢？這種爭論底結果，我們曾達到了一致的解決：用「民族革命運動」以代替「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毫無疑義的，凡民族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運動，因為落後國度裏居民底基本羣衆乃是農民，而農民乃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者。誰要是以為無產階級政黨——假如它在這樣的國度裏面，一般地能夠發生的話——不與農民運動成立一定的關係，不在事實上援助農民運動，就能够在這種落後的國度裏面進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在這裏却有人駁斥說，假如我們僅說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那就抹殺了改良主義運動和革命運動之間的任何區別。可是，這種區別，最近幾年來在落後的和殖民地的國度裏面，却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因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正以一切力量，企圖在被壓迫的民族中間培植一種改良主義的運動。在剝削國度底資產階級與殖民地國度底資產階級之間，已經發生成了某種程度上的接近，以致使被壓迫國度底資產階級，往往——也許甚至在大多數的場合之下——雖然它支持民族運動，但同時却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起來。就是說，和他們一起來反對一切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在委員會裏面，不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認為對這種區別加以注意和差不多到處拿「民族革命的」這術語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這個術語是唯一正確的。這種代替底意義，

就在於：我們共產主義者，只有在這種場合之下，即在殖民地國度底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是真正革命的、而其代表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的被剝削羣衆時，才應當而且將要援助這種運動的。假如連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的話，那末，共產主義者在這些國度裏面就應當和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作鬥爭，第二國際底英雄們也是在這種資產階級之列的。在殖民地國度裏面已有改良主義的政黨存在了，有時這些政黨底代表者以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自命。現在，我所說過的這兩區別已經貫徹了全部的提綱，並且我相信，由於這一點，現在我們底觀點是更十二分明確地被規定了。

此外，我還要說一說農民蘇維埃。在從前屬於沙皇制度的殖民地裏，在像土耳其斯坦這些落後的國度裏，俄國共產黨人底實際工作，曾經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怎樣在把共產主義的策略和政策應用於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因為這些國度底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們裏面還統治着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因此，那兒還談不上純粹無產階級的運動。在這些國度裏，幾乎沒有產業無產階級。不管如此，在那裏我們仍然負擔起了而且應當擔負起領導底作用。我們底工作曾經向我們表明：在這些國度裏面，須克服極大的困難，但是我們工作底實際結果却也表明：即使有這些困難，但在幾乎沒有無產階級存在的地方，也可以在羣衆中喚起追求獨立的政治思想和獨立的政治活動之志向。這種工作，對於我們，比較對於西歐各國來的同志們更艱難些，

因為無產階級在俄國正忙於國家底工作。十分明顯的，關於半封建的依存地位的農民，是能夠很好地了解蘇維埃組織底思想和實現這種思想的。同樣很明顯的，不但受商業資本所剝削而且在封建的基礎上受封建主和國家所剝削的被壓迫羣衆，在他們的條件之下是可以應用這種武裝、這種組織的形式的。蘇維埃組織底思想是很簡單的，不但可以被應用到無產階級的關係上去，而且可以被應用到農民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關係上去。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暫時還不十分大，但是，在有幾個殖民地國度底代表參加的委員會裏面的爭論，却絕對不可反駁地向我們證明了，在共產國際底提綱裏面務須指出：農民蘇維埃，即被剝削者底蘇維埃，乃是不但適用於資本主義各國，而且也適用於有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各國之一種手段，共產黨和那些聯合於共產黨的分子底責任，就是在落後的國度和在殖民地裏，到處宣傳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底思想；在那裏，他們應當在環境允許的限度以內，努力建立勞動人民蘇維埃。

在這裏，正給我們開闢了實際工作底一個極有趣味的和極重要的領域。目前，在這方面，我們底一般經驗還不特別大，可是，我們將逐漸積蓄越來越多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先進國度底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當幫助落後的勞動羣衆，以及在蘇維埃共和國底勝利的無產階級跟這些羣衆握起手來而能夠予他們以援助時，落後的國度之發展是能夠超越它們目前的階段的——關於這點，是可以沒有任

何爭論的了。

在委員會裏面，關於這個問題，不但與我所起草的提綱相聯系，而且尤其與魯易同志底提綱相聯系，曾經進行了十分熱烈的爭論，魯易同志將在這裏發言，辯護他的提綱，並且曾經一致地通過了對於這個提綱的若干修正。

問題底提法會是這樣的：有人主張，對於那些現在還在解放，並且在戰後的現在已經可以在他們中間看到一種進步運動的落後民族，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能不能承認這種主張是正確的呢？我們曾經「否定地」答覆了這個問題。假如勝利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將在他們中間進行有系統的宣傳，而蘇維埃政府將以它所擁有的一切手段去幫助他們，那末，以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對於落後民族是不可避免的意見，顯然是不正確的。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後國度裏，我們不但應當成立獨立的戰鬥員幹部，獨立的黨的組織，不但應當進行關於組織農民蘇維埃的宣傳，並努力使這種組織適應於前資本主義的條件，而且共產國際應當提出並在理論上確立這樣的命題：即落後的國度，靠先進國度底無產階級之幫助，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達到蘇維埃制度，並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達到共產主義。

這裏，需要用那些手段，那是不能預先指出的。關於這，實際的經驗會告訴我們的。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蘇維埃底思想，是為最偏僻的民族中間的一切勞動羣衆所接

近的，這種組織，即蘇維埃，一定適應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制度底條件，共產黨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應當在全世界上立刻開始進行。

我還要指出，共產黨不僅在他們本國，而且在剝削民族利用以控制其殖民地人民的軍隊裏面的革命工作，具有怎樣的意義。

英國社會黨底費爾契同志，曾經在我們的委員會裏面講到了這個問題。他曾經指出，英國普通的工人將以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就是賣國。是的，充滿着侵略主義與沙文主義情緒的英美工人貴族，對於社會主義是一種最大的危險，他們是第二國際底最有力的支柱，在這裏，我們所看到的是資產階級國際底領袖和工人之最無恥的變節。在第二國際內，他們同樣也在討論過殖民地的問題。巴塞爾宣言也十分明白地說到了這個問題。第二國際底各黨都提出了革命地行動的諾言，但是，一種真正革命的工作，和在剝削和被壓迫民族實行反對壓迫者起義時，對他們的一種真正革命的援助，這在第二國際底各黨中間，我們是看不到的。據我所知，在大多數退出了第二國際並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各黨中間，也是同樣看不到的。這是我們必須向全世界公佈的，這是不可以反駁的事情。我們就將知道，人們會不會企圖反駁這種事情。

一切這些意見，都應作為我們決議底基礎，這些決議無疑地太長了，但我相信它們仍是有用處的，並將在民族

和殖民地問題上，幫助真正革命工作之發展和組織，而我們的重要任務，也就是在這裏。

論國會主義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在共產國際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波爾蒂加同志，顯然要在這裏替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辯護，但是，他對於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所引以贊成國會活動的一些論據，却沒有答覆一個。

波爾蒂加同志曾經承認，歷史的經驗不是人工創造出來的。他剛才告訴我們，須要把鬥爭轉移到別的方面去。難道他不知道：每一個革命的危機都伴以國會的危機嗎？誠然，他說過，須要把鬥爭轉移到別的方面去，移到蘇維埃上面去。可是，波爾蒂加同志自己承認，蘇維埃不是人工地製造的。俄國的例子證明，蘇維埃不是在革命時期，就是直接在革命之前才能組織起來。尚在克倫斯基時期，蘇維埃（即孟塞維克的蘇維埃）就是這樣組織的，就是它絕不能使它自己構成無產階級的政權。國會乃是歷史發展底產物，在我們還沒有壯大到足以解散資產階級的國會以前，我們是不能把它從生活中抹殺掉的。只有作為資產階級國會之議員，才能從特定的歷史條件出發，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社會及國會制度的鬥爭。資產階級在鬥爭中

所使用的同一的手段，無產階級也應當加以利用，——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你可不能斷言說，這不是這樣的，假如你要爭論這的話，那末，你就應當從而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底經驗一筆勾銷。

你們說過，職工會也充滿着機會主義的情緒，職工會也是一種危險；可是，另一方面，你們却說過，對於職工會需要作個例外，因為它們本身是工人的組織。可是，這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才是對的。在職工會裏面，也有極落後的分子：即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之一部分、落後的工人和小農。一切這些分子，都真地在想，國會是代表他們底利益的；要反對這種情形，就須要在國會內工作，並用事實給羣衆指出真理。落後羣衆是不懂理論的，他們所需要的是經驗。

我們在俄國已經看到這一點了。我們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曾迫不得已而召集立憲會議，爲的給落後的無產階級證明，它經過立憲會議是什麼也達不到的。爲了使無產階級能夠把這個和那個互相比較起見，我們曾經不得不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具體地對照一下，使他們看到蘇維埃是唯一的出路。

蘇奇同志是一位革命的工團主義者，曾經擁護這同一的理論，可是，邏輯並不是在他的方面。他曾經聲明，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這是很明白的事情。但是，波爾蒂加同志，假如你斷言你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那末，就可以要求你更有邏輯些。必須要知道，用什麼方法能夠打

倒國會。假如你能夠在一切國度裏用武裝起義去打倒國會，那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我們在俄國，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都證明了我們粉碎資產階級國會的意志。但是，你却忽視了這樣的一個事實：這沒有很長時期的準備是不可能的，並且在大多數國度裏面，要一下子就破壞國會還是不可能的。我們只好在國會內去進行破壞國會的鬥爭。你用你的革命意志去代替那規定着現代社會各階級底政治路線的條件，因而，你忘記了，我們爲着破壞俄國的資產階級國會，甚至在我們勝利以後還不得不先召集立憲會議。你曾經說：『對的，俄國革命是不符合於西歐情況的一個例子。』但是，你却舉出了一種極輕率的論據，給我們證明這一點。我們已經走完了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時期。我們是在一種使我們不得不鼓動立憲會議選舉的時候，迅速地走完了這種時期。並且後來，在工人階級已經有了奪取政權的可能時，農民還相信有資產階級國會之必要。

在注意到這些落後分子時，我們曾經不得不決定進行選舉，用實例，用事實指示給羣衆看：在巨大的普遍的貧困時期所選舉出來的這種立憲會議，並不能表現出被剝削的各階級底希望和要求。這樣，蘇維埃政權和資產階級政權之間的衝突，不但對我們、對工人階級底實際是十分明白的事，而且對農民意絕大多數、對小職員、對小資產階級等等，都是很明白的了。在一切的資本主義國度裏，都有着工人階級底落後分子存在，他們確信，國會是人民底真正代表者，他們沒有看見在那裏使用着卑鄙諷刺的

手段。人們說，這就是資產階級所用以欺騙羣衆的工具。但是，這種論據却是掉轉頭來反對你的，反對你的提綱的。假如你不進到國會裏面去，你怎樣在真正落後的和爲資產階級所欺騙的羣衆面前，去暴露國會底真實性質呢？假使你站在國會外面，你怎樣去揭穿這個或那個國會主義的陰謀，這個或那個政黨底態度呢？假如你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末，你就必須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各階級底相互關係和各政黨底相互關係是相互密切聯系着的。我再重述一句，假如你不是國會議員，假如你拒絕國會活動，那你怎樣去指出這一切呢？俄國革命底歷史會正確地表明，工人階級、農民、小職員底廣大羣衆，如果他們沒有從他們切身的經驗信服的話，那是不能用任何論據使他們信服的。

在這裏，人們曾經說，我們參加國會的鬥爭，要喪失很多時間的，能不能想像出一切階級像對國會那樣同樣關心的一種別的機關來呢？這是不能人工製造出來的。假如一切階級都被牽入了國會的鬥爭，那末，這所以如此，是因爲利益和衝突都真正在國會裏面找得了它們的反映的緣故。假如到處一開始都可以一下子喚起一個——譬如說吧——同盟罷工，以便一舉而推翻資本主義，那末，在各個不同的國度裏早就都發生革命了。可是，須要顧到事實，目前，國會還是階級鬥爭底一個舞台，波爾蒂加同志和擁護他底觀點的人們，都必須對羣衆說真話。德國是國會裏面可以有共產主義黨團的最好的例子，因此，你應當對羣

衆公開地說：「我們太弱了，不足以創立一個有堅密組織的黨」。這該是非說出不可的眞話了。可是，假如你使羣衆意識了自己的薄弱，那末，羣衆就不去做你的信徒，而變成你的敵人、變成國會制度底信徒了。

假如你說：「工人同志們，我們是很弱的，以致我們不能創立一個足夠紀律化的黨」，它可以強制國會議員來服從黨，那末，工人們就會拋棄你的，因為他們將要說：「我們如何能夠跟這些軟弱無能的人們一起去建設無產階級專政呢？」

假如你以為在無產階級勝利之日，知識分子、中間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會立刻變成共產主義者，那你就太天真了。

假如你沒有這種幻想，那末，你就在現在應當準備無產階級去檢閱自己的隊伍。在國家工作的一切領域裏面，你都不能從這個規律中找到一個例外。你到處都可以看到自稱爲共產主義者的機會主義的辯護士，那既不承認紀律、也不承認共產黨、更不承認無產階級國家的小資產者。假如你不準備工人去創立一個真正紀律化的黨，它可以強制自己的一切黨員服從它的紀律，那末，你就永遠不會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我想，因此，你不願承認，正是很多新的共產黨之軟弱，才迫使它們否認國會的工作。我確信，真正革命的工人底絕大多數，將追隨我們，而要表示反對你的反國會主義的提議的。

給德國和法國工人的一封信

——論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總結——

同志們！德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報紙，對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內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討論，正在予以很多的注意。資產階級的報紙正在最賣力地堅持這兩個黨裏面右的、機會主義的一部分之觀點。

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因為這些右派分子，基本上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如像狄特曼和克里斯賓，不善於革命地去思索，沒有能力藉助工人階級去準備革命和實現革命。和這些右的、機會主義的分子分裂，那是必要的事情，這種分裂乃是出結真正革命的、真正無產階級羣衆的唯一手段。

關於莫斯科「獨裁」等等的狂叫，只是一種轉移視線的手腕。事實上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二十個委員當中，只有五個是俄國共產黨黨員。關於「獨裁」等等的一切說法，都是自欺或欺騙工人的話。這種話是掩蓋某些機會主義領袖之破產的，正如德國共產主義工黨（KAPD）裏面類似的話遮蓋該黨領袖中某些離開無產階級革命進路的領袖之破產一樣。彷彿「莫斯科獨裁者」在加入共產國際條件裏

西和某幾個人作對的狂叫，也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話。在加入條件底二十條上明白地、黑白分明地寫着：對於右翼領袖和對於中央機關人選上的那些嚴格的規則中，經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底同意，得有「例外」。

既直接宣佈例外是可以允許的，就是說，絕對不允許某些個別的人物，是根本談不到的了。這就是說，完全承認有不是顧到過去、而是顧到現在之必要，有顧到個別人物、個別領袖觀點和行爲改變之必要。既宣佈經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底同意，得有例外——在這個執行委員會裏面，俄國人只佔四分之一——，這就是說，「獨裁」等等的狂叫，全係夢囈，全係說話。

所有這些狂叫，都只是轉移視線罷了。實際上則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分子和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之間正在進行着鬥爭。曾經而且現在仍屬於後者的，有希法亭、狄特曼、克里斯賓，以及德國和法國國會黨底很多議員等等。這兩個政治派別的鬥爭，正進行於全世界一切國度，而毫無例外，這種鬥爭有甚長時期的歷史；這種鬥爭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和以後，曾經到處都尖銳化了，而且現在還在尖銳化着。機會主義由「工人貴族」分子、職工會、合作社及其他組織裏面的舊官僚分子、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等等所代表。這一流派，在事實上因他們的動搖，因他們的「孟塞維主義」（狄特曼和克里斯賓們是完全和我們的孟塞維克相類似的），是在工人運動內部，在社會主義的政黨內部，實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不

洗清這個派別，不與該派分裂，不開除這個派別底一切著名的代表者，而要團結革命的無產階級，那是不可能的事。

狄特曼、克里斯賓們等，因他們長期動搖到改良主義和孟塞維主義方面去，因他們不會革命地去思惟、去行動，在事實上，因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乃是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實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實現無產階級服從於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只有和這些及其一類的人們分裂，才能實現革命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國際的統一，以推翻資產階級。

意大利的事變，甚至使那些沒有看到和狄特曼及克里斯賓們「統一」和「講和」會有怎樣害處的人們當中的最頑固的，都不得不睜開眼睛來了。意大利的克里斯賓們和狄特曼們（杜拉斯、蒲蘭波利尼、達拉哥那）在真正的革命到來時，都立刻開始妨害意大利的革命了。在整個的歐洲、在全世界，都是在向這個方向——或快或慢地、或多或少艱難和痛苦地——發展的。

現在是澈底丟棄所有這一切關於和狄特曼及克里斯賓們、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英國獨立工黨、法國社會黨等右翼可以「統一」和「講和」的絕對有害的幻想之時候了。現在是一切革命的工人從自己的黨中把這些人清洗出去和建立無產階級底真正統一的共產黨的時候了。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關於自由的謬論

(一)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第二百十三期上，發表了我的一封短短的給德國和法國工人的信——論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討論。十月五日意大利社會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轉載了這封信，並加上了一個按語，現在就來說一說這個按語，因為它明白地顯示出前進報主筆塞拉第同志所採取的立場之不正確性。

【列寧的解釋——我們讀到——在某種程度內緩和了那些苛刻的條件，這些條件乃是由不大能夠根據這麼大的距離和這種完全不同的情況之下正確地去估計人和情況的同志們所口授的……】

列寧丟開了他的犧牲品：毛底連尼……現在，列寧——我們不知道他是以自己的名義或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名義——說：「允許」有「例外」（經執行委員會底同意，在逐例之中）。

關於「犧牲品」——以毛底連尼——一位改良主義者為代表——諷刺式的按語，並沒有擊中目標。和塞拉第的意

見相反，我沒有提到毛底達尼（和朗格）底名字，決不是有意的。我爲了表徵派別的特點，特舉了這個或那個人底名字作爲例子，關於某一個別人的問題，我却放在一邊了，並且現在還是如此；我不負解決這種問題的責任，認爲這種問題是次要的，而指出得有例外。不管他如何聲明。塞拉第仍然深深知道（因爲他確切地引據了真進報上我的文章），我只是而且是只能用我自己的名義說話，而決不是用執行委員會的名義說話的。

塞拉第用他的說明使前進報的讀者離開了最重要、最基本、最本質的問題，即現在是否允許改良主義者留在意大利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以內的問題。塞拉第掩蓋了他所採取的立場之不正確性，努力把視線從本質的東西轉移到次要的和不正確的東西上面去。

應和這種情形鬥爭。應闡明本質的東西。

無論在這個接語和在別的文章裏面，塞拉第都說到莫斯科代表大會（即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意大利的事情沒有充分的熟悉。好像本質不是在於兩個基本方向之鬥爭，不在於如何解決是否允許和改良主義者「統一」的基本問題，而是在於關於「莫斯科」沒有充分熟悉的事件之意見分歧！

這種見解——和這種把注意力從主要問題轉移開來的企圖——之露骨的不正確性，由關於意大利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內部爭論的正式報告所揭露得很清楚了。這個爭論是於上述的那一期前進報出版之前幾天，即九月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及十月一日，在米蘭舉行的。

這個爭論以兩個決議的表決而告結束。這兩個決議之中，一個可以叫做共產主義的決議；另一個可以叫做『中派的決議』，或規避的決議，或以隱蔽的方式帶同改良主義者聯盟（『統一』）的決議。第一個決議以七票（特拉其尼、金那里、羅金特、銅達爾、卡蘇基、馬爾加來、柏龍乃）的利了；第二個決議被否決了（它有五票：巴拉托諾、查內里尼、巴策、家柯米尼、塞拉第）。

第一個決議以極度的明確性和極度的確切性為特徵。它開始指出，意大利革命鬥爭的『目前條件』，要求黨要有『很大的一致性』。接着說，在服從紀律的條件之下允許一切人留在黨內，這個條件過去未曾執行；希望那些抱有與第三國際底原則和策略相反的信仰的人們去服從紀律，那是錯誤的；因此，在接受莫斯科底二十一條件之後，應舉行一次『徹底的清黨』；把一切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分子從黨內趕出去。在這裏我們沒有看出任何人的名字，任何人的私事。在這裏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條明確的政治路線。在這裏精確地指出了這種決議的動機、意大利黨的歷史之具體事實、其革命形勢之具體特點。

第二個決議乃是規避策略和笨拙外交底模範；我們接受二十一條，可是承認，『這些條件允許有作懷疑解釋的可能』，『必須要使共產國際每一分部底政治規準跟該國底歷史條件和具體的、實際的特點符合一致，把這些規準交給國際批准』；決議強調有『根據二十一條保持意大

利社會黨統一之必要】；個別的破壞紀律的事件，必須受黨中央委員會的嚴格處罰。

共產主義的決議說：革命的形勢要求黨要有巨大的一致性。這是不可爭辯的。贊成與改良主義者「統一」的人們之決議，企圖迴避這個不可爭辯的真理，可又不致爭辯這個真理。

共產主義的決議說：意大利的特點是在於使改良主義者服從黨底決定的條件未被履行。這是問題的中心。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末，在一般的革命形勢尖銳化時，甚至也許在決定的革命的決戰底前夜，把改良主義者留在黨內，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罪惡的。

事實對不對呢？改良主義者是否執行了黨的決定，是否在事實上服從了黨，是否執行了黨底政策呢？改良主義者底辯護人之決議不能肯定地回答這些問題，它不能反駁共產主義者底否定的答案，而迴避了回答，反來覆去，一般地援引各國各有不同的具體特點，引用這一點是爲了迴避並以虛偽的眼光敘述意大利正是在這個時機底最重要的【具體特點】。因爲意大利底這種具體特點，正是在於，改良主義者事實上已經證明不能真正執行黨底決定了，不能在事實上實行黨的政策了。主張與改良主義者統一之人們之決議，對於這個基本問題，表現了逃避手腕，其實是完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的。

因此之故，塞拉第、巴拉托諾、蒼內里尼、巴篤和家柯米尼，已經十分明白地和不可爭辯地證明了他們是根本

不正確的，他們的政治路線是根本錯誤的。

意大利黨中央委員會裏面的爭論更加暴露了塞拉第路線之這種十足的不正確。共產主義者恰恰指出了，改良主義者依舊像現在這樣的繼續下去，就不能不對革命息工，正如他們在不久以前佔領工廠的意大利工人底革命運動時期曾經對革命息工一樣。

問題的核心就在這裏！假若黨內有着對革命息工的人們存在，那末，如何能夠準備革命，如何能夠迎接決定性的戰鬥呢？這不僅是一個錯誤，這是一種罪惡。

假如塞拉第像他於十月十四日在人道報上所發表的一封信裏面所公開說的，打算只開除杜拉第一人*，那末，在這裏，塞拉第底錯誤也已經為事實所揭穿了。因為意大利的改良主義者，不僅召集了他們獨特的小派別大會（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一日於萊喬·愛米里亞），不僅在該大會上重復了他們改良主義觀點中的一切本質的東西，不僅在這個大會上為非力浦·杜拉第舉行了非常莊嚴的喝采，並

* 這封信中主要的地方如下：『我們仍都贊成莫斯科的條件。問題只在於這些條件之選用，我新曾，應清除黨內的有害的分子——我會建議開除杜拉第，但是，我們不應失去職工會和合作社底羣衆。別的人是希望根本分裂的。意見的分歧就在於此。』（見十月十四日人道報，旁註是塞拉第加的。）

且用特列佛斯的口宣稱：「要就是讓我們留在黨內，要就是我們全體脫離黨。」附帶地說一句，資產階級的報紙和改良主義者自己都力謀誇張他們這次小派別大會的意義。但是我們在十月十三日的前進報（米蘭版）上却直接讀到，改良主義者總共只召集了黨底二百個分部底代表，而全黨底分部則有九千個！

可是，我們還是來詳細地說一說塞拉第關於問題的本質所提出的主要論據。塞拉第害怕分裂，以為分裂是會削弱黨，特別是削弱職工會、合作社及市議會力量的。不要破壞為社會主義建設所必要的這些機關——這就是塞拉第底基本思想。

「從那裏我們可以得到這末多的「共產主義者」——他說（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米蘭版的前進報上說）——，即使是昨天的最火熱的共產主義者，去担任我們根據特拉其尼的建議而趕走了人們的那一切社會職務呢？」

塞拉第同志在他所主編的共產主義雜誌（第二十四期一六二七頁）上所登的他的關於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一篇論文裏面，也有同樣的思想：

「請你設想一下米蘭市政吧，它不是由有才能的人管理的，而是由一些自昨天起以火熱的共產主義者著名的新人管理的。」

塞拉第害怕破壞職工會、合作社和市政，他害怕新人有能力和犯錯誤。

共產主義者害怕改良主義者對革命怠工。

這個對照顯示出了塞拉第底原則上的錯誤。他時時在重複着一個思想：有採取靈活策略之必要。這個思想是不可爭辯的。但是，在一定的意大利情況之下，應當向左走，而塞拉第却偏向右邊來，這對於我們有什麼用處呢？爲了勝利地完成革命和保衛革命，當意大利的黨還需要向左走相當的一步（決不可以縛住自己的手，並不可以忘記，以後的情況很可能要求向右走相當的幾步）。

在自己的隊伍裏面有改良主義者證塞羅克存在，那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就不能獲得勝利的，就不能保衛革命的。這在原則上是明白的事情。這是由俄國和匈牙利的經驗所明顯地證實了的。這是一個有決定性的考慮。拿職工會、合作社及市政等底『損失』或失敗、錯誤、破產之危險來和這門危險相比較，那簡直是可笑的，不僅是可笑的，而且是罪惡的。爲了米蘭市政會不會失敗這種考慮，而以革命底整個運動置諸孤注一擲，這就是說，完全失去理智，完全不懂革命底基本任務，完全不善於準備革命的勝利。

我們在俄國，因爲新人和非專門的人在合作社、市政府、職工會等等裏面的不會工作，曾經犯了成千的錯誤，遭受了成千次的破產、損失等等。我們毫不懷疑，別約，比較文明的民族，這樣的錯誤會犯的少些。但是，縱有這些錯誤，我們却已經獲得了重要的東西：無產階級擊取了政權，並且我們保持這個政權有三年之久了。

塞拉第同志所指出的錯誤是局部的問題，同在革命當

中容許孟塞維克對革命怠工的「錯誤」比較起來，其改正要容易一百萬倍的。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匈牙利已經明白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因為在俄國無產階級政權的三年以來，曾有過多次的困難局面，那時，如果讓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留在我們黨內，或甚至以多少可注目的數目留在中央的蘇維埃機關如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類，那末，蘇維埃政權一定早就被推翻了。

索拉第沒有理解意大利現在所有的這種過渡時機底特點，在這個時機，如一般公認的，問題就是迎接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爲了奪取國家政權而進行的決定的鬥爭。在這樣的時機，不但從黨內驅逐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和索拉第派是無條件地必要的，而且甚至驅走可能動搖和表現動搖到與改良主義者「統一」方面去的優秀的共產主義者，從一切負責的職務上趕走他們也可以是有益的。

舉一個顯明的例子。剛剛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和以後不久，俄國很多卓越的共產黨人，都犯了錯誤，這種錯誤現在我們不願再提及了。爲什麼不願提及呢？因爲如沒有特別必要，再提已經完全糾正了的錯誤，那是不正確的。對於意大利的工人，回憶一下這些錯誤是有益的。在我所說的那個時期，這些著名的布爾塞維克和共產主義者，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李可夫、諾金和米留金，都表現了動搖，害怕布爾塞維克使自己太孤立，從事起義太冒險，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底某部分太不讓步了，

這次的糾紛竟達到這種程度，這些同志示威式地辭去了黨內工作及蘇維埃工作底一切負責職務，使蘇維埃革命底敵人大為高興。事情竟弄到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報上對辭了職的那些同志，展開了非常激烈的論戰。經過了幾個星期以後——至多經過幾個月以後，所有這些同志都認識了他們的錯誤，又回到黨的和蘇維埃底負責職務上來了。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那是不難明白的。在革命底前夜和在最劇烈地爭取革命勝利的時期，黨內些微的動搖都可以斷送一切、都可以破壞革命、都可以使政權從無產階級手中失去的，因爲這種政權還沒有鞏固，因爲對它的襲擊還是非常強大的。假如動搖的領袖在這樣的時期滾開，這不是削弱黨，而是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和革命。

現在在意大利正是這樣的一個時期。革命的危機正在全國範圍內成熟着，人人都可以看到和認識到這一點的。無產階級已經用行動證明了，它是能夠自發地抬起頭來，能夠掀起羣衆走上強大的革命的運動。意大利的貧農或半無產者（塞拉第同志毫無理由地染上了在使用這個名詞時加上一個問號的壞習慣：這是一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它表達着一種正確思想，這思想已由俄國和意大利的事實所證實了，這就是貧農一半是私有者，一半是無產者）——意大利的貧農已經用行動證明，他們是能夠追隨於無產階級之後而加入革命鬥爭的。現在爲意大利革命的勝利所最必要和絕對必要的事情，就在於使一個真正共產主義的黨，在決定的時機不會動搖和不會表現弱點的黨，把高

度的狂熱，對革命的忠誠、殘力、毫無顧忌的勇敢和決心融合於一身的黨，成爲意大利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真正的先鋒隊。在非常困難的、非常艱苦的、會有極大犧牲的鬥爭當中，獲得勝利，要在全世界資產階級採取極度尖銳的暗殺、陰謀、誹謗、造謠、引誘、暴力的局面之下，要在每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每一個杜拉第派、每一個「中派」、每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社會黨黨員、無政府主義者都表現出最危險的動搖的局面下，堅持已取得的政權。在這樣的時機，在這樣的局面之下，黨應當比平時或比不困難的時期更要百倍地鞏固、堅決、勇敢、熱誠和無情。在這樣的時機和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假如孟塞維克，像參加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一日萊蕪·愛米里亞大會的人們，全體脫離黨，假如甚至卓越的共產黨人，如像黨中央委員會底現任委員，巴拉托諾、蒼內里尼、巴賽、家柯米尼、塞拉第，離開黨的領導，那末，黨將更百倍地加強，而不是削弱。

後面這一類人們中間的大多數，即使現在辭了職，但無疑的在認識了他們的錯誤，在無產階級勝利以後，在這種勝利鞏固以後，會很快地回過頭來的。甚至意大利的孟塞維克即杜拉第派底一部分，也有可能^在最大的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以後，會回過頭來，被收入黨的，正如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曾經站在障礙物底另一面的一部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現在（我們在革命之後已經過了三個困難的年頭）又轉到我們這方面來了一樣。

現在意大利革命的無產階級，不但處在如我所說的非

常困難的鬥爭時代的前面，而且處在最困難的鬥爭時代的前面。最困難的事情還在前面。我以為瞞去這些困難是一種輕率和罪惡。我很奇怪，塞拉第同志如何能夠沒有真誠地在他的共產主義雜誌（第二十四期，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五——三十日）上發表了這末一篇輕率的論文，如G. F. 底：我們會被封鎖嗎？和這篇論文底作者相反，我個人以為，如果無產階級在意大利勝利的話，則英國、法國和美國對該國實行封鎖是可能的和可信的。據我看來，格拉家第同志在其於意大利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見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的前進報，米蘭版）裏面把封鎖問題提得正確的多了。他承認關於可能的封鎖的問題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Problema gravissima”）。他指出，俄國雖被封鎖，但終能自保，部分地是因為俄國人口稀少和地域遼闊的緣故；——意大利的革命，「假如不和中歐別的某一國底革命協同進行，那是不能抵抗長久的」；「這種協同進行是困難的，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整個的歐洲大陸正處在一個革命的時代。

這說的很慎重，但是很正確的。我只補充一句：對於意大利，某種的協同進行——雖則還是不夠的，雖則還不完全的——是有深禱的了，還應當為一種完全的協同進行而鬥爭。改良主義者指出封鎖底可能性，為的對革命怠工，為的跑開革命，為的把他們自己的狼狽、慌亂、恐怖、不堅決、動搖、躊躇的情緒，移植到羣衆身上去。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不想否認鬥爭底危險和困難，為的影響羣衆有

很大的堅定性，爲的精洗黨的軟弱的、動搖的、不穩定的分子，爲的以更大的熱忱、更強的國際主義，爲了偉大的目標而有以更大的犧牲決心去充實整個運動，即加速英、法、美的革命，如果這些國家決定封鎖無產階級的和蘇維埃意大利共和國的話。

以新人去代替改良主義的或「中派」的有經驗的領袖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在某種特殊的場合只涉及某一國的局部問題。這是一切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個共同的問題，唯其它是一個共同的問題，所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論共產國際底基本任務*裏面，把它提出而完全精確地加以解決了。在第八條上我們讀到：

「對無產階級專政之準備，不僅要求解釋每一種改良主義底資產階級的性質……而且要求在一切無產階級的組織裏面——不但在政治組織裏面，而且在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教育的等等組織裏面——以共產主義者去代替舊的領袖……必須比過去更百倍勇敢地把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的工人底這些代表們從其一切職務上排擠出去，而以甚至完全沒有經驗的工人去代替他們，只要他們跟被剝削的羣衆聯系在一起，而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享有這些羣衆底信任。無產階級專政需要委任正是這樣的沒有經驗的工人去擔負最負責的國家職務，否則，工人政府的政權就沒有力量。

豈和不為羣衆所擁護了。」

因此，塞拉第說，在意大利黨內「大家」都同意接受共產主義代表大會底決議，那是徒然的。實際上我們看到的，適為相反。

在我於前面已經提到的人道報上所登載他的一封情書函，塞拉第附帶地寫道：

「……至於說到最近的事變，那末，必須知道，「全國勞動總同盟」（意大利職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者提議把運動之領導權交給那些願意把這種運動擴展到革命的人們。我們在全國勞動總同盟內的同志們，曾經聲明：假如極端主義者願意擔負起義之領導，那末，他們同意做一個遵守紀律的兵士。但是，極端主義者却沒有接受運動之領導。……」

塞拉第如果相信「全國勞動總同盟」中的改良主義者底這種聲明是可以兌現的，那他就太天真了。實際上，這是對革命怠工的變種之一：在最緊急的關頭以辭職相威脅。在這裏，問題不在於忠誠，而在於領導者如果在事變底每一阻難的轉捩關頭便在「自己人」中間、在首腦中間、在「領袖」中間遇到動搖、躊躇、辭職，那在革命中就不能得到勝利了。能知道下面一事，對於塞拉第同志也許不無益處的：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初（舊曆九月底）當俄國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和資產階級的聯盟在政治上顯然地瓦解時，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車爾諾夫的黨，在其報紙上寫道：

「布爾塞維克將不得不組織內閣……讓他們不要作無益的努力，用他們所急切造成的他們不可能奪取政權的理論作為護身符吧。民主派是不會接受這種理論的。同時，我問題擁護者們必須向他們保證予以完全的支持。」（見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舊曆九月二十一日〕社會革命黨人底報紙，該黨的機關報，車爾諾夫底「民事業報」，曾引用於我的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小冊子，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第四頁）*

假如革命的工人相信這種聲明是誠意的的話，那末，他們就會犯的致命的錯誤，正如相信匈牙利杜拉第派所犯的錯誤一樣，——這個匈牙利的杜拉第派，曾允諾給柏拉孔以幫助，而加入共產黨，但是雖然如此，仍然做了革命底怠工者，以其動搖而斷送了革命。

×

×

×

我作個總結吧：

（一）意大利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表現出最大的耐心、審慎、冷靜，以便在意大利工人階級跟資產階級為奪取政權的、行將到來的決定的鬥爭中，正確地估計一般情況，特別是適當的時機。

（二）同時，該黨底全部宣傳與鼓動，必須充滿極度

* 俄文中文本，參見選集第十一卷上冊。

堅決地、團結一致地、集中地、以熱誠的英雄主義、不惜任何代價、把這種鬥爭勝利進行到底的精神，無情地砍斷那杜拉第派所滲透着的遲疑、不決、動搖。

(三) 現在塞拉第所主編的在米蘭出版的前進報所進行的這種宣傳，不是在鬥爭中教育無產階級，而是使它忘卻瓦解。在這樣的一種時機，黨底中央委員會必須領導工人，準備革命，駁斥錯誤的見解。這是可以（而且必須）作的，同時須給與一切派別以發展意見的機會。塞拉第是在領導着，但是在不正確的方向上領導着。

(四) 開除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一日萊奮·愛米里亞大會底一切參加者之黨籍，是加強黨，而不是削弱黨，因為這樣的「傾軋」，只能「匈牙利式地」斷送革命，即使他們是誠實的。白軍和資產階級是善於利用甚至完全「忠實的」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等底動搖、遲疑、懷疑、無信心等等的。

(五) 假如像巴拉托諾、蒼內里尼、巴箕、蒙柯米尼、塞拉第這樣的人，要動搖和退黨的話，那就不要挽留他們，而要立刻允許。在決定的鬥爭時期過去以後，他們回來，那時，對於無產階級將更有益些。

(六) 同志們！意大利的工人們！不要忘記一切革命歷史底教訓，不要忘記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俄國和匈牙利底教訓。在意大利底無產階級面前，擺着最大規模的戰鬥、最重大的困難、最嚴重的犧牲。對資產階級的勝利，政權之轉入無產階級之手，意大利蘇維埃共和國之掌

固，都視這種鬥爭之結果，視工人羣衆之團結性、紀律性及消滅以轉移的。意大利及全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都正在盡其所能，不顧任何罪惡和任何殘暴，使政權不要落在無產階級手裏，能推翻無產階級政權。改良主義者以及參加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一日萊佛·愛米里亞大會的那些人的野格，遲疑不堅決，乃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人，雖然其中有很多是忠實的，但在一切時期，在每一國度內，都是以其動搖而斷送了革命業事的。這些人曾在匈牙利斷送了革命（第一次革命，跟着來時將是第二次革命），假如不把他們從一切負責的職務上趕走，不用無產階級不信任、無產階級的警惕性和監視的萬里長城，把他們包圍起來，那末，他們也許在俄國也要斷送革命的。

意大利底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都追隨革命的無產階級前進着。歸根到底，勝利將是他們的，因為它的事業乃是全世界工人底事業，因為除羅馬維埃共和國、工人共和國以外，再沒有別的免除目前帝國主義戰爭之繼續，免除新的、已經準備好的帝國主義戰爭，免除資本主義奴隸制和壓迫之慘狀的辦法。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二）

蘇立文瑞士左派社會黨的報紙民權報的主編諾伯斯同志，不久以前發表了季諾維也夫論與機會主義者有決裂必要的一封信和他自己對這封信的冗長的答覆。諾伯斯底思

想可歸結如下：對接受二十一條件和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給了一個堅決否定的答案——自然是爲了「自由」、爲了批評之自由、對莫斯科過分的要求或獨裁的自由（我沒有保存諾伯斯底論文，不得不靠記憶去引用這篇論文，在這裏，我只對原意負責，而不對這個那個用語負責）。

——諾伯斯同志，除開別人以外，力引塞拉第同志爲盟友。大家都曉得，塞拉第也是不滿意於「莫斯科」、即特別不滿意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俄國委員，同樣也埋怨莫斯科違反了共產國際底個別部分，個別的黨，個別成員底「自由」的。因此，這裏關於自由說幾句話，也許不是多餘說吧。

在經過三年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我們有權利說，全世界最流行的和最通俗的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見，就是藉口它違反了自由和平等。各國一切資產階級的報紙，乃至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會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連考茨基、勃拉亭、馬爾托夫、車爾洛夫、朗格等等，等等在內）這報紙，都正是以違反自由和平等，競相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從理論的觀點看來，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讓讀者回想一下馬克思在資本論裏面那有名的充滿着諷刺意味的話吧：

【商品流通或交換之範圍——勞動力之買賣，是在其框架以內實現的——是天賦人權之真正的樂園。在這裏支配着的，只是自由、平等、私有產和邊沁。】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末段，中文郭王譯本，

一九三八、一二五頁)

這幾句充滿着諷刺意味的話含有最深遠的歷史哲學的內容。把這幾句話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裏面關於同一問題的通俗的解釋比較一下，特別是和恩格斯謂：平等乃是一種成見或某種謬誤，因為這個概念沒有消滅階級的意義這幾句話比較一下。封建制度及其遺跡之消滅，資產階級（可以有充分的權利說：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制度底基礎之建立，佔據了全世界歷史底一個整個時代，自由、平等、私有產，遑沁不可避免地會是這個全世界歷史時代底口號。資本主義及其遺跡之消滅，共產主義秩序底基礎之建立，構成全世界歷史底現在已經開始的、新時代底內容。吾輩時代底口號不可避免地而且應當是：消滅階級；為實現這個目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情地揭穿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關於自由和平等的成見；和這種成見作無情的鬥爭。誰不懂得這一點，那誰就絲毫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之基本原則等問題。

在階級未被消滅以前，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空話，都是欺騙自己或對工人的欺騙，以及對一切勞動者和被資本剝削者的欺騙，不論如何，乃是對資產階級利益之辯護。在階級未被消滅以前，在談論到自由和平等時，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自由是爲了那一階級？爲了什麼用途？那個階級和那個階級之平等？在怎樣的關係上？對這些問題之直接的或間接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迴避，就不可避免地是對資產階級利益之辯護，對資本利益之辯護，對剝

削者利益之辯護。在對這些問題，對生產手段私人佔有的問題緘默不談之下，自由和平等的口號乃是資產階級社會底一種欺騙和虛偽；資產階級社會用對於自由和平等的形式上的承認，來掩蓋對工人、對一切勞動者和被資本剝削者、即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度絕大多數人的真正的、經濟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現在在俄國，由於無產階級專政已在實踐上提出了資本主義底根本的最後的問題，便可以特別明白地看出，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空話是對誰服務的？（*cui prodest?*「對誰有益的？」）如果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車爾洛夫和馬爾托夫向我們提出在勞動民主主義底範圍內空談自由和平等的議論——因為瞧吧，他們在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議論上並沒有過錯的，並沒有忘記馬克思呵！——那末，我們就要問他們：怎樣處理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僱傭工人階級和小私有者階級之間的區別呢？

在勞動民主主義範圍內的自由和平等，乃是對小土地佔有者（雖然是在國有土地上進行他底經濟的）以投機價格出賣其剩餘糧食即剝削工人之自由，凡在勞動民主主義範圍以內講自由和平等——在資本主義已被推翻，而私有財產和商業自由却都還存在的情況下——之人，都是剝削者底辯護人。無產階級在執行自己的專政時，必須和這種辯護人周旋，正如和對付剝削者一樣，即使這種辯護人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黨人、或甚至認清了第二國際腐爛的人等等。

只要生產手段底私人佔有制（例如農具和牲畜，即使土地私人佔有制已被廢止）和自由商業一日繼續存在，則資本主義底經濟基礎也一日繼續存在。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和這種基礎作勝利的鬥爭之唯一的手段，消滅階級之唯一的道路（沒有這種道路，就根本談不到人的個性底——而不是私有者底——真正自由，就根本談不到在社會關係上和政治關係上的人和人底真正平等——而不是私有者和無產者、吃飽者和挨餓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底虛偽的平等）。無產階級專政是引向階級之消滅，一方面用推翻剝削者並壓服其反抗的辦法引向這一點，另一方面，用中立小私有者，使他們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動搖，成爲不足爲害的辦法引向這一點。

諾伯斯和塞拉第同志言論謬誤的地方，當然不在於他們是虛偽的和不誠實的。決不是的。他們是完全誠實的，在他們言論裏面任何主觀的虛偽是沒有的。但在客觀上，就其內容講，他們的言論是謬誤的，因爲他們是爲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成見辯護，因爲其結果是爲資產階級辯護。

共產國際決不能承認凡願簽字於某項宣言，而不問其政治行爲的人，人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這是對共產主義者的一種理論上的和實踐政治上的自殺，猶如『在勞動民主主義範圍內』承認自由和平等一樣。凡會讀和願意了解所讀的東西的人，都不能不看到共產國際底一切決定、提綱、決議、規定、條件，都不是無條件地承認願意加入共

產國際的人們之『自由和平等』。

我們承認『自由和平等』底條件是在什麼地方呢？共產國際會員底自由和平等是在什麼地方呢？

在於：機會主義者和『中派』如瑞士社會黨和意大利社會黨右翼底一切有名的代表者之類，都不能做共產國際會員。因為這些機會主義者和『中派』，無論他們怎樣發誓，他們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但在實際上仍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成見、弱點、動搖之傳播者和辯護者。

首先要和這種成見，要和這種弱點、要和這種動搖決裂；要和那些頌揚、辯護、體現這種見解和屬性的人決裂，然後，也只有在那種條件之下，才有加入共產國際的『自由』，才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在事實上（不是口頭上）和任何別的共產主義者，——共產國際底會員之『平等』。

諾伯斯同志，你可以『自由』地辯護你所辯護的那些見解。但是我們也可以『自由』地宣佈這種見解是小資產階級的成見，是對無產階級底事業有害而對於資本有益的偏見；我們也可以『自由』地拒絕那辯護這種見解或與之相適應的政策的人們，加入聯盟或與他們成立一個團體。我們已經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底名義責斥了這種政策和這種見解。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無條件地和事先地要求要和機會主義者決裂。

諾伯斯和塞拉第同志，不要一般地講自由和平等了！你們講的是不執行共產國際關於無條件地必須和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他們不能不破壞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不對這

種專政怠工) 決裂的決定之自由。你們講的是機會主義及『中派』和共產主義者之平等。我們是不能承認共產國際有這樣的自由和這樣的平等的，至於任何別的自由和平等，就隨便尊便吧。

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當兒，勝利之最主要的和基本的條件，乃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脫離機會主義者及『中派』、脫離其影響、脫離其成見、弱點、動搖之自由。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三編

共產國際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會

意大利問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想主要地答覆一下拉撒里同志。他說：『拿出具體的事實來，不要講空話。』這是很好的。假如我們追究一下意大利改良主義——機會主義傾向底發展，那末這將是空話呢，還是事實？在你們的言論裏面，在你們的整個政策上，你們都忽視了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底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就是：不僅這種傾向、而且那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集團，都已經存在了很長久的時間了。我很清楚地記得那伯恩斯坦開始其機會主義宣傳的一個時期，這個宣傳是以社會愛國主義、第二國際底叛節與破產而告終的。自那個時期起，我們就已經不但知道了杜拉第的名字，而且知道了他在意大利黨內和意大利工人運動內的宣傳。從那時起，在二十年的過程中，他都是意大利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底組織破壞者。時間的缺乏，使我不能澈底地研究與意大利的黨有關的材料，但是，我認爲意大利一家資產階級報紙——我已經不記得那是新聞報，還是晚上快

報參——所登關於杜拉第及其朋友們在萊薩·愛米里亞會議的一項消息、乃是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我把這個消息和前進報上所發表的比較了一下。這不是充分的證據嗎？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在和塞拉第及其朋友們的論戰中，我們曾經公開和明白地告訴他們，根據我們的信念，局勢是怎樣的。我們告訴他們說，意大利的黨在它還容忍像杜拉第這樣的人留在它的隊伍裏面時，是不能成爲共產黨的。

這不是政治的事實嗎？或者這又只是空話嗎？當我們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曾經向意大利的無產階級公開地宣稱：『不要跟改良主義者，跟杜拉第搞在一起！』時，當塞拉第開始在意大利報紙上發表反對共產國際的一系列的論文，並召集獨特的改良主義者會議時——難道這一切都只是空話嗎？這已經是超過於分裂了，這已經是創立新黨了。看不見這些，那就是瞎子。這個文件對於這個問題有着決定的意義。凡參加萊薩·愛米里亞會議的人，都應當開除黨籍，因為他們都是孟塞維克，但不是俄國的孟塞維克，而是意大利的孟塞維克罷了。拉撒里說：『我們懂得意大利人民底心理。』我個人關於俄國人民不

* 新聞報出版於吐林。

* 晚上快報係意大利銷行最廣的資產階級報紙之

一，出版於米蘭。

——校閱者

敢這樣斷言，但是，這不是重要的。「意大利社會黨人非常懂得意大利人民底精神」——拉撒里說。這有可能，我不想反駁這了。假如考慮到具體的材料和其頑強地不願褪絕孟塞維主義一點，那末，孟塞維主義對於他可說是陌生的。我們不得不說，批准我們執行委員會底決議乃是必要的事情，不論這是怎樣痛苦的。凡容忍像杜拉第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留在自己的隊伍內的黨，是不能加入共產國際的。

拉撒里同志問：「爲什麼要改變黨底名稱呢？這個名稱是完全令人滿意的。」但是我們是不能贊同這個觀點的。我們很知道第二國際底歷史，它底沒落和它底破產。難道我們不知道德國黨底歷史嗎？難道我們不知道，德國工人運動底最大的不幸是在於它在大戰以前就沒有實行決裂嗎？這種延誤竟犧牲了二萬工人底生命，由於他們和德國共產黨人的論戰及對他們的埋怨，謝德曼派和中派曾經把這二萬工人出賣給德國政府了。

難道我們現在在意大利沒有看到同樣的圖畫嗎？意大利的黨從不是真正革命的黨。意大利黨底最大的不幸，就是在於它在大戰以前就沒有實行和孟塞維克和改良主義者決裂，讓後者仍然繼續留在黨內。拉撒里同志說：「我們完全承認有與改良主義者決裂之必要；唯一的意見分歧，只是在於我們沒有認爲在利物諾大會上實行這種決裂是需要的。」但是，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却是另一回事。我們不是第一次討論意大利改良主義的問題了。在去年當我們

和塞拉第爭論這時，我們曾經問他：『請你原諒，可是，爲什麼不在現在完成意大利黨裏面的分裂呢？爲什麼必須把它拖延下去呢？』塞拉第曾經給我們怎樣的回答了這呢？什麼都沒有。佛羅沙特有一篇論文，其中說：『必須要做機敏而聰明的人』，拉撒里在引用這篇論文時，他顯然是把這看做一個對他有利的和反對我們的論據。我以爲，他是弄錯了。恰恰相反，這正是一個對我們有利而反對拉撒里同志的最好的論據。假如他被迫不得不向意大利的工人說明他的態度和他的脫黨時，那末，意大利的工人會怎麼說呢？假如意大利的工人承認我們的策略，跟共產主義左派——他們決不常常是甚至簡單地共產主義的左派，寧是類似於無政府主義——底曲綫比較起來是機敏而聰明的，那末，你將怎樣回答他們呢？

塞拉第和他的黨說，似乎俄國人只希望人們效法他們的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所要求的正是相反的東西。背熟共產主義的決議，而在一切場合之下都使用革命的空話，這是不夠的。這太少了，我們老早就反對死讀這個或那個決議的共產主義者。真正共產主義底第一個條件，是和機會主義決裂。我們將十分自由地和極度坦白地贊成這一點的共產主義者傾談，並有充分的權利和勇氣對他們說：『不要做任何蠢事，要巧妙一點，聰明一點。』可是，我們只和那已經跟機會主義決裂了的共產主義者才這樣說，對你們還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我再重複一次，我希望，大會追認執行委員會底決議。拉撒里同志說：

【我們正處在準備時期】。這是一句真話。你們正處在準備時期。這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是和孟塞維克決裂，猶如我們在一九〇三年和我們的孟塞維克所作者一樣。因德國黨沒有和孟塞維克決裂，致使整個德國工人階級在德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很長的和疲憊不堪的時期都忍受着這事情的痛苦。

拉撤里同志說，意大利的黨正處在準備時期。我是完全承認這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和改良主義者嚴肅的、激動的、明確的、斷然的決裂。那時，羣衆就完全擁護共產主義了。第二個階段決不是在於重複革命的口號。它將是接受我們的聰明的和巧妙的決議，這些決議將永遠是聰明的和巧妙的，將永遠重複說：基本的革命的原則應適合於各國底特點。

意大利的革命，將是跟俄國的革命不一樣的。它將以另一種方式開始。是怎樣的方式呢？這，我們還不知道，這，你們也不知道。意大利的共產主義者並非常常都是十足的共產主義者。當在意大利佔領工廠時，可有過一個共產主義者露過頭角嗎？不，那時在意大利還沒有共產主義；只可說有某種無政府主義，還根本談不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只有用革命鬥爭的經驗，才能創立起來，才能灌輸給工人羣衆，這條道路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和孟塞維克徹底決裂，這些孟塞維克和資產階級的政府已經合作了二十多年了。在齊美爾瓦德和京塔爾兩次會議上，我曾有機會略略觀察了一下毛底連

尼，很有可能他是一個不加入資產階級政府而留在社會黨中央（在這裏，他可以給資產階級貢獻更大的利益）的十足機敏的政治家。可是，杜拉第及其朋友們底整個理論立場、整個宣傳、整個鼓動，都是和資產階級合作的。這不是由金那利底發言中所舉的衆多的引話所證明了嗎？是的，這就是杜拉第已經準備好的統一戰綫。因此，我應告訴拉撒里同志：像你在這裏所發表的言論及塞拉第同志在這裏所發表的言論，都不是準備革命，而是破壞革命的。（歡呼：『對呀！』鼓掌。）

在利物諾*，你們曾經得到了可觀的多數。你們有九八、〇〇〇票，對改良主義者一四、〇〇〇票，對共產主義者五八、〇〇〇票。在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度內，有自己的一定的傳統，純粹共產主義的運動方才開始，如沒有關於分裂的充分的準備，則上述的數字對於共產主義者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一個可把握的證據。證明：意大利的工人運動將比我們俄國的運動發展的快些，因為你們

* 利物諾是意大利的一個城市。意大利社會黨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在該城舉行代表大會，在該大會上塞拉第所領導的一派曾經拒絕和一四、〇〇〇改良主義者分裂，寧願和五八、〇〇〇共產主義者分裂，列寧即指此而言。

知悉了關於我們運動的數字，你們就會曉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在推翻沙皇以後和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時期，我們與孟塞維克比較還只是少數。這是十五年殘酷的鬥爭和分裂以後的事。在我們這裏，右翼未曾得到發展，這並不像你們在以輕蔑的調子說到俄國時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不錯，在意大利，事情的發展將完全不同。在和孟塞維克鬥爭了十五年和在沙皇制度滅亡以後，我們是和爲數很少的擁護者開始工作的。在你們那裏，現在有五八、〇〇〇具有共產主義情緒的工人，而估摸不確定立場的聯合起來的中派爲九八、〇〇〇人。這是一個應無條件地說服那對意大利工人底羣衆運動不願閉上眼睛的一切人的證據和事實。一切事情都不是一下子做到的。但是，這就已經可作爲證明：工人羣衆——不是舊的領袖、不是官僚、不是教授、不是新聞記者，而是真正被剝削的階級，被剝削者的先鋒隊——是擁護我們的。這也就是你們在利物諾所犯的重大錯誤底標幟。這是事實。你們擁有九八、〇〇〇票，但是，你們却寧願和一四、〇〇〇個改良主義者合作去反對五八、〇〇〇個共產主義者。即使這些共產主義者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即使他們只是波爾蒂加底同情者——這是不真實的，因爲波爾蒂加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曾經十分誠實地聲明，他放棄了一切無政府主義及反國會主義——，你們也應當和他們合作的。但是你們是怎樣做的呢？你們寧願與一四、〇〇〇個改良主義者聯合，而與五八、〇〇〇個共產主義者決裂，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據，證

明塞拉第政策是一種對意大利的不幸，我們從不希望塞拉第在意大利應該模仿俄國的革命。那是很愚蠢的事情。我們的智力和靈活性還足以避免這樣的蠢事。但是，塞拉第却證明他在意大利的政策上是不對的。也許他不得不迂迴一下，這是一年前他在這裏常常重複的一個用語。他說：『我們善於迂迴，我們不願作奴隸式的模仿。這是一種愚蠢事情。我們應當迂迴，以便和機會主義分離。你們俄國人，你們不會這樣作。我們意大利人，是善於這樣作的。我們再看吧。』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塞拉第曾經漂亮地迂迴了。他和五八、〇〇〇個共產主義者決裂了。現在，同志們跑到這裏來，說：『假如你們推開我們的話，那末，羣衆就要弄糊塗了。』不，同志們，你們弄錯了。意大利的工人羣衆，現在就已經弄糊塗了。假如我們對他們說：『同志們，意大利的工人們，你們在共產國際和孟塞維克之間選擇一個吧，前者永遠不會要求你們奴隸式地模仿俄國人，而後者在二十年來我們却熟悉他們，而且從不容忍他們。在真正的、革命的共產國際裏面做鄰居的』，那對於他們是有利的。這就是我們所要告訴意大利工人的話。結果是不容懷疑的。工人羣衆是要跟着我們前進的。

給德國共產黨員的一封信

敬愛的同志們！

我曾經打算用一篇詳細的文章，闡明我對於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教訓之見解。可惜，因為病的緣故，我至今還不能開始這個工作。你們黨——『統一的德國共產黨』——底代表大會決定在八月二十日開會，遂使我趕急寫這封信，為着不要耽誤寄到德國去的日期起見，我必須在幾個小時內把這封信寫完。

在我能夠判斷的限度內，德國共產黨底地位是特別艱苦的。這是不難了解的事情。

第一、而且是主要的，即從一九一八年年底起，德國底國際形勢就使其內部的革命危機非常迅速和劇烈地尖銳化了，這推使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要立刻奪取政權。同時，武裝精良和有組織的、被『俄國經驗』所教訓過的德國資產階級及整個國際資產階級，都以發狂的憎恨，仇視德國革命的無產階級了。德國成萬的優秀人物，其革命的工人，都被資產階級、被他們的英雄——諾斯克及其一派，被他們的直接的漢人、謝德曼輩等等，被他們的間接的和『精細的』（因而是對於它特別寶貴的）助手、『第二半

以確定共產國際底基本路線爲其目的，特別是在現在，在我們不僅形式地青睞了真正的中派，而且開除了他們的黨籍以後，它是必要的。這是事實。我應當辯護這個提綱。假如現在特拉其尼跑出來說：我們應當繼續反中派的鬥爭，然後敘述應當如何願意進行這種鬥爭，那末，我就說：要是這些修正案應該意味着某個方向的話，則和這個派別作無情的鬥爭，是很必要的，因爲在相反の場合，就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和什麼共產國際了。使我吃驚的，德國共產主義工黨並沒有贊成這個提案。你們只聽一聽特拉其尼所擁護的和這些修正案所說的吧。修正提案是這樣開始的：『第一頁第一段第十九行應該刪去：「大多數」……字樣。』大多數！這是極端危險的！接着：『應以「目的」兩字代替「原則」兩字』。原則和目的是兩件不同的東西：在目的上，甚至無政府主義者也和我們一致的，因爲他們也都主張消滅剝削和階級差別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經遇到若干無政府主義者，並和他們談過話，可是，也就看的夠了。在目的上，我談了幾句就和他們一致了，而關於原則，則永不可能。原則不是目的，也不是綱領，更不是策略，更不是理論。策略和理論並不是原則。在原則的意義上，我們所區別於無政府主

● 修正案是由德國、奧國及意大利代表團提出的。

——編輯部註

義者的是什麼呢？共產主義底原則，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在過渡時期內使用國家的強制力量。這就是共產主義底原則，但是這不是它底目的。提出這種修正案的同志們都犯錯誤了。

第二、在那裏這樣地說：『應該刪去「大多數」字樣』。你們讀一讀全文吧：

『在很多國度內，就革命的意思說，客觀形勢已經尖銳化了，很多羣衆性的共產黨已經成立起來了，可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這些黨還沒有一個担負起在工人階級的真正革命的鬥爭中對其大多數有事實上的領導權。在這種條件之下，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應着手於一些策略問題之修正。』

這就是他們想要刪去『大多數』字樣的地方。假如我們連對於這樣簡單的事情都不能談妥，那末，我就不懂得，我們如何能在一起工作並領導無產階級到勝利上去呢？這時，在原則問題上我們不能達到一致，那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請給我指出一個沒有掌握工人階級羣衆的黨吧。特立其尼甚至沒有想過可舉某個例子來。這樣的例子，是不存在的。

總之，用『目的』代替『原則』，刪去『大多數』字樣。謝天謝地！我們是不能同意這的。甚至德國的黨——最優秀的黨之一——也還沒有取得工人底大多數。這是事實。正處在最艱苦的鬥爭前面的我們，並不害怕說出這個真理，可是在這兒有着三個代表團，它們願從非真理開始。

因為如果大會刪去【大多數】字樣，那末，它就是以此表明，它是歡喜非真理的。這是再明白沒有的道理。

往下，則是這樣的一個修正：【第四頁第一段第十行，「公開的信」等等這些字應刪去。】今天，我就已經聽到了一個有同樣思想的發言。但在那裏這樣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那就是德國共產主義工黨黨員漢泊爾同志的發言，他說：【公開的信會是機會主義的行爲。】我已經在私人談話中聽到這類的觀點了，這是我引爲最大的遺憾和最深的羞恥的。可是，在已經進行了那麼長久的討論之後，在大會上仍宣佈【公開的信】是機會主義的，這却是一種羞恥和恥辱！但特拉其尼同志以三個代表團底名義出現，竟要刪去【公開的信】這些字。這樣，和德國共產主義工黨鬥爭有什麼用呢？【公開的信】是模範的政治的步驟。在我們的提綱裏面是這樣說的。我們應無條件地堅持這一點。它所以是模範的，因為它是吸引工人階級多數的實踐方法底第一個行動。凡是不懂得我們在差不多一切無產者都已經組織起來的歐洲應奪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人，他對於共產主義運動就被丟掉了，他在大革命後的三年中尙未學會這一點時，那他就永遠學不會什麼了。

特拉其尼說：在俄國，雖然黨是極小的，但我們却勝利了。他不滿意於提綱裏面關於捷克斯拉夫所說的話。在這裏有二十七個修正；假如我願意把這些提案統通加以批評，那末我就像若干發言人一樣，不得不講不下於三個鐘頭的話了……在這裏宣稱，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擁有三

十萬至四十萬黨員，必須要爭取大多數，創造不可戰勝的力量，繼續吸收新的工人羣衆。特拉其尼已經準備好進攻了。他說：「既然黨內已經有了四十萬的工人，那我們爲什麼還要繼續爭取呢？刪去吧！」他害怕「羣衆」這個詞，意欲剷除它。特拉其尼同志對於俄國的革命，是了解得太少了。

我們在俄國會經是一個小小的黨，但是，除此以外，和我們在一起的則有全國工人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大多數（聽衆高呼：「非常對！」）。你們底大多數在那裏呢？幾乎軍隊底一半——當時至少有一千萬人——曾是和我們在一起的。難道軍隊底大多數是擁護你們嗎？請給我指出這樣的一個國度吧！假如特拉其尼同志底這種觀點爲三個代表團所贊同，那末，在國際裏面就不是一切都令人如意了。那時，我們就應說：「停住，堅決的鬥爭，否則，共產國際就要滅亡的……」。

雖然我處於防禦地位，但根據我所有的經驗，我必須說，我講話的目的和我講話的原則，是護擁我們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和提綱。如果有人說，不能更改它們的一個字，那自然是一種學究氣味。我已經讀過了不少的決議，我深深知道，它們每一行上都可以提出很好的改正的。可是，這是一種學究氣味。如果現在^仍仍然宣稱，在政治上的意義上一個字都不能改動，那是因爲像我所看到的一樣，這些改動都具有一種十分確定的政治的性質，因爲這些改動都要引導到對於共產國際有害的和危險的道路上去。

的緣故。因此，我、以及我們全體、以及俄國代表團都應堅持，不要改動提綱一字。我們不但責難了我們的右派分子，而且驅逐了他們。但是，假如以反對右派的鬥爭為兒戲，如特拉其尼者，那末，我們就應當說：『夠了！否則，危險就太嚴重了！』

特拉其尼曾辯護進攻鬥爭的理論。那著名的修正案關於這個問題提議了兩三頁長的公式。我們沒有讀它的必要。我們知道，那裏面寫的是些什麼。特拉其尼曾經十分明白地說過，那裏所說的是些什麼。特拉其尼以指出『動的趨向』和『從消極轉為積極』去擁護進攻理論。我們在俄國，已經有了反中派鬥爭的充分的政治經驗了。在十五年以前，我們就已經進行了反對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以及反對孟塞維克的鬥爭了。我們不但戰勝了孟塞維克，而且戰勝了半無政府主義者。

假如我們不這樣作的話，那末，我們就不僅不能掌握政權三年半之久，而且也不能掌握三星期半之久，也就不能在這裏召開共產主義的大會了。『動的趨向』，『從消極轉到積極』——這一切都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曾經用來攻擊我們的空話。現在，他們正坐在監獄裏面，在那裏擁護『共產主義底目的』，想『從消極轉到積極』。像在修正案裏面所作的那樣提出論據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這裏面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政治經驗，沒有任何論據。難道我們在我們提綱裏面曾經發揮了革命進攻底一般理論嗎？難道拉狄克或我們中間的別一個某人曾做了這望

黨事嗎？我們對於完全確定的國度和完全確定的時間曾說過進攻的理論。

我們可以從我們反對孟塞維克的鬥爭中舉出一些例子，這些例子表明，還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就遇見有懷疑革命的黨應採取攻勢的人了。如果在某一位社會民主黨黨員——當時我們都是這樣稱呼的——方面發現了這樣的懷疑，那我們就和他作鬥爭，說，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絲毫不懂得革命政黨底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難道關於一般說來是否允許革命進攻的問題，可以發生爭論嗎？我們爲着找這樣的例子，須要追溯到十五年以前去。難道有在原則上爭論進攻理論的這樣公開的或隱蔽的中派嗎？這個問題是不能刺激起爭論的。可是，現在，在共產國際成立三年之後，我們還在爭論『動的趨向』、『從消極轉到積極』，這個事實，實在是一種恥辱。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協同我們製定這個提綱的拉狄克同志並沒有發生爭論。在真正的進攻未有準備以後，在德國就開始高談革命進攻的理論，那也許是不十分正確的。然而，不管領導者犯了錯誤，但三月的出動仍然是一個大的進步。可是，這却沒有什麼意思。數十萬的工人曾經英勇地進行了鬥爭。不論德國共產主義工黨曾經怎樣英勇地與資產階級作了鬥爭，我們仍然必須說那拉狄克同志在一篇關於賓爾茨的俄文論文裏所說過的話。假如某人，即使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英勇地與資產階級作鬥爭，那末，這當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假如數十萬人和社

會叛徒及資產階級底卑鄙的挑釁作鬥爭，那末，這却是真正的前進一步了。

對自己的錯誤持批評態度，那是極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這樣地開始了。假如某人在數十萬人所參加的鬥爭以後，又出而反對這種鬥爭，並採取像萊維那樣的態度，那末，他就需要把他開除。這已經辦到了。但是，我們應從此得到教訓。難道我們已經準備進攻嗎（拉狄克：「我們也沒有準備防禦。」）？是的，只有在報紙的論文裏面談進攻。應用於一九二一年德國的三月出動上面去的這種理論，是不正確的——我們應當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一般說來，革命進攻的理論並非是偽造的。

我們在俄國已經勝利了，而且是如此容易地勝利了，那是因為我們曾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準備了我們的革命的緣故。這是第一個條件。在我們俄國，一千多萬的工人和農民被武裝起來了，我們的口號會是：不管代價如何，立刻和平。我們勝利了，那是因為最廣大的農民羣衆都有反對地主的革命的情緒。社會革命黨人——第二國際和後半國際底同情者，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曾是個大農民黨。他們曾經要求革命的手段，可是，他們作為第二國際和後半國際底真正的英雄，却沒有足以以革命的方法行動的勇氣。在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我們曾經說過*：

* 參看本選集第十一卷下冊六一頁農民與工人一

【在理論上，我們像從前一樣，正在和社會革命黨人鬥爭着，可是，在實踐上，我們却準備接受社會革命黨人底理論，因為只有我們才能實現這種綱領。】我們是怎樣說的，就那樣的做過了。在我們勝利之後，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曾有反對我們的情緒，而把社會革命黨人底多數派到立憲會議裏面來的農民，曾被我們爭取過來了，雖然不是在幾天之內——如我個人所錯誤地預料與預言的那樣——，然而不論如何却是在幾個星期之內。區別是不很大的。那在西歐能夠在幾個星期之內把農民意多數奪在自已手中的國度請給我指出一個吧！假如說，我們在俄國是勝利了，雖然我們曾經是一個很小的黨，那末，這只是證明，沒有理解俄國的革命，根本沒有理解必須怎樣地去準備革命。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乃是建立真正的共產黨，以便知道我們是在同誰講話，能夠對誰有充分的信任。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會底口號是：『打倒中派！』假如我們在整個的路綫上和在全世界上不和我們在俄國所叫做孟塞維克的中派及半中派分家，那末，我們就甚至不了解共產主義底ABC了。成立真正革命的黨及和孟塞維克決裂，乃是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可是，這只是一個預備學校。我們現在已經召集了第三次大會，而特拉其尼同志却照舊囉嗦說，預備學校底任務即在於驅逐、追究和揭露中派及半中派。竭誠致謝！這些事情我們已經做夠了。我們在第二次大會上已經說過了，中派乃是我們的敵人。可是，還需要再向前進一

步。在組織成黨以後，第二個階段就在於學習怎樣準備革命。在很多國度內，我們甚至還沒有學會怎樣掌握領導。我們在俄國所以勝利，那不但因為工人階級的不可爭辯的多數（在一九一七年選舉時期，工人階級的壓倒多數是跟我們在一起反對孟塞維克的）是站在我們方面，而且是因為直接在我們取得政權之後軍隊底一半以及在幾星期之內十分之九的農民羣衆，都轉到我們方面來了；我們所以勝利，那是因為我們所接受的不是我們的土地綱領，而是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綱領，在實踐上實現了它。我們的勝利也就在於我們實現了社會革命黨人的綱領；這就是這種勝利為什麼那麼容易地勝利的的原因。難道在你們西方話有這種幻想嗎？笑話！特拉其尼及其他簽字於修正案的一切同志們，比較一下具體的經濟條件吧！雖然多數那末迅速地到我們方面來了，可是，在勝利後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却是很大的。我們仍所以打破了困難，那是因為我們不但沒有忘記我們的目的，而且沒有忘記我們的原則，並且沒有容忍那些不談原則、只談目的、『動的趨向』和『從消極轉到積極』的人們留在我們的黨內。也許人們要非難我們，說，我們寧願把這些老爺們關在牢獄裏了。否則，專政就不可能實現了。我們必須準備專政，而這種準備就在於和這種空話及這種修正案作鬥爭。我們的提綱裏面，到處談到了羣衆。可是，同志們，須要了解，什麼是羣衆。德國共產主義工黨，左派的同志們，濫用了這個名詞。可是，特拉其尼及簽字於修正案的一切同志們，也都

同樣不知道，應如何理解「羣衆」一語。

我已經講得太長了；因此，我只想關於「羣衆」這個概念說幾句話。「羣衆」這個概念，是隨着鬥爭性質之變化而變化的。在大戰初期，有幾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已經足夠可以說得上羣衆了。假如黨能做到，不僅把自己的黨員捲入到鬥爭裏面來，假如黨能夠做到，把非黨的工人也能捲到鬥爭中來，那末，這就已經是爭取羣衆的開始了。在我們革命的時期，曾有這種場合，即有幾千工人也就是代表羣衆了。在我們運動底歷史上，在我們反對孟塞維克鬥爭底歷史上，你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即，在一個城市裏面，幾千工人就足以表現出羣衆的性質了。如果平時過着清人的生活，苟延着一綫可憐的生命，從未聽到什麼政治的幾千非黨的工人，一旦開始革命地行動起來時，那就是羣衆。假如運動日益普及和加強，那末，它就逐漸地轉變為真正的革命。我們曾經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在三次革命時期，都看到了這種情形，並且，你們也還要不得不信服這的。當革命已經有了充分準備的時候，「羣衆」這個概念就變成另一個意思了：幾千工人已不是羣衆了。這個概念就開始意味着別一種東西了。羣衆這個概念，從下面這個意思說來，就發生變化，即：把羣衆了解為多數，而且不僅是簡單的工人大多數，而是一切被剝削者底多數；別的了解對革命者，是不允許的，這個詞的任何別的意思都成了不可理解的了。有可能一個小小的黨，譬如英國的和美國的黨吧，在好好地研究了政治發展

的行程，並熟識了非黨羣衆底生活和習慣，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就可以喚起革命的運動，那是可能的事情（拉狄克同志曾經舉出煤礦工人的罷工，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假如這樣的一個黨，在這樣的一個時機，以它自己的口號出現，並達到有數百萬工人追隨於它之後，那末，這就是一種羣衆運動。我不是無條件地否認，革命是可以由一個極小的黨開始而達到勝利的結束的，可是，要知道，用什麼方法把羣衆爭取到自己方面來。爲了這一點，必須要對革命作澈底的準備。如果有的同志們出來聲明：立刻放棄『大』羣衆的要求，那就必須向這些同志們作鬥爭。沒有澈底的準備，你們在任何國度內便不能得到勝利。一個極小的黨就足以領導羣衆隨自己前進。在一定時機，是沒有成立大的組織的必要的。

可是，爲了勝利，要有羣衆底同情。並不是永遠都需要絕對的多數的；但是，爲了勝利，爲了保持政權，却不僅需要有工人階級——我在這裏是在西歐的意義上，即在產業無產階級的意義上使用『工人階級』這個術語的——底大多數，而且須要有被剝削的和勞動的農村居民底大多數。你們可曾想到這一點嗎？我們在特拉其尼的發言裏面，能否找到即使是這種思想底一點暗示呢？它僅說到『動的趨向』，『從消極轉到積極』！他是否講到糧食問題呢，即便是一個字也能？但工人們却要求食物，雖然他們也能夠多多忍受和餓肚皮的，如像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俄國所看到的那樣。因此，我們不僅必須要把工人階級底

大多數，而且必須要把勞動的和被剝削的農村居民底大多數，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你們曾否準備了這一點呢？差不多一個地方都沒有。

總之，我再重複一遍：我必須無條件地擁護我們的提綱，而且我認為這種擁護對我是理之當然。我們不但責難了中派，而且從黨內驅逐了他們。現在，我們必須掉過頭來反對我們同樣認為危險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用最客氣的形式向同志說明真理（在我們的提綱裏面，已經親切地和客氣地說到這一點了），以便使任何人都不感覺到受屈辱：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些別的比追逐中派更主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夠了。這已經有點乏味了。代替這一點，同志們必須學習領導真正革命的鬥爭。德國同志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在這個國度裏，數十萬的無產者已經英勇地作戰了。凡反對這種鬥爭的任何人，都非立刻開除不可。可是，在開除了他們以後，就不應該再說空話，而必須要立刻開始學習。從所犯的錯誤中學習怎樣更好地組織鬥爭。我們不應在敵人面前隱藏我們的錯誤。誰害怕這一點，那誰就不是革命者。相反的，假如我們公開地向工人說：『是的，我們曾經犯了錯誤』，那末，這就是說，這些錯誤再不會重犯了，我們將會更正確地選擇時機了。假如在鬥爭時期，羣衆——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大多數，而且是一切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底大多數——是站在我們這方面，那末，我們就會真正地勝利了。

擁護共產國際底策略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只限於自衛，這是我引爲大大遺憾的。我說，我引爲大大遺憾，是因爲在知悉了特拉其尼同志底發言和三個代表團底修正案以後，我極願改取攻勢，因爲對於特拉其尼和三個代表團所擁護的這種觀點，老實說，是必須要改取攻勢的。假如大會對這些錯誤、對這些『左的』蠢事不進行堅決的進攻，那末，整個運動就要注_定滅亡的。這是我的深刻的信念。但是，我們是有組織的和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能以反對個別同志而發的演說爲滿足。我們俄國人早已討厭這種左的詞句而要嘔吐了。我們是有組織的人。在製定我們的計劃時，我們應有組織的進行，並努力發現正確的路綫。當然，我們的提綱乃是一種妥協，這對任何人都不是祕密。爲什麼不是那樣的呢？在一定條件之下，在已經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和製定了一定的原則的共產主義者中間，妥協是必要的。由俄國代表團所提出的我們的提綱，曾經過極周密的研究準備，曾是和其他代表團長期考慮和討論的結果。它是

國際」底騎士們——及其卑鄙的毫無氣節、動搖、卑劣氣味、市儈行爲所殺死和折磨死了。武裝的資產階級給手無寸鐵的工人安置下了圈套，大批地屠殺他們，殺害他們的領袖，有系統地一個一個地加以屠殺，在這種場合，資產階級會漂亮地利用了謝德曼和考茨基們這兩派社會民主黨人隊伍裏面的反革命的異端。到危機時期，德國工人還沒有出現真正革命的黨，其原因是由於延遲分裂，由於跟資本家出賣的（謝德曼、列金、大衛德及其同派）和毫無節操的（考茨基、希法亭及其同派）奴才匪徒誇「統一」的、可詛咒的傳統之壓力。每個誠實的、有覺悟的、把一九一二年的巴黎爾宣言看做現實、而非把它看做「第二」類和「第二半個」類無賴們底「報告」的工人，都極度尖銳地生出了對德國舊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的憎恨，這種憎恨——即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羣衆當中最優秀的人們之最高貴、最崇高的感情——使人目炫，不允許他們冷靜考察，製定自己的正確的戰略，以答覆武裝精良的、有組織的、被「俄國經驗」所教訓過的、爲法英美所支持的協約國資本家底優越的戰略，這種憎恨推向了過早的起義。

這就是從一九一八年年年底起德國革命的工人運動之發展爲什麼走上了特別困難和特別艱苦的道路的原因。可是，這種運動曾經而且現在仍在不屈不撓地邁步前進着。組織在舊的孟塞維克（即爲資產階級服務的）工會裏面的以及完全或還不多完全沒有組織的德國工人羣衆，德

國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真正多數其逐漸的向左轉移，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要失掉冷靜和堅定；——有系統地糾正過去的錯誤；——不屈不撓地爭取工會內和工會外的工人羣衆底多數；——耐心地建設能夠在事變底一切關頭真正領導羣衆的堅強的和聰明的共產黨；——給自己製定與那最「啓蒙的」（一般數百年來的經驗，特別是「俄國經驗」）「先進的資產階級底最優秀的國際戰略水平相齊的戰略——這就是德國無產階級現在和將來應做的事情，這就是保證它勝利的東西。

另一方面，在目前，品質不好的左的（「德國共產主義工黨」）和右的（萊維及其刊物我們的道路或蘇維埃）共產主義者，其分裂使德國共產黨底嚴重地位更加困難了。

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始，「左派」或「德國共產主義工黨派」就在國際舞台上從我們方面得到了充分地警告。至少在幾個最主要的國度裏還沒有創造出足夠強大的、有經驗、有勢力的共產黨以前，不得不容忍半無政府主義的分子參加我們的國際大會，並且他們的參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益的。所以有益者：因為這些分子對於沒有經驗的共產主義者可以作為一個顯明的「可怕的榜樣」，並且因為他們自己還能夠學習的。在全世界上，——不是從昨天起，而是從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底開始起——無政府主義就分成兩派了：一派擁護蘇維埃，一派反對蘇維埃，一派擁護無產階級專政，

一派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應該無政府主義底這種分解過程生長和成熟起來。在西歐，曾經歷過稍微大的革命的人，差不多是沒有的；在那裏，大革命底經驗差不多完全被忘記了；但從於一個革命者的願望，從關於革命的言論（和決議）轉到真正的革命的工作，是一種極困難的、緩慢的、痛苦的轉變。

可是，很明顯的，只有有限度地才可以而且應當容忍半無政府主義的分子。在德國，我們已經把他們容忍得好久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曾經向他們提出了有精確期限的哀的美敦書。假如他們自己現在退出共產國際，那就更好了。第一、他們使我們免除了開除他們的麻煩。第二、現在特別詳細地、特別明確地在一切動盪的工人之前、在一切因痛恨舊社會民主主義底機會主義而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人們之前宣佈了，用精確的事實證明了：共產國際曾經是有耐心的，它並沒有立刻和無條件地驅逐無政府主義者，它注意地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且幫助了他們的學習。

現在，要對德國共產主義工黨派少注意些了。我們和他們論戰，只是替他們做廣告。他們太不聰明了；認真對待他們，那是錯誤的；對他們憤恨，那是不值得的。他們對於羣衆並沒有影響，假如我們自己不犯錯誤，他們也不會得到羣衆的。我們讓這個微小的派別自行死滅吧；工人自己會認識這個派別是毫無用處的。我們將要更詳細地宣傳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底組織上的與策略上的決議，並與

正應用這些決議，少拿我們和德國共產主義工黨派辯論的方法替他們做廣告。隨着運動之增長，左的幼稚病也將要成爲過去了，而且正在消逝着。

同樣，現在我們也不必幫助萊維，不必與他辯論，替他做廣告了。他所希望的不是別的，正是我們和他論戰。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以後，應忘記他了，並在我們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上，把全部注意力、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和平的（沒有饒舌、沒有論戰、沒有舊日爭吵的回憶）、實事求是的、積極性的工作上面去。根據我的信念，拉狄克同志第三次全世界代表大會論三月出動及其進一步的策略一文（見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和十五日德國統一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旗報）有不少的地方是違反第三次大會底這個一般的和一致通過的決議的。這篇論文是由波蘭共產主義者裏面的一位同志寄給我的，不僅毫無必要地——而且對事情直接有害地——尖銳地攻擊萊維（這還不十分重要），而且同樣攻擊克拉拉·蔡特金。可是，克拉拉·蔡特金自己却在莫斯科，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和德國統一共產黨中央訂立了友好的、非小組工作的「和約」！這個條件已由我們全體所批准了。拉狄克同志在其不恰當的論戰的熱中中竟達到了這樣直接的不真實的程度，以致給蔡特金加上了一種意思，似乎她「把黨底任何行動延宕到廣大羣衆奮起之日」。很明顯的，拉狄克同志正以這樣的手段爲萊維服務，這正是萊維所求之不得的事了。萊維所希望的，只是無限期地把爭論延長下

法，把更多的人捲入爭論，力謀使蔡特金在論戰上破壞她自己所締訂、並由整個共產國際所批准的『和約』，以便把她從黨推開。拉狄克同志以其論文提供了一個如何『從左的方面』幫助萊維的最好的榜樣。

在這裏，我必須向德國同志說明一下，我爲什麼要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那末長時間地爲萊維辯護。第一、因爲我是在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在瑞士經拉狄克認識萊維的。萊維在那時就已經是個布爾塞維克了。我對於那些僅在俄國布爾塞維主義勝利以後和在國際舞台上一連串的勝利以後才走向布爾塞維主義的人們，不能不抱有若干不信任。可是，這個原因自然是比較不重要的，因爲我對萊維個人所知道的仍然很少。不可比擬地更重要的，則是第二個原因，即萊維在其對於一九二一年德國三月運動的批評上，有很多地方，就事情底本質講，是正確的（自然，不是在於說三月運動是『盲動』：萊維底這個斷言是荒謬的）。

誠然，萊維曾做了一切可能的和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爲的削弱乃至傷害他的批判，爲的以許多枝節瑣事使自己和別人難以了解問題底本質，在這些枝節瑣事上，他是顯然不正當的。萊維使自己的批評具了一種不可允許的和有害的形式。對別人宣傳小心而深思熟慮的戰略的萊維，自己却比任何毛孩子更愚蠢，他曾經那末過早地、那末無準備地、那末荒謬地、那末粗暴地闖進『戰鬥』，以致他一定要在『戰鬥』中槓輸（並且使工作在數年內受到損害或成到困難），雖然這種『戰鬥』是可以獲勝而且應當獲

勝的。萊維的行爲很像一位「知識分子的無政府主義者」（如果我沒有錯的話，德文把這叫做「高等無政府主義者」），不是像個無產階級的共產國際底一位有組織的黨員所作的。萊維是破壞紀律了。

由於犯了這一連串的非常愚蠢的錯誤，萊維便很難把注意力集中到問題底本質上了。而問題底本質，就是說，對德國統一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運動時所犯的很多錯誤之評價與糾正，過去和現在都有巨大的意義。爲了解釋和糾正這種錯誤（有些人頌揚這些錯誤爲馬克思主義策略之珍珠），必須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擁護右翼。否則，共產國際底路線就錯誤了。

我曾經替萊維辯護，而且也應當替他辯護，因爲我碰到了這樣反對他的人，他們簡簡單單地喊叫「孟塞維主義」、「中派主義」，而不願意看到三月運動底錯誤和有說明及糾正這種錯誤之必要。這些人們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漫畫，把反對「中派」的鬥爭變成了一種可笑的遊戲。這些人們有給與整個事情予以最大妨害的威脅，因爲「世界上無人能夠損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除非他們自己損害它」。

我曾經對這些人們說：就假定萊維已經變成了孟塞維克。我對他個人很少知道，假如能給我證明這一點，那我不願固執己見。但是，目前還沒有證明這事情。目前所證明了的，只是他曾經狼狽過而已。單因這一點，就宣佈一個人爲孟塞維克，那是幼稚的蠢事。訓練出一些有經驗

的、非常有威信的黨的領袖，那是一件長期的、困難的事情。可是不這樣，則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底「意志之統一」，就成了一句空話而已。在我們俄國，訓練出一批領導者，曾經費了十五年（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七）的工夫，那是與孟塞維主義作鬥爭的十五年，沙皇政府實行迫害的十五年，包括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即偉大的和強有力的革命之諸年的十五年。雖然如此，但我們仍有過甚至極優秀的同志也有過「狼狽」底慘痛事件。假如西歐的同志們想像，以為他們已有不發生這種「慘痛事件」的保險，那末，這就是非和它鬥爭不可的一種幼稚病。

萊維因破壞紀律，而應當開除。策略應根據對一九二一年三月運動底錯誤之最詳細的解釋與糾正，加以確定。如果在這以後，萊維還想照舊辦事，那時，它就證實了開除他之正確，那時，對動搖的或無信心的工人，將愈加有力、愈使人心服地證明，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萊維的決議是正確的。

我在大會上愈小心地處理對萊維底錯誤之估計，則我現在可以愈有信心地說，萊維已經急於證實這最壞的預料了。我手邊現有他的一份雜誌我們的道路第六期（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出版）。從登在該刊篇首的編者聲明裏面可以看出，萊維已經知道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了。他對於這些決議的答案呢？這是一些關於「大放遜」、關於「教會法規」、關於他將「完全自由」地「討論」這些決議的孟塞維克的口頭禪。這裏還有什麼自由可以比一個人

解除了黨員名義和共產國際會員名義更完全的呢！瞧吧，在他那裏，在萊維那裏寫文章的，將是匿名的黨員！

最初——密謀反黨，鉤心鬥角的爭吵損害黨的工作。

然後——真正討論大會底決議。

這太漂亮了。

但是，萊維却是以此把自己澈底地毀滅了。

萊維希望延長爭吵時間。

滿足他的這種願望，那是最大的戰略上的錯誤。我要勸告德國同志們！禁止在黨底日報上和萊維及其刊物論戰。不應替他做廣告。不應允許他把戰鬥的黨底注意力從重要的事情轉移到不重要的事情上去。在萬分必要時，可在週刊、月刊或小冊子上論戰，並要盡可能地不讓德國共產主義工黨派和萊維在叫他們底名字時感到滿足；可簡單地說「若干不十分聰明的批評家，願意必須自稱為共產主義者」。

我得到報告，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底最近一次會議上，甚至左的弗利斯蘭也不得不尖銳地出來反對那以左傾為兒戲和願意在「捕捉中派」的遊戲中練練體操的馬斯洛夫。這位馬斯洛夫態度（說得緩和一點）之不合理，在此地，在莫斯科也顯示出來了。事實上，德國的黨應把這位馬斯洛夫及其二三位道友和戰友送到蘇維埃俄羅居住上一二年，這些人顯然都是不願遵守「加約」和毫無理智地容易動怒的。我們可以替他們找到有益的事情。我們可以腐化他們。可是，對於國際工人運動和德國工人運動的利

益，却是顯而易見的。

德國共產主義者必須不惜任何代價結束內部爭吵，必須除去兩方面的好爭吵的分子，必須忘掉德國共產主義工黨黨派和萊維，而從事真正的工作。

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 × ×

據我所見，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底策略的與組織的決議案，標誌着運動底一個大進步。應當竭盡一切力量，真正實行這兩個決議。這是困難的事情，但是可以而且必須這樣做的。

起初，共產黨人就應向全世界宣佈他們的原則。這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已經做到了。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則是共產國際之組織上的定型化和加入條件之製定——即真正與中派、與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內的直接的和間接的代理人分離的條件之製定。這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已經做到了。

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應開始實事求是的、積極性的工作，計算到已經開始的共產主義鬥爭底實踐經驗，具體地規定怎樣在策略上和組織上繼續進行工作。這個第三步我們也已經做到了。我們在全世界上有一支共產黨人大軍了。它訓練得還不好，組織得還不好。忘記這個真理或害怕承認這個真理，乃是對事情之最大的損害。對這支軍隊，在實事求是地、最慎重地和最嚴格地檢查自己，並研

究自身運動底經驗時，應加以訓練，加以組織，應用一切演習，各種各樣的戰役，進攻與退却的戰術，加以考驗。沒有這種長期的和艱苦的訓練，則勝利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一年夏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中的【關鍵】，便是共產國際底最優秀的和最有威信的一些部分中之若干，沒有完全正確地理解這個任務，而稍微誇大了【反對中派的鬥爭】，稍微超出了這樣的一種限度，一超過這種限度，則這種鬥爭就變成遊戲了，一超過這種限度，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就開始受到損害了。

第三次代表大會底【關鍵】，就在這裏。

誇大的程度是不大的。但它的危險性却是無窮的。與這種誇大作鬥爭是很困難的，因為造成這種誇大的正是真正最優秀的、最忠實的分，沒有這些分子，也許就沒有共產國際了。在那由德、匈、意等代表團簽字而用德文、法文、英文發表於莫斯科日報的策略上的修正案裏面，曾經十分確定地表現了這種誇大，尤其確定的是，這個修正案是針對那已經寫好了的（經過了長時期的和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決議草案而提出的。拒絕這個修正案曾是共產國際路線底拉直，曾是對這種誇大危險的勝利。

可是，這種誇大，假如不糾正它的話，勢必要斷送共

* 係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用德文、英文、法文出版的一種日報。——編輯部註

產國際的。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損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除非他們自己損害自己」。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阻礙共產主義者對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的勝利（這就是說，在二十世紀的西歐和美國底條件之下，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除非共產主義者自己阻礙這種勝利。

而誇大事情，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這就是說阻礙勝利。

誇大反對中派的鬥爭，就等於挽救中派，鞏固他們的地位，他們對工人的影響。

在從第二次到第三次代表大會的這一時期，我們已經在國際範圍內學會了進行反對中派的勝利的鬥爭，這已經為事實所證明了。我們要把這種鬥爭繼續進行到底（開除萊索和塞拉第黨）。

但是，在反對中派的鬥爭中，我們還沒有在國際範圍內學會進行反對不正確的誇大的鬥爭。但是我們已理解了我們的這個缺點，一如第三次代表大會底經過與結局所證明的。正因為我們意識了我們的缺點，所以我們正在免除這種缺點。

那時，我們將是不可戰勝的了，因為沒有無產階級內部的支柱（經過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內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則西歐和美國底資產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了。

新的、日益有決定意義的戰鬥——防禦的和進攻的戰鬥，作更周密的更切實的準備——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

會決議裏面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東西。

「……假如意大利共產黨能孜孜不倦地、不屈不撓地反對塞拉第底機會主義政策，同時在罷工當中、在反對法西斯蒂反革命運動的鬥爭當中，能與職工會裏面的無產階級羣衆保持密切的聯繫，假如它能把工人階級羣衆運動聯合起來，並把他們的自發的鬥爭轉變爲有周密準備的戰鬥，那末，共產主義在意大利就將成爲一個積極的羣衆的力量了……」

「……德國統一共產黨，愈能夠很好地使自己的戰鬥口號適應於運動底實際情況，愈能夠周密地研究這種情況，愈能夠使這種運動配合起來，則它愈能夠勝利地實行羣衆的行動……」

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會策略決議底最重要的地方。

把無產階級底大多數爭取到我們方面來——這就是「最主要的任務」（策略決議第三節標題）。

當然，我們並不是形式主義地理解這種對大多數之爭取的，如第二半國際中庸俗的「民主主義」底騎士們所理解者。一九二一年七月羅馬全體無產階級——不管職工會裏面的改良主義的無產階級也好，塞拉第黨裏面的中派的無產階級也好——都跟在共產主義者後面反對法西斯蒂，這就是爭取工人階級底大多數到我們方面來。

這遠遠不是決定性的爭取，而只是部分的、只是一剎那的、只是地方性的爭取而已。然而這已是對大多數之爭取了。這樣的一種爭取是可能的，——甚至在無產階級底

大多數在形式上跟在資產階級出身的領袖或跟在實行資產階級政策的領袖（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一切領袖們都是這樣的）後面時或在無產階級底大多數正在動搖時，也是一樣。這樣的一種爭取，正在全世界各地並以各種方式不屈不撓地前進着。我們要更切實地更小心地準備它，不放过資產階級迫使無產階級起而反抗的每個嚴重事件，要學會正確地規定無產階級羣衆不能不和我們一同起來反抗的那樣的時機。

那時，不管我們偉大的進軍當中個別的失敗如何嚴重，個別的轉變如何困難，我們底勝利將是有保證的了。

我們的策略的和戰略的手段還落後於（假如就國際範圍來判斷的話）資產階級底優越的戰略，資產階級已經從俄國底榜樣上學會了乖，不讓自己「突然被俘」了。但是，我們的力量是很大的，是無比地大的；我們正在學習策略和戰略；我們已經根據一九二一年三月運動底錯誤所得到的經驗，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了。我們將要完全精通這門「科學」的。

在最大多數國度內，我們的黨還遠遠不是一切黨員全都參加鬥爭、參加運動、參加羣衆日常生活的真正共產黨，真正革命和惟一革命的階級底真正先鋒隊所應有的那樣。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這個缺點，我們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底工作的決議上已經以最大的明確性揭露了這個缺點了。我們正在克服着這個缺點。

同志們！德國共產黨員們！允許我以如下的願望結束

我的信：願你們八月二十二日的黨的代表大會能堅決和永遠地結束反對左傾脫黨者和右傾脫黨者的瑣屑的鬥爭，黨內的鬥爭已經夠了！打倒還想直接或間接延長這種鬥爭的任何人。我們現在比昨天更明白、更具體、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任務了：我們不害怕公開指出我們的錯誤，以便改正這種錯誤。我們現在要將以一切力量貢獻給黨，改善黨的組織；提高它的工作底質與內容，與羣衆建立更密切的聯繫，製定工人階級底越來越正確的、越來越精密的策略與戰略。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N. 列寧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

我們所付的代價太大了

試設想一下，共產黨人底代表，要進入那資產階級底全體代表在那裏向人數相當多的工人大會大做其宣傳的一所房子裏面去。其次試設想一下，因進入這所房子，資產階級要向我們要求付高類的房金。假如房金不是預先講妥了的，那末，我們當然就必須講講價錢，以便不要加重自己黨底預算。假如我們所付的入場費太大，那末，無疑地我們就犯錯誤了。但是，與其放棄對迄今為改良主義者（即資產階級底最忠實的朋友）所「享有」的那些工人講自己的話的機會，却寧願付與較高的代價，至少在我們還沒有學會應當講價錢以前。

當我在今天的真理報上讀了柏林來的一個謂三個國際底代表在那些條件之下成立協定的電訊時，我忽然想到了這個比喻。

據我所見，我們的代表同意以下的兩個條件，是處理得不正確的：第一個條件，蘇維埃政權關於四十七個社會革命黨人案件不要應用死刑；第二個條件，蘇維埃政權應允許所有三個國際底代表出席對於該案的審判。

這兩個條件不是別的，正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對反動的

資產階級所作的政治上的讓步。假如某人懷疑這樣的一個定義之正確，那末，只需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就足以暴露這個人底政治上的素樸性了，即：英國或別國的現政府，是否同意所有三個國際底代表都出席對被控起義的愛爾蘭工人的審判呢？或出席對最近南非工人起義底被告呢？在這樣的或類似的場合，英國或別國的政府，是否同意它會允許對它們底政治敵人不應用死刑呢？只要對於這些問題稍微想一想，就足以明白如下的一個簡單的真理：我們現在在全世界所看到的，乃是反動的資產階級與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在所指的場合，共產國際乃是代表這個鬥爭中的一方面對另一方面——即反動的資產階級作了政治上的讓步。因為全世界上人人都知道（除了要想隱蔽這個顯然的真理的人以外），社會革命黨人曾經槍斃過共產主義者，並實行過反對共產主義者的暴動，事實上，有時也是形式上跟整個國際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採取統一戰綫來行動的。

現在要問：國際資產階級作為交換條件，對我們作了怎樣的讓步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有一個：它們沒有對我們作任何的讓步。

只有隱蔽階級鬥爭底這簡單而明白的真理的議論，只有模糊工人和勞動羣衆視綫的議論，才能企圖隱蔽這個顯然的真理。根據第三國際代表在柏林所簽定的協定，我們已經對國際資產階級作了兩個政治上的讓步。而我們却沒有從他們方面得到任何的讓步。

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代表；曾經扮演了使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作政治讓步的勒索者之角色，在這場合，他們堅決地拒絕實行或拒絕甚至企圖實行國際資產階級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作任何政治上的讓步。當然，這個不可爭辯的政治事實曾為熟練的資產階級外交底代表們所隱蔽了（資產階級曾在好多世紀間教導本階級底代表做很好的外交家），但是隱蔽事實的企圖，絲毫沒有改變事實本身。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某代表都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聯系在一起的，這在這種場合是個完全不關重要的問題。我們並不責難他們的直接的聯系。在這裏是直接的聯系呢，抑或是相當混亂的間接的聯系，這是與事情完全沒有關係的。與事情有關係的，只是共產國際在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全權代表之壓力下對國際資產階級作了政治上的讓步，而我們却沒有得到任何的讓步作為交換條件。

從這裏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是代表共產國際的拉狄克、布哈林及其他同志，都是作得不正確的。

其次，可否從此得出結論說，我們應該撕毀他們所簽訂的協定呢？不可以的。我以為，這種結論是不正確的，我們不應撕毀已簽字的協定，我們只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國資產階級的外交家，表現得比起我們的外交家來要更熟練些，下一次——假如入場費並不是預先講妥的話——我們就要更熟練地討價還價和迂迴。我們將來必須作為原則的是：假如我們沒有得到國際資產階級方面對

蘇維埃俄羅斯或對正與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國際無產階級底其他部隊或多或少的等價的讓步，那末，我們對國際資產階級不作政治上的讓步（不管怎樣熱練地用隨便什麼手段來掩蔽這種讓步）。

有可能，那反對統一戰綫策略的意大利共產主義者和一部分法國共產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都從上述的議論中得出結論說，統一戰綫策略是錯誤的。這個結論是顯然地不正確的。假如共產黨底全體代表，爲了他們有若干的可能（雖然不很大），對於迄今爲改良主義者所「專有」的工人講話所付的入場費太貴了，那末，要力謀下一次改正這種錯誤。可是，拒絕進到這門禁鎖嚴的，關閉的房子裏面去的任何條件和任何代價，那都是一個無可比擬的更大的錯誤。拉狄克、布哈林及其他同志所犯的錯誤是不很大的；這種錯誤因下面一點緣故而更小些，即：我們至多是冒這樣的危險，就是蘇維埃俄羅斯底敵人，爲柏林談判底結果所鼓勵，對個別人物造成兩三次——或許成功的——暗殺案。因爲他們現在已經預先知道，他們可以槍殺共產黨人，但，他們却有像柏林談判這樣的談判將阻止共產黨人槍殺他們的希望。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在那所關閉的房子上已經穿了個洞了。無論如何，拉狄克同志曾做到即使只在一部分工人面前揭露了這樣的事實，即：第二國際拒絕把取消凡爾賽條約的口號放在示威運動的口號之列。意大利共產主義者和一部分法國共產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底最大錯誤，

是在於他們以他們現有的知識爲滿足。他們以他們清楚地知道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代表以及萊維、塞拉第等老爺們都是資產階級底最熟練的全權代表和資產階級影響的傳播者爲滿足。但是，確確實實知道這一點並真正理解這一點底意義的這樣的人們和工人，不管在意大利也好，在英國，在美國，和在法國也好，無疑義地都是少數。共產黨人不應該按自己的口味去烹調，而應該學會這樣地去行動：即不顧惜某種犧牲，不害怕每當一種新的和困難的事業開始時所不可避免的錯誤，而闖入資產階級底代表對工人發生影響的房子裏面去。不願了解和不願學習這一點的共產黨人，就不能夠希望在工人階級中獲得大多數，或者不論如何，他們使獲得這種大多數的事情更加困難，更加緩慢。可是這對於共產黨人及工人革命底一切真正擁護者，却已經是一件絕對不可寬恕的事情了。

資產階級以他們外交家爲代表，又一次比起共產國際底代表表現得更熟練些。這就是柏林談判底教訓。我們不應忘記這個教訓。我們要從這個教訓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結論。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代表是需要統一戰線的，因爲他們希望能夠以我們方面的過度的讓步削弱我們；他們希望不付任何代價地闖入我們的共產主義的房子裏來；他們希望借助統一戰線底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義策略之正確和革命策略之不正確。我們也需要統一戰線，因爲我們希望使工人相信相反的一面。我們將我們共產主義代表所犯的錯誤放在該代表身上，放在犯了這種錯誤的黨底身

上；同時，努力在這種錯誤底榜樣上學習，並達到將來不再重複這種錯誤。可是，不論如何，我們將來決不把我們共產黨人底錯誤轉嫁在無產階級羣衆身上，無產階級正處在全世界上對其採取攻勢的資本底襲擊之前面。爲了幫助這種羣衆反對資本的鬥爭，爲了幫助他們理解整個國際經濟和整個國際政治上的兩條陣綫底「狡猾機詐」——爲了這，我們採取統一戰綫的策略，並將把這種策略進行到底。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政論家札記

——（論登高山；論沮喪之害；論商業之利益；
論與孟塞維克之關係等等）——

（一）一個例子

我們假設有一個人，他登一個極高的、峻峭的、還沒有
有人探險過的山。我們假定，他克服了空前未聞的困難和
危險，竟達到了比起他以前的人更高更高的地方，可是，
他還沒有達到山頂。現在他正處於這樣的一種情況中，
即：照所選擇的方向和所採取的道路繼續前進，不但已
經困難和危險，而且簡直不可能了。他不得不掉轉頭來向
下走，找尋別的道路。這種道路即使是更長一點，可是却
有達到山頂之可能。從我們假想的登山者現在所在的這個
世界上還沒有人到過的高處往下走，也許甚至比上山更要
危險，更要困難，因為：比較容易失足；不能那末方便地
看清你要立足的地方；沒有因直接升高，直接走向目的地
而生的那種特別高的情緒等等。須要用繩子捆在身上，耗
費許多鐘頭，以使用鵝嘴鋤掘出腳級或可以拴牢繩子的地
方；不得不以烏龜那樣的慢步，向前移動，而且後退，向

下、離目的更遠地移動，而仍然不能看見，這樣的極端危險的、痛苦的下山是否將要結束，能不能找到一條略可靠的道路，可以重新更勇敢地、更迅速地、更直接地、前進、上升、達到山頂上去。

假定陷於這種情況裏面的一個人，不管他所達到的地點是空前地高，但仍有瞬間的沮喪，那差不多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他能夠聽到下面的若干聲音，聽到那從無危險的遠處，用望遠鏡觀看這種極度危險的下山的人們底聲音，但這種瞬間大概是很多的、頻繁的、及嚴重的，——甚至不能把這樣的下山（照「目標變換派」*的榜樣）稱為「使用制動機的下山」，因為制動機，是以計算精確、業已經過試驗的馬車、預先修好道路、早已經過考驗的機器為前提的。可是，現在既沒有車輛，也沒有公路，既沒有一般的任何東西，也沒有事先經過試驗的任何東西！

可是下面來的聲音是幸災樂禍的。有的公開表示幸災樂禍、大聲呼喊，高叫：現在，他就要摔下來了，這對於他是完全活該的，不要發瘋啊！有的努力把他們的幸災樂禍隱藏起來，主要地仿照伊杜什卡·戈洛夫列夫*的榜樣來行動；他們仰天長嘆說，這却使人痛心了，唉！我們的

* 「目標變換派」是亡命國外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底一個集團，他們在蘇聯採用新經濟政策後，抱着蘇維埃政權變質的虛幻的希望，贊成與蘇維埃政權合作。

要權畢竟證實了！把我們畢生精力都用於準備攀登這座高山的合理計劃上面的我們，在我們的計劃沒有告竣以前，難道不能要求延期上山嗎？如果我們這麼熱烈地反對這個狂人現在自己所放棄的那條路（瞧吧，瞧吧，他回頭了，他下去了，他爲了準備能前進幾尺路的机会，費了好幾個鐘頭的功夫！可是，當我們有系統地要求緩和和精確性時，却用最難聽的話咒罵我們！）——如果我們這末熱烈地責難這個狂人，並警告大家不要模仿和幫助他，那末，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攀登這座高山的崇高計劃之愛護，以便不要損害這個一般的崇高計劃。

幸虧我們所設想的登山者，在我們所舉這個例子底情況之下，並不能聽到這些登山思想底「真朋實友」底聲音，否則，他也許就要作嘔了。可是作嘔——人們說——却不能促進腦筋之清醒和腳步之穩健，尤其是在極高的地方。

（二）不用比喻

例子不是證據。每一種比喻都是跛行的。還是無可懷疑的、人所共知的真理，可是，却不妨記住這種真理，以

* 俄俄國談判家沙爾提可夫。謝維林：戈洛夫死矣，先生們故事中的人物——偽善者。——羅維諾

便更明顯地想像一下每一個一般比喻底有效界限。

俄國無產階級，在其革命中曾爬到了極高的高峯，不僅和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三年比較起來是極高的，而且和一八七一年比較起來也是極高的。必須盡可能更冷靜、更明白、更明瞭地認清，我們「已經完成的」是些什麼，沒有完成的是些什麼：那時，頭腦就清醒起來，既不會作嘔，也不會幻想，更不會沮喪了。

我們已經像在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那樣「純粹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奪去的。

我們完成了以革命辦法擺脫最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出路。同樣，這也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拉回去的，這一成就因下面一點而更加寶貴，即：如果資本主義還保存着的話，那在最近的將來，反動的帝國主義大屠殺仍是不可避免的，而二十世紀的人決不會再第二次那麼容易地爲巴塞爾宣言所欺騙了，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叛徒們、英雄們，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四——一八年，就是利用這個宣言來愚弄他們自己和工人的。

我們創造了蘇維埃類型的國家，從而開始了一個新的全世界歷史時代，代替資產階級統治時代的無產階級政治統治時代。同樣，這也是不能奪回去的，雖然只有用幾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底實踐經驗，才能「完成」蘇維埃類型的國家。

可是，我們甚至還沒有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仇視我們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底力量還會奪回這的。必須明確地意識這一點，並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因為再沒有比幻想（和昏頭腦）更危險的了（尤其是在極高的地點）。承認這個苦的真理，絲毫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絲毫沒有足以引起小小沮喪的、合法根據的事情，因為我們總是信仰並重複馬克思主義底這樞初步真理的：即爲了社會主義底勝利，需要有幾個先進國度底工人之共同努力。可是，我們暫時仍然只是一國，並且，我們在一個落後的國度裏、在一個比其他各國破壞得更厲害的國度裏，完成了不可想像地好多事情。不僅如此，我們保存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力量底『軍隊』，我們保存了它的『機動能力』，我們保存了頭腦之清醒，讓我們得以冷靜地估計必須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和在什麼程度內退却（爲的作更有力的躍進）；必須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和怎樣着手那已經完成的事業之改造。應當承認，那幻想不犯錯誤、不退却、不一再重新來作尚未完成的事情和做得不正確的事情而就可以完成這樣全世界歷史的『企業』，如奠定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尤其是在一個小農底國度內）的這種共產黨人，一定要滅亡的。那些既不陷於幻想、也不陷於沮喪、而保持身體力量和靈活性，以便在處理最困難的任務時一再『從頭開始』的共產黨人，則是不會滅亡的（而且最有可能不會滅亡的）。

我們更不許有微小的沮喪，也沒有陷於這種微小的沮

裏的理由，因為我們在我們的一切破壞、貧困、落後、飢荒之下，在準備社會主義的經濟領域以內已經開始前進了，而這時在全世界上與我們並列的一些更先進的，比我們更千倍富足的、軍事上更千倍強大的各國，則在『它們』的，為它們所如此稱頌的、為它們所熟悉的、已經經過了幾百年考驗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之領域內繼續倒退着。

(三) 論捉狐狸；論萊維； 論舍拉策。

人們說，最有希望的捉狐狸的方法是：用藤繩把所探到的狐狸在相當的距離內圍起來，並在離雪不大高的地方插上小紅旗；因害怕顯係人造的『人』的設置物，狐狸只有在這種用小紅旗所築成的『圍牆』開放的時候和地方，才會跑出來；而獵人即可在該處等待狐狸。似乎，這種人人都要捕獲的野獸，其小心謹慎是一個最好的品質。可是，在這裏，『優點之繼續』却成了缺點。人們捉住狐狸，正是由於狐狸之過度小心。

這裏必須說一下我同樣因過度小心而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犯的一個錯誤。在這次大會上，我是站在最右的一翼的。我相信，這會是唯一正確的立場，因為當時一個黨數特別大的（而且『有威信的』）代表集團，以很多德國、匈牙利及意大利的同志為首，曾經採取了一種

過度『左的』和不正確的左的立場，他們太常常以加緊揮動小紅旗來代替那對立刻的和直接的革命行動不十分有利的局面之冷靜估計。我由於小心，由於顧到使這個無疑地不正確的左的傾向對共產國際底全部策略不予以錯誤的方向，曾經用各種方法替萊維辯護，並表示了這樣的臆測，即：萊維失掉頭腦，也許是因為對於左派錯誤之過於驚慌（我並沒有否認，他曾經失掉了頭腦），並說，常有這種情形，即失掉了頭腦的共產黨人，以後『又找到了頭』。當我——在左派底壓力之下——甚至假定，萊維是個孟塞維克時，我也指出，甚至這樣的一種假定也還沒有解決問題。舉例來說，俄國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的十五年鬥爭底全部歷史（一九〇三年——一九一七年）證明，正如俄國三次革命所證明的一樣，一般地講，孟塞維克無條件地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他們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內的代理人。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但是，這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却沒有排除另一個事實，即：在個別の場合，孟塞維克有時反對布爾塞維克是正確的，例如在一九〇七年抵制斯托理賓國會*的問題上。

從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過了八個月

* 關於俄國斯托理賓國會即第三屆國會選舉的策略，可參看本選集第六卷反對抵制國會一文及關於該文的附註釋。

——編者誌

了。顯然，我們那時和『左派』的爭論已經過時了，已經爲生活所解決了。現在已經明白，關於萊維的問題，我曾經是不對的，因爲他已經有效地證明，他陷於孟塞維克的歧途，不是偶然的，不是暫時的，不僅是因反對『左派』底極危險的錯誤，而且是長時期地、牢固地、由於他的整個天性而『折彎棍子』了。萊維不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後，老實地承認有重新請求恢復黨籍之必要，如因對左派底若干錯誤的憤怒而曾經暫時失掉頭腦的人所應做的那樣，反而開始卑鄙地污蔑黨，並從背後掣肘，就是說，實際上替資產階級在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內的代理人服務了。很明白的，德國共產黨人是對的，他們是以如下的行動去回答這一點，即不久以前，又把那秘密援助萊維幹這種高貴的勾當的幾個老爺們從自己的黨內開除出去了。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以後，德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底發展證明，左派在這次大會上底錯誤已爲他們所洞悉、所糾正了——雖然是漸漸地、緩慢地，但却是不屈不撓地；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已被誠實地實行了。把歐洲國會主義的、實際上是改良主義的、只是輕輕塗上革命色彩的、舊型的黨，革新爲新型的黨，爲真正革命的、真正共產主義的黨——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法國的例子就把這種困難表明出來了，也許最清楚地表明出來了。在日常生活中改造黨底工作之類型，革新日常的事務主義，力謀做到使黨成爲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同時不脫離羣衆，相反的，而與羣衆日益密切地接近，把它

們提高到革命的意識和革命的鬥爭上來——這是一件最困難，但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歐洲共產黨人不利用革命的決鬥特別尖銳化的兩個時期中間的（大概是極短促的）時間，如同歐美很多資本主義國度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季所經歷者，對其黨底全部機構和全部工作進行這種徹底的、內部的、深刻的改造，那末，這將是他們方面的最大的罪惡。幸而還沒有引起這種憂慮的理由。那不聲不響的，不彰明顯著的，不哭泣的，不迅速的，但却是深入的在歐洲和美洲建立真正共產黨，無產階級底真正革命先鋒隊的工作，已經開始了。並且這種工作正在繼續着。

甚至從觀察像捉狐狸這樣平凡的事情所得出的政治教訓，也並不是無用的：一方面，過度的小心引導到錯誤上去；另一方面，不可忘記，如果僅僅以「情緒」或揮動小紅旗去代替對時局之冷靜的估計，那就喪失不可補救的錯誤；在困難雖然很大，但滅亡却決非不可避免的這種情況之下，是可以滅亡的。

現在，萊維想在資產階級面前——並因而在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面前，在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面前，特別効勞，她恰恰把盧森堡寫得不正確的那些著作重新出版了。我們可用俄國很好的一首童話裏面的兩句話來回答這一點：應有時比鷄還飛的底些，但是，鷄却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盧森堡在波蘭獨立的問題上是犯錯誤了；她於一九〇三年在對孟塞維主義的估計上是犯錯誤了；她在資本積蓄的理論上是犯錯誤了；她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和普列

哈諾夫、樊迪文、考茨基等並肩擁護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聯合，是犯錯誤了；她在其一九一八年的獄中寫作上是犯錯誤了（並且她本人於一九一八年末和一九一九年初出獄時會糾正了自己錯誤之大部分）。可是，雖然她犯了一切這些錯誤，但她曾經是隻鷹，而且現在仍然是隻鷹，不僅關於她的紀念將永遠對於全世界的共產黨人是寶貴的，而且她的傳記和她的全集將成為教育全世界數代共產黨人的最有益的教訓（在這點上，德國共產黨人再不能遲延了，他們在其嚴重鬥爭中的巨大的犧牲，只能部分地作為解釋這種遲延的理由）。『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後，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具發臭的屍體了。』——盧森堡底名字和她的這句名言，留傳在全世界工人運動底歷史上。可是，在工人運動底後院，在糞堆中，萊維、謝德曼、考茨基這一類的雞，和其整個同類，自然，是對這位偉大的共產黨人底錯誤特別興高彩烈的。讓每個人去高興他的吧。

至於說到塞拉第，把他可以比做一顆敗壞的雞蛋，它帶着響聲和特別……刺鼻的奇香裂開來了。在『自己的』大會上，提議通過一個準備服從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決定的決議，然後把一位老者拉撒里派到這個大會上來，最後以馬販子的粗暴欺詐工人——這却是一種寶貝。意大利共產主義者正在培養着意大利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黨，他們現在，就可以使工人羣衆看到政治欺詐和孟塞維主義底最明顯的榜樣了。這種榜樣底有益的、推開的作用，雖然不是一下子，不是沒有好多次重複表演明顯的教訓而表現出

來的，但勢必要表現出來的。不脫離羣衆；在普通工人面前實際揭露塞拉第底一切騙局的艱苦工作中不丟掉耐心；不辭心於作太輕率的與最危險的決定：在塞拉第說『甲』的地方，就說『不是甲』；教育羣衆不屈不撓地走向革命的世界觀和革命的行動；在實踐上和以實踐方式利用法西斯主義底最好的（雖然是代價高昂的）明顯的教訓——這樣，意大利共產主義底勝利就有保證了。

萊維和塞拉第，就本身來講，並沒有什麼特色，他們的特色，在於他們都是現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極左翼底榜樣，是『他們的』陣營，國際資本家陣營反對我們陣營底極左翼底榜樣。『他們的』陣營，他們全體，從賈彼爾斯到塞拉第，對我們的退却，對我們的『下山』，對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幸災樂禍、狂歡、或流空淚。讓他們去幸災樂禍吧。讓他們去排演他們的滑稽劇吧。讓他們每個人去高興他的吧。可是，我們却不讓自己爲幻想所支配，也不讓自己爲沮喪所支配。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不怕多次地、重複而又重複地努力改正這種錯誤——那時，我們就達到最高峯了。從賈彼爾斯到塞拉第的國際聯合的事業，乃是亡國的事業。

一九三二年三月

論反戰問題

——致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及莫洛托夫
——
——同志（爲政治局開委員而作）——

據昨天漢諾威的消息，國際五金工人聯合會把反戰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並通過了以罷工答覆戰爭的決議，因看了這個消息，我建議如下：

（一）在真理報和消息報發表數篇論文，回憶巴塞爾宣言底命運，並詳細說明現在五金工人所重視的一切無知蠢事或一切社會變態行爲。

（二）把反對戰爭的問題提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下次擴大會議，並通過詳細的決議，解釋：只有預先準備好的和經過考驗的有着很好的非法機構的革命的黨，才能勝利地進行反戰的鬥爭，並且，鬥爭底手段，不是反戰之罷工，而是在作戰的部隊中建立革命的支部，準備這些軍隊實行革命。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 列寧

關於我們赴海牙代表團 任務問題的札記

與海牙會議相聯系，關於反對戰爭危險的問題，我想，最大的困難乃是在於克服這樣一種成見，即：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簡單的、明顯的和比較容易的問題。

——我總要用罷工或革命來答覆戰爭——改良主義者庫一切最著名的領袖平常對於工人階級如此說。而這些答覆往往如此表面的急進，是爲了滿足和安慰工人、合作社員和農民。

最正確的方法是先從最嚴厲地駁斥這種意見開始。人們宜稱：特別是在現在，在大戰剛剛結束之後，只有最愚笨的或虛偽得不可救藥的人們才能確信，這一種對於反戰問題的答覆是有用的。人們宜稱：用罷工「答覆」戰爭是不可行的，正如用革命（就這個字底最簡單的和真正的意義說）來「答覆」戰爭是不可能的一樣。

應當向人們說明現實的局面：產生戰爭的祕密是多麼大，工人黨普通組織，即令自稱爲革命的組織，但在真正逼近的戰爭面前，是如何束手無策。

應當一再最具體地向人們說明，在上次大戰期間情形

是怎樣的，以及爲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特別是應當說明這種情況底意義，即：『保衛祖國』變成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大多數勞動者，都將是不可避免地有利於他們的資產階級而解決這個問題的。

因此，第一，應說明『保衛祖國』的問題；第二，與此聯系，說明『失敗主義』的問題；最後，說明反對戰爭底唯一可能的方式，即保存並建立非法的組織，以便一切參加戰爭的革命者進行長期的反戰工作——必須把這一切放在第一位。

抵制戰爭是一句愚蠢的空話。共產黨人應到任何反動的戰爭裏面去。

希望特別具體地用大戰前德國文獻的例子，特別是用一九一二年巴塞爾代表大會的例子指明，在理論上承認戰爭是一種罪惡，戰爭對於社會主義若是不容許的等等，都是空話，因爲這樣的提出問題是沒有任何具體性的。關於這，我們並不給羣衆造成任何真正活生生的印象，謂戰爭如何可能逼近和正在逼近。相反地，統治階級的報紙，每天都在用無數的份數來塗抹這個問題，並關於這個問題散佈這樣的謠言，致使軟弱的社會主義的報紙無力反對它，尤其社會主義的報紙在和平時期，對這個問題則抱有根本錯誤的見解。共產黨的報紙，在大多數國家裏，大概也同樣是自遺恥辱的。

我想，我們出席國際合作社員和工聯派大會的代表，應當相互分工，並應最細微地詳盡分析那目前用來辯護戰

爭的一切詭辯。

也許吸引羣衆參加戰爭的最主要的手段，正是資產階級報紙所使用的詭辯，說明我們無力反對戰爭的最重要的情況，則是因為我們或者沒有事先認清這種詭辯，或者更壞的是，根據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底精神，用我們不容許戰爭、我們完全了解戰爭底罪惡性等等這一類廉價的、好聽的、完全空洞的話，逃避了這種詭辯。

我以為，假如我們在海牙會議上有幾個能夠用這種或那種語言發表反戰演說的人，那末，最重要的則是駁斥這樣的意見，即：以為出席的人都是反戰者，以為他們都了解戰爭怎樣可能而且不得不在最出人意外的時機出現於他們之前，以為他們都稍稍意識到反對戰爭的方式，以為他們都稍稍能夠採取合理的和可以達到目的的反戰的道路。

與不久以前在戰爭中所得的經驗相聯系，我們應當說明，在宣戰以後的第二天會發生怎樣的一批理論的和現實的問題，而使絕大多數被徵發入伍的人們，都失去用相當清醒的頭腦和相當誠實的毫無成見的態度對待這些問題的一切可能。

我想，應當非常詳細地說明這個問題，應當從兩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敘述與分析在上次大戰中所發生的事情，並向全體出席者說明，他們不知道這一點或者他們佯以為知而實際上却看不見問題底真正焦點是在那裏，不知道這種焦點，就根本談不到反戰鬥爭。在這一點上，我想，必須要

分析當時在俄國社會主義者中關於戰爭問題所發生的一切分歧及一切意見。必須證明，這些分歧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由現代一般戰爭的性質本身所產生的。必須要證明，不分析這些意見，不說明這些見解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和它們對於反戰問題如何具有決定的意義，沒有這種分析，就根本談不到對戰爭的準備，甚至根本談不到對戰爭採取自覺的態度。

第二，應當舉出目前衝突——即使是最細小的——的例子，並以這些例子說明，戰爭怎樣每一天都可以因英法間關於對土耳其條約某一細節問題的紛爭，或美日間因關於太平洋某一問題的極小的意見分歧，或任何大國間因殖民地爭議或因其關稅政策或其一般貿易政策的爭議等等而發生。據我看來，如果對於在海牙可以完全自由地發表自己反戰演說的可能稍有一點點懷疑，那末，就應當想出好多計策，以便至少說出最主要的東西，然後，把那未能講出的出一個小冊子。應事先想到，主席會停止我們發言。

我想，爲了這個目的，除了能夠和負責發表整個反戰演說，即能發揮反戰的一切主要論據和一切條件的講演人以外，還應當邀請精通三個主要的外國語的人加入代表團，這些人底任務應當是和代表們進行談話，並說明他們對於主要論據的了解到了什麼程度，在提出某一論據或引用例子上的必要程度如何。

也許在許多問題上，只有從上次戰爭方面舉出實際例

子，才能予以嚴重的作用。也許在另外的許多問題上，只有用解釋各國間目前衝突及其與可能的武裝衝突相聯系的辦法，才可以予以嚴重的作用。

在反戰鬥爭的問題上，我想起我們共產黨議員在國會內或在國會以外的演講中所作的好多聲明，這些聲明都含有非常不正確的、非常輕浮的關於反戰的東西。我想：對於這些聲明，尤其是如果它們是在大戰以後所作的話，必須堅決地出而加以反對，並無情地指出每個這類演說者的名字。可以隨意緩和自己對於這類講演者的意見，尤其是如果需要這樣作的話，但是對於這類的任何場合，不允緘默不言，因為對於這個問題的輕率乃是這樣的一種禍害，這種禍害是要超過其餘一切禍害的，而且對它持寬容態度，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工人大會的好多決議，都是非常愚蠢和輕率的。

應即刻搜集一切材料，並詳細討論問題底一切個別部分和細節，並討論在大會上的應有的全部「戰略」。

在這個問題上，在我們這一方面，不但不容忍有錯誤，而且也不容忍有本質上的不完備性。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俄國革命底五年與世界 革命底展望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產
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在發言人名單上，我被列為主要的報告人，但你們知道，在我長期害病以後，我不能做大的報告。我只能對於最重要的問題作一個引言。我的講題是極有限制的。俄國革命底五年和世界革命底展望這個題目是太廣太大了，一般說來，一個發言人在一次演講中是不能講完的。因此，我只取這個題目底不大的一部分——即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我故意只取這個小部分來講，為的使你們認識現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至少對我看來是個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我現在正從事研究這個問題。

總之，我只講一下，我們怎樣開始了新經濟政策；以及靠這個政策的幫助，我們獲得了什麼結果。假如我只限於這個問題，那末，我也許能夠關於這個問題做一個總的概觀和一般的觀念。

假如先從我們怎樣採取了新經濟政策這個問題開始，

那末，我必須引證我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一篇論文*。在一九一八年初，我曾經在一個短短的論戰中涉到了一個問題，即：我們對於國家資本主義應佔怎樣的地位。那時我曾經寫道：

【國家資本主義，跟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即當時的）情況比較起來，是前進了一步。如果譬方說在半年之內，我國能建立國家資本主義的話，那末，這便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和可靠的保證，即在一年之內社會主義就在我國完全鞏固起來和成爲不可戰勝的了。】

當然，這是在我們比今天更蠢的時候所說的話，但我們那時並不是如此愚蠢，以致不會考察這樣的問題了。

由此可見，我在一九一八年曾抱着這樣的意見，即：國家資本主義跟蘇維埃共和國當時的經濟狀況比較起來，是前進了一步。這聽起來是很奇異的，也許甚至是荒謬的，因爲那時我們的共和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那時，我們每天都要十分急迫地——也許太過於急迫地——採取一些不同的新的經濟措施，這些措施都只能稱之爲社會主義的措施。可是，雖然如此，我當時仍以爲，國家資本主義跟當時蘇維埃共和國底經濟情況比較起來，是前進了一步，以使我更進而用簡單地列舉俄國經濟結構基本成分

* 參看本選集第十三卷一一九至一五五頁論「左」的幼種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編輯部

的方法，來說明這個思想。依我所見，這些成分如下：「一，宗法制度的、即最原始的農村經濟形式；二，小商品生產（經營糧食的農民，大多數也屬於這一類）；三，私人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所有這些經濟成分，在當時的俄國，都是統通有的。當時，我曾經爲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即說明這些成分是處於怎樣的相互關係之中，應否把非社會主義成分之一，即國家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估價得更高些？我再重說一遍：在一個自稱爲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裏，把非社會主義的成分却比社會主義估價得更高些，承認非社會主義的成分比社會主義更優越些，人人都以爲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假如你們回想一下，我們並沒有把俄國底經濟結構看做一種同質的或高度發展的東西，相反地，我們曾經充分地意識到，在俄國，與社會主義的形式並存的則有宗法制度的農業，即最原始的農業形式，那末，事情就明白了。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資本主義能夠起怎樣的作用呢？

其次，我問我自己：這些成分之中那一種是佔優勢的呢？很明顯的，在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下是小資產階級的成分在統治着。我當時意識到，小資產階級的成分是佔着優勢；別種想法是不可能的。我在當時——這是在一次和今日的問題無關的論戰中——給自己所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對待國家資本主義呢？我給自己答道：國家資本主義，雖然它不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但對於我們和對俄

綱却是比目前的形式更適宜的形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雖已完成了社會革命，但卻沒有過高地品價社會主義經濟胚胎和開端，相反地，那時我們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認識了：是的，如果我們先達到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再到社會主義，那就比較更好些。

我必須要特別地強調這一部分，因為，我以為，只有從這一點出發，第一，才能說明目前的經濟政策是什麼；第二，才能從這裏得出對於共產國際也是重要的實際的結論。我不想說，我們已經有了預先準備好的退却計劃了。這是沒有過的。這幾行簡短的論戰文字，在那時期決不是退却計劃。在這裏，關於很重要的一點，比如，關於商業自由——它對於國家資本主義有着基本的意義——就一字未提可是，那裏却已經有了一個一般的、不確定的退却思想。我以為，我們不僅要從一個就其經濟結構講來曾經而且直到今日仍然很落後的國度之觀點，必須注意這一點，即從共產國際和西歐各先進國度底觀點，也必須注意這一點。例如現在，我們正忙於製定綱領。我個人以為最好我們是這樣做，即使我們現在只是一般地、即所謂第一次讀地討論了一切綱領，並把它們印刷出來，但不是在現今，不是在今年內，最後提出決定了。爲什麼呢？當然，首先我想，是因為我們很難對這些綱領很好地思索過。其次，這是因為我們幾乎絲毫沒有思索過可能的退却以及保證這種退却的問題。而這却是一個在整個世界發生如此基本的變化如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及其巨大的困難下我

們無條件需要加以注意的問題。我們不僅應當知道，在我們直接轉入攻勢並且獲得勝利時，我們應當怎樣行動。在革命時期，這已不是那麼困難了，而且，也不是那麼重要了，至少這不是最有決定的意義了。在革命時期，常有敵人失却頭腦的時機，假如我們在這種時機進攻敵人，那末，我們是可以容易得到勝利的。但是這還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們的敵人，如果他有充足的堅定性的話，那可以事先集合力量的，等等。那時他可以容易地挑撥我們進攻，然後使我們後退數年。這就是我為什麼要說，我們必須準備有退却可能的這個思想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不是從理論的觀點出發而已。從實踐的觀點出發，凡是在最近的將來準備對資本主義改取直接攻勢的一切黨，現在也都應當思索一下如何保證退却。我想，假如我們與我們革命經驗中的其他一切教訓並列而注意到這種教訓，那末，這不僅不會給予我們以任何損害，而且很有可能在好多場合將予我們以利益。

在我強調了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經把國家資本主義看作可能的退却路線以後，現在我就來講我們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吧。我重說一遍：那時，這還是一個很模糊的觀念，但到一九二一年，在我們克服了並且是勝利地克服了國內戰爭最重要的階段以後，我們曾遇到了蘇維埃俄羅斯最重大的——我想，這是最重大的——內部的政治危機，這種危機不但引導到可觀的一部分農民之不滿，而且引導到可觀的一部分工人之不滿。這是蘇維埃俄羅斯歷史

上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後一次廣大農民羣衆，雖然不是自覺的、但却是本能的、在情緒上反對我們的。這種特殊的、對我們當然極不舒服的情況，是由什麼引起的呢？原因是，我們在我們的經濟進攻上推進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安置下足夠的基礎，羣衆曾經感到了我們在那時還不會自覺地明白說出^等，但是不久、在幾星期之後、我們就已經承認了的東西，那就是：直接的轉到純粹社會主義的形式，轉到純粹社會的分配，是超出我們力量以上的，假如我們不能實行這樣的退却，即只限於比較容易的任務，那末，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了。我以爲，危機開始於一九二一年二月。是年春季，我們就已經一致決定——關於這個問題，當時我們沒有見到重大的分歧——採取新經濟政策了。現在，經過一年半之後，在一九二二年年末，我們已經能夠做出若干比較了。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們曾經怎樣渡過了在一年半以上的時間呢？結果是什麼呢？這種退却是不是對我們有益呢？它是否確實救了我們呢？或者結果是不確定的呢？這是我給自己提出的一個主要問題，我以爲這個主要的問題對於一切共產黨也都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因爲，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末，我們統通都要注法定滅亡的。我想，在下面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安心而肯定地答覆這個問題了，即：過去一年半的歲月，正面地和絕對地證明，我們已經考驗及格了。

我現在試圖證明這一點。爲了這一點，我必簡短地列舉我國經濟底一切組成部分。

首先來講我們的財政制度和著名的俄國盧布。我想，可以認為俄國盧布是著名的，那怕只因為這種盧布的數量，現在已達百萬之四次方了（即一之後加二十四個零——被閱者）。這就已經有意思了。這是一個天文學上的數字。我相信，在這裏，甚至不是人人都知道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但是，我們不認為這個數字——並且是從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是過度重要的，因為盡可以把後面的零數塗去的。在這種藝術——它從經濟的觀點看來，同樣是完全不重要的——上，我們已經獲得了一些成績，並且我相信，在事情底以後發展過程中，在這種藝術上，我們還要獲得遠較為大的成績的。至於真正重要的事情，則是盧布穩定的問題。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的最優良的力量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正在給這個任務加以決定的意義。假如我們做到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然後永遠把盧布穩定下來，那就是說，我們獲得勝利了。那時，一切這些天文學上的數字，一切百萬之三次方，百萬之四次方，就都毫無意義了。那時，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經濟安置在牢固的基礎之上，並在牢固的基礎之上向前發展下去。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我可以給你們舉出相當重要的和決定的事實。在一九二一年，紙盧布價格之穩定時期繼續了不及三個月。在今年、一九二二年，它雖然還沒有結束，但穩定時期已延長至五個月以上了。我想，這就已經夠了。如果你們提出科學的證據，我們在將來可以十足地解決這個任務，那末，這當然是不夠的。然而據我看來，要完完全

全地證明這一點，一般說來那是不可能的。所舉的材料證明，自去年我們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起，直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學會前進了。如果我們學會了這一點，那末，我確信，只要我們不做某種特別的蠢事，今後我們也會學會在這條路上得到進一步的成功的。然而，最重要的却是商業，即我們所需要的商品流轉。如果我們不管我們是處在戰爭狀態之中（因為像你們所知道的，海參威僅在幾個星期以前才克服），不管我們僅到現在才能開始完全有系統地進行我們的經濟活動，仍能在兩年過程之內搞好商業，假如我們不管這些，仍能做到使紙盧布底穩定時期從三個月提高到五個月，那末，我相信，我敢說，我們對這就滿意了。可是，我們却是孤立的。我們未曾得到任何借款，現在也沒有得到借款。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此『輝煌』地組織着他們的資本主義經濟，以致他們直到今日還不知道自己到何處去，這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中，沒有一國曾經援助過我們。他們曾以凡爾塞和約創造了一種財政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假如這些大資本主義國家都如此管理其經濟的話，那末，我想，落後的和沒有教養的我們，只要能達到最重要的東西，能達到盧布穩定之條件，那就很滿足了。這不是可以用什麼理論的分析能證明的，而是要用實踐證明的，這，我認爲，實踐比世界上一切的理論論戰都更重要。實踐證明，我們在這裏已經獲得了決定的結果，即我們正開始把經濟向盧布穩定的方向推進，這對於商業，對於商品自由

流轉，對於農民和對於廣大的小生產者羣衆，都是有最重大的意義的。

現在，我來講我們的社會目的。最主要的當然是農民。在一九二一年，我們曾經無條件地遇到了巨大部分農民之不滿。之後，我們又遇到了飢荒，這表示對農民是一個嚴重的考驗。當時所有的外國都嘖叫：「看吧，這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底結果」，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們對於這一事實即在實際上飢荒乃是國內戰爭底殘酷結果，緘默不言，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曾經在一九一八年開始進攻我們的一切地主和資本家，都這樣地設想問題，好像飢荒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底結果。飢荒曾經是重大的和嚴重的不幸，確是使我們全部組織的和革命的工作有被消滅危險的一種不幸。

總之，現在我要問：在這種前所未有的和意外的災難以後，在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以後，在我們允許農民有貿易自由以後，今日的情形究竟怎樣呢？答案是很明白的，人人都是看得見的，即在一年之內，農民不僅對付了飢荒，而且繳納了這樣大量的糧食稅，致使我們現在差不多沒有採用強制的辦法，就已經得到了數萬萬普特的糧食。從前，一九二一年以前，所謂決定俄國一般風景的農民暴動，現在差不多完全絕跡了。農民很滿意於他們的現狀。我們可以泰然地這樣說的。我們認為，這些證據比什麼統計證據都更重要的。至於農民在我國是決定的因素，這是誰都不懷疑的。現在農民正處在這樣的狀態之中，即

我們不必懼怕農民方面有什麼反對我們的運動。我們可以完全自覺的、毫不誇大的這樣說。這已經做到了。農民可以對於我們國家政權底工作之這方面或那方面不滿，他們可以有怨言。這當然是可能的和不可免的，因為我們的機關和我們國營經濟還太不好，不足以預防這種事情，但無論如何，全體農民方面對我們的任何嚴重的不滿，却是完全沒有的了。這在一年之內就辦到了。我想，這就已經很多了。

現在，我再進而講一下輕工業。我們在工業上，對重工業和輕工業應加以區別，因為二者是處在不同的狀況之中。說到輕工業，我可以泰然地說，在這裏可以看到普遍的繁榮了。我不用敘述詳細情節了。引用統計數字，並不是我的任務。但是，這個總的印象，却建築在事實基礎之上，我可以保證，在這種基礎之上是沒有絲毫不正確的或不精密的東西的。我們可以看到輕工業底一般繁榮和與此有關的彼得格勒以及莫斯科工人狀況之確定的改善。在別的區域裏只能在較小的程度上看到這一點，因為在那裏重工業是佔着優勢，因此，人們不應把這種情形一般化。然而，我仍要重複說：輕工業是處在無條件的高漲之中，彼得格勒及莫斯科工人狀況底改善是毫無疑義的。一九二一年底春季，在這兩個城市裏，在工人中間，曾經籠罩着不滿。現在情形就不同了。一天天都在注視工人狀況和情緒的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會錯誤的。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重工業。在這裏，我必須說，情況

仍然是嚴重的。這種情況，到了一九二一年開始有了某種轉變。因此，我們可以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情況將要改善的。我們爲了這個，已經部分地搜集了必要的款項。在資本主義國度裏，爲了改善重工業底狀況，需要數萬萬的借款，沒有這種借款，則改善就不可能了。資本主義各國底經濟史證明：在落後的國度裏，只有數萬萬美元或金盧布的長期借款，才能成爲提高重工業底手段。我們沒有這種借款，直到今日我們仍然沒有得到這種借款。現在關於特許租借權及其他所寫下的東西，除了一張紙面外，一無所有了。近來我們把這寫下了很多，尤其是關於烏爾瓜特的特許租借權。然而，我以爲，我們的特許租借權政策是極好的。可是雖然如此，我們却還沒有碰到過得去的特許租借權。這就是我要請你們不要忘記的一點。因此，重工業底狀況對我們落後的國度，確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因爲我們不能希望從富裕的國度得到借款。雖然如此，但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種顯著的改善，其次，我們看到，我們的商業活動，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若干資本了。誠然，目前是爲數很小的，僅僅超過二千萬金盧布多一點。無論如何，基礎已經奠下了：我們的商業提供我們以款項，我們可利用以改善重工業底狀況。目前，我們的重工業，不論如何，還處在極困難的局面之中。但是，我認爲我們已經能夠節省了。以後，我們也還要這樣做的。雖然這往往是靠人民得來的，但我們現在仍應節省。我們現在正設法縮小我們國家預算，縮小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在後面關於我們

國家機關，還要講幾句的。我們無論如何必須縮小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必須盡可能地節省。我們要節省一切，甚至在學校方面也要節省。非如此不可，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設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不能成其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要滅亡的。我們深深曉得這一點。

不僅農民經濟的豐收——這還不夠——，不僅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底健全狀態——這也還不夠——是對俄國之拯救，而且我們也需要重工業，而為了使重工業達到健全狀態，則需要很多年的工作。

➤ 重工業需要國家補助金。如果我們籌不出這種補助金，那末，我們作為文明的國家——我就不用說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了——，就要滅亡的。所以，在這一關係上，我們已經有了斷然的一步。我們已經籌得了為使重工業站稳自己腳跟所必要的款項。誠然，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籌出的數目，還不足二千萬金盧布，但是，不論如何，這一筆錢是有了，它只是用於提高我們的重工業。

我想，如前邊所允諾的，一般說來，我已經簡短地給你們解釋了我們國民經濟的最主要的因素了，我想，從這一切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說，現在新經濟政策已經有了成績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證據，證明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能夠進行商業，保持農業和工業底鞏固障地，而向前進了。實際的活動已經證明這了。我想，目前這對於我們已經夠了。我們還必須學會更多的事務，我們已經懂得

我們還必須要學習的。我們保持政權已經五年之久了，並且在這整整五年之內，我們都處在戰爭狀態之中。這就是說，我們已經有了勝利了。

這是很明白的，因為農民是擁護我們的。要農民比擁護我們更進一步，那是很難的。他們懂得，站在白軍背後的是地主，他們仇視地主，比仇視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更厲害。因此，農民是以最大熱忱，以最大的忠心擁護我們的。要農民保衛我們，抵抗白軍，那是不難達到的事情。以前曾經帶俄戰爭的農民，會盡一切可能，擁護反對白軍的戰爭，擁護反對地主的國內戰爭。然而，這還不能包括一切，因為在這裏本質上只是政權保留在大地主手裏抑或農民手裏的問題。對於我們這是不夠的。農民了解，我們是爲工人奪取政權的，我們的目的，是借助這個政權創立社會主義的秩序。因此，對於我們最重要的乃是爲社會主義經濟底經濟上的準備。我們不能用直接的道路去準備這種經濟。我們不得不走彎路去準備這種經濟。像我們所建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是和普通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概念並不相同的。我們握有一切大權，我們握有土地，土地是屬於國有的。這是極重要的事情，雖然我們的敵人這樣地較速問題，好像這沒有什麼意義似的。這是錯誤的。土地屬於國家，這個情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經濟關係上也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我們已經達到這一點了，我必須說，我們以後的一切活動也都只有在這個範圍內發展起來。我們已經做到了使我們的農民擁

意，使工業活躍、商業活躍的地步了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跟黑字圖所了解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即在於我們不僅把土地，而且也把工業底一切最重要部分都握在無產階級國家手裏了。我們首先出租了若干部分的中小工業，把一切其他的工業都留在自己手裏。至於說到商業，那末，我還想着重地說，我們正在努力成立混合公司，我們已經成立了混合公司，即資本的一部分屬於私人資本家，而且是外國資本家，另一部分則屬於我們的公司。第一，我們是用這種方法學習提高，這對於我們是必需的；第二，在我們認為這有必要時，我們隨時有取消這種公司的可能，所以我們是無險可冒的。我們是跟私人資本家學習，並試圖研究出我們如何可以升到高處去，我們會犯那些錯誤。據我看，我可以只限於說這麼多就夠了。

我還想提一提幾個不十分重要的問題。

無疑義的，我們已經做了而且現在還在做着很多的蠢事，再沒有比我把這判斷得更好，看得更清楚的了。

爲什麼我們正在做着蠢事呢？這是很明白的，第一，我們是一個落後的國度；第二，我國的教育是非常低的；第三，我們沒有得到外援。沒有一個文明的國家會幫助我們的。相反的，他們都是在力謀反對我們的。第四，我們的國家機關要負責。我們承襲了舊的國家機關，這是我們的不幸。國家機關常常犯事反對我們的。情形是這樣的：一九一七年，在我們取得了政權以後，國家機關對我們寫道。我們當時非常震驚，並請求說：「請開頭吧。」之後，

他們就通通回頭了。這曾是我們的不幸。現在，我們擁有大批服務人員，但我們沒有真正能夠指揮他們的足夠的、受過教育的力量。事實上，常有這種情形，即在上面，在我們擁有國家政權的地方，某些機關相當盡職，但在下面，在他們指揮的地方，他們就這樣地指揮着，即時常從事反對我們的措施。在上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我想，無論如何，只有幾千個，至多也不過幾萬個。但是，在下面，那從沙皇政府和資產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舊官吏，就有數十萬人，他們部分地是自覺的從事反對我們的，部分地是不自覺地從事反對我們的。在這裏，在最短時期內，是幹不出什麼事來的。那是不容置疑的，在這裏，我們必須做很多年的工作，以便使機關完善起來，改變它，並吸收新的力量。我們之從事這種事情是相當快的，也許是太快了。蘇維埃學校，工人大學，已經成立起來了，幾十萬青年在學習着，也許學得太快了，但無論如何，工作是已經開始了，我想，這種工作是會有它底果實的。假如我們工作不操之過急，那末，幾年之後，我們就有大批足以根本改變我們機關的青年人了。

我已經說過，我們曾經做了大量的蠢事，但在這一關係上，我也必須關於我們的敵人再說幾句話。如果我們的敵人譴責我們，指出說，似乎列寧本人也承認，布爾塞維克曾經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末，我就要回答他們說：是的，但是，你們可曉得，我們的蠢事是和你們的完全不同的。我們只是開始學習而已，但是，我們却正在這樣有系統地

學習，致使我們確信，我們將得到好的結果的。可是，假使我們的敵人，即資本家和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強迫我們所做的蠢事，那末，我就讓我在這裏引用一位著名的俄國作家底話來做個比喻，我把他的話稍微改變了一下，這樣，就如下述：如果布爾塞維克做了蠢事的話，那末，他就說：『二乘二等於五』；如果他的敵人即資本家和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做了蠢事，那末，他們就說：『二乘二等於洋燭燭』^①。這是不難證明的。比方，就拿英、美、法、日和高爾察克所締結的條件來說吧。我要問你們：世界上有沒有更開明的和更強大的強國呢？結果怎樣呢？它們不作計算、不考慮、不觀察，就承諾幫助高爾察克。這是一個大失敗，據我看，這個失敗甚至從人的常識之觀點看來，也是很難了解。

或者再舉一個別的更親切、更重要的例子：凡爾賽和約。我要問你們：在這上面，『偉大的』、『光榮的』列強，做了些什麼事情呢？他們如何能夠找到打破這種混亂和這種謬論的出路呢？我想，如果我再說一次，我們的蠢事，跟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世界及第二國際沆瀣在一起所做的蠢事比較起來，還是不算什麼的，那末，這並不

① 這裏，列寧所引的，是屠格涅夫在其小說父與子裏面讓女性仇視片皮加索夫所說的話，他是想用這些話說明，女人在辯論時也要比男人辯論時更不合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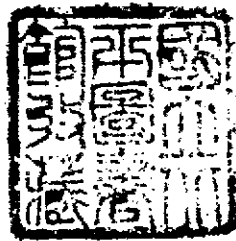
是誇大之詞。因此，我認爲，世界革命底前途——這是我應該簡單的說一說的題目——是有利的。我以爲，在某一定的條件之下，這種前途還要更好些。關於這些條件，我暫不說幾句。

在一九二一年，在第三次大會上，我們曾經通過了共產黨組織機構及其工作方法和內容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差不多澈頭澈尾是俄國的，就是說，一切都是取自俄國情況的。這是它的好的方面，但同時也是它的不好的方面。其所以不好，是因爲，我確信，差不多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把它從頭到尾讀完的——在我說這句話以前，我又把這個決議案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第一，這個決議太長了，它有五十個或五十個以上的節目。通常外國人都是不能讀這樣長的東西的。第二，即使把它讀完，那末在外國人當中也沒有一個人懂得它，正因爲它太俄國化了。並不是因爲它是用俄文寫的——它已經很好地翻譯成了各國的文字——，但它澈頭澈尾地充滿着俄國的精神。第三，即使某位外國人例外地讀懂了它，那末，他也不能執行它的。這是它的第三個缺點。我曾經和幾位來到了這裏的代表談過話，並且我希望，在大會以後的過程中，即使我不親自參加大會——可惜這對我是不可能的——，但也要和各國來的大多數代表詳細談話的。我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即我們在這個決議犯了很大的錯誤，即我們自己給自己斬斷了走到進一步勝利去的道路。如我所談的，決議是做得非常好的，我贊成它底一切五十節目或五十以上的節

目。但是，我們沒有了解，應當怎樣以我們俄國的經驗去接近外國人。決議案裏面所說的一切，都仍然是死的字句。可是，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點，那末，我們就不能向前推進了。我以爲，對我們大家，對俄國同志及對外國同志，最重要的，則是我們在俄國革命五年之後應學習的東西。我們現在只是獲得了學習的機會。我不知道，這種機會能夠繼續多久。我不知道，資本主義列強給我們安心學習的機會能夠有多久。可是，我們必須利用每一個沒有鬥爭活動、沒有戰爭的時機來學習，並且要從頭學起。

全黨和俄國底一切階層，都以他們渴求知識的慾望證明了這一點。這種對學習的努力表明，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乃是學習，再學習。但是，外國的同志也應該學習，這不是說，要像我們學習的那樣去學習——學習讀、寫、及理解所讀的東西，這對於我們還是需要的。人們在爭論，這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呢抑或資產階級的文化？我讓這個問題暫作懸案。不論如何，不容置疑的：我們首先必須要學會讀、寫和了解所讀的東西。外國人是不需要這的。他們所需要的，已是一種較高的東西；屬於這一類東西的，首先是他們同樣要了解我們關於共產黨組織機構所寫成而外國同志沒有讀和沒有了解就簽了字的那些東西。這應該是他們的第一個任務。必須要把這個決議付之執行，一個夜裏是不能完成這個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決議案太俄國化了，它反映了俄國的經驗，因此，它是爲外國人所完全不明白的，並且他們不能滿足於這樣一點，即：把它當作型

業，掛到牆角上，並向它做祈禱。這種辦法是不能得到赫變的結果的。他們必須消化俄國經驗的優良的東西。怎樣消化，我是不知道的。也許下面這種情形會對我們有莫大的功績，即：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他們向意大利人說明，意人還啓蒙得不夠，意國還沒有免除黑色百人團的。也許這會是十分有益的。我們俄國人，同樣必須尋找向外國說明這個決議案概要的辦法。否則，他們是絕對不能執行這個決議案的。我堅信，在這一關係上，我們不但應當對俄國同志，而且也應該對外國同志說：在目前正在來到的這一時期，學習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學習的。他們却必須在特殊的意義上學習，使他們真正把握到革命工作之組織、機構、辦法和內容。假如做到這一點的話，那末，我確信，世界革命的前途將不僅是輝煌，而且是非常好的。



259	13	在亞姆……	的亞姆……
280	1	森」。	行」。
282	3	社主義	社會主義
287	3	半吊子集團	半吊子的集團
295	1	偶然的	偶然性
304	4	我們說不要：…	我們說：不要…
323	17	代表者	表現者
334	15	在把共產	把共產……
356	16	後而這……	後面這……
368	4	隨便尊便……	隨便……
378		與391頁訂錯	與391頁掉換
384	倒數7	三月的出動	三月的發動
385	9	三月出動	三月發動
391		與378頁訂錯	與378頁掉換
392	13	機會主義的憎恨	機會主義之憎恨
395	10—11	三月出動	三月發動
417	8	舍拉第	塞拉第
420	4	一九二二年季	一九二二年初
432	13	未提可是……	未提。可是……
442	1	…地步了我…	…地步了。我…
445	倒數3	這個決議犯了…	這個決議內犯了…

又：70和71頁「最後的一言」一語，係俄文成語，即最新原理或最後結論之意。

「列寧選集」第十八卷正誤表

頁數	行數	錯字	改正
扉頁目錄	2	第八十卷	第十八卷
2	3	國際主義	國際意義
2	7	…鬥爭發育……	…鬥爭中發育……
正文			
14	倒數3	察雷特里	蔡雷特里
17	12	國際思潮	國際派別
51	倒數6	而像	正像
64	4	國際主義	國際意義
76	9	【……主義者】 看的……	【……主義者】 的……
80	10	…行爲)最…	…行爲)，最……
137	10	茲奇	茲哥……
150	4	那對	那時……
197	12	列達布爾	列迭布爾
220	3	野，	的田野，
220	4	的田飛揚	飛揚
231	10	麥克納爾	麥克唐納

